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 清末民初无政府派的文化思想

〔韩〕曹世铉◇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本书着重探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无政府派的文化思想。作者通过对无政府派是否西化派，无政府主义与进化论、科学主义之间的关系，无政府派文化革命论的具体内容及其内在逻辑，无政府派文化思想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等问题的探讨，揭示了无政府派思想在反专制、反封建中做出的积极贡献及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与历史意义。

ISBN 7-80149-997-2



9 787801 499974 >

<http://www.ssdph.com.cn>

ISBN 7-80149-997-2/K · 132

定价：25.00元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 清末民初无政府派的文化思想

〔韩〕曹世铉/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著 者 / [韩]曹世铉

---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 政 编 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dph.com.cn>  
责 任 部 门 / 编辑出版中心  
(010)65232637  
项 目 经 理 / 宋月华  
责 任 编 辑 / 章绍武  
责 任 校 对 / 杨蔚琴  
责 任 印 制 / 同 非

---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 者 服 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65285539  
法 律 顾 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 /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

开 本 / 850 × 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12  
字 数 / 274 千字  
版 次 /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 ISBN 7 - 80149 - 997 - 2 / K · 132  
定 价 / 25.00 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学术评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 戴 逸  
副主任委员 齐世荣 金冲及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邓小南 王思治 刘桂生 刘家和  
阮芳纪(常务) 陈铁健 张振鹞  
张椿年 经君健 郭松义 阎步克  
谢曙光

##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沈志华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一川 于 沛 王小甫  
张 彤 李世安 李丹慧  
杨 群 陈东林 徐思彦

##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书目

### 1994 年度

- 《魏忠贤专权研究》，苗棣著
- 《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高王凌著
-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朱德新著
- 《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研究》，王中田著
- 《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沈志华著
- 《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李世安著

### 1995 年度

- 《中国古代私学发展诸问题研究》，吴霓著
- 《官府、幕友与书生——“绍兴师爷”研究》，郭润涛著
- 《1895~1936 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陈争平著
- 《1949~1952 年中国经济分析》，董志凯主编
- 《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马龙闪著
- 《利玛窦与中国》，林金水著
- 《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1774~1911 年）》，吕昭义著

### 1996 年度

- 《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许檀著
- 《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职能研究》，吴吉远著
- 《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罗检秋著
- 《南通现代化：1895~1938》，常宗虎著

《张东荪文化思想研究》，左玉河著

### 1997 年度

《〈尚书〉周初八诰研究》，杜勇著

《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  
侯旭东著

《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陈爽著

《西域和卓家族研究》，刘正寅 魏良弢著

《清代赋税政策研究（1644～1840年）》，何平著

《边界与民族——清代勘分中俄西北边界大臣的察哈台、满、  
汉五件文书研究》，何星亮著

《中东和谈史（1913～1995年）》，徐向群 宫少朋主编

### 1998 年度

《古典书学浅探》，郑晓华著

《辽金农业地理》，韩茂莉著

《元代书院研究》，徐梓著

《明清高利贷资本》，刘秋根著

《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尚小明著

《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李细珠著

### 1999 年度

《唐代翰林学士》，毛蕾著

《唐宋茶业经济》，孙洪升著

《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臧运祜著

《改良的命运——俄国地方自治改革史》，邵丽英著

### 2000 年度

《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东周墓葬制度》，印群著

《中国地名学史考论》，华林甫著

《宋代海外贸易》，黄纯艳著

- 《元代史学思想研究》，周少川著  
《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王宏斌著  
《清代私盐问题研究》，张小也著  
《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王跃生著  
《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徐浩著  
《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 11 村透视并与英国农村之比较》，侯建新著  
《儒学近代之境——章太炎儒学思想研究》，张昭军著  
《犹太民族史上的东方一页：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上海犹太人》，潘光 王健著  
《俄国东正教会改革（1861~1917）》，戴桂菊著  
《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 年）》，李春放著

#### 2001 年度

- 《〈仪礼·丧服〉考论》，丁鼎著  
《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韩树峰著  
《两宋货币史》，汪圣铎著  
《明代充军研究》，吴艳红著  
《明代史学的历程》，钱茂伟著  
《清代科举家族》，张杰著  
《清代台湾的海防》，许毓良著  
《清末民初无政府派的文化思想》，〔韩〕曹世铉著



##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改版弁言

从1998年起，文库改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设立文库的初衷，“出版前言”都讲了，这是历史记录，改版后仍保留，这也表明改版并不改变初衷，而且要不断改进，做得更好。

1994年，面对学术著作出书难，由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毅然支持，文库得以顺利面世，迄1997年，已出版专著25部。1998年，当资助文库的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面临调息困难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又慨然接过接力棒，并于当年又出了改版后专著7部。5年草创，文库在史学园地立了起来，应征书稿逐年增多，质量总体在提高，读者面日益扩大，听到了肯定的声音，这些得来不易，是要诚挚感谢大家的；而需要格外关注的是，我们的工作还有许多缺点、不足和遗憾，必须认真不断加以改进。

如何改进？把这几年想的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全力以赴出精品。

文库创立伊始就定下，资助出版的专著，无例外要由专家推荐、经编委初审、评委终审并无记名投票通过，从制度上保证选优原则；评委们对专家推荐的书稿，是既充分尊重又认真评选，主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前后两家出版社也都希望出的是

一套好书。这些证明，从主观上大家都要求出精品。从客观来说，有限的资助只能用在刀刃上；而读者对文库的要求更是不断在提高，这些也要求非出精品不可。总之，只有出精品才能永葆文库的活力。

出精品，作者提供好书稿是基础。如“出版前言”所指出的，开辟研究的新领域、采用科学的研究新方法、提出新的学术见解，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达到或基本达到这些条件的，都是好书。当然，取法乎上，希望“上不封顶”；自然，也要合格有“底”，初步设想相当于经过进一步研究、修改的优秀博士论文的水平，是合格的“底”。有了好书稿、合格的书稿，还需推荐专家和评委的慧眼，推荐和评审都要出以推进学术的公心，以公平竞争为准则。最后，还要精心做好编辑、校对、设计、印装等每一道工序，不然也会功亏一篑。

5周岁，在文库成长路上，还只是起步阶段，前面的路还长，需要的是有足够耐力的远行者。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编辑委员会

1998年9月

##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出版前言

在当前改革大潮中，我国经济发展迅猛，人民生活有较大提高，思想观念随之逐步改变，全国热气腾腾，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举国公认，世界瞩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而尚待完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那就是在社会各个角落弥漫着“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止；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的浊流。出版界也难遗世而独立，不受影响，突出表现为迎合市民心理的读物汗牛充栋，而高品位的学术著作，由于印数少，赔本多，则寥若晨星。尚无一定知名度的中青年学者，往往求出书而无门，感受尤深。这种情况虽然不会永远如此，已使莘莘学子扼腕叹息。

历史科学的责任，是研究过去，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指导现实。我国历来有重视历史的传统，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数千年者，与此关系匪浅。中国是东方大国，探索东方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能更加直接为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借鉴。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历史学科十分关心，但限于财力尚来充裕，资助项目难于面面俱到。我们是一群有志于东方史研究的中青年学人，有鉴于此，几年前自筹资金设立了一个民间研究机构，现为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创业伊始，主要是切磋研究。但感到自己研究能力毕竟有限，于是决定利用自筹资金

## 2 清末民初无政府派的文化思想

设立“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有关东方历史的优秀研究成果出版。凡入选的著作，均以《东方历史学术文库》作为丛书的总名。

我们这一举措，得到了老一辈史学家的鼓励，中青年同行的关注。胡绳同志为基金题词，在京的多位著名史学专家慨然应邀组成学术评审委员会，复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允承出版；全国不少中青年学者纷纷应征，投赐稿件。来稿不乏佳作——或是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或在深度和广度上超过同类著作；或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或提出了新的学术见解，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百花齐放，绚丽多彩。这些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也增强了我们办好此事的信心。

资助出版每年评选一次。凡提出申请的著作，首先需专家书面推荐，再经编辑委员会初审筛选，最后由学术评审委员会评审论证，投票通过。但由于基金为数有限，目前每年仅能资助若干种著作的出版，致使有些佳著不能入选，这是一大遗憾，也是我们歉疚的。

大厦之成，非一木能擎。史学的繁荣，出版的困难，远非我们这点绵薄之力能解决其万一。我们此举，意在抛砖引玉，期望得到海内外企业界，或给予我们财务支持，使我们得以扩大资助的数量；或另创学术著作基金，为共同繁荣历史学而努力。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编辑委员会

1994年9月

## 序

近 20 年来，对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的研究有了明显的进展，陆续整理出版了多种有关的资料集，出版了学术著作五部，还发表了一批论文，可谓形成一个研究的热点。

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是探讨中国无政府主义政治思想和运动的，多有创获。但是，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所涉内容广泛，除去政治思想和运动这一主要领域外，文化思想也是一个重要方面。韩国曹世铉博士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有鉴于对近代中国无政府派文化思想研究的薄弱，选择了这个问题作为他的博士论文题目。1999 年，他进行了博士论文答辩。此后，根据专家所提意见和自己发现存在的问题，对论文做了认真的修改补充，即现在出版的《清末民初无政府派的文化思想》一书。

曹世铉学习勤奋，研究工作做得扎实。他对于清末民初无政府派文化思想的研究，一方面是从掌握中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学界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情况入手，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做了实事求是的评析；一方面是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着重以《天义》、《衡报》、《世界》、《新世纪》、《新世界》、《社会世界》、《人道周报》、《良心》、《民声》、《自由录》、《进化》及《新青年》等十余种报刊作为分析问题的文献基础，并按刊物、时间顺序列出刊登的有关无政府主义文化思想文章的一览表，作为附录。曹世铉在这两方面所做的工作，表明了其治学态度的严谨，是值得赞许

的。历史研究，文献资料是基础。没有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研究是难以进行的。而详细了解已有的研究状况，是做好所研究课题的出发点。不了解已有的研究状况，不“知彼”，研究是盲目的。盲目的研究，或则是无谓的重复劳动，或则是不能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突破创新。学术需要积累，需要继承。学术的发展，是在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发展；学术的创新，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学术的发展，就是在不断积累和扬弃中进行的。长江后浪推前浪，没有前浪哪来可推的后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没有蓝也没有可胜的青。轻率地否定前人的学术成果，认为前人的研究都是浅层次的、陈旧的，只有自己的研究成果才是深层次的、创新的等等，并不可取。

《清末民初无政府派的文化思想》共五章，包括无政府主义的传人和无政府派的形成、“天义”派的文化思想、“新世纪”派的文化思想、民国初无政府派的传统文化革新思想和中国无政府派与新文化运动，着重论述了中国无政府派文化思想形成、发展的历程，“天义”派、“新世纪”派文化思想各自的特点，民国初期无政府派与“新世纪”派文化思想的关系，以及无政府派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等问题，构成了清末民初中国无政府派文化思想发展变化的脉络。

在这些问题的论述中，作者阐发了自己的见解。例如，认为“近代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是进化论和科学主义的产物。中国无政府派所宣传的进化论和科学主义，并不是他们所创造的产物，而是时代的普遍思潮。这种以进化论和科学主义为武器消灭现存体制的努力，最终陷入了自我矛盾之中”；“从文化思想方面来说，早期无政府派张继、杨笃生的无政府主义解释中，除了宣传对清政府的革命主张以外，还存在着对传统儒教价值体系的全盘性的否定，如‘吾愿杀尽结婚者’、‘吾愿杀尽孔孟教之徒’等。与此相反，国粹派马叙伦、刘师培的解释则强调了无政府主义跟‘佛

氏涅槃、孔氏太平、释氏天国’式传统乌托邦的类似性，或古代刺客和近代虚无党人的同质性，即他们在传统历史中理解无政府主义的存在意义。上述两种解释，即反传统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解释与传统、历史和无政府主义的结合，暗示了后来的‘新世纪’派和‘天义’派的两种无政府主义思维方式”；“通过社会党和师复等人的社会运动，可以较容易看到‘新世纪’派的深刻影响。民初无政府派通过他们的期刊反复介绍‘新世纪’派的观点，而且出版了‘新世纪’派的不少著作及译著。其实，家族、女性、道德、教育、世界语等各种文化问题的基本看法都是由《新世纪》而来的。可以说，‘新世纪’无政府主义在民初社会里占据其主导性地位。……对清末《新世纪》无政府主义的再解释，即是民初的师复主义，这使它成为清末无政府主义和新文化运动时期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桥梁”；“清末时期《新世纪》的文化思想作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青年》思想上的起源之一，对新文化运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等等。之所以列举了书中的一些论断，是想便于读者了解作者在书中的主要思路。

曹世铉在书中所阐发的见解，不是随意拈来的片断史料就轻易立论，而是依据翔实的文献，全面地考析后做出的论断。学术需要创新，不创新就不能发展。但是，创新是一个艰苦研究的过程，要费时日，花心血，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能急于求成，用取巧的、走捷径的办法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创新。

人无完人，书也无完书。曹世铉的这部著作当然不是完美无缺的，会存在着不足甚至错误之处。书中的论断，读者也未必都赞同。有不同意见是好事，通过争鸣探讨，可以得到提高。

桑书铎

2002年4月19日

# 目 录

序	1
绪 论	1
第一章 清末社会思潮中的无政府主义	17
第一节 革命的虚无主义者的出现	18
1. 1905年以前上海的革命风潮	18
2. 俄国“虚无党”和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介绍	25
3. 东京《民报》中的社会主义宣传	36
第二节 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	43
1. 日本：“亚洲和亲会”和“社会主义讲习会”	43
2. 法国：“世界社”与言论出版事业	56
小 结	70
第二章 以国学批判专制文化——“天义”派的文化思想	72
第一节 刘师培：国粹与无政府之间	73
1. 论家族、三纲和孔子	73
2. 文字、教育改革论	84
第二节 古和今，中和西	90



1. 传统文化中的乌托邦 .....	90
2. 批判西方文明, 提倡“中国式”无政府革命 .....	97
第三节 妇女解放论 .....	106
1. 男女问题与家庭问题 .....	106
2. 女性和社会革命 .....	112
小 结 .....	117
<b>第三章 以科学反对传统文化——“新世纪”派的文化思想</b> .....	120
第一节 提倡科学、道德, 批判宗教、迷信 .....	121
1. 科学, 互助, 无政府 .....	121
2. 以无政府教育代替宗教 .....	127
第二节 尊今薄古: 家庭, 三纲, 孔子, 女性 .....	138
1. 家庭、三纲及“孔丘之革命” .....	138
2. 女界革命论 .....	149
第三节 否定“保存国粹”, 宣传“万国新语” .....	154
1. 批评“好古”的国粹主义 .....	154
2. 文字革命论与世界语论争 .....	161
小 结 .....	169
<b>第四章 民国初无政府派的反复古主义</b> .....	172
第一节 中国社会党(含“新”社会党)与文化革新论 .....	173
1. 江亢虎和“三无主义” .....	173
2. 中国社会党: 广义, 纯粹, 无治 .....	182
3. “新”社会党: 狭义, 极端, 无强权 .....	192
第二节 师复与无政府共产主义文化论 .....	201

---

1. 从“刘思复”到“师复” .....	201
2. “心社”和清除旧恶习 .....	206
3. 《民声》中的反复古主义 .....	212
小 结 .....	227
<b>第五章 中国无政府派与新文化运动</b> .....	<b>229</b>
<b>第一节 蔡元培和原“新世纪”派的新文化运动</b> .....	<b>230</b>
1. 民初吴、蔡、李的道德启蒙运动 .....	230
2. “以工兼学”、“以学兼工”——（留法）勤工俭学 运动 .....	238
3. “互助”和“劳动”——无政府主义在北京大学 .....	248
<b>第二节 《新青年》言论中的无政府主义</b> .....	<b>257</b>
1. 陈独秀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 .....	257
2. 《新青年》作者中的无政府派 .....	265
3. 无政府派论“新文化”：以《新青年》为中心 .....	273
小 结 .....	286
<b>结 语</b> .....	<b>289</b>
<b>附 录</b> .....	<b>294</b>
<b>参考文献</b> .....	<b>314</b>
<b>后 记</b> .....	<b>345</b>

---

## 绪 论

清朝末期的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一系列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最主要表现为改良或推翻清朝而建立近代政治制度，并以此为基础来对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改变导致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专制主义、封建主义现存的社会制度。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这一时期出现了各种新的社会思潮。例如，共和主义思潮、君主立宪主义思潮、国粹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等。其中，共和派的理论——三民主义——成为辛亥革命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政治和社会诸方面的基本理念。与此相反，革命后君主立宪派的政治理想虽然失败了，但其中传统主义色彩浓厚的一部分人物结合国学复兴运动，于20世纪20年代再次登上历史舞台并掀起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保守派和革命派里都出现过的国粹主义思潮也受到本世纪初盛行的反传统主义的影响而萎缩，而到了五四运动以后，重新走上了再生的道路。然而，社会主义思潮经过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地接受过程，成为后来的中国共产主义的前奏，并且通过1949年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新的社会理念。因此，清末时期出现的主要思潮，尽管在它们的政治理想的实现上存在成败，但作为一种社会运动，仍然存在其生命力。就这一点来说，本研究的主题——中国无政府主义也不例外。

**近代中国社会与无政府主义的兴起原因** 讨论无政府主义之前，有必要了解无政府主义为什么在中国近代社会占有相当重要

地位的原因。众所周知，清朝末期西方的各种思想大量传播到中国，并有选择地被接受。无政府主义就是其中的一种例证。特别是在较短的时期内无政府主义成为主要思潮之一，这一事实说明，在中国思想界里存在着可以接受无政府主义的社会背景。就像有些学者所指出的一样，其原因在于长期支配中国社会的“广泛的民族主义”思潮之中<sup>①</sup>。其实，清末时期无政府主义的最大特征，就在于与民族主义这一时代精神的不可分关系之中，就这一点来说，其他诸多思潮也不例外。

在西方社会里主张世界主义、普遍主义并彻底反对种族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是怎样跟中国等东亚社会的民族主义思潮结合起来的呢？对于从表面上看似乎相互矛盾的这一问题，美国研究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学者德里克（Arif Dirlik）认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最关心的是民族主义问题，虽然无政府主义具有与社会进化论的民族主义相反的倾向，但是它在中国具有号召力，就与重新解释的民族主义思想有关。这就是无政府主义在对社会进化论的民族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又作为其补充思想，具有时代的历史意义<sup>②</sup>。这是基于西方民族主义和中国等第三世界地域民族主义的差别之上。西方的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结合的现象比较多。与此相反，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特点是，在于它与激进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结合之上。因此，无政府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这一现象也就在这种背景下可以得到解释。换言之，近代东亚社会共同面临的两重压迫，即抵御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解决封建社会内部构造的危机，促使其形成了与西方不同性格

① [日] 巖崎隆：《近代中国アナキズムの研究》，东京，研文出版，1994，第8页。

② [美] Arif Dirlik. *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50~63.

的民族主义，并且在其时代潮流内可以吸收包括无政府主义在内的大部分西方思潮。近代时期东亚社会所认为的民族主义，是非常复杂模糊的概念，并且在近代时期，由于 Nationalism 这一词通过日本翻译为“民族主义”后所出现的错误，又引起了不少误解<sup>①</sup>。其实，Anarchism 这个词也是错误翻译的另一个代表事例。日译“无政府主义”的翻译应是“反强权主义”，这是较正确的解释<sup>②</sup>。如此，民族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两者概念之间的不谐和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在翻译过程中就发生了。

为了更加充分地理解，以在中国民族主义形成过程中贡献最大的西方“进化论”为例，再次理解无政府主义在中国被接受与其发展的意义。诸多学者都认为，清末民初在思想史上是进化论最为盛行的历史时期。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就是对欧洲进化论适合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的一种有力的例证。其代表性进化理论是以斯宾塞、赫胥黎等为代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以克鲁

---

① 一般来说，英文 Nation 的近代翻译词是“民族”一词。但英文 Nation 本来指的是有关公共事务的、有关国家相关的政治概念。因此，其意义较“国民”清楚。并且，英文 Nationalism 翻译为“国民主义”比“民族主义”更明确。其实，近代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和“国民主义”两概念之间的区分不甚清楚。中国等东亚社会的所谓“民族主义（或国民主义）”政治理念，实际上是为了建设强有力国民国家而追求国家与社会的协助，然而，无政府主义则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否认现存国家的存在意义，并且主张进行解体国家的社会革命，这就是它们之间的根本性的差异。但它们两者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平民主义”或“人民主义”的政治趋向。

② 在东亚社会里“无政府主义”这一词在翻译接受过程中已经被歪曲，即本来 Anarchism 词源是 An (=无) + Archi (=支配、权力、暴力、抑压)，所以这词的意味较广泛。但它译为“无政府主义”以后，成为否定合法政府和一切组织的混乱和暴力的代名词。还有，与西方一样，无政府主义和虚无党的暗杀、暴动方法无分别，这也就更加加重用词的歪曲现象。本书在 Anarchism 和“无政府主义”的选用过程中，为了研究的方便，即选用一种约定俗成的用法“无政府主义”。

泡特金为代表的“互助论”的无政府主义。他们都是达尔文主义者和社会学家，而且其研究方法论在科学主义原则（主要是归纳和演绎）上基本一致，只是在自然进化论对人类社会的解释上有差距。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本来是对强调生存竞争的斯宾塞式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性的修正理论。20世纪初社会达尔文主义接受初期，中国知识分子并不重视帝国主义问题而只注重排满革命问题，由此导致了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理论越来越明显，所以中国知识分子迫切需要相应的理论来纠偏补弊。“互助”的进化论在近代中国可以得到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思想中存在对于“竞争”的民族主义（指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的批判因素。这是由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换言之，无政府主义的被接受这一现象可以在进化论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得到理解。这种事例，从社会契约论（民约论）或天赋人权说等其他主要西方思想的吸收过程，也可以得到解释。

另外一方面，即便看到“传统和近代化”这一热门话题，在中国的政治危机和传统价值体系的危机中，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方的无政府主义这一事实说明无政府主义思想包含着可以刺激中国传统的内容。与在社会进化论的接受过程中所出现的情形一样，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的互助论，在历史认识上具有反传统的特性。在吸收社会进化论的过程中，也已经具有了反资本主义的因素，所以作为社会主义理论之一的互助论更加彻底地具有反资本主义的性格。他们反对传统的态度当时所持的是民族主义的观点，我们从新文化运动中的反传统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现象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使我们更加重视包括中国在内的近代东亚社会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与历史状况。在反传统的意识体系里除了对传统的全面否定倾向以外，还存在着既批判专制主义封建文化又希望恢复古代传统的传统趋向性的集团即国粹派，对此种事实应该留意。中国的无政府派里，不仅存在坚持全面否定

传统的人（例如新世纪派），而且也有着把传统思想中的老庄的小国寡民、佛教的个人解脱以及儒墨的尚同乃至对大同世界的追求等和西方无政府主义联系起来的人（例如天义派）。

把清末民初中国社会里无政府主义盛行原因和以往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看，国内因素，除了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的背景以外，还应进一步说明中国传统思维体系里与无政府主义类似的思维体系的存在。尤其应强调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儒家为中心的伦理政治与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理论的相似性，从而说明克鲁泡特金主义何以成为中国无政府主义主流的原因。更为直接的是，通过由于对清政府的失望从而兴起的革命运动这一过程，分析了无政府主义的接受过程，并且通过对当时中国留学生的增加和他们接受新思想的过程中来考察无政府主义。另外还分析了以小农为主的中国农村社会的意识结构与无政府主义相似的原因。国际因素，以欧洲、日本等国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国际劳动运动的兴起和俄国虚无党的暗杀、暴动风潮等影响为基本中心而展开论证。俄国与中国都是类似的专制主义国家，所以处于相似的政治文化环境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更加容易产生共同感。无政府主义等各种西方社会思潮通过日本而进入近代中国社会，并产生了直接的冲击作用，因此，也应该重视近代日本思想界的趋向。所以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扎下了根，并且不仅在政治、经济问题上，而且在日常文化方面，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研究情况及其特点** 专门研究无政府主义的学者们一致认为，关于无政府主义的概念、内涵及其思想的发展形态，就像光线通过棱角镜就会产生各种颜色一样，其内容和形式上具有多样性、复杂性，从而在研究上存在相当的难度。因此，对无政府主义的研究，不能简单化，需要加以具体分析。其实，无政府主义在成为“理论”以前应先解释为“信念”与“情感”的特殊思想。特别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研究，过去一段时期由于资料不

足，更加增大了研究的困难。但是最近，由于出版的资料集增多，并且发表了从多种角度论述中国无政府主义的论文，现在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到它的前景。

中国学术界早期对无政府主义研究的传统观点认为，它基本上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而且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政治理念。在这种观点下，过去的研究大多注重他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运动方面，所以通过研究对它的评价不高。早期研究者还认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的活动无政府主义的色彩比较浓厚，因此，为了批判“四人帮”从而开始研究无政府主义。中国学术界对无政府派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实际上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由于学者们的几种资料集的出版和资料介绍等种种成果，更加改善了研究环境<sup>①</sup>。随着研究成果的积累，对无政府主义的评价更进一步公允和客观，如对无政府主义的政治思想基本否定的同时，又部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确立以前它所做出的贡献。特别是对近代中国无政府派在反对封建主义方面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在这种研究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前后出版了有关无政府主义研究的四本专门著作<sup>②</sup>。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在提纲的构成和对无政府派的看法与评价问题上基本一致。即在无政府主义发

① 例如，钟离蒙、杨凤麟主编《无政府主义批判》，辽宁大学出版社，198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编《中国无政府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高军、王松林、杨树标主编《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无政府主义资料选》（上、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等。

② 徐善广、柳剑平：《中国无政府主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路哲：《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蒋俊、李兴芝：《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汤庭芬：《中国无政府主义研究》，法律出版社，1991。



展阶段问题上认为，在辛亥革命以前开始在中国传播，民国初年无政府派的力量逐渐发展，新文化运动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潮进一步扩展，到20世纪20年代初关于无政府主义论争后，无政府主义运动开始走向衰退等无政府主义发展的几个阶段的划分基本一致，并且基于在对无政府派的批判性评价基础上，主要注重历史事实的概括性记述。其中蒋俊和李兴芝的著作是比较系统的，而汤庭芬的著作专门研究了政治思想中的无政府主义。另外还有，胡绳武、金冲及的有关新世纪派的研究<sup>①</sup>，杨天石、王学庄的有关天义派及在日本的中国革命派的活动研究<sup>②</sup>，蒋俊<sup>③</sup>和张磊<sup>④</sup>等人的有关民国初中国社会党和师复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及介绍无政府派资料等等研究成果。这些文章不是专门著作，但可以认为是中国学界较早的有关无政府主义的有代表性的研究<sup>⑤</sup>。另外，港

- 
- ① 胡绳武、金冲及：《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金冲及、胡绳武：《早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辛亥革命史稿》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 ② 杨天石、王学庄：《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杨天石编《“社会主义讲习会”资料》，《中国哲学》第1辑，1979；杨天石编《“社会主义讲习会”资料》（续），《中国哲学》第9辑，1983；杨天石、王学庄：《论“天义报”刘师培等人的无政府主义》，《近代中国人物》（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 ③ 蒋俊：《辛亥革命前有关无政府主义的书籍资料述评》，《中国哲学》第13辑，人民出版社，1985；《外国无政府主义论著汉译目录》，《中国哲学论丛》，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略论“极乐地”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意义》，《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等。
- ④ 张磊整理《刘师复外文》，《中国哲学》第12辑，1984；张磊、余炎光：《论刘师复》，《近代中国人物》（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 ⑤ 另外，袁伟时：《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上卷）》（第3编第2章），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杨奎松、董士伟：《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第4章和第6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吴雁南等主编《清末社会思潮》（第8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9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等著作中较专门谈到无政府主义。

台学界对吴稚晖等人的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方面的研究<sup>①</sup>及最近大陆学界兴起的有关刘师培的研究及其资料集和评传等的出版<sup>②</sup>，也在某一方面直接关系本研究主题。对中国学界的研究动态的了解，嵯峨隆、蒋俊和李兴芝、坂井洋史等人的相关研究综述论文，也可以提供帮助和参考<sup>③</sup>。

在美国学界，斯卡拉皮诺（R. A. Scalapino）和于（G. T. Yu）合著的《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一书是对中国无政府主义进行研究的最早专著<sup>④</sup>。此书概括地记述了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其中，较早地理解了巴黎新世纪派的重要性，从而做出了先驱性的贡献。伯纳尔（Martin Bernal）的研究对有关中国革命派和日本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论证，所以对于理解东京天义派的形成背景有一定的帮助<sup>⑤</sup>。作者认为天义派和新世纪派的出现，与1905年前后追求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世界性运动有关联。并且提出1906~1907年间的中国思想界里无政

① 例如，李文能：《吴敬恒对中国现代政治的影响》，台北，正中书局，1977；詹玮：《吴稚晖与国语运动》，香港，文史哲出版社，1992等。

② 李妙根编《刘师培论学论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李妙根编《国粹与西化——刘师培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方光华：《刘师培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刘师培：《刘申叔遗书》（全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7；刘师培：《刘师培全集》（全四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影印本，1997；朱维铮主编《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三联书店，1998等。

③ [日] 嵯峨隆：《最近の中国におけるアナキズム研究の动向》，《アジア经济》25，1984；蒋俊、李兴芝：《建国以来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思潮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日] 坂井洋史，《近年の中国アナキズムの研究おめぐって》，《中国社会と文化》，东大中国学会，1988。

④ [美] R. A. Scalapino/G. T. Yu. *The Chinese Anarchist Move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Press, 1961。

⑤ [美] Martin Bernal. *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 Ithaca/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府主义相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占据了主流地位<sup>①</sup>。20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出版了关于无政府主义研究的两本专著，更加明确了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地位。德里克（Arif Dirlik）把“五四”时期前后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和20年代中期的共产主义运动结合在一起，非常重视其相互间的关联性<sup>②</sup>。他为了批判西方学界对中国近代思想的所谓“文化主义”研究方法，更加注重无政府主义的现实政治意义。因此，他批评西方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所主张的中西文化冲突论等强调地区特殊性的文化主义解释，从世界变革运动的脉络中理解了无政府主义，他可以说是美国学界左派的代表性研究者。同一时期发表的沙培德（Peter Zarrow）的研究，不同于德里克注重政治思想和运动本身的问题，而是注重中国无政府派的政治文化方面，所以他比其他学者更加重视政治文化的环境因素<sup>③</sup>。可以说，他在无政府主义和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上，进行了一定深度的研究<sup>④</sup>。

在日本学界，较早就开始了以刘师培和师复为中心的无政府

- 
- ① 德里克在对伯纳尔的研究评价中提出，伯纳尔认为中国由于没有个人主义传统，所以知识分子容易选择社会主义，但这时候，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国家社会主义（包含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对特别强调自由的无政府主义的出现进行充分的论证。并且，作者犯了把中国同盟会的社会主义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错误。
- ② [美] Arif Dirlik. *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 ③ [美] Peter Zarrow. *Anarchism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 ④ 最近在魏定熙（Tim Weston）的研究中，评价了德里克和沙培德的无政府主义研究：“德里克强调了早期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激进思想，但没有思考他们这种思想和行为方式是建立在什么样的世界观基础上。沙培德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无政府主义和非儒家主义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是很有启发性的。但是，沙培德不太注意研究那些与之完全相反的观点”（[美] 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5-6页）。

主义研究，特别是由于刘师培在日本从事无政府主义运动，所以对他的传统学术与政治思想的研究相对更多一些。其中，丸山松幸认为，清末刘师培著作中的无政府主义反对强权论，不仅把排满主义从单纯的复仇主义和种族主义中解救出来，而且明确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他的反精英主义把人间平等论进行了彻底化，所以对其历史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sup>①</sup>。狭间直树的从中国社会主义接受过程到“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等一系列研究也是有意义的<sup>②</sup>。玉川信明的著作，是对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概括性研究的著作<sup>③</sup>，虽然他的著作没有形成体系，但它有助于理解当时的各种情况。在日本，嵯峨隆可以说是专门研究清末民初无政府主义的代表性学者。他以“传统与近代”为主题而花费十余年研究中国无政府主义的成果，近来出版成单行本<sup>④</sup>，并且与坂井洋史等人一起发行了有关资料集，从而弥补了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白<sup>⑤</sup>。此外，还有以进化论为中心理解无政府主义的有田和夫的研究<sup>⑥</sup>。

①〔日〕丸山松幸：《中国近代の革命思想》，东京，研文出版，1982。对于刘师培，斯卡拉皮诺认为，刘师培为了论证无政府主义的正当性，就广泛利用中国的传统思想，是为了服务于西方的激进主义思潮。与此相反，丸山松幸认为，刘师培通过国学思考而理解了西方的无政府主义。就这样，国学与革命之间内部因果关系的观点，是在日本学界里普遍存在的。

②〔日〕狭间直树：《中国社会主义の黎明》，东京，岩波书店，1976；《刘思复と“民声”——民国初年における中国の无政府主义》，《思想》578，1972；《五四运动の精神的前提——恽代英アナキズムの时代性》，《东方学报》第61卷，1989年3月等。

③〔日〕玉川信明：《中国の黒い旗》，东京，晶文社，1981。

④〔日〕嵯峨隆：《近代中国アナキズムの研究》，东京，研文出版，1994。

⑤〔日〕坂井洋史、嵯峨隆编《原典中国アナキズム史料集成》（全十二册，别册一），东京，绿荫书房，1994。

⑥〔日〕有田和夫：《清末意识构造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84。

和以巴金的无政府主义为中心进行研究的坂井洋史<sup>①</sup>等人的研究论文<sup>②</sup>。特别是在日本学界，曾以北京五四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主导说为中心展开了一场论争，这也是值得重视的<sup>③</sup>。

在韩国学界，有以刘师培的国粹主义为研究主题的千圣林和有关新世纪派的活动为研究主题的朴济均等人的博士学位论文，其研究内容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具有深刻联系<sup>④</sup>。

从上所述的对研究现状的介绍中可看出，对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所做的研究，不仅有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也有从中西文明冲突的观点上所做的评价，还有以中国传统与近代化为中心进行的分析等。无论其方法论如何，对中国无政府主义的研究与西方研究的脉络相同，基本上都是以政治思想和运动为中心，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其实，无政府主义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代表性政治思想之一，又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种，当时风靡了全世界，所以这也是必然的结果。其中，认为政府乃至国家是强权的代表，并且以此为主要批判对象，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更应该注意到的是，无政府主义是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许多领域的一种综合性思想体系。即对待政府和国家的观点，只是对无政府主义一个侧面的反映。在这种前提下，对无政府主义不能简单地认为，它是以反对国家和政府为特征的政治思想。如果只局限于政治领域的话，不可避免地会对它在中国近代社会中的

① [日]坂井洋史：《20年代の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と巴金》，《猫头鹰》创刊号，1983年6月；《巴金を読む》，《季刊中国研究》第16号，1989；《近代中国のアナキズム批判——章炳麟と朱謙之をめぐる》，《一桥论丛》第101卷第3号，1989等。

② 其他研究目录参见“参考文献”。

③ 参见[日]坂井洋史《近年の中国アナキズムの研究おめぐって》。

④ [韩]千圣林：《辛亥革命时期对于国粹学派的研究》，梨花女子大学校博士学位论文，1995；[韩]朴济均：《中国‘巴黎小徒’（1907～1921）の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实践》，庆北大学校博士学位论文，1996。

实际影响及其现实意义有所忽视。因此，我们研究无政府主义时应该进行全方位研究。这是笔者的基本观点。

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的社会革命，大致上是由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文化（道德）革命等三方面所构成的。其中，文化（道德）革命受到非常的重视。这与中国人每次在历史转变时期总是以“文化”为中心而展开论战的情况基本上一致，并且这种论战与当时社会政治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就像中国一贯强调政治伦理色彩的社会里，除了现代意义上的政治以外，还可以用道德或文化来说明的因素来左右社会主要问题。而且中国无政府主义的革命论与西方无政府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对“个人”与“个人主义”的关心相对薄弱，而对“人民”或“社会”的关心相当强劲。这种特征，在政治思想或运动的研究里，使我们的眼光能更放开一些。在对中国无政府主义的政治思想与运动的研究已经达到一定水平的前提下，笔者将对无政府主义的“文化”思想——这一更加具体的主题，进行深人一步的探讨。

**选题意义及其方法** 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最高目标在于建设一个以个人为主的绝对自由的乌托邦世界。所以西方无政府派在批判阻碍人们追求自由的因素时，除了个人内部的良心发现以外，着重批判外来的强制性权力和权威，常常指责压抑人类最具代表性的东西——国家和政府。因而他们认为国家和政府是少数权力者压迫多数人民的权力象征。清末时期的中国无政府派通过这种“权力”概念分析而得到了与此相似的结论。那时候，他们认识到政治权力的代表是以皇帝为中心的专制王朝，因此，提出了“政治革命”的第一任务是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即“排皇革命”。与此同时，他们追求更为根本性的革命即“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的含义除了政治部分外，还包括经济和文化部分。欧美的无政府派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的强烈不满，与此相反，清末的中国无政府派中的大多数人则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支

柱——封建支配秩序和儒学的传统文化表露了强烈的反感。当然，这种状况是由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因此，中国无政府派在“父权=君权、反家庭=反国家”的逻辑思维下，对传统文化中的专制的、封建的因素展开了全面而强有力的批判。

当时他们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批判的激进态度，是其他任何政治派别所无法相比的。例如，他们认为“家庭”是权力集中的基本单位和“万恶之根源”，所以特别重视家庭问题和家庭周围的诸多社会文化环境，如同重视推翻清朝的政治革命一样，甚至认为变革社会文化占有比颠覆政权更重要的地位。清末无政府派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了解封建文化深层结构的本质的程度，由此开展了对制约人的自主性的封建文化的激烈抨击。辛亥革命后，他们的这种思想继续表现在对复古主义的强烈反抗的内部心理中并继承了下来，其结果，在新文化运动的巨大潮流中，我们将再一次看到他们的活动。在本研究中，笔者持有一个观点，即无政府主义经过同清末各种社会思潮的对立和融合过程，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成为构成新文化运动起源的主要社会思想之一。

那么，本书将要论述的“文化”是什么呢？我们在探讨近代时期中国文化的诸问题以前，首先有必要对这一用语进行解释。因为，近代时期的“文化”用词，虽然具有“物质的、精神的要素”、“意识形态”、“文明”等的含意，但不是与今日一样普遍化的一般概念，而只不过是特殊的事例<sup>①</sup>。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是从新文化运动这种概念成为大众用语的20世纪20年代以后开始形成的。其实，在新文化运动初期，也没有得到普及，就使用了“新思潮”等用语来概括这种运动<sup>②</sup>。当然，这不同于传统时

① 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第14～15页。

② 刘桂生等编《台港及海外五四运动论著摘要》，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第4～5页（编者注）。

代的文化用语所包含的“典章、制度”的含意。换言之，辛亥革命前后，文化用语从传统语言转变到现代语言，经历了具有新内容的过渡时期。

本书所指的文化的内涵是一种狭义的概念，它特指新文化运动时期所反映出的文化现象。限制性地规定无政府派的文化思想，就是指以孔子批判、儒家意识形态、女性解放、家庭问题、文学革命、文字改良、道德问题、科学与迷信等关键词为代表的文化思想。换句话说，本研究不是讨论当代所说的文化范畴里的一切领域，而主要讨论旧文化与新文化之间成为焦点的主题，就这种意义上讨论文化。这与笔者的基本论点有密切的关联，就是说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化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是相联系的。在一般情况下，存在着只强调戊戌时期的文化革新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而忽视辛亥革命时期文化思潮的倾向<sup>①</sup>。但笔者认为，从戊戌到“五四”的过程中，辛亥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这种认识将会通过对无政府派的文化思想的分析而得到证明。从戊戌时期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过渡过程中，无政府主义的文化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就是在这种前提成立的情况下得到的认识。

本研究的基本目的，是要通过对构成无政府派文化思想的具体社会文化因素的深入研究，探讨无政府派文化思想的本质特征。

本书的前半部分考察俄国、日本、法国等的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以何种形式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影响。通过西方进化论、社会契约论（民约论）被中国无政府派所接受的过程和立宪派、革命

---

<sup>①</sup> 参见龚书铎《辛亥文化革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下），中华书局，1994，第1116～1126页。



派的中西文化观等比较方法，以说明中国无政府派的政治主张如何适合于对传统文化的革新主张。其主要方法，以对《天义》、《衡报》、《世界》、《新世纪》等无政府派杂志的分析为中心而展开。通过这些杂志，除了了解中国无政府派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主张以外，还可以看出其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宣传新文化的所谓“文化革命”思想的内容。与此同时，笔者不但注意无政府派本身的文化思想，而且希望通过与当时其他社会思潮和派别进行比较的方法，更进一步具体探讨中国无政府派的固有特色。例如，在研究构成上比较强调的一个思潮，就是清末国粹派的文化思想部分。国粹派与无政府派都是清末社会思潮中比较系统的文化派别，并且两者具有同一的出发点。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清末无政府派别之一的天义派的代表人物刘师培同时又是国粹派的代表人物。通过这个人物的分析，可以看出无政府派对待传统的另一种思维方式。

本书的后半部分考察清末无政府派的文化革新主张，并且这种主张通过民初中国社会党（包含社会党）和师复而传播到中国国内的过程，以及这些组织和活动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到底产生了何种影响。同时，通过新文化运动的象征——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北京大学的改革和《新青年》的创刊这三个事件，考察无政府派的思想及其活动状况。新文化运动时期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全盛时期一致，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无政府派所主张的最急进的进步主张与当时的时代潮流相一致，并且具有相当的生命力。其主要分析的资料是《社会世界》、《良心》、《民声》、《新青年》、《自由录》、《进化》、《奋斗》、《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杂志。当时无政府派为了进行社会革命，选择了不谈政治问题而进行文化革新的方法。同时，他们在平民主义的倾向下开始从事劳动运动的新领域。更为有趣的是，“五四”时期又是无政府派开始走向分裂和衰落的时期，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除了

通常的解释以外，从文化思想的角度看，从戊戌到“五四”的变革时期是传统和现代的价值共存的时期。本人尤其注意的是这一点。

笔者认为通过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的批判，然后到了五四运动的前后才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政治路线的分化与斗争。这就是包括无政府主义在内的各种进步的社会思潮，为了批判旧文化而构筑了联合战线，在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经济的分化与对立。新文化运动成就明显的时候，加速了他们内部的分裂，所谓“问题和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三大思想论战，是象征他们内部的政治路线分裂的标志。这时候，无政府主义在社会文化运动中再也没有占据优势地位，而是更加加强了作为一种政治派别的色彩，也就形成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共产主义等诸多政治理论的竞争和对立。众所周知，由于无政府派对于日本的侵华战争、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对立等国内外主要问题没有及时提出有效的现实方向与行动纲领，从而逐渐走向了衰退之路。笔者在这种背景下，将探讨和理解无政府主义在近代东亚被接受的一个典型事例——中国。

# 第一章 清末社会思潮中的 无政府主义

本章主要叙述 20 世纪初西方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和辛亥革命前的两个代表性的无政府派别——“天义”派和“新世纪”派<sup>①</sup>——的形成过程。这章前半部，首先介绍天义派和新世纪派的核心成员参加早期排满的民族主义活动的情况。1905 年以前，他们都在上海以“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和《苏报》等为中心参加排满革命活动。这种早期的革命活动和无政府主义间存在着相互关联性。从思想方面来说，主要是与俄国的虚无主义思潮有密切的关系。由此来记述当时各种进步性刊物中的介绍俄国“虚无党”和流行暗杀、暴动风潮的情况。革命的虚无主义者的出现是共和派、国粹派和无政府派兴起时的一个重要过渡性阶段。“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在其机关刊物《民报》中可以发现这三个政治派别的观点。

近代中国的无政府派是在日本和法国的海外中国同盟会员中形成的。这章后半部，通过中国革命家与国外社会主义者的关系，

---

<sup>①</sup> 近代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两个社团，其名称是由他们所创办的刊物而来的。在日本东京以出版《天义》报为主进行活动的刘师培、何震、张继、汪公权等人是“天义”派，在法国巴黎以出版《新世纪》为主进行活动的李石曾、吴稚晖、褚民谊、张静江等人是“新世纪”派。有人也曾提出“东京小组（东京派）”或“巴黎小组（巴黎派）”等的地域区别方法。

来论述他们的无政府组织的形成过程。我们从“社会主义讲习会”和“世界社”的成立以及《天义》和《新世纪》的出版中可以发现国际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他们都不满意以政治问题为主的君主立宪论及主张排满革命论，从而提出了包括政治革命的社会革命论。但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中，个人的特点比较鲜明，各人的思想构成也不一样，有的人受到传统教育影响并且在无政府思想中表现较浓厚，有的人注重学习西方学术而坚持对传统的批判态度。

## 第一节 革命的虚无主义者的出现

### 1. 1905年以前上海的革命风潮

进入20世纪之后，清朝推行“新政”，“兴学堂、派游学”，国内新式学堂迅猛增加，出国留学也出现了一个高潮。有意思的是这些新式知识分子之中出现了反对清朝的革命派。在日本留学的中国知识分子（主要以青年学生为中心）开始讨论有关排满革命的种种问题。当时留日学界的社团为小型化，只有留学生会馆和同乡会等例外。其中，“励志会”、“国民会”、“青年会”等中的少数急进学生开始出现排满言论。并且，在国内以上海为中心开始了革命言论的宣传和革命团体的初步形成。特别是在上海这个中西交汇的新兴大都市中，革命派的崛起这一现象本身就进一步扩大了社会影响。可以说，当时这一城市里排满革命派的代表性团体就是“中国教育会”。后来，在拒俄运动中，教育会和留日学界关系更加密切，甚至建立了统一组织“军国民教育会”<sup>①</sup>。

<sup>①</sup> 有关“中国教育会”问题参见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三联书店，1995，第196～237页。

从切合本章论述的主题方面来说，这时期即将形成的国粹派和无政府派的代表人物已经相互认识并开始一起活动，其中心就是在上述的中国教育会中。

中国教育会成立于1902年春，由蔡元培与叶瀚、蒋智由、王季同、汪德渊、黄宗仰、王慕陶等人发起，蔡被选举为会长。该会建立的公开目的是给中国学校编写教科书，但它“表面上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sup>①</sup>，是20世纪初国内最早出现的革命团体之一。会员中有激进派，也有温和派。叶瀚、蒋维乔等温和派希望它为纯粹的教育机关，激进派则企图借此展开革命活动。蔡元培是教育会中的激进派的领导者。中国教育会成立前后，曾创办了一所“爱国女学”。同年10月南洋公学发生退学风潮，蔡元培等人帮助退学学生组织“爱国学社”，这一名称可能是由爱国女学而来。在爱国学社的教师里，有近代中国的两位杰出思想家，即章太炎和吴稚晖。

1901年前后，章、吴两人在上海与蔡元培首次认识<sup>②</sup>。章太炎从1900年开始与改良派决裂，断发易服，倡言反清革命，通过著述《噫书》等文，鼓吹种族革命。1903年爱国学社成立，他被聘为教习。而吴稚晖参加爱国学社几个月前，曾在日本带领26名学生向清驻日公使要求准许他们进入日本军校，被日本警察驱逐出境，与蔡元培回到上海<sup>③</sup>。这时期，爱国学社成员吴稚

① 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上海书店，1984，第84页。

② 陶英惠的《蔡元培年谱》和王世儒的《蔡元培先生年谱》两者意见不一致。陶认为蔡、吴之间初识于1899年，蔡、章之间初识于1902年；王认为蔡、吴和蔡、章之间初识都是在1901年。参见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第76、113页；王世儒编撰《蔡元培先生年谱》（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45、53页。

③ 参见〔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8章），三联书店，1983年翻译版。

晖、章太炎等开始在张园举办演讲会，公开倡言革命。有趣的是，吴稚晖加入教育会时还不是革命党，“直到彼时明年正月起在张园演说，演高兴了，才开始称说革命”<sup>①</sup>。爱国学社成立不久，《苏报》即成为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言论机关和上海革命党人的宣传阵地，由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7人轮流撰写评论，张园演说会讲稿也在《苏报》上发表，“崇论横议，震撼一世”<sup>②</sup>。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苏报》三位一体，构成了上海宣传革命的中心。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成员中包括了后来成为著名的国粹派与无政府派的代表人物，如吴稚晖、章太炎、张继、刘师培、柳亚子、陈去病等人。正因如此，以上海和江浙地区为中心展开的排满革命运动渐渐发展分化为清末两个有特色的政治文化派别——国粹派和无政府派。

新世纪派的主要成员吴稚晖与李石曾、张静江之间初识也是这一时期的事情。1901年，李石曾与张静江在北京相识而开始交流。李石曾是清末大学士李鸿藻之子，而张静江是浙江大财产家之子。1902年孙宝琦任驻法钦差大臣，他们两人以随员名义随行，同年8月乘新铭轮由天津至上海<sup>③</sup>。当时，李石曾经人介绍，与蔡元培、吴稚晖等相识，然后与张静江同船赴法<sup>④</sup>。吴稚晖与李石曾第一次见面时说，“海外留学生愈多愈好，用苦学方法使多数人可去留学”<sup>⑤</sup>。而章太炎与以后成为天义派的主要成员张继、刘师培之间的相识也是1902—1903年的事情。张继

① 吴敬恒：《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东方杂志》第33卷第1期。

②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1集，中华书局，1987，第120页。

③ 王云五主编《民国李石曾先生煜瀛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第14页。

④ 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七），第114页。

⑤ 王云五主编《民国吴稚晖先生敬恒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第27页。

1899年赴日，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是留日学生中最早出现的革命分子之一，刘师培则是三代均精研《春秋左氏传》的经学世家子弟。章氏与秦力山等人在东京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时（1902年4月），通过秦力山的介绍结识张继<sup>①</sup>。第二年春，刘师培参加会试，未能如愿以偿，在回家途中于上海结识章太炎、蔡元培等人，思想为之一变<sup>②</sup>。章太炎特别喜欢“书香门第”的青年学者刘师培。另外，他们与清末在上海活动的革命派之间的交流都是以中国教育会为中心而进行的。但其中惟一遗憾的事是，在教育会和爱国学社之间的主导权纷争中，支持学社的吴稚晖与支持教育会的章太炎之间发生了相互纠缠，产生了对立情绪。后来章太炎提起的所谓“苏报案”中的吴稚晖“告密”问题<sup>③</sup>，可能就是由这种敌对情绪而发展起来的。这时，蔡元培因气愤教育会与学社之分裂，便辞职赴青岛。

1903年6月，因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康有为》等反清文章，发生了有名的“苏报案”，章太炎、邹容被捕入狱，《苏报》被停刊<sup>④</sup>，而爱国学社随之停办。事件发生之后，吴稚晖经由香港逃往英国，但残存的会员又逐渐恢复并加强了革命活动。同年8月初，张继、陈独秀、章士钊、何梅士等人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报》，时人称此报为“《苏报》第二”，该报不直接攻击清朝，而是主张汉民族的民族主义和限制君主权力。同年12月，自青岛回到上海的蔡元培与一些革命派人士发起组织“对俄同志会”，蔡氏和王小徐、汪允宗等编辑的《俄事警闻》也同时出版。可以说，《国民日报》和《俄事警闻》两刊物是

① 章太炎：《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年），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

② 万易：《刘师培年谱》，《文教资料简报》，1985年第2期，第122页。

③ 参见吴敬恒《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

④ 参见《苏报案纪事》，台北，中央党史会影印本，1968。

《苏报》的后身。《俄事警闻》后改为《警钟日报》（1904年2月），而对俄同志会也改名“争存会”<sup>①</sup>。在这一时期，从本章论述的范围上来说，我们注意的人物是蔡元培、张继、刘师培三人<sup>②</sup>。

当时，在上海的革命运动带有强烈的“救亡”的危机意识，同时伴随着以绝望心理为基础的暗杀、暴动等过激手段，这种心理状态可以在蔡元培等大多数革命派知识分子的意识之中看到。例如，蔡元培回忆中谈到，“自三十六岁（1902年）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下暴动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sup>③</sup>。这样，蔡元培认为暗杀活动于女子较适合。因此，第二次在爱国女学任教时（1904年6月），他吸收了爱国女学教员钟宪鬯、俞子夷两人参加“暗杀团”，并学习制造炸药<sup>④</sup>，随后加入的还有刘师培、章士钊、陈独秀等人。张继在日留学时激愤于清朝的腐败，立志排满，曾组织青年会，创办《国民报》。1903年因剪掉留日学生监督姚文甫的辫子，被遣送回上海，他又参加以中国教育会为中心的暗杀等革命活动，并在《苏报》、《国民日报》上鼓吹革

① 《争存会变更议案》，《警钟日报》，1904年4月7日。

② 有人认为，张继与刘师培的友谊可能是在1903年前后。1904年冬，万福华谋刺王之春时，刘师培借了张继的手枪交给万福华，他们之间的密切交往是这段时期的事（〔日〕小野川秀美：《刘师培と无政府主义》，《东方学报》36，1964，第704页）。

③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蔡元培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9，第196页。

④ 蔡元培说，“其时并不取贤母良妻主义，乃欲造成虚无党一派之女子。除年幼者，照通例授普通知识外，年长一班，则为讲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主义等，且尤重化学”（蔡元培：《口述传略》，《蔡子民先生言行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第8页）。



命。这一时期他发表的《“无政府主义”序》一文可以说是最富有过激性和战斗性的<sup>①</sup>。张继日后回忆说，当时的思想是“四万万人要杀去一万万”云云。由此，有人认为，张继是“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者”<sup>②</sup>。刘师培从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政治活动中也接受了排满革命论。但是，从他最早在《苏报》上发表的文章中不容易看到对革命的强烈意识。到1903年，刘师培在《国民日报》上发表了《黄帝纪年说》与《王船山史说申义》两篇文章，这种学术性比较浓厚的文章却带有革命性特点。这些文章发表的同时，他参加了蔡元培、陈去病等人组织的对俄同志会，并发行其机关杂志《俄事警闻》等，通过上述活动走上了革命家之路。他们三人都是清末国内革命派的主要阵地——中国教育会的较有代表性的激进派人物。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苏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蔡、张、刘三人在对“排满”问题的看法上具有各自的特点。例如，张继1903年6月10日在《苏报》发表的笔名为自然生的《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一文中，他强调“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时，把满族排斥在中国人之外，把满洲视为“贼满人之古宅”，不应去保它，同时他批评了依赖清朝拒俄的幻想，激烈地提出为了制御外来的大敌必须推翻清朝统治<sup>③</sup>。同年6月22日刘师培在《苏报》上发表了笔名申叔的短文《论留学生之非叛徒》。与张继的义愤相比，这篇文章冷静得多，简洁地说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清朝镇压爱国者，就把自己放到必须推翻的地位上去了。最终说，“中国者，汉族人之中国也！反汉族之人，即为叛

① 燕客：《“无政府主义”序》。参见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第23～24页。

② 杨天石：《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者张继》，《民国掌故》，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第396～398页。

③ 自然生：《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苏报》，1903年6月10日。

中国之人；保汉族之人，即为存中国之人”<sup>①</sup>。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张继的热血男儿性格和刘师培的典型学者风格，而且通过他们共同的种族主义倾向反映了当时《苏报》宣传“仇满”革命的特色<sup>②</sup>。与此相反，蔡元培在《释仇满》一文中认为“排满”口号的出现，是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决定的。他说，“近日纷纷‘仇满’之论，皆政略之争，而非种族之争也”。如此，蔡氏跟别人不一样，他不太喜欢种族主义的“仇满”倾向<sup>③</sup>。

1904年6月，蔡元培因事辞去《警钟日报》主编职务，该报由汪允宗、林獬、刘师培接编。同年11月，蔡氏和一些人商量，将暗杀团规章加以修订，并把它改造扩大定名为“光复会”，由他任会长。其后，暗杀团成员杨笃生离开上海去北京搞所谓“中央革命”，并将吴樾介绍给蔡元培使其参加了暗杀团，成为光复会的一员。当年，张继到长沙，在黄兴执教鞭的明德学堂教西洋史，并参与“华兴会”的创办。接着张继与杨笃生、何海樵密谋，前往北京，向西太后、光绪帝投掷炸弹，没有实现，再赴湖南。华兴会的起义失败之后，同年冬张继受万福华刺王之春案连累，与黄兴等被拘于上海，获释后再赴日本。1905年3月，《警钟日报》因抨击德国密谋经营山东，被官厅封禁。因清朝拘捕搞暗杀活动的革命者，爱国女学也渐渐陷于停顿。其后中国教育会的革命力量愈来愈减少。同年9月，吴樾持杨笃生提供的炸弹谋刺清廷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壮烈牺牲。随后，蔡元培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并领导同盟会上海支部工作。

刘师培由蔡元培介绍，加入光复会。并且陈独秀在安徽领导

① 申叔：《论留学生之非叛徒》，《苏报》，1903年6月22日。

② 王学庄：《苏报》。见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人民出版社，1982，第375~379页。

③ 蔡元培：《释“仇满”》，《苏报》，1903年4月11、12日。

反清的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时，他也参加了陈独秀的革命活动。在1904~1905年之间，刘师培在《警钟日报》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有《论孔教与中国政治无涉》、《论中国并不保存国粹》、《习斋学案序》、《近儒学案序目》、《并青雍预颜门学案序》等，他的这些文章也是学术和革命两者相结合的文章。他还参与了“国粹保存会”的发起和组织工作。1905年初，以中国教育会为纽带，以《警钟日报》、《中国白话报》和《政艺通报》为主要阵地的国粹保存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同年2月23日，其机关刊物《国粹学报》问世。该报的前身《政艺通报》同人黄节、邓实等人转向革命当在1903~1904年之间，主要原因也可能是受中国教育会影响的结果。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在清末革命派中首先以《国粹学报》为主形成了国粹派的独自势力。其主要会员有刘师培、章太炎（狱中）、邓实、黄节、马叙伦等<sup>①</sup>。另外，我们应注意的是，《警钟日报》（包含《俄事警闻》）中连载了不少有关俄国虚无党的记事。而1905年以前在上海的革命风潮中，革命派常用的暗杀、暴动等暴力手段与俄国虚无党人的革命手段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其实，该报是在宣传俄国的“虚无党”和虚无主义的过程中无政府主义才孕育而来的。由此，有人曾认为《警钟日报》是中国无政府主义的源流之一<sup>②</sup>。

## 2. 俄国“虚无党”和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介绍

1905年前后，在中国革命派的形成过程中，影响较大的外来思潮之一是俄国“虚无党”（Nihilist）的活动及其虚无主义思想。虚无党原是俄国一些革命派的总称，主要是指“民粹派”

<sup>①</sup> 参见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第8~16页。

<sup>②</sup> [日]丸山松幸：《中国近代の革命思想》，研文出版，1982，第88页。

(Populist)。19世纪60—70年代，俄国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为了推翻沙皇的反动统治，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又自称为是人民的精粹，故称民粹派。民粹派虽然激烈反对俄国当时的专制统治，但是不懂得政治革命的意义。他们强调人民群众的社会经济解放，而把推翻旧的政治制度放在某种从属的地位，因此否认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宣传在村社及其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立即进行社会主义变革。他们主张的“社会革命”与旨在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是有区别的，这种思想使民粹主义者很容易和西欧社会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者找到共同的语言。其实，俄国的民粹主义运动中存在着几个主要的派别，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派别就是巴枯宁派。这一派否认在群众中开展宣传工作的必要性，认为广大农民已经有了发动社会革命的充分准备，革命知识分子的任务只是在于把各地的农民联合起来，立即举行暴动<sup>①</sup>。巴枯宁的名言是“人民不需要进行任何训练，可以直接发动他们暴动”；“在任何一个村里发动暴动都是轻而易举的”。俄国民粹主义者虽然受巴枯宁思想影响很大，但严格地说，民粹主义并不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也不是虚无党的同义词。虚无党、民粹派和无政府派三者之间存在着差别。但当时在西方国家介绍三个派别时不太注意三者之间的明确区分。

“虚无党”及虚无主义思潮是通过日本而介绍到中国的。19世纪末在日本它就影响了自由民权思想，当时将俄国的虚无主义、民粹主义及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社会主义一并输入进来，日本社会主义者也未将三者加以区分。在初期的一些著作里，“恐怖主义”、“民粹主义”等词成了无政府主义的译名。中国人接受无政府主义时，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这种概念上的混乱，特别是

<sup>①</sup> 陈之骅：《克鲁泡特金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第101—102页。

在虚无党和无政府党两个概念上没有差别<sup>①</sup>。例如，从现在的研究来看，中国人最初使用“无政府”这一词的可能是当时在日本亡命的梁启超。他在《清议报》（66册）的《无政府党之凶暴》（1900年10月21日）和该报（98册）《难乎为民上者》（1901年10月11日）两文中已经使用“无政府党”这一词<sup>②</sup>。其中，前一文只报道无政府党人暗杀意大利皇帝这一暗杀事件，而后一文则介绍无政府党人的暗杀活动。如后一文中说：“无政府党者，不问为专制国，为自由国，而惟以杀其首长为务，彼等之目的在破坏秩序，若夫专制秩序与自由秩序皆非所问也，彼等秩序之敌也，文明之敌也。”<sup>③</sup>在这两文中，他还没有区分虚无党和无政府党的不同概念。“无政府（党/主义）”一词可能是从日本人翻译西方著作中得来的。1902年以后，对无政府主义的兴趣在日本不断发展。西田通彻的《虚无党事情》和烟山专太郎的《近世无政府主义》等书中较明确地使用“无政府（党/主义）”一词<sup>④</sup>。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中国的虚无主义（包含无政府主义）不是革命派的专有物，相反，保皇派人士已经注意到“虚无党”及虚无主义思潮。当时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从清日战争的败北到戊戌

① 19世纪后半期有的论著中已经记述过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及无政府主义者的早期概念。例如，Nihilism（虚无主义）一词在李凤苞的《使德日记》（1879年）中翻译为“尼赫尼士”；Anarchism（无政府主义）一词在《泰西各国采风记》（1894年）中翻译为“鸭都吉思”；Anarchist（无政府主义者）一词也是在《泰西新史撮要》（1895年）中翻译为“鸭捺鸡撕得”这一用语（刘其发主编《近代中国空想社会主义史论》，华夏出版社，1986，第78页）。

② 洪德先：《早期国人对无政府主义的初步认识》，《食货月刊》49，台北，1985年2月。转引自〔韩〕朴济均《中国‘巴黎小组’（1907~1921）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实践》，庆北大学校博士学位论文，1996，第19页。

③ 梁启超：《难乎为民上者》，《清议报》（98册），1901年10月11日。

④ 〔日〕铃木靖之：《日本无政府主义运动史》，第15页，黑色战线社，1979。

变法的失败，从而激愤清朝对帝国主义国家的软弱无力。特别是他们的绝望心理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达到最高潮。因此，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文章中可以看到有关虚无党的记事。而且这些保皇派人士办的出版社也翻译出版了有关虚无党的书籍。他们对虚无党及其基本政治主张的态度带警戒或批判的色彩较浓厚，而对虚无党的暗杀手段感兴趣，其代表性的人物也是梁启超<sup>①</sup>。例如，他的《致康有为书》（1902年）、《新民说——论进步》（1902年）、《拟讨专制政体檄》（1902年）、《论俄罗斯虚无党》（1903年）等文中就直接或间接宣传破坏主义。特别是在《论俄罗斯虚无党》一文中较详细地叙述了虚无党的历史及其意义。他说，“虚无党之手段，吾钦佩，若其主义，则吾不敢赞同也”，因为“彼党之宗旨，以无政府为究竟”，“岂有无政府而能立于今日之世界者”<sup>②</sup>。梁启超对破坏主义感兴趣的原因，是因为1899~1903年间梁启超表现出了空前的激进倾向，他既不排除使用起义、暗杀等暴力手段，又在一定程度上附和了排满革命，甚至与中国教育会的立场接近起来<sup>③</sup>。除梁启超等保皇派外，在日本的留学生杂志及上海的进步性杂志中也可以看到有关虚无党人的记事。特别是在上海以中国教育会为中心的革命派的崛起过程中，他们希望在中国出现虚无党人，因为他们认为为了进行反清革命，很需要虚无党人的暗杀、暴动的手段。

中国国内最早比较体系性地介绍无政府主义学说的是，1902年马君武以“独立之个人”的名义翻译的英国人克喀伯写的《俄罗斯大风潮》一书。译者认为，无政府主义是18世纪法国圣西

① 参见汤庭芬《梁启超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

② 梁启超：《论俄罗斯虚无党》，《饮冰室合集》卷2（文集15），中华书局，1989，第30页。

③ 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第205页。

门等人的社会主义与 19 世纪英国达尔文、斯宾塞等人的进化论交汇而产生的一种“新主义”，“是新主义曰：无政府主义”。他翻译这本书的目的，毫无疑问，是企图用这种“新主义”来冲击中国的传统思想。在书中，他激烈地批评了古代的圣贤和经典<sup>①</sup>。马君武说：“人们之最恶者，莫如野蛮时代之圣贤矣。”他断言：“无改造社会之思想者，其人断不可谓之大豪杰。”<sup>②</sup> 同年 2 月，日本人幸德秋水的政治评论集《广长舌》也翻译出刊，其中，《无政府党的制造》一文引起了读者的较多注意。其实，幸德秋水著述《广长舌》（1902 年）时，他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该书注重宣传的是反对帝国主义，而在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中往往介绍了暗杀主义、无政府主义。他认为暗杀是腐败社会的必然产物，而无政府主义也是国家社会的绝望产物<sup>③</sup>。中国早期革命派经常引用幸德秋水的两句话：“无政府主义的盛行由于人们对今日国家社会的绝望；专制政府是无政府主义之制造厂。”这两句话，在一定程度上也导出了 20 世纪初

① 当时，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1902 年 12 月 21 日记述了他读到此书后的感想。他说：“《俄罗斯大风潮》一书，言无政府党之宗旨也。彼其意欲得完全无限制之自由，各奉自然之产，家给自足，互相助济，无少缺乏。人人有平等之价值，一切政府威权，地方法治，为人类所连结者，皆废弃不用。又云：人须明自然法律，自然法律之理明，则外来之法律可不用。故不但专制之君吏当除去之，即被民选举者，亦当除去之。此学派创于俄罗斯最高贵族巴枯宁……而克姜部特京亲王，法国大著名地学家尔李碎勒克吕，俄罗斯名士拉吾委夫，皆与焉，可谓极无政府党一时之盛矣……余谓创此派之人，其心为救世，非不可嘉也，病其识不足。若从其说，反为害于世。”

② 马君武：《“俄罗斯大风潮”序言》，转引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第 1~2 页。

③ 参见〔日〕幸德秋水，中国国民丛书社译《社会主义广长舌》，商务印书馆，1902，第 35~42 页。

年中国社会上忽然掀起的一股无政府主义浪潮的政治原因<sup>①</sup>。1903年2月，福井准造著的《近世社会主义》由赵必振翻译在广智书局出版。同年3月，西川光次郎著的《社会党》由周子高翻译出版。这两本书是较早介绍社会主义的译著。有趣的是，《俄罗斯大风潮》、《世界十二女杰》<sup>②</sup>、《近世社会主义》、《社会党》等一系列翻译著作都是由保皇派梁启超主持的出版社广智书局出版的（参见表1）<sup>③</sup>。

1903年苏报案前后，介绍和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显著增加。当时，影响最大的是日人烟山专太郎的《近世无政府主义》（1902年由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刊印）一书。此书主要内容是介绍俄国虚无党的历史，很快就受到了中国革命分子的注意。作者本来写作的目的是为了批评无政府主义，但不少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喜欢接受这本书中的主义和主张。他们把《近世无政府主义》的内容在几种杂志上部分地进行翻译和介绍。例如，据中国学者的考证，《俄国虚无党三杰传》（《大陆》第7期，1903年6月），《俄罗斯的革命党》（《童子世界》第33号，1903年6月），《弑俄帝亚历山大者传》（《大陆》第9期，1903年8月），《俄国革命党女杰沙勃罗克传》（《浙江潮》第7期，1903年9月），《俄皇亚历山大第二之死状》（《国民日报》，1903年），《俄国虚无党源流考》（《警钟日报》第28～65号，1904年）等，都是此书部分章节的摘述<sup>④</sup>。

① 蒋俊、李兴芝：《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第12页。

② 在本书的《路易美世倪女史》一文中介绍了法国著名无政府女子党人。参见〔日〕岩崎徂堂、三上寄风、赵必振译《世界十二女杰》，广智书局，1903，第26～31页。

③ 参见〔日〕狭间直树《中国社会主义の黎明》，岩波书店，1976，第83页。

④ 蒋俊：《无政府主义的传入与二十世纪初年的革命风潮》，《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3年1期，第87页。



1904年4月出版的《自由血》(金一译),则是烟山氏这一著作最完整的译本。但《自由血》并非直译,金一(金天翮)在译述时还参考并采用了其他资料。译者在绪言中高度地赞扬虚无党,说“虚无党何也,自由之神也,革命之急先锋也,专制政体之敌也”<sup>①</sup>。该书简明地介绍各国社会党和其代表人物,其中巴枯宁是虚无党代表之一。据日本学者的见解,张继译的《无政府主义》(1903年)、陈冷译的《虚无党》(1904年)、笔名炸弹的《俄国虚无党之机关》(《汉声》第6号,1903年7月),都来源于此书<sup>②</sup>。甚至在《民报》中渊实(廖仲恺)翻译的《虚无党小史》,译者明确表明“此篇为日本文学士烟山专太郎所著《近世无政府主义》之第三章”<sup>③</sup>。因此,我们可以说,当时革命派介绍虚无党及虚无主义的文章,绝大部分均以此书为依据。这些摘译、节译、意译和编译的用意非常明确,即以此书籍内容来影射中国社会<sup>④</sup>。上述翻译的原书大部分本来不是为了宣传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为目的,但实际结果却起到了对读者的介绍和启蒙效果。

另外,在各种报刊杂志中继续介绍宣传俄国虚无党和无政府党。例如,《苏报》中的《虚无党》、《江苏》中的《露西亚虚无党》、《新湖南》中的《湖南之湖南人》、《浙江潮》中的《新社会之理论》等。其作者中较典型地赞扬俄国虚无党的可能是杨笃生,他认为“今世界各国中破坏之精神,最强盛者莫如俄国之无政府党”,宣称:“今日之言暴动者,立义也!”;“今日之言暴动

① 金一译:《自由血》,东大陆图书译印局,1904,第2页。

② [日]狭间直树:《中国社会主义の黎明》,第114~115页。

③ 渊实:《虚无党小史》,《民报》第11号、第17号,1907年1月25日,10月25日。

④ 参见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第182~185页。

者，爱国也！”；“今日之言暴动者，贞士也”<sup>①</sup>。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更激昂地说：“虚无党，虚无党，我爱你，我崇拜你，你们所作的事业磊磊落落，能杀那混账王八蛋的皇帝，能打救那一般受苦的兄弟姐妹，无一件不惊天动地……我久想见见你们，和你们谈谈，我好领教一切，学学你们的手段方法，我好作个榜样”<sup>②</sup>。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暗杀时代”的心理状况。由上所述，最早接触这一学说的是政治上比较敏感的保皇派，但1903年以《苏报》案为起点，在日留学生和上海革命派知识分子开始积极接受虚无主义及无政府主义。当然，其原因是为了在反清革命中提供暗杀、暴动等过激手段的理论根据。

那么，从本章论述的主题来说，当时革命派的心理最早是怎么反应无政府主义的？又怎么理解无政府主义的？有人认为，马叙伦从1903年8月到9月在《政艺通报》上发表的《二十世纪之新主义》一文，是在带有好意的态度上叙述的最初有关无政府主义的文章<sup>③</sup>。其中说：“我闻专制政治者，所以鼓铸破败专制政体之无政府党之大制造厂也。制造厂之器用愈备，则其所鼓铸而出之物质愈多，专制政治愈甚者，则所制造之无政府党愈众。”<sup>④</sup>这可能是受幸德秋水的影响。在上述观点基础上，作者申述无政府主义的兴趣在于它“与佛氏之涅槃、孔氏之太平、耶氏之天国无异”，惟有无政府主义可使贫富、贵贱、老幼、男女，平均融合。当时刘师培也肯定暗杀，他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

① 杨笃生的《湖南之湖南人》，转引自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第20～21页。

② 杨笃生：《理想的虚无党绪言》，《国民日报》，1903，转引自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第26页。

③ [日]嵯峨隆：《近代中国アナギズムの研究》，研文出版，1994，第46页。

④ 马叙伦：《二十世纪之新主义》，转引自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第6～16页。

立游侠传与刺客传的主旨乃在并立君权与侠义，传述刺客侠义事，使独夫民贼知所战慄，并说“刺客所为，尤近西国之虚无党”（见《中国民约精义》卷二，司马迁）。游侠与刺客成为对抗暴政的义士，这点与虚无党相类似<sup>①</sup>。

1903年末，张继的《无政府主义》一书在上海出版。这本书是张继利用日文资料以译述形式构成的上下两篇著作，它可以说是1907年以前出版的书籍中最富有体系性的译著。在文章中，张继认为无政府主义最大的价值在于它的平等原理<sup>②</sup>。他不仅将18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布利、巴贝夫等人视为无政府主义者，而且将资产阶级的雅各宾派也称为无政府党，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主平等思想等同于无政府主义。张继在《无政府主义》译著序文中宣称：“吾愿杀尽满洲人，以张复仇大义，而养成复仇之壮烈国民；吾愿杀尽亚洲特产之君主，以洗亚人之羞辱，为亚人增光；吾愿杀尽政府官吏，以去一切特权之毒根；吾愿杀尽财产家资本家，使一国之经济均归平等，无贫富之差；吾愿杀尽结婚者，以自由恋爱为万事公共之基础；吾愿杀尽孔、孟教之徒，使人人各现其真性，无复有伪道德之迹。”<sup>③</sup> 1904年初，他发表的《无政府主义及无政府党之精神》一文中，又说：“夫欲建设，必先大破坏，无政府党可谓达于破坏之极点矣，今之中国正值破坏时代之初”，可以“借其手段以铲除此野蛮奴隶世界”。<sup>④</sup> 由

① [日]小野川秀美：《刘师培と无政府主义》，《东方学报》36，1964年第703~704页。

② 转引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第49~50页。

③ 燕客：《“无政府主义”序》，转引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第23页。

④ 自然生：《无政府主义及无政府党之精神》，《中国白话报》第2期，1904年1月2日。

此观之，张继和上述的杨笃生两人可以说是1903年前后上海革命派中的最激进分子，也可以说是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复合的早期无政府主义分子。但从实质上说，他们所崇拜的，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革命的精神、一种反抗专制统治的信念，还不是西方本来的无政府主义<sup>①</sup>。

从文化思想方面来说，早期无政府派张继、杨笃生的无政府主义解释中，除了宣传对清朝的革命主张以外，还存在着对传统儒教价值体系的全盘性的否定。例如，“吾愿杀尽结婚者”，“吾愿杀尽孔、孟教之徒”等。与此相反，国粹派马叙伦、刘师培的解释则强调了无政府主义跟“佛氏涅槃、孔氏太平、耶氏天国”式传统乌托邦的类似性，或古代刺客和近代虚无党人的同质性，即他们在传统历史中理解无政府主义的存在意义。上述两种解释，即反传统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解释与传统、历史和无政府主义的结合，暗示了后来的“新世纪派”和“天义派”的两种无政府主义思维方式。

当时，上海革命派的领导人蔡元培也是中国早期介绍无政府主义的人物之一。1904年2月17日（农历正月初二）起，他的白话小说《新年梦》分六次在《俄事警闻》上发表。他通过“最爱平等爱自由”的“中国一民”（指蔡元培）的梦境，宣传了他那带有浓厚无政府色彩的社会理想。在《新年梦》中，作者的主张是：第一，宣传废除私有财产和采取按劳分配原则的思想；第二，主张打倒腐败的政府；第三，强调中国人要为反对和抵抗列强侵略、实现民族独立而斗争；第四，主张设立起调解纠纷作用的万国公法裁判所；第五，主张废除姓氏、家庭、婚姻、法律，统一语言、文字直至废除国家，实现大同理想；第六，号召改造

<sup>①</sup> 杨奎松、董士伟：《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32～33页。

自然、征服自然<sup>①</sup>。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废政府、废私产、废军备，同时主张废姓氏、废家庭、废婚姻、废法律、统一语言文字、最后废除国家。这些空想社会主张与中国无政府派构想理想社会大体上一致，特别是在有关文化问题上，我们注意的是第五项的内容。由此，有人曾强调指出蔡元培思想中的无政府主义因素<sup>②</sup>。

综上所述，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传入时期开始于1901到1902年，在1903年“苏报案”前后形成一股热潮，其余波一直延续到1905年。当时，反清革命派为了推动革命的发展，大多数人思想上受到了俄国虚无党人那种激烈手段的影响，他们实行的破坏主义因具有强烈感情色彩而不能提出合理性的方案。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浪头<sup>③</sup>。在这里，我们再次注意的是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根本性的差别。其实，中国革命派中的虚无主义者与俄国民粹主义者不一样，俄国民粹派有反政治倾向，而中国革命的虚无主义者更注重打倒清朝的排满革命。而他们的虚无主义具有个人主义和政治革命的性质而无政府主义者宣传的社会革命性质。但虚无主义者提出的有关个人主义的道德问题，却是后来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不得不

① 蔡建国：《蔡元培与近代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第233页。

② 例如，〔美〕Duiker, William. *Ts'ai Yuan - p'ei: Educator of Modern China*.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7；耿云志：《蔡元培——新文化运动的赞助者和保护者》，《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二），1980；李华兴：《民主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复合体——蔡元培政治思想初探》，《复旦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美〕Dirlik, Arif. *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91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多数研究者同意蔡元培思想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甚至有些人认为他是一个“哲学的”无政府主义者。

③ 蒋俊：《无政府主义的传入与二十世纪初年的革命风潮》，第86页。

面对的问题<sup>①</sup>。

### 3. 东京《民报》中的社会主义宣传

1905年8月，在孙中山倡导下，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采用了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也就是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学说<sup>②</sup>。同年11月改造《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为《民报》，作为同盟会机关报，由张继、章太炎、陶成章、汪精卫先后主持编辑。由前所述，梁启超较早接触到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但他在当时所写的一些文章中提到的社会主义，实际内容大多是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1903年冬，梁启超游美归日之后，政治态度发生很大变化。他开始宣传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不但反对一切革命主张，而且对他过去提出的“新民说”主张也持否定态度。因此，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和保皇派，就“共和革命”还是“开明专制”，在《民报》和《新民丛报》上展开辩论。辩论中，相应地刊载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普及了欧洲社会主义思潮。但其中除少数文章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来介绍社会主义外，实际上不少是介绍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从1903年各种报刊对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介绍，到1905年以后《民报》对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宣传，说明了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已在部分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影响。

<sup>①</sup> 参见〔美〕费侠莉（Charolitte Furth）《思想的转变：从改良运动到五四运动（1895～1920）》，见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翻译版，第401页。

<sup>②</sup> 有的学者认为，同盟会的政治理念主要是共和主义而不是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这三个原理都只是为了成立共和政体的手段或方法，参见〔韩〕全容万《中国同盟会的‘共和主义’研究》，西江大学校博士学位论文，1996。

在《民报》上介绍无政府主义是与其当时主编及发行人张继和章太炎的思想有关。张继于1904年11月万福华事件之后，再赴日本，任留学生会馆的总干事，执留日学生界的牛耳。翌年，他主持同盟会总部工作并为《民报》名义上的编辑。他为《民报》草拟了六大宗旨，即颠覆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政体，实行土地国有，维持世界和平等。此六项宗旨后为同盟会所接受，成为《民报》著名的六大主义。1906年3月，张继离日赴南洋及辽东奉天等地策动“马贼”起义。而章太炎1906年6月于上海监狱出狱后，立即乘轮赴日。到达日本后，他参加了同盟会并任《民报》主编。因章氏是经学大家，他不太满意胡汉民、汪精卫等人的政治论调，而以学术性为主来编辑《民报》。但他主要强调的是宗教、道德方面，而不太注意同盟会政治纲领的宣传。张、章两人都对无政府主义颇有好感，通过这种事实可以推测《民报》编辑方针是受到无政府主义不少影响的（参见表2）。

张继主编时期（第1~6、19号）：在《民报》创刊号孙中山的《发刊词》中已经提到无政府主义，说：“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sup>①</sup>但这时孙中山的言论中并没有对无政府主义的评价，而只宣传他本人提倡的三民主义。其实，《民报》早期撰稿者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宋教仁等人的文章，都注重宣传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例如，汪精卫的《民族的国家》（第1、2号）、胡汉民的《民报的六大主义》（第3号）和朱执信的《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第5号）等文都充分反映了同盟会的政治纲领。该报初期通过《虚无党女杰苏菲亚肖像》（第2号）、《无政府首创者巴枯宁》（第3号）、《露国拔苦总督拉加希芝被炸之真景》（第4号）等图画间接介绍了虚无党和无政府党。但当时在以三民主义为主

<sup>①</sup> 孙文：《发刊词》，《民报》第1号，1905年11月26日。

宣传共和革命的《民报》中，有些作者对无政府主义并不持肯定态度。例如，陈天华在《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第1号）一文中提出，“彼无政府之主义，宁吾侪今日之所主持乎”<sup>①</sup>。他认为民主政治与无政府主义有着原则区别：第一，民主政治并不等于自由放任；第二，民主国家强调自由，并不专指个人自由，并不是无政府主义的个人自由主义；第三，行民主制度，也有强制之处<sup>②</sup>。因此，他对无政府之个人主义批评说：“吾侪求总体之自由者也，非求个人之自由者也。以个体之自由解共和，毫厘而千里也”<sup>③</sup>。胡汉民在《民报六大主义》（第3号）一文中，针对某些人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指出：“有破坏而无建设，曰无意识之破坏……吾人信今日支那国民之程度，不可以无政府。”<sup>④</sup> 这表明在《民报》初期，陈天华、胡汉民坚持民主、共和政体的现实性而批评无政府主义的空想性。

章太炎主编时期（第7~18、23~24号）：这一时期的有些文章更具体地论述了无政府主义。其代表性的人物是廖仲恺（笔名：渊实）。他在《民报》第7号和第9号中发表了《社会主义史大纲》和《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篇翻译文章。这可能是从日本无政府主义杂志《社会主义研究》中刊载的颯堺利彦所翻译文章的重译<sup>⑤</sup>。还有，在《民报》第8号和第11、17号中也连载了《无政府主义之二派》和《虚无党小史》两篇翻译文章。前一文是译自日人久津见蕨村所著《欧美之无政府主义》中一节，后一文是译自日人烟山专太郎所著《近世无政府主义》一书中的第三章。并且，为了介绍在第2号和第3号中的有关无政府

① 思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民报》第1号，1905年11月26日。

② 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398~399页。

③ 思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民报》第1号，1905年11月26日。

④ 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第3号，1906年4月5日。

⑤ 〔日〕颯峨隆：《近代中国アナギズムの研究》，第56页。



党人图画，即《虚无党女杰苏菲亚肖像》和《无政府首创者巴枯宁》，以无首为笔名刊载了《苏菲亚传》（第15号）和《无政府主义实行者巴枯宁传》（第16号）<sup>①</sup>两篇文章。廖仲恺在《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前言中曾说：“现世界之革命有三大主义：一、社会主义；一、无政府主义；一、虚无主义”，“惟译者今日尚在研究时代，自不欲发表意见，估俟他日。”<sup>②</sup>因此，他实际上是积极介绍无政府主义，但从研究者的态度上不发表自己意见<sup>③</sup>。章太炎主编时期，特别是从第11号（1907年1月）开始，即看不到有关共和革命派的文章，而有10篇以上支持无政府主义或恐怖主义的文章。《民报》这种编辑方针的改变，表明章氏在思想上与孙中山派的分歧，而加入无政府主义的阵营之中<sup>④</sup>。

有趣的是，章太炎主编时期也有批评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如在《民报》第7号中发表了梦蝶生（叶夏声）写的《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一文<sup>⑤</sup>。作者为了批评梁启超等保皇派提出的“革命=无政府状态”的模式，他把革命党与无政府党加以区分后，对于无政府主义较具体地进行了批评。他说，“无政府党与革命党其主张不能两立”，“无政府主义之非政治革命，非仅不同，且大相悖谬也”，无政府主义则“其实行之期难定，其理想之为梦幻也”。作者在文章中主要批评的地方是无政府主义的

① 久津见藤村所著《无政府主义》中部分翻译。

② 渊实：《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民报》第9号，1906年11月15日。

③ 廖仲恺（无首）在《民报》第21号（1908年6月10日）中又翻译发表《帝王暗杀之时代》一文。

④ 参见〔美〕Bernal, Martin. *The Triumph of Anarchism over Marxism 1906-1907,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pp.97-142.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⑤ 梦蝶生：《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民报》第7号，1906年9月5日。

“破坏主义”这一特点。到《民报》第17号中铁铮（雷照性）发表的《政府说》<sup>①</sup>，再次较深刻地批评了无政府主义。他说：“今之世界，政府林立，一国无政府，必将被灭矣。”认为当前“运会”要求建立共和政府。作者指责无政府主义者“不循运会”，而“不赴运会，则将为运会所淘汰，而归于灭绝矣！”他尖锐地指出：提倡无政府主义，也与宣传改良主义一样，其结果“适以巩固满政府，非与汉奸同处乎？”但同时认为革命“鼓吹之时，无政府主义与民族主义可相辅而行”。作者强调的是无政府主义的“空想性”问题。照此看来，以共和革命论为主同盟会主流派认为无政府主义是缺乏现实可能性的。铁铮的上述文章刺激了法国的新世纪派，因此，褚民谊在《新世纪》的《无政府说》<sup>②</sup>长文中具体地反驳了同盟会的政治革命论。

我们应注意的是，1907年以后《民报》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过1903年前后流行的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相杂合的水平。他们在宣传革命理论中更具体地理解了西方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所谓从“巴枯宁”式无政府主义到“克鲁泡特金”式无政府主义转变过程就是反映其理论的科学主义化现象，而主要变化在对有关进化论问题的解释之中。章太炎和孙中山对无政府主义的认识态度是其较好的例子。

章太炎于1904年开始怀疑进化与道德之关系。到1906年，他在《具分进化论》<sup>③</sup>中对社会进化论做了自己的解释，主要认为在道德上善和恶并进，在生活上苦和乐并进。可能是受佛教的唯识论和老庄的相对主义影响，他的进化论的最大特点在于客观上肯定进化法则支配世界，但怀疑进化论能够给中国人以最美满

① 铁铮：《政府说》，《民报》第17号，1907年10月25日。

② 参见民《无政府说》，《新世纪》第31号，1908年1月25日。

③ 太炎：《具分进化论》，《民报》第7号，1906年9月5日。

的幸福。由于这种思路，章氏在《社会通论商兑》<sup>①</sup>一文中，更具体地批评严复解释的民族主义，从而攻击他主张的社会进化论。章氏对严复以图腾、宗法、军国的社会演化程序硬套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做法进行了驳斥，指出中国当时并不是宗法社会，他认为，为了进行真正革命先需要人民内部的自觉，而这种主体性的自觉则需要对压制和隶属的否定。1907年，章太炎曾积极参加张继、刘师培等人创办的“社会主义讲习会”活动，并且写了《五无论》（1907年9月）、《国家论》（1907年10月）、《“总同盟罢工”序》（1907年）和《“无政府主义”序》（1908年4月）等有关无政府主义的文章。1907年前后，章氏可能是受到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的影响，开始利用互助论而批判社会进化论。以后，他在《四惑论》<sup>②</sup>（1908年7月）中再次怀疑无政府主义的进化理论。在与新世纪派论争过程中，他全面否定“公理”、“进化”、“唯物”、“自然”等克鲁泡特金主义的主要概念。所以如此，他对于国粹主义和西方文化的不同看法应是一个重要原因。

孙中山的有关民生主义的理论和主张，也吸收了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思想。与章太炎一样，孙氏利用互助的进化论而批评社会进化论中的优胜劣败和弱肉强食等逻辑。他说：“人类初出之时，亦与禽兽无异，再经几许万年之进化，而始长成人性，而人类之进化，于是乎起源。此期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孙中山认为，一切恶都来源于残留在人类身上的兽性，一切善、一切“仁义道德”都来源于人类的互助天性，是这种天性的表现和作用。人类道德进化的过程，便是不

① 太炎：《社会通论商兑》，《民报》第12号，1907年3月6日。

② 太炎：《四惑论》，《民报》第22号，1908年7月10日。

断克服兽性，发扬、增长互助的人性的过程。这种“人类以互助为原则”的思想，从理论上来说，可以说是受克鲁泡特金的影响，但这两种互助论在理论上并不完全相同。克鲁泡特金认为，“互助是一切生物的本性、本能”。孙中山则认为，“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以互助为原则”。其实，当时孙中山对新世纪派吴稚晖等人鼓吹的无政府主义曾寄予相当的同情<sup>①</sup>。

综上所述，中国同盟会机关杂志《民报》的主要言论是对以三民主义为主的政治革命的宣传，即政论性杂志的性格很浓厚，相对来说社会文化方面的文章并不多。从该报第20号起<sup>②</sup>，宣言“国粹”后，更强调民族主义和纯粹学术的性格。《民报》对虚无党、无政府主义的介绍，无论从形式上、数量上都大大超越了以前所有的报刊。其原因如下：第一，不少同盟会员在上海时期已经初步认识虚无党、虚无主义及无政府主义，渡日后在日本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影响下，更注意学习这一理论。第二，与在上海时期一样，不少同盟会员特别对虚无党、无政府党人的暗杀、暴动方法感兴趣，因此，事实上在《民报》中的有关无政府主义记事大多数仍是介绍这种革命手段及其运动的历史、事件。第三，在同盟会中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眼中，社会主义就是民生主义，而无政府主义也是社会主义之一，所以他们对它进行介绍就是必然的了。另外，这与同盟会的两大领导人孙中山和章太炎对无政府主义的认识也有密切关系。其实，《民报》中除了宣传共和主义和国粹主义以外，有关无政府主义的（包括虚无党关系记事）文章也构成了其刊物宣传的三大思潮之一。

<sup>①</sup> 参见《孙文学说》。

<sup>②</sup> “本社自二十期起改定篇次，专以历史事实为根据以发挥民族主义。期于激动感情不入空谈□□□”（《本社特别广告》，《民报》第20号，1908年4月25日）。

## 第二节 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

### 1. 日本：“亚洲和亲会”和“社会主义讲习会”

20世纪以前社会主义在日本的传播与中国一样是在资本主义还不发达的情况下进行的，它和资产阶级的自由民权运动相伴而行。当时，日本一些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从资产阶级民主的要求出发，为了批判天皇绝对主义制度，在宣传欧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同时，开始介绍西方的社会主义学说。1901年5月，日本最初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是短命的，它仅存在一天<sup>①</sup>。从1902~1904年，在日本出版了许多有关无政府主义的书籍。但大多数激进分子把无政府主义与俄国民粹派的恐怖主义看做是一回事。其出版物中影响最大的是烟山专太郎的《近世无政府主义》一书<sup>②</sup>。这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社会主义者是幸德秋水和片山潜两人。

幸德秋水是一个法国派的自由民权主义者，是中江兆民的高足。从自由民权左派运动出发，他在《万朝报》发表《二十世纪的怪物——帝国主义》（1901年），从而确定了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又经过论文集《广长舌》（1902年）出版之后，终于写出《社会主义神髓》（1903年）一书。片山潜虽然是从基督教社会改良主义出发的，但通过各种工会和社会主义研究会及组织社会

---

① 有关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参见〔美〕Martin Bernal, *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 Ithaca/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74 - 89.

② 〔美〕Martin Bernal, *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 Ithaca/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202~203.

民主党，发挥了核心作用，结合工人阶级的成长，使自己发展成为社会主义者。他一面为《劳动世界》撰写文章，一面终于写出了《我的社会主义》（1903年）一书<sup>①</sup>。1903~1904年之间，他们通过平民社和《平民新闻》等展开反战运动（反对日俄战争）和进行翻译《共产党宣言》等的宣传活动。1905年2月，幸德秋水被捕入狱6个月。在狱中他阅读了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等的著作，就被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强烈地吸引住，表现出从社会主义者转向无政府主义者的苗头<sup>②</sup>。其后他宣称：“我是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者入狱，以无政府主义者出来的。”<sup>③</sup>

无政府派真正出现在日本是1906年，是由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创办的《新纪元》和幸德秋水、片山潜、久津见蕨村、大杉荣等参加的《光》两个杂志为中心展开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物。同年2月，“日本社会党”作为合法政党而建立起来。3月，堺利彦创刊的《社会主义研究》中已经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在杂志中连载的布里斯的《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久津见蕨村的《无政府主义之两派》等文，曾在《民报》上被翻译介绍。当时，著名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在美国居留6个月后回到日本，他忽然改变了过去主张的马克思主义而开始宣传无政府主义。幸德秋水在同年6月23日归国欢迎会演说中提倡所谓“直接行动”论，这一理论主要是反对普通选举和议会主义路线而提出以总同盟罢工为主的革命方法。他从美国带来的无政府主义，实际是无政府共产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一个结合物。幸德秋水从社会主义者转变为一

① [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二卷）（1959年作），商务印书馆，1991翻译版，第67页。

② [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近代日本思想史》，第77页。

③ 见路哲《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第48页。

个无政府主义者，也反映出当时无政府主义对日本思想界的巨大影响。有人曾认为上述的久津见藤村与幸德秋水两人是日本无政府主义第一代的指导者<sup>①</sup>。

1907年2月5日，幸德秋水在《平民新闻》上发表了《我的思想变化》一文，对照世界现状，尖锐地批判了议会政党化的社会主义的腐败堕落，主张采取直接行动论。对此，一直同幸德秋水一起进行活动的片山潜，于2月10日在《社会党运动的方针》一文中，针对幸德秋水的直接行动论，主张兼用议会政策，强调应该用一切手段致力于工人的团结训练与教育<sup>②</sup>。这些论争最终导致了日本社会党的分裂，社会党分裂为温和、强硬两派。温和派以片山潜、田添铁二为代表，在第二国际影响下，主张通过议会道路来实现革命；强硬派以幸德秋水、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为代表，完全否定议会斗争，宣扬无政府主义，主张除直接行动、总同盟罢工外，别无其他革命的途径。前者组织“社会主义同志会”，创刊《社会新闻》；后者组织“金曜讲演会”，创刊《大阪平民新闻》。1907年，日本的同盟罢工比上一年增加四倍以上，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直至1908年，幸德秋水及其思想，完全支配了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sup>③</sup>。我们注意的是，幸德秋水领导日本无政府运动兴盛时期与章太炎主编《民报》时期（1906年7月至1908年10月）大体上一致。

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强有力地影响了当时在日本的相当一批中国革命党人和青年学生。这时在日本留学的中国人已经达到万人之多，中国革命党人最集中的地方是日本的东京，而这

① [日] 铃木靖之：《日本无政府主义运动史》（二）（1932年作），黑色战线社，1979，第15～16页。

② [日] 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近代日本思想史》，第77～78页。

③ [美] Martin Bernal, *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 第213页。

里又是日本社会党人活动频繁的地方。因此，不少同盟会员经常出席日本社会主义党派组织的各种会议，日本社会主义者也积极参加同盟会等组织和团体。特别是幸德秋水的思想与活动影响了中国革命派及留学生<sup>①</sup>，他本人一直对中国革命派抱有同情态度，与中国进步人士有广泛的接触。但幸德秋水特别接近的并不是孙中山派，而是为中国革命追求新哲理的革命家们，其中有张继、章太炎等。例如，1906年末，张继再次回到东京，他通过日本人北一辉的介绍而认识了幸德秋水，可能是较早接触幸德秋水的同盟会员。1907年初，张继已经“与幸德秋水，大杉荣，堺利彦来往，尤佩服秋水学问”<sup>②</sup>，几乎完全接受了幸德秋水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章太炎可能很希望与幸德秋水进行交流，因此，1907年3月章氏给幸德秋水寄明信片，并与张继一起访问幸德秋水家<sup>③</sup>，自称“由儒家进入社会主义的”幸德秋水和国学大师章太炎的见面肯定具有相同的因素。此前一个月（2月13日），刘师培应章太炎之邀，与妻何震及姻弟汪公权一起赴日本，与章太炎、苏曼殊同居一处。他们先后加入同盟会，并由刘师培担任《民报》编辑。他们渡日后通过张继、章太炎从而开始与幸德秋水的交流。另外，除了受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直接影响以外，另一个影响来源是逃亡到日本的俄国无政府党人。他们特别

① 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景梅九，在回忆1907年他在日本东京时参加幸德秋水的演说会后说，“自从听了这场演说，对于社会主义，更加一番研究，因为这主义，就是三民主义里边的民生主义，与同盟会不相违背。所以和日本社会党人握手起来，天天在一块谈些世界革命大势”（景梅九：《罪案》，转引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第907页）。

② 张继：《回忆录》（一）（沈云龙主编《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三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8页）。

③ 参见〔日〕石母田正：《续历史と民族の发见》（第10章），东京，1969，第191~203页，转引《辛亥革命与幸德秋水》，《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翻译版，第330~339页。



热衷于搞暗杀活动，其言行自然也在一部分中国革命派中产生了影响，例如，他们的《革命评论》和《民报》之间的友谊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sup>①</sup>。

1907年4月，幸德秋水在《平民新闻》上撰文，号召中国的革命家与日本的革命家结合，东洋各国的社会党应当联合起来<sup>②</sup>。章太炎首先响应幸德秋水的倡议，开始与印度流亡在东京的革命者筹组“亚洲和亲会”<sup>③</sup>。入会的中国人有章太炎、张继、刘师培、何震、苏曼殊、陶冶公、陈独秀等，以及印度人钵逻罕、保什等，而日本方面参加者有幸德秋水、山川均、大杉荣等<sup>④</sup>。会长是章太炎，《亚洲和亲会约章》也出自章氏之手。但

① 参见〔美〕Martin Bernal, *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 第214-217页。

② 有关“亚洲和亲会”和“社会主义讲习会”两团体的事实，已有不少专论。例如，〔日〕竹内善朔：《明治末期における中日革命运动の交流》，《中国研究》5，1948年（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号，1981年）；〔日〕石母田正：《幸德秋水と中国》，《续历史と民族の发见》，东京大学出版会，1953年；〔日〕永井算巳：《社会主义讲习会と政闻社》，《东方学报》51，1968年；〔美〕Martin Bernal, *The Triumph of Anarchism over Marxism 1906-1907, China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pp.97-142.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日〕梶村秀树：《亚洲和亲会をめぐって》，《アジアの胎动》1、2，1977年；杨天石、王学庄：《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王有为：《试析章太炎“亚洲和亲会约章”》，《学术月刊》，1979年第6期；汤志钧：《关于亚洲和亲会》，《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辑，1980年9月；〔日〕富田升：《社会主义讲习会と亚洲和亲会》，《东洋学集刊》第64号，1990年11月（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2号，1993）等。

③ 杨天石、王学庄：《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第185页。石母田正以为亚洲和亲会第一次集会在7月20日左右，见〔日〕石母田正：《幸德秋水と中国》，《续历史と民族の发见》。

④ “朝鲜同志当时没有参加，这是因为他们有个前提，即日本人如果出席，他们就不出席”，结果没有加入（〔日〕竹内善朔：《明治末期における中日革命运动の交流》，《中国研究》5，1948年）。

有人认为，该会原是在张继、刘师培的积极倡导下筹建起来的，却把章太炎推于上位，以章太炎名义发表了宣言书<sup>①</sup>。在《约章》中以“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为宗旨，主张“凡亚洲人，除主张侵略主义者，无论‘民族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皆得入会”<sup>②</sup>。这一“反抗帝国主义”的宗旨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第一次正式出现了。但同时也在文章中也表现了某些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例如“会中无会长、干事之职，各会员有平均利权”等。章太炎认为只有民族主义与反帝国主义联系起来，亚洲被压迫民族共同参加反帝国主义斗争求得完全独立，才是“圆满民族主义”。在受到日本无政府主义影响之后，章氏的民族主义超越了种族主义范畴。可以说，从排满革命论到反帝民族主义的转变可看出他增加了对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的关心。此后，章太炎在《民报》上不但宣扬亚洲和亲会的旨趣，而且宣传亚洲各国民族的独立<sup>③</sup>。

1907年6月，刘师培通过他的妻子何震创办了《天义》报。同月，张继和刘师培共同发起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这可能是受幸德秋水等组织“金曜演讲会”的影响，这在张继和刘师培共同发表的广告中表述得非常清楚。他们说：“近世以来，社会主义盛于西欧，蔓延于日本，而中国学者则鲜闻其说。虽有志之士，间倡民族主义，然仅辨民族之异同，不复计民生之休戚，即

① [日]竹内善朔：《明治末期における中日革命运动の交流》，《中国研究》5，1948年。

② 章太炎：《亚洲和亲会约章》（见汤志钧：《关于亚洲和亲会》）。

③ 有人曾认为，关于亚洲和亲会的挫折，其主要原因在最有力的组织者、演说家张继受1908年1月的所谓“屋上演说事件”牵连后，逃亡法国所致。而同年6月大杉荣的“赤旗事件”后，在日本政府镇压下，各国同志的离散，给以决定性损伤（[日]富田升：《社会主义讲习会と亚洲和亲会》）。

使光复之说果见实行，亦恐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同人有鉴于此，慨社会主义之不昌，拟搜集东西前哲各学术，参互考核，发挥光大，以饷我国民，又虑此学之不能普及也，拟设社会主义讲习会，以讨论此旨。”<sup>①</sup> 讲习会名为讨论社会主义，实为提倡无政府主义。这以后，“女子复权会”的机关杂志《天义》报实际上成为社会主义讲习会的刊物。因此，讲习会派可以说就是天义派。在上述讲习会广告中的“虽有志之士，间倡民族主义，然仅辨民族之异同，不复计民生之休戚，即使光复之说果见实行，亦恐以暴易暴，不知其非”部分已经间接批判了同盟会的排满革命论。

1907年8月31日，他们在东京举行第一次讲习会时，刘师培首先就明确宣言：“吾辈之宗旨，不仅以实行社会主义为止，乃以无政府为目的者也”，而“无政府主义于学理最为圆满”。又说：“大约言无政府，则种族革命该于其中，仅言种族革命，决不足以该革命之全，此吾辈所由以无政府为目的也。”随后，张继在会议上声明：该会的目的在于“阐明无政府主义”。接着，幸德秋水做了讲演。通过刘师培解释，幸德秋水演说又提出：“吾辈之意，惟欲于满洲政府颠覆后即行无政府，决不欲于排满以后另立新政府也”。幸德秋水这篇演讲稿后来又在巴黎的《新世纪》上分两次转载。最后，何震在有关女性解放的演说中介绍《天义》报时说，“一面言男女平等，一面言无政府”<sup>②</sup>。这就为社会主义讲习会定下了调子，所以社会主义讲习会与巴黎世界社一起是中国最早成立的无政府主义组织。从现存的资料来看，可

<sup>①</sup> 《社会主义讲习会广告》，《民报》第15号，1907年7月5日。

<sup>②</sup> 均见《“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记事》，《天义》第6卷，1907年9月1日。

以判断该会总计召开了8次会议<sup>①</sup>。其中在该会做过演说的，中国方面有刘师培、何震、张继、章太炎、景定成、潘怪汉、汪公权、南桂馨等，日本方面有幸德秋水、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等<sup>②</sup>，这些参加者基本上与亚洲和亲会成员一致。

同一时期，孙中山离开日本时发生了所谓民报社经费问题争议。其纷争过程中同盟会领导集团分裂，此即第一次“倒孙运动”。章太炎、张继等人激烈地批评孙中山，张继声言“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章太炎也在孙中山照片上写“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等字。这时刘师培提议改造同盟会东京本部，准备将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北一辉、和田三郎等拉进同盟会领导集团<sup>③</sup>。由此观之，同盟会上层在1907年的分裂原因与张继、刘师培等人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日本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种分裂是在革命运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

1908年4月，所谓“齐民社”成立，它是由社会主义讲习会改名而成。实际上，在改名后不久的时间内，二者在名义上是并用的，该社共计召开5次大会。齐民社时期尽管最重要的组织者张继因所谓“屋上演说事件”脱离该社<sup>④</sup>，但实际上它仍在继续活动，特别是所记录下来的最后两次大会（5月17日、6月14日），参加者竟达数百人<sup>⑤</sup>。

① 参见蒋俊、李兴芝《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第39～40页。

② 参见〔日〕富田升《社会主义讲习会と亚洲和亲会》。

③ 参见杨天石《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

④ 1908年1月17日，张继因参加幸德秋水派的“金曜讲演会”，几乎被日警逮捕，逃脱后，于1908年3月经新加坡赴欧洲。

⑤ 〔日〕富田升：《社会主义讲习会と亚洲和亲会》。

社会主义讲习会主要领导人之一张继，胆大性急，勇于斗争，在东京的中国人士中被称其“一团火”<sup>①</sup>。清政府曾悬赏3000元收买他的首级。在此期间，他曾将幸德秋水译为日文的马拉得斯塔（E. Malatesta）的《无政府主义》及罗拉（A. Roller）的《总同盟罢工》于1907年重译为中文。前书由刘师培作序出版，后书也由章太炎、刘师培、黄侃分别作序出版。马拉得斯塔是意大利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他的工团主义思想对中国无政府派的影响相当深刻。当时，有关马拉得斯塔著作的翻译不少。例如，《天义》报第16~19卷合册以白话译载了他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工人问答》，译者为周作人与吴弱男。《新世纪》第21~27号也以《工人之无政府主义谈》为题目翻译连载了同一著作。罗拉是德国无政府主义者，所著《总同盟罢工》被视为无政府主义的经典<sup>②</sup>。作者将总罢工和非军备运动联系起来通过直接行动方法来达到无政府社会主义，强调了经济、道德、政治诸革命，这些内容与幸德秋水宣传的革命论大体上一致。

对于讲习会另一领导刘师培来说，上海时期他写的《中国民约论》和《中国民族志》等文，主要介绍了西方的民约论和进化论并持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态度。但是，他到东京接受了无政府主义后，开始批判关于社会进化论的种种解释，而且他对于民约论的积极解释也与无政府道德论持一致的态度。在此期间，从他写的《悲佃篇》（1907年7月）、《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1907年9月）、《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三）》（1907年12

① 例如，1907年10月梁启超等人在东京锦辉馆召开立宪团体“政闻社”成立大会，张继带人冲击会场。还有，同年11~12月，张继又带头反对立宪派用“集股拒款”的方法声援江浙铁路风潮。

② 1904年有的杂志中已经开始介绍总同盟罢工，其中，作者已认识到总同盟罢工是无政府党人的主要革命手段（《社会革命与总同盟罢工》，《大陆》第2年第9号，1904年10月28日）。

月)一系列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从民族主义到无政府主义的转变过程<sup>①</sup>。上海时期他强调过的“汉民族”或“攘夷论”等的民族主义色彩,到东京时期已经改变了,即他开始注意到农民和工人等“人民”本身并具有了以反强权为基础的反帝论代替种族主义的色彩。刘师培批评严复是一个功利富强论者,放弃了上海时期对近代西方文明的好感,而跟章太炎一样对资本主义产生强烈厌恶的心理。再者说,上海时期刘师培为了批判封建专制,曾试图寻找中国古代与西方近代一致的东西。相反,到东京时期他为了否定西方资本主义,而试图寻找中国古代与未来无政府社会的一致性。大体来说,刘师培从1907年6月《天义》报创刊前后急速地转变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在《天义》报中可以看到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观。他的妻子何震本来是爱国女学出身,热情赞扬虚无党人,她的激进的无政府女性解放论,在《天义》报的不少文章中可以看到。

另外,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也是讲习会的积极分子。例如,章太炎曾先后做过《国家论》、《人之根性恶》等讲演。1907年12月,又曾提议派张继去青岛举办讲习会。同一时期,他还为张继所译《无政府主义》一书作序文。在章氏看来,无政府主义虽然赶不上庄子的《齐物论》,但它是实现人类平等、救护贫民的好药方<sup>②</sup>。光复会主要领导人陶成章、张恭等人的无政府主义色彩也较浓厚,从他们制定的《龙华会章程》(可能是1908年春)<sup>③</sup>和

① 有人认为,刘师培在《民报》第18号上发表的《辨满洲非中国之臣民(续)》一文较明白地表现出从排满民族主义者到无政府主义者的转变过程(〔日〕嵯峨隆:《近代中国アナギズムの研究》,第61页)。

② 杨天石、王学庄:《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第187页。

③ 参见杨天石、王学庄《龙华会章程探微》,《历史研究》,1979年第9期。

种种革命活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无政府主义的种种因素<sup>①</sup>。

作为社会主义讲习会成员的张继、刘师培、章太炎等人之间虽然在性格气质上具有不少差别，但在对待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态度上却共同持批判的态度。张继虽然是讲习会和《天义》报的主要组织者，并对无政府主义宣传也产生过巨大影响，但他发表的关于无政府主义学术性的文章除几种翻译物外却很少。章太炎的活动主要在主编《民报》及国学讲习会。他写的一些文章对无政府主义持同情态度，但对民族主义的强烈感情却超过无政府主义。因此，讲习会派的政治思想主要是通过《天义》报中刘师培、何震的文章而体现出来。在该报中，他们宣传“人类平等和人类均力说”、“废除国家和政府”、“实行无政府共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主张总同盟罢工、农民革命、亚洲革命”、“女性解放论”等。这种社会革命主张很自然地就会对以孙中山为主同盟会的三民主义提出异议，直至进行全面的批判。

讲习会派（指天义派）提出：“无政府革命，凡种族革命之利无不具，且尽去种族革命之害。况实行无政府，则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均该于其中，若徒言种族革命，决不足以该革命之全，此无政府革命优于种族革命者也。”<sup>②</sup>所以，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排斥“反满”，他们将“反满”作为一种斗争口号，但不足以完全说明革命的含意。在有关种族主义问题上，刘师培等人认为：第一，所谓“学术之谬”，即在学术上过分强调了中外华夷之旧说。他们把民族主义解释为反对帝国主义；第

<sup>①</sup> 参见〔日〕竹内善朔《明治末期における中日革命运动の交流》，第88～89页。

<sup>②</sup> 震、申叔：《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天义》第6卷、7卷，1907年9月1日、9月15日。

二，所谓“心术之恶”，即指责革命派反满的目的是“希冀代满人握政权”；第三，所谓“政策之偏”，即革命党的基础力量只有“学生和会党”。他们希望这次革命能具有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sup>①</sup>。章太炎在说明民族主义革命的内涵时，也摆脱了超越早期的种族主义色彩，而主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奴役。讲习会派特别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议会制度具有反感情绪。章太炎在《民报》上连续发表的《五无论》、《国家论》、《代议然否论》等文，集中地表现了他对梁启超主张的君主立宪制度和孙中山主张的美国式政治制度的批判立场。章氏认为，代议制不仅有碍于反帝的民族主义的实现，而且有碍于真正民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实现<sup>②</sup>。刘师培也担心资产阶级政权建立后，人民将更加不自由，社会革命将更加困难。

讲习会派通过政府对人民、资本家对佣工、强族对弱族各对立结构来说明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特别强调，军备和私有财产是人民的大敌和公理的大敌。他们认为，排满革命论不过是民族帝国主义说，保皇派的立宪论、革命派的共和论都只是私利私欲的产物。革命应是从大多数平民开始的，因而应包括种族、政治、经济的根本性的社会革命。讲习会派的观点是，专制、立宪与共和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他们认为君主、立宪、共和等各种政府是万恶之根源，并且激烈地批判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选举制。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经济不平等具有强烈的反感，并且认为社会革命论的形成在于中国固有政俗与西欧最圆满学说的结合之中。其实，对民族问题的历史认识不足在幸德秋水的思想中已经存在着。他不但批判西方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

<sup>①</sup> 震、申叔：《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天义》第6卷、7卷，1907年9月1日、9月15日。

<sup>②</sup> 太炎：《代议然否论》，《民报》第24号，1908年10月10日，第8~10页。



同时也批判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因此，他不大注意具有民族解放理论的社会主义的时代意义，这种态度可能对讲习会派影响不少。

综上所述，亚洲和亲会和社会主义讲习会均是为对抗孙中山领导的“建设民国”派而兴起的。他们受到幸德秋水的直接行动论的影响，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其后，无政府派内部的分裂，即章太炎和刘师培夫妇之间的对立、章太炎与无政府主义诀别和接近端方及刘师培的所谓“变节”问题等，也与这些团体的解体有密切关系<sup>①</sup>。另外，在革命派内部还出现了攻击和重建光复会这样的事件，其原因是相当复杂的。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流行在其中的影响与作用，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两个团体可能是在所谓的“赤旗事件”（1908年6月）中遭到日本政府对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弹压而逐渐解体。到1910年，为了除去社会党、无政府党人，日本政府通过假造阴谋暗杀明治天皇的“大逆事件”而杀害了幸德秋水等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由此，日本无政府主义运动也进入了黑暗时期。

大逆事件之前，幸德秋水在《病中放语》（1908年1月1日）一文中对中国一些革命派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给予评价说：

然而，在法国及日本留学的青年人以及流亡革命党青年的大多数人，已经开始了排斥满人、恢复中国、创立宪政等

<sup>①</sup> 这些问题参见杨天石《章太炎与端方关系考析》，《南开学报》，1978年第6期；〔日〕富田升：《刘师培变节问题の再检讨》，《论集（人间、言语、情报）——东北学院大学论集》第98号，1990年12月；杨天石：《刘师培举报章太炎》；《刘师培举报章太炎引起的风波》；《刘师培举报章太炎引起的风波的余波》，《民国掌故》，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郑师渠：《章太炎刘师培交谊论》，《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6期；杨天石：《何震揭发章太炎》，《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等。

活动。他们不安于共和政治，更着力主张所谓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尤其激进者提出共产的无政府主义；青年人甚至热心地倡导个人的无政府主义。他们不断地把几万册杂志、小册子秘密输送到其本国……对于当前的国会、选举、商业、经济，都根本不信任，他们对当前的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都表示绝望，而另外要谋求人民幸福之途。<sup>①</sup>

可以看出，幸德秋水已经注意到在法国的中国人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如果说，日本是中国无政府主义传播的东路的话，那么，法国则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西路。当时法国是欧洲国际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中心。

## 2. 法国：“世界社”与言论出版事业

法国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的故乡，也是巴枯宁、克鲁泡特金以及其他许多国际无政府主义者经常活动的地方。19世纪后期，在法国流行的暗杀风潮衰退；而80年代前后，克鲁泡特金和邵可侣（Elisée Reclus）等人开始介绍新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克鲁泡特金是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和活动家，并且是国际性的地理学家。他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就集中精力从事于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宣传活动，写下了大量的著述。他在法国从1883年1月到1886年1月三年的监狱生活中著述的《面包掠夺》（1892年出版）和《田园、工场、手工场》（1899年出版）两本书就是有关无政府共产主义理论的代表性著作。后来，他在英国写的《现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1901年出版）、《互助：进化的一个要素》

<sup>①</sup> 幸德秋水：《病中放语》，《高知新闻》，1908年1月1日。见〔日〕盐田庄兵卫编《幸德秋水日记书简》（增补版），未来社，1965，第151～152页。

(略称《互助论》，1902年出版)<sup>①</sup>等著述也直接影响了中国无政府派<sup>②</sup>。

邵可侣与克鲁泡特金一样，也是一位著名的法国地理学家与无政府主义者，同时又是克鲁泡特金的好同志。克鲁泡特金在法国被监禁时期，他替克氏编辑出版《面包掠夺》，书名也由邵可侣代拟，这一事实反映出两人之间深厚的友谊<sup>③</sup>。强调进化即革命，是他无政府学说的理论基础。有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曾认为，“邵可侣的行为可为革命者的模范，他有宗教家的热忱，而无他们的迷信，他为爱好动物，一生吃素……他是革命的‘清教徒’”<sup>④</sup>。邵可侣的著作有《进化、革命和无政府理想》（1892年）、《世界新地理》（1875～1894年）、《人与地》（1905～1908年）<sup>⑤</sup>等。他向住在法国的中国人传播无政府主义，并直接影响

- 
- ① 《互助论》原是克鲁泡特金在1890～1896年间，在英国伦敦用英文写的单篇文章，陆续发表在《十九世纪》(Nineteenth Century)杂志上，1902年才汇集成单行本出版。书名的原称是《互助：一个进化的因素》，这本书当时在无政府主义的著作里占有一个很特殊的地位。
- ② 在辛亥革命以前，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理论之所以能在中国传播和发展，这是由于中国当时有其存在的气候和土壤。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俄国是中国的邻近国，当时在中国人的一般认识中，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国情与中国国情相似。第二，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重伦理、儒学的教化既是政治伦理化的表现，又是伦理政治化的结果。传入中国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中，克鲁泡特金的理论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齐卫平、钟家栋：《向着“无何有之乡”——无政府主义思潮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348页）。
- ③ 参见克鲁泡特金著、巴金译《面包与自由》（爱利赛·邵可侣序），商务印书馆，1982翻译版，第1～6页。
- ④ 邵可侣著，毕修勺译《进化与革命》（译者序），平明书店，1947翻译版。
- ⑤ 以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毕修勺在1930～1934年间，曾在伯鲁·邵可侣指导下，翻爱利赛·邵可侣的大著《人与地》，参见路哲《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第86页。

了以后《新世纪》等杂志的创刊<sup>①</sup>。

我们应注意的另一个人物是格拉佛 (Jean Grave)。他是法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家，著有《垂死的社会和无政府状态》、《革命与改良》、《未来社会》等。20世纪初，正如上所述在法国最流行的是克鲁泡特金和邵可倡提倡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而在其运动中，格拉佛在出版方面的旺盛活动是一个重要构成部分。著名编辑兼宣传家格拉佛主编的《新世纪》，可以说是无政府共产主义最具代表性的杂志。它除了宣传无政府共产主义外，还介绍当时刚兴起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因此，法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发生了重大变化，从1902年到1908年之间，在法国工人运动中无政府主义（包含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力达到顶点<sup>②</sup>。在此期间，他与中国留学生之间关系密切，并协助他们的社会活动。严格说来，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源泉，是邵可倡和格拉佛所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思想。

李石曾与张静江于1902年以驻法公使孙宝琦随员身份赴法。到法国后，李石曾于1903年入梦达尼城农业实用学校学习。1906年8月，在巴黎经张静江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自农校毕业后，即改入巴黎巴斯德学院 (Institut Pasteur) 研究生物化学，特别从事于大豆的研究。“时先生 (李石曾) 在巴黎住家食堂中常遇见地理学大家邵可倡 (Paul Reclus)，颇将克鲁泡特金所著互助论，陆谟克 (Lamarck) 所著生物互助并存论，居右 (J.M.Guqau) 所著自然道德论，介绍宣扬，先生闻而乐之”<sup>③</sup>。以后，他通过邵可倡又受到了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

① 有关邵可倡的无政府主义参见 [美] Fleming, Marie. *The Anarchist Way to Socialism: Elisee Reclus and Nineteen Century European Anarchism*. London: Croom and Helm, 1979.

② Woodcock: 《无政府主义》(运动篇)，萤雪出版社，1982翻译版，第91页。

③ 王云五主编《民国吴稚晖先生敬恒年谱》，第18页。

推崇卢梭和伏尔泰反对强权、反对宗教的哲学；又深为无政府主义思想感化，研究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其实，李石曾通过伯鲁·邵可倡（爱利赛·邵可倡的侄子）的介绍认识了无政府主义。伯鲁·邵可倡给李石曾介绍爱利赛·邵可倡和让·格拉佛的法国无政府共产主义及无政府工团主义。李氏可能是对邵可倡的无政府主义伦理学印象很深，因此他也以无政府主义者为标准实行严格的伦理生活，其代表事例就是实践素食主义而参加肉体劳动。他于1907年在巴黎开设“远东生物学研究会”，并附设研究室，研究大豆食品，改进并推广豆制品的制造，为此还开设豆腐工场。当时他给工场华工讲授法语及文化科学知识，此为“勤工俭学”之始，可以说他是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中全面地接受无政府主义之第一人。

张静江在法国充任使馆商务随员的同时，由其父出资30万元开办通运公司，在上海、巴黎间经营古玩、茶叶、丝绸等贸易，并在纽约开设分公司。他与李石曾一样“旅法数年，渐结识西欧无政府党诸学者，获聆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学说，因之思想锐进，立论怪特，隐然以中国无政府主义之宣讲师自任”<sup>①</sup>。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发现张静江的有关无政府主义学说的论述<sup>②</sup>。1905年，张静江在法国商船上结识了孙中山，表示愿意在财政方面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此后，张氏在经济方面大力支持同盟会的活动，博得了孙中山的信任<sup>③</sup>。1906年3月，张静江在新加坡正式加入同盟会。新世纪派的主要撰稿

① 冯自由：《新世纪主人张静江》，《革命逸史》第2集，中华书局，1987，第210页。

② 据冯自由说，“静江纵谈所笃信之无政府、无宗教、无家庭等学说，论议生风，所谈男女关系之界说，尤见天真”（冯自由：《新世纪主人张静江》，第211页）。

③ 冯自由：《新世纪主人张静江》，第212页。

者褚民谊本来是张静江的同乡后辈，1903年去日本留学研读政治经济，后来又随张静江到法国，参加李石曾创办的豆腐工场和勤工俭学活动，开始接受无政府主义学说。这时他可能受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影响较大，曾说：“阅克陆泡特金之《告少年》，然后知世之不公平者，断非藉律师之力，所能展转也，根本之问题，不能解决，则社会种种，终不得正当。所谓根本问题者，则社会组织之问题也。”<sup>①</sup>

1904年，吴稚晖因苏报案移住英国，已40岁的吴氏热情地学习英语，并开始学习照相术，研究写真铜版。他在伦敦过了一段十分艰苦而又努力学习的生活，积累了一些勤工俭学的经验。1905年3月，孙中山访问吴稚晖，始相订交。同年7月，张静江自巴黎至伦敦，因而与吴稚晖相见。前此二年，他已与李石曾相识于上海。1905年冬，吴氏在伦敦由曹亚伯介绍加入同盟会。当时吴稚晖感慨西方诸国的物质文明急速发展，开始怀疑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他在英国熟知进化理论和古人类学，便开始用中文论述这些理论，并着手翻译工作。1906年，吴稚晖应张静江邀请至巴黎旅游。李石曾给吴氏建议发起“世界社”之组织，这时吴稚晖受到李石曾的影响而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曾回忆说：“从前我在巴黎力驳无政府主义，它现在幼稚的信条，便叫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我当时老实不客气，竟说我将不尽所能，止取所需，我不愿烧饭，我止愿吃饭，你奈我何？李石曾先生心平气和的对我说道：‘你吃饭就是啦！’而且他背后并不曾再说‘吴稚晖之不仁也’。我明天便挂了无政府党的口头招牌。”<sup>②</sup>李石曾又邀请吴稚晖赴法，共同筹划开展社会运动，因

<sup>①</sup> 民：《续无政府说》，《新世纪》第46号，1908年5月9日。

<sup>②</sup> 吴稚晖：《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吴稚晖学术论著》，上海，出版合作社，1927，第19页。

此同年 12 月吴稚晖移住巴黎<sup>①</sup>。

到 1907 年，这三位同盟会员的主张已经超过中国同盟会的政治革命主张，他们希望将中国的革命与世界革命思潮结合，进而影响中国的革命事业。有趣的是，李石曾、张静江等人参加同盟会时，都不满意盟书上的“当天发誓”文句，因为他们是无政府党人，都不信有天，不用“当天”二字，所以他们都省略这种宣誓而破例加入同盟会。有人曾在有关欧洲同盟会的回忆中对上述新世纪派的情况进行批评说：

留法农科毕业之学生李煜瀛（李石曾）加盟（同盟会），未几张静江加盟，石瑛、曹亚伯、吴敬恒（吴稚晖）自英来巴黎加盟。自张静江加盟后，巴黎之革命团体为之一变，盖从前纯为学生，此刻则兼营商业。西历一千九百零七年阳历年节，我赴巴黎，则见有开元茶馆之设，兼售中国美术品。李煜瀛有印字处之设，专出画报，又组织豆腐公司。吴敬恒亦来，筹出《新世纪》周刊。时总理需款甚急，静江至出卖茶馆、停止营业以济之，前后若干万，不复如寒酸学生之仅能接济旅费矣。当一千九百零七、八年之间，巴黎之革命空气可称盛极一时，未几又复衰颓。因李煜瀛为无政府党所引诱，以浪漫派普鲁东、巴古宁为神圣，尊崇其说。吴敬恒本不通欧洲文学，亦盲从之，对于革命转趋冷淡，所出《新世纪》反刺孙文、黄兴。<sup>②</sup>

① 1910 年的法国情报文书中报告，“从 4 年前（指 1906 年）在巴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集合处，其中，相当数人自任‘革命前卫队’的真正无政府主义者”。

② 朱和中遗稿：《欧洲同盟会纪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 6 集，第 17～18 页。

另外，我们应注意的是新世纪派和蔡元培之间的亲密关系。蔡元培于1907年6月至1911年11月第一次留学德国时期，在那里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潮作为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流派之一，受到整个中国留学生的注意。蔡元培参加了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人组织的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团体——“世界社”<sup>①</sup>。世界社出版的《新世纪》刊物，曾多次介绍克鲁泡特金的著作，蔡氏受到过克鲁泡特金的影响。特别是1908年，蔡元培受李石曾的影响而开始实践吃素。同年，他曾游巴黎，与吴稚晖、李石曾多有往来。《蔡元培年谱》中说：“先生（蔡元培）与吴、李、张三人，志同道合，在清末即奠下友谊的基础，民国成立后，更是密切合作，在不同的岗位上，共同为促进国家统一而努力，因而社会中有‘吴、蔡、张、李’同称之说。”<sup>②</sup>所谓“民国四老”这个词即是从这里而来的。

1906年12月，吴稚晖与李石曾、张静江正式发起组织“世界社”，地址设于巴黎达庐街25号（25, Rue Dareau, Paris），并组织“中华印字局”，位于巴黎卫生街83号（83, Rue Dela Sante, Paris）。1907年1月，筹备编印《新世纪》周报。《新世纪》编辑部设在巴黎濮侣街4号（4, Rue Broca, Paris），这个地方也就在由法国无政府主义者让·格拉佛所发行的机关报《Les Temps Nouveaux》（译名“新世纪”或“新世代”）的同一座楼房<sup>③</sup>。巴黎无政府派创办的中文《新世纪》周刊，直接取名于法文的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该刊物不少文章是从格拉佛主编的《新世纪》杂志上翻译而来。这从中文《新世纪》的第一号

① 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第181页。

② 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第182~183页。

③ 张继：《回忆录》（一）（见沈云龙主编《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第8页）。



题目《La Tempoĵ Novaj》(世界语名称)之中就可以看出是受法文《新世纪》的影响。特别是,爱利赛·邵可倡的侄子伯鲁·邵可倡和世界社同人的关系很密切。李石曾自己就说“小邵(伯鲁·邵可倡)是我最好的朋友”,并与吴稚晖比较说:“邵可倡是法国的吴稚晖,吴稚晖是中国的邵可倡。”<sup>①</sup> 这些事实充分说明格拉佛等法国无政府主义者与新世纪派之间有直接的交流。《新世纪》由张静江负责经费,吴稚晖负责编排,李石曾、褚民谊、蔡元培等供给文稿。同年6月22日,《新世纪》创刊号发行。他们创办《新世纪》杂志的理论基础是克鲁泡特金、邵可倡等人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并相应介绍蒲鲁东、巴枯宁、拉马尔克等人的思想。

早在《新世纪》创刊前后,李石曾等人发行过大型画刊——《世界》,编印过《近代世界六十名人》,包括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其中就有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像传。《世界》是以文化和社会为建设目的而出版的画报,只出了两卷和附录一卷后便停刊了<sup>②</sup>。但《世界》杂志明确地表明了新世纪派对文化问题的关心。他们共同认为文化是各种社会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世界》里并不公开宣传无政府主义,而且不少文章是介绍西方的最新科学技术及当时有关国际政治的新消息。它由“世界各殊之风物”、“世界真理之科学”、“世界最近之现象”及“世界进化之略述”等栏目构成,其中详细介绍了进化论、暗杀等社会革命风

<sup>①</sup> 李石曾:《空间之琐谈》,《李石曾先生文集》(下册),中央文物供应社,1980,第58页。

<sup>②</sup> 1907年1月或7月,第1期《世界》画报印一万册,以张静江妻子姚蕙为发行人,另设世界社于上海望平街,有周柏年主持国内推销,当时警为珍奇。1908年1月,《世界》画报第2期出版,并增刊《近代世界六十名人》,各附肖像、简介其学术思想或科学发明(王云五主编《民国吴稚晖先生敬恒年谱》,第35-36页)。

潮、女性及教育问题等等。有关中国方面的问题在记事中也可看到，即通过画报形式介绍缠足、阿片、新军、华工、灾害等社会问题（参见表5）。当时在《世界》第2号末尾中预告了第3号的目录，但可能是因经济问题而最终没有发行。世界社同人认为，“《世界》为文化社会建设之刊物，《新世纪》为当时革命之秘密机关”<sup>①</sup>。

世界社同人（以下称新世纪派）在《新世纪》创刊号中把革命定义为：“昔之所谓革命，一时表面之更革而已……若新世纪之革命则不然。凡不合于公理者皆革之，且革之不已，愈进愈归正当。故此乃刻刻进化之革命，乃图众人幸福之革命。”<sup>②</sup> 他们把无政府主义特点归结为自由（=去强权）、平等（=共利益）、博爱（=爱众人）、大同（=无国界）、公道（=不求己利）、真理（=不畏人言）、改良（=不拘成式）、进化（=更革无穷）等关键概念<sup>③</sup>。又说，无政府“革命之大义”是在“自由、平等、博爱、大同、公道、真理、改良、进化”等的价值实现之中。新世纪派认为，“无政府则无国界，无国界则世界大同矣。人不役人而不役于人，人不倚人而不倚于人，人不害人而不害于人，所谓自由平等博爱是也”<sup>④</sup>。为了实现这种无政府主义的理想，他们号召对既存秩序进行反抗，其主要攻击对象是“军国主义”、“祖国主义”、“家庭主义”、“私产主义”、“宗教主义”等五大主义，并且他们把这五大主义归结为“强权主义”，“反对强权主义”的口号即规定了该派的无政府主义性质。巴黎无政府派宣称坚决反对宗教、传统、家族、放纵、知识分子、统治、军阀、国

① 李石曾：《重印巴黎新世纪书后》，《李石曾先生文集》（上册），第374页。

② 《新世纪之革命》，《新世纪》第1期，1907年6月22日。

③ 真民：《革命》，《新世纪丛书》第1集，1907年。

④ 民：《续普及革命》，《新世纪》第17号，1907年10月12日。

家等，同时积极赞同自由、科学、人道、革命、共产、国际等<sup>①</sup>。其主要实现手段是包括“书说”、“抵抗”、“结会”、“暗杀”、“众人起事”等方法。在革命宣传中，他们始终坚持互助论的信念，即追求人性的进化、社会的进化，最终达到理想社会。新世纪派的这些观点为后来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所继承。

《新世纪》创刊后，李石曾等人通过《答 CHEE 氏》、《答自由血氏》、《验新世纪丛书革命（非社会党来稿）附答》、《来书（军魂）附答》、《答旁观者》等的答辩，较详细地说明了他们追求的目标。文章中，新世纪派认为，国家和政府只不过是少数人支配多数人的机构，是破坏正常社会的根源。与东京讲习会派一样，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和工人间的关系也从同样的角度来进行批判。其实，当时巴黎无政府派所要推翻的国家和政府的具体对象就是清朝，他们认为推翻清朝就意味着无政府主义革命的开端。新世纪派主张的不是满族和汉族之间的对立，而是对皇帝体制的消灭。但他们实际上直接打倒的对象是清皇室和官僚张之洞、端方、袁世凯等人，并且仇视主张君主立宪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光绪帝、西太后死亡前后，《新世纪》的论调中没有一点同情心理，反而将两人比喻为各种动物以示嘲弄。与对国家革命的态度一样，他们也对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持基本否定的立场。

中国无政府派共同认为，代议制政治与专制政治一样，也是极恶的东西。如果说专制政治是绝对少数人统治绝对多数人民的话，那么代议制政治是多数支配阶级统治全部平民的结构。这种认识也是依据西方无政府主义的逻辑，这种无政府革命论的实际内容与保皇派提出的君主立宪论和排满派提出的共和革命论之间具有一定的差别，他们是在无政府革命 = 社会革命、共和革命 =

<sup>①</sup> 《本馆广告》，《新世纪》第 52 号，1908 年 6 月 20 日。

政治革命的区别基础上展开自己的理论的。另外，新世纪派认为暗杀是革命的主要手段之一，所以他们积极介绍西方诸国的暗杀活动，并且赞扬徐锡麟、秋瑾、汪精卫等人的暗杀行为及朝鲜人安重根对日本人伊藤博文的暗杀活动。在与《新世纪》的创刊同时发行的《新世纪丛书》和《新世纪杂刊》中，我们可以再次了解新世纪派追求的无政府革命论。

《新世纪丛书》共出版六集。第1集《革命》；第2集《思审自由》；第3集《告少年》（克鲁泡特金著，真民译）；第4集《秩序》（克鲁泡特金著，真民译）；第5集《世界七个无政府主义者》（保罗·爱露斯著，真民译）；第6集《无政府共产主义》（卡菲洛著，真民译）。除《革命》一文为李石曾撰写外，其余5篇都是李石曾翻译的外国无政府主义的论著。他在《革命》一文中说，“政治革命为权舆，社会革命为究竟”。通过这种区分设定了同盟会的政治革命和他们主张的社会革命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排满不若言排皇”，排皇革命比排满革命更优越。因为排皇革命不过是政治革命，不能说是真正革命，所以社会革命就是惟一的真正革命。李石曾还说：“社会革命必自倾覆强权始，倾覆强权必自倾覆皇帝始。”以排皇革命作为无政府革命的出发点。新世纪派认为国家主义是“自利”，是从帝王开始的，而社会主义是“至公”，是从平民开始的，即说明了帝王主义和国家主义两者是同一性质。当时在立宪派和共和派之间进行的有关瓜分问题的论争上，李石曾认为，“即使果有瓜分之事，亦必革命，因今政府之害民，尤甚于瓜分之祸故也。吾何畏瓜分乎？畏失吾自由与平等而已。请观他国与吾政府之专制孰为甚耶？”<sup>①</sup>这样，他表现的革命比瓜分更应该重视的主张，甚至在革命派内部也引起了不少争议。

<sup>①</sup> 真民：《革命》，《新世纪丛书》第1集。

《新世纪杂刊》共有五卷：一、《萍乡革命军与马福益》；二、《中国炸裂弹与吴樾》；三、《上海国事犯与邹容》；四、《广东抚台与史坚如》；五、《湖南学生与禹之谟》，均为陆沈编著<sup>①</sup>。其中，《萍乡革命军与马福益》附录中收入了千夜（褚民谊）的文章《就社会主义以正革命之义论》。除这篇文章外，都是宣传和介绍反清革命活动的文章。褚民谊在上述文章中宣传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革命”，不仅攻击了君主立宪派，而且也批评了共和革命派。文章说：“其民族主义不脱复仇主义，政治革命亦不脱专制，不过易姓改朝之瓜代，而不谓之真革命。使果中国今日犹为此革命也，吾决其无济于社会，无益于人道也。”积极提倡“社会革命”，公开地贬低或否定“政治革命”，是褚民谊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他在《新世纪》上发表的文章，也表露出这种倾向<sup>②</sup>。例如，《伸论民族民权社会三主义之异同》一文，在比较了无政府的革命与有政府的革命两者异同后，指出“推主张革命者之所以多主张有政府者，其利害之见与功名之心有以蔽其明也”。他表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不能达吾之目的也，则舍民族主义、民权主义而取其较广大较公正之社会主义也”<sup>③</sup>。褚民谊在《杂刊》中的“社会革命包括排满革命”这一主张和李石曾在《丛书》中的“排皇革命比排满革命好”的看法，与新世纪的读者之间引起了论战。

当时，年轻的李石曾和褚民谊掌握无政府主义理论较多，因此，他们两人对同盟会的三民主义批判相对比较激烈。与此不

① 据广告，《新世纪杂刊》共出版五种，但我们只见到上面《萍乡革命军与马福益》一种。

② 蒋俊：《辛亥革命前有关无政府主义的书刊资料述评》，《中国哲学》13，人民出版社，1985，第364页。

③ 民：《伸论民族民权社会三主义之异同》，《新世纪》第6号，1907年7月27日。

同，排满革命活动经验较丰富的吴稚晖对同盟会路线的态度则较温和。吴稚晖认为民族主义的革命会成为复仇革命，共和革命仅是过渡，最终是大同革命，便是无政府主义的境界。这里吴稚晖宣传的无政府主义是为了“坚决革命党之责任心”，他宣传的进化论中强调“渐进”性，认为事物的发展只能由较不善进为较善，无政府主义还很遥远，在此之前，只能以共和制度为“过渡物”<sup>①</sup>。这就使他在政治上更加接近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趣的是，保皇派康有为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的逻辑与吴稚晖的三阶段革命说（传统时代：“以暴易暴”的王朝交替——过渡时代：“共和革命”——大同时代：“无政府革命”）在内部构造上是同一思路。但在革命方法上，康氏的渐进性方法和新世纪派部分采用的急进性方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sup>②</sup>。

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实际上不仅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也是一面批评同盟会的革命理论，一面肯定同盟会革命论的现实意义，这一点是与东京讲习会派不同的地方。后来，新世纪派与孙中山之间的个人亲密关系更加强了这种态度。大体上说，在《新世纪》上，吴稚晖极力宣传科学主义、世界语及对清朝政府的批判，而李石曾则注重翻译介绍西方无政府主义理论并着重批判家庭、三纲、女性等封建文化。褚民谊也是通过《普及革

① 四无：《无政府主义可以坚决革命党之责任心》，《新世纪》第58号，1908年8月1日。

② 有人认为，从理论上讲，吴稚晖所散发的“三期革命说”，实际上是康有为在10余年前所刻意宣传的“公羊三世说”的再版。吴稚晖用“以暴易暴”之名代替了康有为的“据乱”之词，用“过渡时代”替换了“升平”字眼，用“大同”一词表示了“太平”的本意。所以，在他的新名词、新理论中，却处处流露出康有为“张三世说”的痕迹（李柏玲：《吴稚晖与早期无政府主义宣传》，《大庆师专学报》，1989年第1期）。

命》、《无政府说》、《好古》等长文，介绍无政府原理并批判国粹主义。他们三者之间虽有不同的观点，但对于无政府革命的基本思路是基本一致的，特别是在唯物主义的科学观、互助论的道德观、“以教育为革命”说等基本思维逻辑上具有同一性格。

另外，1908年4月东京讲习会派的张继到巴黎，他先后访问了欧美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参与编辑《新世纪》，又特意跑到“鹰山共产村”试行无政府主义生活方式。有人曾认为，当时《新世纪》发表的《去矣！与会党为伍》一文署名为“反”的作者可能是张继<sup>①</sup>。因为这篇文章宣传的总同盟罢工不是新世纪派的革命策略，而是张继、刘师培等人的观点<sup>②</sup>。另一方面，张继到欧洲后继续与东京的刘师培等人保持密切的关系，以写信形式为天义派的《衡报》投稿。有趣的是，上海时期与张继一起最激烈主张暴力革命的杨笃生当时在英国伦敦居住，他已经不赞成新世纪派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主张和种种方法<sup>③</sup>；而张继在辛亥革命以前继续坚持无政府社会革命。但是，后来张继又放弃了无政府主义。据他说，其原因在于：“想来想去，这虽不是落伍，这总是空想的，是佛教所谓的极乐世界，是耶稣教所谓天堂，是不能达到的。”<sup>④</sup>

综上所述，巴黎无政府派创办的世界社的早期事业主要在革命言论和出版事业方面<sup>⑤</sup>。他们的急进性倾向引起了清朝的注

① 蒋俊、李兴芝：《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第96～97页。

② 参见反《去矣！与会党为伍》，《新世纪》第42号，1908年4月11日。

③ 参见蒋俊、李兴芝《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第76～77页。

④ 据李石曾说，“溥泉（指张继）最早亦极热烈于社会方面，后乃稍为淡薄，而较浓于政治方面，实则其人固于社会较近，有时环境之力可以影响个人”（李石曾：《谈新年》，《李石曾先生文集》（下册），第85页）。

⑤ 另外，新世纪书报局还出版了李石曾译的《夜未央》和《鸣不平》两本小册子。前者是虚无党革命活动的剧本，后者是揭露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小说。

意，因此，1907年10月，清朝外务部准两江总督电，以《新世纪》煽惑民心，请予禁止，并电令驻法公使查禁发行。其后，1908年10月25日，清朝通令沿海沿江各省，严禁行销《新世纪》周刊<sup>①</sup>。当时，在日本的《民报》与《新民丛报》两者所宣扬的改良与革命理论互异，《新世纪》加入二者之论争，从论争中可以看出三者之异同。只是《新世纪》因远在欧洲，其论争自然没有后二者的影响来得普遍。革命派中的胡汉民对《新世纪》报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并较客观地叙述新世纪派的特点。他说：“巴黎有《新世纪》者，以科学为镜，以公理为衡，以进化为鞭，以人道为轨。举现世之所谓政治社会组织而反对之。其究极，使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归。其言若过高，与言种族革命、政治革命者不能尽同。”<sup>②</sup>

## 小 结

由于对清朝的绝望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使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由此走上革命之路。海外留学生和国内上海等城市的知识分子的初期反应是感情上的极度愤怒，民族主义的排满革命论的兴起和暗杀、破坏的虚无主义思潮的流行，即标志着革命运动的开始。通过中国教育会的革命言论和活动，可以看到这些变化。其中，俄国虚无党风潮在中国的流行，就是无政府主义传入中国的一个重要阶段。当时一部分有传统学问的人士寻求中国古代的乌托邦思想，而一部分以海外留学生为主的新式知识分子则放弃过去的一切东西。随着他们各自需要的建设性的理论方案，

<sup>①</sup> 毛云五主编《民国李石曾先生煜瀛年谱》，第20、22页。

<sup>②</sup> 汉民：《近年中国革命报之发达》，《中兴日报》1909年1月19日。



渐渐出现了共和派、国粹派、无政府派等政治派别。而革命派理论的成熟，导致了中国同盟会那样大规模的政治团体的成立。与梁启超主编《新民丛报》的渐进改革论相反，革命派的刊物《民报》中除宣传三民主义外，还介绍国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其中，1905年以后《民报》中宣传的无政府主义已经超过1903年前后流行的虚无主义的水平。

中国同盟会会员中一部分人在日本和法国接受了西方无政府主义理论。在东京的国粹派主要代表刘师培等人，在巴黎研究西方自然科学的李石曾等人，都接受了无政府社会革命论。日本无政府主义的始祖幸德秋水和同盟会会员之间的思想交流，促成了“亚洲和亲会”和“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成立，其中后者全面地宣传了无政府主义。同一时期在欧洲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中心巴黎，通过邵可倡、格拉佛等国际无政府主义者宣传的克鲁泡特金主义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很大。由此，他们也成立了一个小规模无政府主义团体——“世界社”。从讲习会派办的《天义》报来看，他们与日本无政府主义者联合起来批判孙中山的政治路线，而试图争夺同盟会的领导权；但由于日本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消沉，使其运动逐渐衰退。与此相反，从世界社的《新世纪》来看，因为它创办于法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全盛期，从而接受了正统的西方无政府共产主义理论，所以其理论的水平比较高。因此，辛亥革命以后，他们在《新世纪》上宣传的言论成为中国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中心。当然，刘师培的所谓“变节”问题和讲习会派的倒孙运动与新世纪派的吴稚晖等人和孙中山的个人亲密关系等实际因素，对他们革命后的道路起了重要的作用。

## 第二章 以国学批判专制文化

### ——“天义”派的文化思想

本章主要通过《天义》<sup>①</sup> 报分析“天义”派的文化思想。《天义》于1907年6月10日创刊于日本东京，1908年6月15日出至第19期停刊，主编是何震（刘师培之妻）。何震在日本东京组织“女子复权会”，《天义》是这个团体的机关杂志。其简章说：“以破坏固有之社会实行人类之平等为宗旨，于提倡女界革命，外兼提倡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故曰天义。”<sup>②</sup> 它的主

---

① 笔者分析的资料是在“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图书馆”（略称中央编译局）所藏的《天义》原本。同时参考在日本出版的大安株式会社影印本。

② 《简章》，《天义》第1卷，1907年6月10日。有的学者认为从《天义》初期的论调不容易断定其为无政府主义刊物，据刘师培参加“社会主义讲习会”和在《天义》第8、9、10卷合册（1907年10月30日）中的简章宗旨（“破除国界种界实行世界主义；抵抗世界一切之强权；颠覆一切现近之人治；实行共产制度；实行男女绝对之平等”）看，大概可以推定刘师培在1907年7~8月之间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丸山松幸说）。但是，在第8、9、10卷合册中的宗旨不过是《天义》第2卷的宗旨内容的重复记载。另外，有人通过对第8、9、10卷合册和第11、12卷合册两种英文宗旨的比较，说明天义派的无政府主义性质（小野川秀美说）。小野川秀美也是不太注意在第11、12卷合册中的英文宗旨与在《天义》第2卷中的英文宗旨一致的事实。这种认识错误发生的原因是大多数国外学者在《天义》大安影印本（缺第1卷、第2卷、第4卷、第7卷、第13~14卷合册）的基础上分析该杂志。

要撰稿人有刘师培、何震、汪公权、去非、独应、志达、忱乌、畏公、民鸣等，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刘师培。他不仅是国粹派的核心分子，同时也是天义派事实上的领导者，因此，他在《天义》报上宣传无政府主义过程中同时继续给《国粹学报》投稿。刘师培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后由过去的排满民族主义者变成为反帝国主义论者，但在他的思想变化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传统主义”因素，这个特点就成为理解他的思想的一个关键问题。刘师培利用古代学术中的乌托邦思想，来解释自己的无政府革命理论。他在《天义》报中，批判了西洋的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以绝对平等观念为中心的乌托邦社会观。天义派后来所办的刊物《衡报》，对农民和工人的关心以及对阶级矛盾的认识等有关社会革命的记载，在文化思想上也有一定意义。另外，这本杂志本来是女子复权会的机关杂志，所以内容中妇女解放问题的文章相当多。天义派对女性劳动权问题及参政权问题等的独特看法，与其他政治派别的主张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 第一节 刘师培：国粹与无政府之间

### 1. 论家族、三纲和孔子

20世纪初，中国社会有几种有代表性的文化派别。有关本章密切关系的派别可以说有三种：其一，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民丛报》派；其二，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以《国粹学报》为主要阵地的国粹派；其三，以吴稚晖、李石曾为代表的《新世纪》派<sup>①</sup>。其

<sup>①</sup> 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第36~37页。

中，国粹派和新世纪派在政治上都是革命派，但是从文化思想方面来说，国粹派是在复兴国学的旗帜下批评西方文明，而新世纪派则是注重批判传统和宣传西学的性格较浓厚。《新民丛报》也大量介绍西洋种种学说，但从梁启超个人来说比较富有国粹主义的性格。和其他两个派别比较起来，他在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态度<sup>①</sup>。另外，章太炎任主编时期的《民报》也较重要。当时《民报》的主要论调除了宣传共和主义外还宣传国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但它比较注重政治革命，不太注意文化问题。笔者在这里主要谈到的是刘师培的国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1907年以前在刘师培的国学研究中，他很注意中国传统思想的保存和复兴。他甚至认为传统文化的危机比清朝的国家危机更严重，这种文化危机意识反映在刘师培在《国粹学报》连载的一系列文章中，当时他可能是在《国粹学报》上发表文章最多的一个人<sup>②</sup>。1907年以后，刘师培从事无政府主义活动时期仍继续在《国粹学报》上发表有关国学方面的文章。我们为了理解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除了研究他的政治性论著以外，还应该注意学术性文章中的社会文化意识。如果我们只分析《天义》报的话，实际上不会太明白刘师培的整个文化观的变化过程。所以，这一章中将他在上海时期（1903~1906）写的有关排满民族革命论及其《国粹学报》的国学文章与在东京时期（1907~1908）写的有

① 有关日本国粹主义和中国国粹主义比较问题，参见〔美〕Martin Bernal, Liu shih-p'ei and National Essence,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90~112。

② 据统计，在82期刊物中只有两期（第41和43期）没有刘师培的著述，他的论著多达50余种以上，发表或部分发表在《国粹学报》上。所以可以说他是《国粹学报》的最重要的撰述人（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人民出版社，1982，第328页）。

关无政府革命论及其《天义》报的政论文章联系起来考察，从而进行研究。

**家族和三纲** 中国传统社会是宗法制度与等级制度结合的社会，以宗法制度为主干，君臣、父子、夫妇间的人伦关系，被赋予了尊卑名分与等级隶属关系。“三纲五常”等一整套封建伦常，是封建时代人际关系的准绳，也是不容动摇的道德规范。由此，近代中国持个人解放主张的思想家常直面的问题就是“家族”问题。又因为“三纲”是维持家族制度的基础，所以思想家们对家族、三纲两者同时进行批判。上海时期，刘师培在《警钟日报》发表的《论中国家族压制之原因》中认为“国家之起源，起于家族”，“盖家族压制之坚，皆由家族思想之发达”，特别是中国“家族思想愈发达，则家族之压制有坚”，在这种观点基础上批评家族思想即“三纲之说”。他为了批判三纲伦理，分析了女性受抑压的社会史的起源，主张对受礼教拘束强烈的中国应首先实行“家族革命”<sup>①</sup>。其后，刘师培的家族观及三纲说在《伦理教科书》（1905年）中典型地反映出来。

刘师培的伦理思想的出发点是在接受戴震的自然人性论上，坚持人间的人性有“体”和“用”而它是“不善不恶”的这一观点，刘师培利用戴震的这种人性论而极力主张打破封建家族观念<sup>②</sup>。他认为，“家族伦理者基于宗法时代之制度”，而“以宗法治家，即以宗法治国，使贵者不至降为贱，卑者不敢抗尊，以维

① 刘师培：《论中国家族压制之原因》，《警钟日报》，1904年4月13~15日。文章中说：“欧美各国家族之压抑较中国为轻，故西人之革命也，不必家族革命之阶级。若中国之民，惑于三纲之说，名分相凌，以私德而伤公德，非经家族革命之阶级，则国民公共之观念永无进步之期，又安能奏合群之效耶？”

② 参见刘师培《伦理学教科书》第1册，《刘申叔先生遗书》（以下略称《遗书》）第63册。

天下之治安”；还说，“秦汉以降，民间习俗相沿，仍存宗法时代之遗风。既存宗法之遗风，此中国之伦理所由偏崇家族也”<sup>①</sup>。他指出中国家族伦理的发达与中国宗法制度有密切关系，这无疑是正确的。刘师培进而指出中国家族伦理的弊害。认为它仅以家族为范围，使中国人民自古以来仅有私德而无公德，把自己局限于家族范围之内，除此以外别无义务可言。而家族制度的极不平等，是由于家族伦理从宗法观念中产生，所以一家人中子弟对父兄的屈从，就像国家之中臣民对君主的屈从一样<sup>②</sup>。父权、夫权是君权之缩影，家族伦理是君臣伦理的基础。

一般认为，秦汉时期，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形成相适应，董仲舒完成了天人合一的儒家思想体系。夫为妻纲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一起被提了出来，成为构筑整个封建社会纲常名教的基础。刘师培也认为，家族制度中的封建等级观念扩展开来即为“三纲”说。他把父子、夫妇及兄弟关系称为家族伦理，指出这种三纲为主的伦理关系“最不平等”。其中，刘师培比较注意“父子之伦理”，即“孝”。他把中国家族与西洋伦理进行比较，认为“西洋家族伦理始于夫妇一伦，中国家族伦理莫重于父子一

① 刘师培：《伦理学教科书》第2册，第1课，《遗书》第64册。

② 刘师培：《伦理教科书》第2册，第2课，《遗书》第64册。文章中说：“家族伦理为实践伦理之基，特中国所行家族伦理其弊有二、一曰所行伦理仅以家族为范围。中国人民自古以来仅有私德无公德，以己身为家族之身，一若舍孝悌而外别无道德，舍家族而外别无义务。又以社会国家之伦理皆由家族伦理而推，人人能尽其家族伦理，即为完全无缺之人，而一群之公益不暇兼营。其弊一也。一曰家族制度最不平等。家族伦理即由宗法而生，故子弟屈服于父兄，犹之臣民服从于君主，而三纲之说以兴。父之责子，夫之责妻，虽不当于理，亦谓之直。若为子者、为妻者以理争之，虽当于理，亦谓之曲。使天下之民受屈于空理之下，不敢稍违。舍理论势，以势为理，仅弱者对于强者所尽之义务耳。其弊二也。”

伦，其伦理尤以孝德为重，故儒家以孝为百行之首”<sup>①</sup>。刘师培大体上同意“孝”是“人民之美德”，但批评了父子之间的爱仅以家族为范围的利己主义。另外，他在夫妇和兄弟关系问题中也谈到各种不公平的现象。有意思的是，刘师培相信这种等级观念的三纲说不是先秦时期的思想，它是西汉以后的产物，特别是由宋明理学的弊端所造成的。在上古社会，既没有严格的夫妻、父子关系，也没有君臣关系。大约到农业生产出现之后，才出现了私有财产。正因为私有财产出现，人们有了组织社会的要求，于是才出现了家庭和国家。刘师培列举“五经”以及诸子百家的论述，阐明政治民主意识在先秦相当发达，其后随着专制主义的加强，古代关于家族伦理的民主意识受到蚕食。所以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种种“谬说”才得以流行。

中国以家族为本位的伦理观导致了个人为本位的伦理观及国家、社会伦理的不发达，如果不能改良封建家族伦理即不能实现平等制度及国民公共观念的进步。因此，在家庭伦理的改造问题上，刘师培提出了几点主张，即：第一，“父子平等”；第二，“男女平等”；第三，“行一夫一妻制”；第四，“婚姻自由”；第五，经济独立等。这样，他反对三纲说，希望把以家族为主的中国改造成为以社会为主的中国。在《伦理学教科书》中，刘师培的家族观及批评三纲说与在以后《天义》中的女性解放观相似的地方较多。但是，那时他还不谈离婚自由问题，也不太理解女性和经济间的具体关系。

如上所述，刘师培在《伦理教科书》中继承了戴震以来反朱子学的传统和对专制政府的批判意识，试图进行一种伦理革命。他认为中国的伦理代表一种以儒家三纲五常为中心的伦理秩序。因此，他不仅批判了主张纲常名教和“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

<sup>①</sup> 刘师培：《伦理教科书》第2册，第18课，《遗书》第64册。

旧伦理旧道德，而且极力提倡“群重己轻，舍私为公”的新道德，这种“伦理”概念的基础在于道德进化观。刘师培接受西方社会进化论中的适者生存逻辑，这一点和其他革命派没有什么差别。刘师培对家族、三纲的批判与对专制国家的批判之间存在着不可分的关系，但与梁启超比较起来存在一定的差别。梁启超写的《新民说》（1902年）中，提倡的“合群之德”的重要内容就是国家主义，认为国家起源于人们要求互助互利的动机，“国家之立，由于不得已也”。他还提出，中国目前贫弱落后，屡遭列强的侵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人“无国家思想”，即缺乏自觉的爱国心。这样，梁启超国家主义的色彩较浓厚，而在刘师培的《伦理学教科书》中这点却显得非常薄弱，甚至仅有一点反映。而且梁氏撰文的目的是为激励起新中国国民的思想觉悟，而刘氏写书却是为了阐述他所谓的“完善之人”和“完善的社会”<sup>①</sup>。刘师培在书中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人人都成了“完人”，社会就近于“完全”。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刘师培的重视个性的倾向。

同时期，刘师培写的《普告汉人》、《中国民族志》、《攘书》等的内容，可以说跟当时绝大多数革命派一样表现出了排满主义的倾向。但相对来说，他在排满论中学术性比较浓厚。他从传统古籍中引出各种历史事实，在归纳这些史实根据的基础上，否定了异族王朝的正统性，这种以学术服务批判封建专制的方法是刘师培的一个特色。例如，虽然刘师培有关排满主义代表性的文章《攘书》的大部分篇幅与阐述各民族起源及其历史问题有关，但这不是该书的惟一主题。在这本书的后半部分，他提出了对儒家

<sup>①</sup> [美] Hao Chang, Liu shih p'ei (1884~1919),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 (1890 ~ 1911)*,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 156 ~ 157.



的三纲学说及孔子问题等的简括性批评<sup>①</sup>，与《伦理学教科书》一样认为“三纲之说本于纬书”，而“秦汉以前未闻此语”<sup>②</sup>。刘师培将三纲称为“罪纲”，专列《罪纲篇》进行批判，这里也表现出从学术上进行批判的特色。

到东京时期，刘师培转向无政府主义后，在人性论问题上“性善论”的倾向更浓厚，同时对个人的关心也更增加。可以说，这是受克鲁泡特金和托尔斯泰等西方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影响，但大体上他仍坚持社会平等超过个人自由。相反，国粹派泰斗章太炎接受无政府主义后，放弃了“性无善无恶”的折中的伦理观，改主“性恶论”，并以此为根据，进而提出“五无论”：无政府，无聚落，无人人类，无众生，无世界。其原因可能是与章太炎的唯识论的佛教思想有关系。

刘师培在《天义》上对家族和家庭的看法比上海时期更加激进，其代表性文章就是作者署名“汉一”（可能是刘师培所作）的《毁家论》一文，这篇文章认为“家”是“万恶之首”。它说：

盖家也者，为万恶之首。自有家而后，人各自私。自有家而后，女子日受男子羈縻。自有家而后，无益有损之琐事因是总生（今人动言家务累人，其实皆是自寻烦恼，今既无家，则此等琐事，亦随而俱无矣）。自有家而后，世界公共之人类乃得私于一人（婴孩为人类之孽生，关系于社会全体，而有家者，则以之私于其父一人矣）。自有家而后，世界公共之婴孩乃使女子一人肩其任（婴孩之生，既关系于社

① [美] Hao Chang, Liu shih - p'ei (1884 ~ 1919),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 (1890 ~ 1911)*, Um.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205.

② 刘师培：《攘书》（废纲篇），见《遗书》第18册。

会全体，则宜公共鞠养，若有家室，则男子必迫女子鞠养，而以之续一己之祭祀矣。<sup>①</sup>

该文认为，“今日欲从事于社会革命必先自男女革命”，而“欲开社会革命之幕者，必自破家始矣”。天义派共同认为家庭是万恶之源，家庭束缚自由，家庭造成不平等。所以只有毁家，才能救世，才能“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男有分，女有归”，才能实现平等和博爱。家族制度引发利己主义，家族表现出男子对女子的束缚，家族的存在产生了少数对世界人类的支配。他们认为“毁家”、“灭家”就是消灭父权、夫权，家庭解体是无政府社会革命的重要基础。

这时期刘师培对三纲伦理的批评也超过上海时期。在君臣关系问题上，他已经突破过去以种族论为主的排满主义界限，指出：“汉族之君，其祸更甚于异族之君。”而“异族为君，其命当革，即汉族为君，其命亦当革。”“专制之主，其虐凌女子之罪，上通于天。”<sup>②</sup> 这样，作者没有区分满族和汉族之间的差别，直接揭露整个封建帝王的罪恶。父子问题也是跟夫妇问题联系起来说，“夫妇不平等，故父母之于子女也，亦不能平等”，“父母重男轻女也，即为子女者，亦重夫轻母”。夫妇之间不平等最终导致子女之间不平等，甚至父母对子女的爱心也不过一种利己心。夫妇问题成为天义派最注意的一个题目。他们通过文字、礼制、学术等方面分析男女不平等的起源和变迁后，最终提出，“重男轻女之风推其原因，则夫为妻纲之说有以致之也”，这夫为妻纲的邪说使得“男女之间遂成绝对之不平等”<sup>③</sup>。刘师培明确认为

① 汉一：《毁家论》，《天义》第4卷，1907年7月25日。

② 震述：《女子复仇论》（一），《天义》第2卷，1907年6月25日。

③ 震述：《女子复仇论》（二），《天义》第3卷，1907年7月10日。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三纲”伦理之中就有两纲即“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关于家庭伦理关系的，而封建家族伦理是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重要工具。另外，上述种种文章中作者常批判君主天命说，这与否定孔子素王说的立场联系起来，与康有为等变法派的孔子观形成冲突。

**孔子问题** 国粹派“古学复兴”的口号中“古学”是指包括儒学在内的先秦诸子学，而“复兴”是指含有欧洲文艺复兴式的再生意义。可以说，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通过批判中世纪和复兴古代从而创造近代精神一样，刘师培希求的国学复兴不是单纯的过去再现，而是一种反专制的、反封建的革新主张。他把传统学术分为“君学”和“国学”的对立，并且提倡政治和学问各自的独立，从中能看到他反对权力的基本态度。这种研究倾向包括当时流行的对于孔子的偶像化、宗教化——即孔学、孔教——的批判。

上海时期，刘师培在《论孔教与中国政治无涉》（1904年）一文中，指责孔学影响政治的有三条：“区等级而判尊卑（如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是）”；“薄事功而尚迂阔（如孟子侈口陈正义，而董子又言正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皆孔学末流之失也）”；“重家族而轻国家（如奖励孝慈笃敬，大抵皆指对于个人之私德言，非指公德言也）”<sup>①</sup>。《论孔学不能无弊》（1904年）一文又指出孔学最显著弊病有四点：即“信人事并信天事”；“重文科不重实科”；“有持论而无验诸”；“执己见而排异说”。在《孔子传》（1904年）一文中进一步指责孔子学术存在的问题：一叫泥古，中国的不肯变法，就是中泥古之毒。二叫迂阔，尊王贱霸，造成艺事不发达。三叫迷信，孔子信鬼神，对后世影响不好。四叫自尊、执一，排斥别的

<sup>①</sup> 刘师培：《论孔教与中国政治无涉》，《警钟日报》1904年5月4日。

学说<sup>①</sup>。刘师培在上述有关孔子及孔学的文章之中，坚持对学术和宗教两者的严格区分观点，并认为孔子是一个“学术家”而不是一个“宗教家”<sup>②</sup>。刘师培在《读某君孔子生日演说稿书后》（1904年）中较具体谈到这个问题<sup>③</sup>。《孔学真论》（1906年）中也再次谈到上述“孔学四失”的见解<sup>④</sup>。这种解释是对变法派康有为的孔教说的一大批评<sup>⑤</sup>。

今文学家康有为将孔子提升为“改制”的教主，将儒教从注重伦理转变成为一种宗教，并将佛教与基督教的教义糅合在“儒教”中<sup>⑥</sup>。今文学家关于孔教的主张，遭到了当时知识界的反对，其代表性的学术派别就是章太炎、刘师培等国粹派<sup>⑦</sup>。其中，对康有为进行批判比较能够做到摆事实，讲道理的是刘师培。刘师培与章太炎一样，在对孔子的绝对地位问题上，较早就产生了怀疑。他专门写了《汉代古文学辨诬》（1906年）和《论孔子无改制之说》（同年）两文，对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做了针锋相对的批判。文章中，刘师培说明古文

① 刘师培：《孔子传》，《中国白话报》第10、13、14期。

② 刘师培：《论孔子不能无弊》，《警钟日报》1904年12月12日、13日。

③ 刘师培：《读某君孔子生日演说稿书后》，《左盦外集》卷9，《遗书》第49册。

④ 刘师培：《孔学真论》，《左盦外集》卷9，《遗书》第49册。

⑤ 参见李妙根《论辛亥革命前后刘师培的政治思想》，《求是学刊》1983年第4期，第81～82页。

⑥ 〔美〕萧公权（Hsiao Kung-chuan）：《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1975年作），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翻译版，第101页。

⑦ 文化问题上，有人认为由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组织的国粹派是第一个文化保守主义的文化团体。清末民初文化保守主义的另一个发展是康有为的孔教运动（郑大华：《梁漱溟与胡适——文化保守主义与西化思潮的比较》，中华书局，1994，第19～25页）。而有人认为“孔教运动在本质上不是一场宗教运动，而是一场保守的民族主义文化运动”（房德邻：《康有为与孔教运动》，《北京师范大学报》1988年第6期）。

经学不是刘歆伪作，并且将论点逐一详细地叙述和论证，申明古文经学胜于今文经学<sup>①</sup>。他认为“改制”之权利属于天子帝王，孔子没有改制，并具体地证明、批判康有为提出的孔子所改制度的12项目<sup>②</sup>。否定孔子是宗教家、儒学是儒教的观点，他认为孔子是史学家，是中国文明的恩人。今古文学两派学术上、文化上的差异渐渐发展到政治上的对立关系，是说明近代中国学术、文化和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的明显事例。

如上所述，刘师培是清末有代表性的一位古文经学家。他认为“六经”都是前代的史料，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史学家或大学者，不是“托古改制”、“微言大义”的政治家或圣人。因此，刘师培学术研究对象不仅是以孔子为主的经学，而且是对中国古代思想的全面注意，这种学术态度在清末诸子学复兴中具有很大的贡献。他对诸子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打破了对孔子的偶像崇拜，而其对孔子批判的基本内容则在于揭露专制君主和封建主义将孔子教条化的倾向，不在于对孔子个人的全面否定。当时，他对康有为的学术性批判与另一位古文经学家章太炎比较起来，他的治学态度是更开放的、更普遍的。刘师培等人对孔子展开初步的批判，上承康有为等改造经学之余波，下启新文化运动非儒学、反孔教之先河，是近代中国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封建文化思想浪潮中一个重要的阶段。

到东京时期，刘师培在《天义》的《女子复仇论》（可能是何震与刘师培共著）<sup>③</sup>中却进一步表现出对孔子否定的倾向。它

① 刘师培：《汉代古文学辨诬》，《左龠外集》卷4，《遗书》第44册。

② 刘师培：《论孔子无改制之说》，《左龠外集》卷5，《遗书》第45册。

③ 在《天义》中连载的多数文章以何震名字署名，大体上，这些文章充分反映了刘师培等天义派的共同立场。又，何震写的文章中有不少可能是在刘师培的帮助下或两者一起合作提出的。例如，从传统学术内容丰富的《女子复仇论》等文中我们可以发现刘师培的国学知识。

说：“儒家之学术，以重男轻女标其宗。孔丘者，儒家之鼻祖也。而其人即以出妻闻……盖以暴行施之于妻，莫孔门若。孟轲者，儒家之大师也，因入室而妻失迎，遂谋出妻，其专制室人为何如？”<sup>①</sup>他们认为，自孔丘开始，经过汉、宋儒者，形成了以“夫为妻纲”为核心的一整套压迫妇女的学说，同时认为这种儒家学术偏于专制及男子的私利私欲。因此，他们激愤地喊道：“故儒家之学术，均杀人之学术也。”这可能是自戴震以来对儒家思想最强烈的控诉。并最终提出，“非扫荡儒书之邪说，则真理无复昌明之期”<sup>②</sup>。另外，在该报记载的尊重孔子的一篇来稿和其按语中，编辑者明确提出，“此函所言……为孔子辩护，为本社所不取”<sup>③</sup>。从这里，可以看出天义派揭露传统儒学的整个弊端的思想倾向。因为这些长文和案语等不知是否为刘师培本人所作，所以我们不容易判断他对孔子的全面否定与否。但在实际上，无政府主义者时期的刘师培虽没有专门谈到有关孔子的论文，但他在《天义》报上写的有些文章中把孔子标记为“孔丘”一词，通过这种事例我们仍可以推测的是，从上海到东京时期他一直坚持对孔子及孔学的部分批评态度。

## 2. 文字、教育改革论

**文字** 国粹派可以说是文化决定论者，他们认为一个民族文化的存亡盛衰决定着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存亡盛衰。章太炎把国学、国粹归结为“我们汉种的历史”，其中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sup>④</sup>。刘师培也早已关注民族语言统一问题和各种

① 震述：《女子复仇论》（二），《天义》第3卷，1907年7月10日。

② 震述，《女子复仇论》（二），《天义》第3卷，1907年7月10日。

③ 《东京五六居士来函》（案语）：《天义》第8、9、10卷合册，1907年10月30日。

④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民报》第6号，1906年7月25日。

民族历史的研究。文字方面，他把中国传统的“小学”素养和西方的“社会学”知识结合后形成了文字革新论。

上海时期，刘师培写了《中国文字流弊论》（1903年）一文，首先批评了中国文字的五个问题，即：“一、字形递变而旧意不可考也”，“二、一字数义而丐词生也”，“三、假借多而本意失也”，“四、由数字一义也”，“五、由点画之繁也”<sup>①</sup>。然后提出了中国汉字改革之一大措施，“宜用俗语”即常用白话文。因此，他先后在《中国白话报》上撰写了一系列白话文章，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论激烈的好处》（1904年）、《孔子传》（1904年）等，为提倡白话做了有益的尝试。在《论白话报与中国前途之关系》（1904年）中也鼓励白话文的使用和白话文杂志的刊行。作者认为，白话报的长处是可以“救文字之穷”、“救演说之穷”，短处有“方言不应”、“用字太繁”<sup>②</sup>。刘师培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大诗人但丁为振兴意大利国民教育、推行文字通俗化为例，认为白话文是启迪民智、普及教育的有利工具。与此同时，他还进一步提出从改革旧有汉字入手，进行文字简化工作，添造新字，以适应时代需要。这些主张反映了刘师培把中国文字改造成为适应近代社会需要的希望。到1905年，刘师培成为《国粹学报》主要撰稿人后，进一步发展了改革汉字的观点。在《中国文字改良论》一文里，他明确提出：“居今日之中国，舍形字而用音，势也；废各地方言用统一之官话亦势之所必趋也。”<sup>③</sup>这一观点同近代中国汉语改革中所实行的提倡普通话和走拼音化发展道路的趋势是一致的。他特别强调声韵，提出了中国语改革为表音文

① 刘师培：《中国文字流弊论》，《左龠外集》卷6，《遗书》第46册。

② 刘师培：《论白话报与中国前途之关系》，《警钟日报》1904年4月25、26日。

③ 刘师培：《中国文学改良论》，《广益丛报》第70号，1905年5月13日。

字的大胆构想。可以说，刘师培是清末有代表性的一位语言学者，但他的国语改革论不仅属于文化问题，而且与政治问题有密切关系。

1907~1908年之间，刘师培先后在《国粹学报》上发表《新方言序》（1907年）和《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1908年）两篇文章，表现出在汉字改革方面的两种不同观点<sup>①</sup>。在前一文里，他还继续维持着他在前一时期关于改革文字的进步观点；而在后一文里，他则一反前说，反对用拼音文，反对推广统一的官话。他说：“今人不察，于中土文字，欲妄造音母，以冀行远。不知中土文字之贵，惟在字形，至于字音一端，则有音无字者几占其半……”<sup>②</sup> 这表明了刘师培这一时期在改革汉字观点上的变化<sup>③</sup>。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的这种变化？与上海时期一样，其主要原因在于西洋社会学理论与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的混合。小学（文字学）专家刘师培特别相信社会学方法论的有效性，他说，“治小学者，必与社会学相证明”，而“以顾形思义，可以穷原始社会之形”，所以，古代中国文字的保存有益世界文化的发展。又说，“今欲扩中土文字之用，莫若取《说文》一书译以 Esperanto（即中国人所谓世界语）之文”<sup>④</sup>。在这里，我们应注意的是 Esperanto 和无政府主义的不可分关系。

除了吴稚晖等新世纪派以外，刘师培是近代中国最早宣传 Esperanto 的人物之一。他写的《人类均力说》中，已经谈到实

① 刘师培：《新方言序》，《左龠外集》卷17，《遗书》第57册。

② 刘师培：《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左龠外集》卷6，见《遗书》第46册。

③ 参见周新国《试析1903-1908年刘师培的政治思想》，《江海学刊》1989年第1期，第141页。

④ 刘师培：《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左龠外集》卷6，见《遗书》第46册。



现人类“均力”（简单地说，一个人具有几种技术）的主要课题之一就是文字统一问题。作者认为，废止国界后制造使用简单文字，无论如何人人都可以容易地旅行于世界各地<sup>①</sup>。《天义》最终卷中的《Esperanto 事例通译总序》和《Esperanto 事例通译》两文较具体地表现出他对世界语的关注。在《总序》中，他提出了世界纷争的两大原因。即：“一，由生计而生，一，由感情而起。由于生计者，即财产不平等是也。由于感情者，即语言不统一是也。”<sup>②</sup>刘师培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提出了“平均财产”和“统一语言”两个方案。其中，他注重宣传采用世界语的革新方法，这有可能是受到了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的影响。在《天义》停刊后刊行的《衡报》中连续记载《劝同志肆习世界新语Esperanto》、《世界新语 Esperanto 发达记》等文章，还有大杉荣主持“世界语讲演会”的广告及世界语和英文栏的开设等，都反映了刘师培对文字革命和国际间联合的希望。他认为，为了万国各社会党和无政府党的联合，为了实现世界大同，最先的急务在世界新语学习问题上。有趣的现象是，刘师培宣传世界语而同时主张保存古文，这个论调从《天义》到《衡报》时期一直不变。例如，在《衡报》写的《衡书三篇》一文与在《国粹学报》所载的《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一样，一再谈到把中国文字翻译成 Esperanto 语而传播到国际社会<sup>③</sup>。那时，他相信“共产无

① 申叔：《人类均力说》，《天义》第3卷，1907年7月10日。

② 申叔：《Esperanto 事例通译总序》，《天义》第16、17、18、19卷合册，1908年。

③ 刘师培：《衡书三篇》，《衡报》第10号，1908年8月8日。《衡书三篇》中可以看出刘师培无政府主义者的印象大大减少而考证学者的色彩较全面地表现出来。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国学问题、生计问题和人种改良问题等（〔日〕森时彦：《民族主义と无政府主义——国学の徒、刘师培の革命论》，《辛亥革命の研究》，筑摩书房，1978，第133页）。现在因《衡报》缺第9号和第11号，所以我们不知道《衡书三篇》的后半部内容。

政府之实行，所由与学术（包括中国古代象形文字的保存和研究——笔者）进步互相表里也”<sup>①</sup>。

**教育** 近代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共同特点即在教育改革方面的主张。刘师培的最早的时论性文章也是有关教育改革问题。1903年3月，他在《苏报》上发表《仪征刘君师培留别扬州人士书》一文，提出教育改革和女子教育的必要性。此时，在刘师培的思想意识中还没有发现反对清朝的态度。其后，会试不合格的刘师培回到上海，1903年6月，在《苏报》上又发表两篇文章，一篇是《创设师范学会章程》，另一篇是《论留学生之非叛徒》。前一篇文章的内容与《留别扬州人士书》大体一样，但后一篇文章中能发现他的变化。文章说，当时留学生和新式学堂学生主张的反法、拒俄运动不是叛逆，是爱国运动<sup>②</sup>。从中可看到他初步的排满意识。到1904年，刘师培分析了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在于“文明教育概乎未闻，故近世以来，智识日卑、民气日弱”，并明确提出：“生存竞争优胜劣败，而民族之优劣一视教育之浅深。”<sup>③</sup> 这种思想包含了教育救国的观点，它与这一时期刘师培排满思想的主线是有一致性的。与此同时，刘师培还冥思苦想地设计了普及教育的方法，主要有三个内容：一是筹办学费；二是设置学校；三是延纳教员，反映了刘师培对普及教育的重视<sup>④</sup>。

另外，刘师培对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实践是在自编教科书的

① 刘师培：《衡书三篇》，《衡报》第10号，1906年8月8日。

② 申叔：《论留学生之非叛逆》，《苏报》1903年6月22日。

③ 刘师培：《争存会变更议案》（原无标题，据李妙根所加的标题），《警钟日报》1904年4月7日。

④ 刘师培：《教育普及议》（《警钟日报》1904年6月）；《讲普及教育的法子》（《中国白话报》第13期，1904年6月）；《教育》（《中国白话报》第15期，1904年7月）等文。参见周新国《试析1903~1908年刘师培的政治思想》。

著述活动中。当时，传统教科书不适应社会变化的状况，还不仅仅是表现在教育内容上，其形式和结构的不科学使传统教材严重脱离了实际。因此，他亲自编写和刊行了《伦理学教科书》（二册）、《经学教科书》（二册）、《中国文学教科书》（一册）、《中国历史教科书》（二册）、《中国地理教科书》（二册）等书。正是这种自编教科书的出现，才真正促进了人民大众意识的开发。

到日本东京后，刘师培关于普及教育的思想主要是附属在他的无政府思想体系里。在他阐述自己的无政府思想中，曾对未来社会的教育做过设想。他的教育论的主要特点，在于对资本主义式教育制度的强烈批判。他认为废科举，兴学堂，只对绅士富民有利，贫民得不到好处。因为要上学堂，需花很多钱，穷人上不起，而要做官，又非有学堂毕业的资历不可。科举制度，则不问学历，“及徼幸获选，则贫民与富民同升，未尝有阶级制度寓其间也”。而兴办学堂，“贫民永沦于奴隶，富者益智，贫者益愚，因智而贵，因愚而贱，可逆赌也”<sup>①</sup>。但是刘师培提出的替代资本主义式教育制度的方案还不够清楚，只是他在对乌托邦理想的描写过程中列举了无政府教育的长处。其大纲为：6岁开始学习刘师培等人准备创制的世界公用文字，学会这种文字，将来就可以周游世界。从10岁至20岁，专门“从事实学”。每日半天学习历史、地理、物理、化学、音乐、美术之类的知识，半天学习制造各种物品的劳动技能。学习这些知识，都是“以老者为师”<sup>②</sup>。

这一时期，刘师培的有关教育方面的文章比上海时期少得多，但我们不能由此断定他忽视教育问题。其实，在《天义》报

<sup>①</sup> 申叔：《论新政为病民之本》，《天义》第8、9、10卷合册，1907年10月30日。

<sup>②</sup> 申叔：《人类均力说》，《天义》第3卷，1907年7月10日。

上，天义派的教育论主要从女性解放论的宣传中反映出来。天义派的《女子复仇论》（三）、《家庭与教育》<sup>①</sup>、《女性教育问题》等文都是把家庭革命与教育革命联系起来，主张女性的教育均等、女学复兴等。他们共同认为传统女性没有受教育权利，所以她们越来越愚昧、卑贱及虚弱化。因为近代女性教育不过是宗教和家政教育，所以应该革新旧教育制度即由无政府主义教育来替代。

综上所述，刘师培对封建礼教的批判、文字及教育制度改革主张等从上海时期到东京时期一直进行着，并在逻辑思维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变化和发展。以后，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又摆脱了思想中的激进因素，回归为一个纯粹的考证学者，有关文化方面的态度也变得越来越保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为了研究刘师培个人思想，还需要了解刘师培对国学的强烈愿望这一特点。

## 第二节 古和今，中和西

### 1. 传统文化中的乌托邦

上海时期，刘师培在西洋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代表人物斯宾塞、卢梭等人的影响下，通过《警钟日报》、《国粹学报》等宣传“排满革命”论。到东京时期，他在西洋社会主义学说的鼓吹者克鲁泡特金、幸德秋水等人的影响下，通过《天义》、《衡报》等主张“无政府革命”论。但我们通过《国粹学报》上的文章可以

---

<sup>①</sup> 这篇文章在原《新世纪》（第30号，1908年1月18日）中连载的节录《续革命原理》（革新之一人著，真译）之一部。

看到的是，他的主要论据及其论证方法就是“国学”，即在中国传统的文章、制度之中。因此，我们不但应注意刘师培对“国学与革命”问题中的各种解释方法，而且应注意到他的所谓“中国式”无政府主义的种种特色。可以说，国学和无政府主义的结合现象是解释复杂的清末思想界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sup>①</sup>。对刘师培来说，有人曾谈到：

在革命发展过程中，革命党人内部意见不一，思想杂陈。一个明显的表现，是国粹思想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流播……国粹思想趋向保守，无政府主义则是过激。然而，历史现象又是复杂的。国粹派的主要人物章太炎曾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他的一些作品有着浓厚的无政府主义色彩。另一个主要人物刘师培更为突出，他既大力宣传国粹，又狂热鼓吹无政府主义……他的无政府主义最终归于复古主义……刘师培的这种现象，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sup>②</sup>

清末社会进化论、民约论等西洋思想被国粹派利用，成为他们排满民族主义理论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刘师培也非常喜欢这些新思潮，他通过严复等人翻译的西洋各种学术、政治译著来了解西学，其主要是斯宾塞等人的“社会学”。当时，社会学不是单纯的一个学科，可以说是属于西方社会科学。另外，他更注意的地方是“平等”学说。刘师培较早积极接受卢梭的民约论和天赋人权说，否定君权神授说。按照这种资产阶级的平等学说，他指

<sup>①</sup> [日] 狭间直树：《中国社会主义の黎明》，东京，岩波书店，1976，第107页。

<sup>②</sup> 龚书铎：《〈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序》（1992年作），《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增订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314页。

出天命观是愚昧迷信的产物，君权神授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其实，刘师培是中国介绍卢梭“民约论”的人物之一。他在《中国民约精义》长文中较详细地介绍了天赋人权学说，指出“欲行民约，必先合群力以保国家；欲保国家，必先合群力以去君主。盖团体不匡之民，未有能脱专制之祸者也……则共和政府之成立，由于民之群聚，明矣”<sup>①</sup>。由于这本书从卢梭的“民约”出发，主张回复“天赋”的自由平等之权利，而从其中平等论的观点得出废除君主专制制度的结论。

1907年到日本后，刘师培最喜欢的无政府主义者是克鲁泡特金，他跟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一样，认为斯宾塞、赫胥黎等人是歪曲达尔文进化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所以，“扰乱平和，蔑视公理，均赫胥黎诸氏‘惟争乃存’一语有以误之也。‘惟争乃存’，故以能竞争为强，若明于苦氏（克鲁泡特金）互助之说，则竞争者恒劣败，互助者始生存，而强权可以渐弭矣”<sup>②</sup>。由于刘师培把克鲁泡特金学说看成是最圆满的，因而他积极宣传克氏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这一点与在巴黎的新世纪派相似。但他把克氏学说分为“互相扶助说”（互助论）和“无中心说”两者，则有自己的特色。前一论点是克鲁泡特金在《互助论》中的“新”进化论解释，后一论点是克氏在《无政府主义之哲学》中证明的一个自然科学的原理。特别是“无中心论”是刘师培具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它为天义派的“人类均力论”设想提供了理论基础。另外，刘师培看好克鲁泡特金的一个原因主要在于克氏的研究方法论。克鲁泡特金的归纳法就是从历史事实中找理论根据或从社

① 刘光汉、林獬：《程子》（按语），《中国民约精义》卷2，上海镜今书局刊印，1904（见《遗书》第16册）。

② 申叔：《苦鲁把特金学术述口》（二），《天义》第13、14卷合册，1907年12月30日。

会具体事实中找理论根据，这种方法论是刘师培最常用的方法<sup>①</sup>。但他对于克鲁泡特金的学说也并非完全满意，因此又谈到西洋其他的无政府主义。

《天义》报着重介绍了托尔斯泰的《致中国人书》，此文先后两次在该报翻译发表，并加了按语。按语指出：“此书之意，在于使中国人民不复仿行西法，其言最为沉切，至其要归，则在中国实行无政府。彼以中国无政府，则外患自息，人人不为政府尽职，则政府不复存，此即所谓以消极政策而至无政府也。”<sup>②</sup>刘师培等人高度肯定了托尔斯泰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指责，尤其欣赏他对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赞美。另外，天义派为了批判白种崇拜、全盘西化思潮和欧洲式工商立国，接受了托尔斯泰对儒佛道高度评价而批判资本主义诸国道德为伪道德等的观点。还有，斯谛纳尔是所谓个人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我”是万事万物的主体，人类的进化之途是由集合之体分化为个体，由国家、社会分化为个人，达到不受任何制限，“各遂我性”的境界。刘师培受过斯谛纳尔的这些观点的影响，但是，他的理论又多了一点集体主义的色彩<sup>③</sup>。他在介绍三人的特点中谈到，“盖苦氏（克鲁泡特金）主文明进步，异于杜氏（托尔斯泰）之消极；苦氏言无政府归于自由结合，异于斯氏（斯谛纳尔）个人无政府之说也……故杜氏之说，用之有政府之世，足以利民；苦氏之说，则用之无政府之世，足以便民。若斯氏之说，则较苦氏之说为尤高，然近今之人民决无此程度”<sup>④</sup>。所以说，刘师培对各种西洋无政

① 参见申叔《人类均力说》。

② 忧国：《俄杜尔斯特致中国人书节译》（按语），《天义》第11、12卷合册，1907年11月29日。

③ 杨天石、王学庄：《论〈天义报〉刘师培等人的无政府主义》，《近代中国人物》（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456-457页。

④ 申叔：《克鲁巴特金学术述略》（二）。

府主义学术都很感兴趣。如上所述，与托尔斯泰和斯谛纳尔相比较，他对克鲁泡特金的评价最高。在《天义》报介绍国外无政府主义者文章中有关克鲁泡特金的文章分量最多，这一事实证明了他的基本取向。

刘师培是国粹派的一位国学大师，他常常从中国历史上为无政府主义寻求根据。例如：《天义》报（第5卷）登载“中国无政府主义发明家老子像”，以证明无政府主义思想出自中国。照刘师培的说法，老子是中国无政府论最早的发明家。他还说，“佛言一切法无位，又言众生不异法身，法身不异众生。又言众生无有齐限。中国孟轲亦曰：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也……近世西儒卢梭，又创天赋人权之论。是人类平等之旨久为先哲所昌言”等<sup>①</sup>。天义派的其他成员都喜欢中西文化比较的方法。例如，“西欧有巴枯宁，中国亦有巴枯宁；中国之巴枯宁且生于西欧巴枯宁数百载前。其人惟何，即明温陵李卓吾先生是也”<sup>②</sup>，等等。刘师培说：

中国数千年之政治，出于儒道二家之学说。儒道二家之学说主于放任，故中国之政治主放任而不主干涉。明（名）曰专制，实则上不亲民，民不信官，法律不过具文，官吏仅同虚设，无一真有权之人，亦无一真奉法之人。上之于下，视若草木鸟兽，任其自生自灭；下之于上，视若狞鬼恶神，可近而不可亲。名曰有政府，实则与无政府无异。<sup>③</sup>

① 申叔：《人类均力说》。

② 不公仇：《李卓吾先生学说》，《天义》第1卷，1907年6月10日。

③ 《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记事》的刘师培讲演部分（据《天义》第6卷，1907年9月1日）。



甚至在他看来，“中国自三代以后，名曰专制政体，实则与无政府略同”。不但“封建既废”，且“舍满汉不平等外，汉族之中，无平民贵族之区”，“富者役贫，亦较泰西为善”，因此，“实行无政府主义，以中国为最易”<sup>①</sup>。在这里，应注意的是刘师培的国学所具有的普遍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世界观联系这一可能性。他为了寻找中国实行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写了《西汉社会主义学发达考》、《鲍生学术发微》、《区田考序》等文章，列举西汉末抑制豪民的肖望之、匡衡、贡禹等人、魏晋时期信奉老庄的鲍敬言，并加以推崇，认为他们的思想与无政府之说相同。其中，他认为，古代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是鲍敬言、许行两人。

刘师培给公元四世纪的道家哲学家鲍敬言（抱朴子）以极高评价，他在《鲍生学术发微》中的主要论旨分为四个要点：其一，鲍敬言是无君主义的创始者，而且打破了君权神授论，认为君权不是神授，君主不过人民中之一人，所以人民不必要有对君主的尊敬心；其二，从历史来看，一直存在强者对弱者、知者对愚者的蔑视。通过征服过程建立了君臣制，同时也拘束了人民的自由；其三，君主只是一个掠夺者。在人类本性中本来存在自由和平等观念，但因国家权力的暴虐性发生战争、灾难及疾病等；其四，因为权力的主要工具即伪道德，所以发生了人民的不幸，所以，我们应该回复自由、废弃伪道德。刘师培对鲍敬言的“无君论”最终评价是：“中国政由君出，既言无君，即系废灭人治，与无政府之说同。至于（废）道德而弃法制，非军备而贱财货，尤属清源之论。盖彼义欲使众民平等，共享完全之自由，故立其说，较老庄为尤显。”<sup>②</sup>

① 震、申叔：《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二），《天义》第7卷，1907年9月15日。

② 申叔：《鲍生学术发微》，《天义》第8、9、10卷合册，1907年10月30日。

另外，刘师培在《人类均力说》一文里，赞扬许行为中国倡“并耕说”的第一人。同时他批评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违背人类平等之趣旨。他介绍许行的学说：“战国之时，有许行倡并耕之说，其言曰：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又以滕有仓廩府库，为厉民自养。其说甚精。盖并耕者，即人人劳动之谓也。斥滕君厉民自养，即破坏阶级之谓也……即孟轲复生，又安能以循辞相抵耶。若轲言天下之人，因劳力劳心之分，生治人治于人之差别，则与人类平等之旨，大相背驰，其说更出许行下矣。盖许行之说，虽未圆满，然其倡并耕之说，则固中国第一人也。”<sup>①</sup> 在这里，有趣味的是，我们通过刘师培对许行的评价这一事例，从中可以发现刘师培个人的政治思想的变化情况。例如，排满革命论者时期，刘师培批评许行“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的这一观点，那时，刘师培指斥许行之言，“不独背于孟子，亦且大背于卢梭者也”，而列举“不知分功之义”、“欲去君主之有司”、“举国人民皆平等”的谬误<sup>②</sup>。他说：“许行之自由，无限之自由也；孟子之自由，有限之自由也。许行之说，可行于野蛮之时，不可行于文明进化之日。”<sup>③</sup> 这种观

① 申叔：《人类均力说》。

② 刘师培在《中国民约精义》（1903年）中曾说：“案许行之言，与西人无政府党最近，而无政府党之起源则起于近世社会主义。盖嫉贫富之不均而思所以革其弊，与许行嫉滕君厉民以自养者同一目的，及法人布鲁东创之于前，俄人巴枯宁继之于后，巴氏之宗旨曰，世间最可乐之事，未有甚于革命者也。所谓人之自由，惟有服从自然之法律而已，故专制之君吏吾固当除去之，即被民选举者吾亦当除去之。故其除婚姻之制，去等级之别，使人人作工，各有其分田，地为公共之物，资本为社会之公产，故人人于政治也平等，于社会也亦平等。其说创始于西欧，渐被于大陆。溯其原因，亦出于《民约论》之一分子。其与许行之说不同者，则不欲以一人之身而备百工之事耳……”这一段记事可能是刘师培有关无政府主义的最早评论之一。

③ 刘光汉、林瀚：《许行》（按语），《中国民约精义》。

点与无政府主义者时期对许行的解释表现出完全相反的态度。更有趣味的是，后来刘师培投降端方后再次改变对许行的评价，攻击许行并耕说的非现实性。这样，刘师培在无政府解释中便不能避免“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式谬误。

简单说，在刘师培的思路中特别希望的是中国古代已经存在共产制及共产主义这一事实的论证。可以说，他通过“以古证西”、“以古证今”的方法，试图给传统思想以革命解释<sup>①</sup>，这种传统主义的态度正是与反传统的新世纪派最不相同的地方。

## 2. 批判西方文明，提倡“中国式”无政府革命

20世纪初，梁启超把进化论和民族主义相联系，他在从“家族”到“部民”再到“国家”的历史解释基础上主张国民国家的建立。同时说明如果没有国民，就没有国家的形成，而反复强调了“国民”存在的重要性。他在《新民说》、《论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等文章中，一再宣传为了反抗民族帝国主义的侵略应建立以民族主义为主的国民国家。当时，他不太注意帝国主义与亚洲民族解放的问题。与此相反，刘师培无政府主义的出发点却建立在反对一切强权的逻辑基础上。他早期《中国民约精义》和《攘书》中所表现出的排满主义倾向渐渐发生了变化，到在《天义》报记载的《亚洲现势论》里，刘师培已经将种族主义的观点消解在无政府思想之中。他认为，“民族之革命，即弱种对于强种之抗力耳”，还说，“实行无政府，则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均该于其中”<sup>②</sup>。这种“强族”和“弱族”之逻辑，可以说超越

<sup>①</sup> [韩] 千圣林：《辛亥革命时期对于国粹学派的研究》，梨花女子大学校博士学位论文，1995，第157页。

<sup>②</sup> 震、申叔：《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天义》第6卷，1907年9月1日。

了汉族对满族的对立构图，而形成了弱族的亚洲人民对强族的帝国主义的对抗格局。

刘师培在上海时期的反专制、反封建的意识形态到东京时期更加发展，开始主张排帝王，而不是过去的排满。这时期，国粹派的领导者章太炎也在《五无论》、《国家论》等文中表现出对国家的消极态度甚至否定国家的态度。他们的头脑里存在的是对封建专制的绝望、古代理想社会的再建与无政府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等三者结合后提出的有关反帝国主义的思想意识。“亚洲和亲会”和“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成立就是这种“新”解释的民族观的反映。可以说，中国无政府派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反帝国主义理论派别之一，特别是刘师培较具体地形成了反帝斗争的思想。他的核心见解就是亚洲民族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应与欧洲社会革命者联合起来把亚洲各民族从外来控制下解放出来，同时推翻已经建立的欧洲各国政府。刘师培肯定世界是一种“相对性”的并否定一切“中心”的观点，最终提出了所谓“无中心”说。欧洲的新世纪派则没有形成这样的思想，它似乎希望通过与各社会之进化发展相并行的过程产生类似的结果。这对无政府主义理论是个独特的贡献<sup>①</sup>。这样，刘师培希望防止的是从民族主义到民族帝国主义的转化，并且为了使民族主义正常发展急需要无政府主义的理论。

在东京时期与上海时期不一样，刘师培攻击“功利富强之说”（例如批判严复），以为这是“中国人心之大患”。他指责道：“害天下人民者，其唯功利二字乎？图功之目的在于自强，图利之目的在于自富……强弱显殊，贫富迥隔，遂与平等之合理大相

<sup>①</sup> [美] 沙培德 (Peter Zarrow): 《辛亥革命中的激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纪念辛亥革命 8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下)，中华书局，1994，第 1064 页。

背驰。是则富强二字，非惟为人类之大敌也，且为公理之大敌。”<sup>①</sup> 天义派则更进一步批判资本主义阶级制度，例如，他们认为“今法美各国，号为民主之国矣，然统治者与被治者阶级未能尽除也，贫富之界非惟不能破，抑且变本加厉。富者收佣工以增己富，因富而攫权；佣工为贫而仰给于人，因以自失其权”<sup>②</sup>。天义派往往对三代以前的传统社会历史和文化抱有更强的信念。刘师培也认为中国古代社会自由放任，阶级观念淡薄，贫富差别不大，比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有合理之处，如果学习西方的民主、法制以及其他实业策略，反而会加剧社会的混乱。从他的这种态度中能看到他对资产阶级学说的强烈反感。

刘师培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后仍一直坚持卢梭的天赋人权说，认为“卢氏以原人为平等、独立之民者，固为学术上不易之公理”。在“天赋”这一词解释人类权利中说：

吾人确信人类有三大权。一曰平等权，二曰独立权，三曰自由权。平等者，权利义务无复差别之谓也；独立者，不役他人、不倚他人之谓也；自由者，不受制于人，不受役于人之谓也。此三权者，吾人均认为天赋。独立、自由二权，以个人为本位，而平等之权必合人类全体而后见，故为人类全体谋幸福，当以平等之权为尤重。独立权者，所以维持平等权者也。惟过用其自由之权，则与他人之自由生冲突，与人类平等之旨或相背驰，故欲维持人类平等权，宁限制个人自由权。<sup>③</sup>

<sup>①</sup> 申叔：《废兵废财论》，《天义》第2卷，1907年6月25日。

<sup>②</sup> 去非子译述《破坏社会论》，《天义》第1卷，1907年6月10日。

<sup>③</sup> 申叔：《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一），《天义》第4卷，1907年7月25日。

在这里，有趣的是，西洋无政府主义者都以个人的“完全自由”或“绝对自由”作为最高原则，而刘师培却独张异帜，表示为了“人类平等”，可以限制“个人自由”。这种以“平等”为主解释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是由传统思想中的“平均”观念带来的。那时，刘师培常引用斯宾塞、甄克斯等人的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但它已经不是基于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国家观上，而是基于在社会的进化及其历史根据问题上。原来，卢梭以自然权为主的民约论和天赋人权说思想是17~18世纪的产物，而与19世纪后半叶在批评自然权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进化论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对立。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刚认识到这种矛盾，刘师培也是将法国的自由、民主、博爱的革命思想和无政府主义思想联系起来攻击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种问题。在这种逻辑构造上，为了批评维新派和共和派，“维新不如守旧，立宪不如专制”的刘师培式逆说法登场了。他通过对学堂、代议政体和实业问题等社会问题分析后提出，“新政既行之后，受其益者，惟新党资本家，舍是以外，则多数人民愈趋于贫苦”<sup>①</sup>。

如上所述，天义派为了批判资本主义大量引用西洋社会思想家卢梭、克鲁泡特金甚至斯宾塞、甄克斯等的一些社会学理论，他们利用这些理论对中国同盟会的三民主义进行了批判。刘师培认为，民族主义就是“希冀代满人握统治之权”，“利用光复之名，以攫重利”，“黠者具帝王思想，卑者冀为开国元勋”。有人说，革命派的“排满”和改良派的“保满”没有什么区别，“排满亦出于私，与倡保满者相同”。结论是，“民族主义，乃不合于公理之最甚者也”<sup>②</sup>。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提出了包括议会制度在内的一整套民主共和制度。对此，天义派持强烈反对的态度。他

① 申叔：《论新政为病民之本》。

② 志达：《保满与排满》，《天义》第3卷，1907年7月25日。

们尖锐地揭露资产阶级选举制、代议制的欺骗性，认为在这种制度下，“贫民虽有选举之名，实则失选举自由之柄”，“由是贫者之命悬于富者之手，名曰普通选举，实则贫者并无生命权，其选举之时，势不得不举富人以仰其鼻息，则所谓选举者，与专制何异？乃号其名曰共和，吾不知其何者为共，何者为和也，则共和政体非公明矣！”<sup>①</sup>。对于民生主义（其实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具有相似的地方），刘师培在批判民生主义时注意的是孙中山提出的土地国有制和“平均地权”的政策部分。他说，“土地国有之说，名为均财，实则易为政府所利用”，而“今日欲设政府，又以平均地权愚民者，均汉武、王莽之流也”<sup>②</sup>。这样，刘师培讥之为相同于汉武帝的盐铁专营和王莽改制。东京的中国无政府派共同认为孙中山派式共和革命主张不过是对欧美、日本文明陶醉的结果，它不过是一种幻想。因先进诸国的物质文明是“有政府”时代的東西，反而苛酷平民，仅“无政府”时代的物质文明才能得到有效的發展<sup>③</sup>。

天义派设想的“中国式”无政府社会在刘师培写的《人类均力说》中可以看得到。他认为导致出现不平等的根源主要有两个：社会分工和“民有智愚强弱之分”。要消灭这两个根源，他认为只有实行“均力主义”。他在文章里描述的理想社会是，“处于社会，则人人为平等之人；离于社会，则人人为独立之人。人人为工，人人为士，权利相等，义务相均”的世界。这种无中心的均力社会就是一种“以一人而兼众艺”的社会。它是政治上废除现存一切政府和國家，建立乡为单位的自治机构；生产上改变传统的分工格局，一律按年龄来改換职业，不存在体力劳动和脑

① 去非子译述《破坏社会论》。

② 申叔：《西汉社会主义发达考》（二），《天义》第5卷，1907年8月10日。

③ 杨天石、王学庄：《论〈天义报〉刘师培等人的无政府主义》，第451-456页。

力劳动的分工；消费上采用绝对平均主义的方式；理想社会中不存在家庭，也没有男女有别之界限。刘师培认为“均力说”有四善，即“适于人性”、“合于人道”、“合于世界进化之公理”、“泯世界之争端”的好处<sup>①</sup>。他的均力说是一幅改造不平等社会，建设人间美好未来的理想蓝图。从这一理论中可以看出托尔斯泰和许行等思想相结合的现象，而它在某些地方很类似于傅立叶的“和谐制度”<sup>②</sup>。

1908年4月，刘师培为避免日本政府的注意，将《天义》报停刊，改出《衡报》，托名在澳门“平民社”编辑发行（实际东京出版）。以“一、颠覆人治，实行共产；二、提倡非军备主义及总同盟罢工；三、记录民生疾苦；四、联络世界劳动团体及直接行动派之民党”为宗旨<sup>③</sup>。这本刊物的基本论调是与《天义》报相似的，例如，批判共和制、议会制、选举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主张中国古代与无政府社会的结合、Esperanto（世界语）宣传等（参见表4）。该报这时期重点发表的是有关农民疾苦调查记和政论。刘师培在调查中国农民、工人的社会生活状态中对有关劳动、农民运动的方面有所注重<sup>④</sup>。他号召在中国组织“劳民协会”，从而为无政府革命奠定基础。《衡

① 申叔：《人类均力说》。

② 《天义》曾在第16~19卷合册上介绍过傅立叶的学说（参见杨天石、王学庄《论〈天义报〉刘师培等人的无政府主义》，第461~462页）。

③ 申叔：《发刊词》，《衡报》第1号，1908年4月28日。

④ 《衡报》发表大量关于农工问题的文章，如《农民疾苦调查会章程》、《论中国田主之罪恶》、《哀佃民》、《贵州农民疾苦调查》、《川省农民疾苦谈》、《山西佃民之疾苦》、《山东沂州佃民之苦》、《皖北佃民之苦》、《江苏松江农民之困苦》、《江西袁州农民之疾苦》、《浙江湖州农民之疾苦》、《四川工人之悲苦》、《衢州纸工苦况》、《论中国资本阶级之发达》等。有人提出，它们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一组调查农民、较早调查工人阶级状况的文章（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3集，人民出版社，1982，第351页）。



报》曾发表长文《论中国宜组织劳民协会》，主张以“劳民”为革命的势力，重视农民问题，肯定农民的革命性格，呼吁革命党人到工人、农民中去做发动工作<sup>①</sup>。《无政府革命与农民革命》一文又说，“中国农民果革命，则无政府之革命成矣。故欲行无政府革命，必自农民革命始。所以农民革命者，即以抗税诸法反对政府及田主是也”等<sup>②</sup>。这可能是与张继有关系，1907年由张继翻译的《总同盟罢工》一书是工团主义的代表作，但张继翻译此书的目的是针对会党的，刘师培则据此提出了组织“劳民协会”的主张。把欧洲工团主义的萌芽嫁接到中国破产农民的树木上，是《衡报》时期天义派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一大特色<sup>③</sup>。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刘师培发现农民、工人的存在，这一事实可以给予两种评价。一种是他认识到农民、工人的革命力量、劳农运动的必要性及总同盟罢工的意义，其进步性可以把刘师培等人看成高于孙中山的革命派。另一种是刘师培的共产主义的根据不是西方社会主义，是中国传统式的。他一直宣传中国古代共产制和无政府共产革命的类似性，并且反复强调“国粹”的保存和再生。这些传统取向的因素也一点没有变化。例如，刘师培在论述对人口增加和农业生产性问题解决的办法中，他不是采用先进的生产工具，也不是采用科学技术，而是实行古代的“区田法”<sup>④</sup>。这反映出他的无政府社会仍是以传统的农业为基础的社会。此前一年，刘师培在《天义》报中已经谈到废除封建土地私

① 《论中国宜组织劳民协会》，《衡报》第5、6号，1908年6月8日、6月18日。

② 《无政府革命与农民革命》，《衡报》第7号（农民号），1908年6月28日。

③ 蒋俊、李兴芝：《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第186页。

④ 参见申叔《区田考序》，《天义》第16~19合册，1908年；申撰：《衡书三篇》（生计问题）第10号，1908年8月8日。

有制而对“均田”土地制度给予高度评价<sup>①</sup>。

有意思的是，与其复杂的思想相对应，刘师培在社会经历上也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一个“不变”与“善变”的人物<sup>②</sup>。1908年冬他由日本归国后忽然投靠两江总督端方，1911年随端方参加对四川保路运动的镇压。辛亥革命爆发后，由于章太炎、蔡元培等党人的庇护才得以免罪。1914年他被推荐至北京，参加袁世凯的“公府谏议”，写了《君政复古论》等文赞成帝制运动，做了“筹安会”的一名成员。从他当时的文章中有关对袁世凯帝制运动的支持、对许行和鲍敬言的批判、对联邦制论的厌恶及身分秩序的维持等主张，充分地表明了他已从无政府主义中完全脱离出来。袁世凯死后，他逃避到天津。1917年，蔡元培怜其才学，招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新文化运动时期，刘师培在北京大学创刊的《国故月刊》中宣传传统语文体的使用和古代伦理体系的保存主张等，也表明他与当时以《新青年》为主的进步思想界的对立。1919年秋，他因肺病最终结束了复杂多难的生涯，终年36岁。上述辛亥前后刘师培所谓“变节”问题在学术界提到的不同意见已经不少<sup>③</sup>，这个问题，我们在从反清意识弱化和传统文化复兴的角度

① 参见叔时写的《中国古代均贫富之制》和《颜元斥土地不均之害》两篇文章（《天义》第2卷，1907年6月25日）。

② 参见朱维铮《刘师培：一个“不变”与“善变”的人物》，《书林》，1989年第2期。

③ 刘师培变节原因，与他比较接近的人曾有过不同的说法，研究者也据此做过不同的解释，大致有以下几种：①何震和汪公权诱惑说，蔡元培、张继、冯自由、胡汉民（丸山松幸等人）；②刘师培本人迷恋功名利禄说，刘富曾、章太炎、陶成章（何若钧、郑师渠、方光华等人）；③同盟会内部分裂、清朝的收买工作、经济困难等环境要因说，陈鍾凡、黎锦熙（有田和夫、小野川秀美、嵯峨隆、方光华等人）；④刘师培的传统学术、国粹主义影响说（何若钧、杨天石、森时彦、嵯峨隆等人）。大体上，研究者同意刘师培“变节”的原因是由于他在政治上的革命性和文化上的保守性相统一而导致的结果。

上可以说明。刘师培是否担心西方近代物质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抹杀？为了保存国粹，他放弃革命运动而同学问的“知己”合流，即投降端方<sup>①</sup>。

那么，我们怎么理解刘师培思想中国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两者相结合的问题呢？通过下面他的一句话可以发现解决这个难题的一把重要钥匙：“中国国粹之存亡，亦视共产无政府主义之实行与否而已。”<sup>②</sup>他又说：“共产无政府主义果见施行，则芸芸众生，均脱身人治之外，各适其求无忧生之[?]。舍殫精工作外暇日孔多，而古今书籍复为共有，便于检寻。则研究中国学术者，必较现今为尤众，斯固无待于保存者也。”<sup>③</sup>其实，在《天义》、《衡报》两杂志中有一定分量的文章持续谈到有关传统学术问题。有人曾认为，传统思想和无政府主义并不是矛盾性的关系，反而，为刘师培反对君学的国学，为解释无政府主义提供了一个丰富源泉。他的传统思想就是以具有新内容的“国学”来重新解释的传统思想，这种思想可以与无政府主义共鸣。因为国学也是对封建主义或专制主义的批判，它存在相对的进步性<sup>④</sup>。我们已经谈到，本来清末国粹派和无政府派的起源是一样的，这种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上述看法。但是，刘师培对于传统的断绝意识缺如、对于过去的彻底否定、对于激进主义的不完善等就成为他的进步思想中的一些主要缺点<sup>⑤</sup>。

① 日本学者嵯峨隆在刘师培“变节”问题记述中，通过“从传统的再生、急进化回到它的形骸化、反动化的移行”等的表现方法，说明了刘师培投降端方的事实（〔日〕嵯峨隆：《近代中国アナキズムの研究》，研文出版1994，第18页）。

② 申撰：《衡书三篇》（国学问题）。

③ 申撰：《衡书三篇》（国学问题）。

④ 〔日〕森村彦：《民族主义と无政府主义——国学の徒、刘师培の革命论》，第183页。

⑤ 〔日〕有田和夫：《清末におけるアナキズム》，《东方学》第30号，1965，第84页。

### 第三节 妇女解放论

#### 1. 男女问题与家庭问题

前两节主要论述以刘师培为主的天义派的文化思想。中国最初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杂志《天义》，本来是一种有关女性问题的专门杂志，男女问题、家庭问题及女性和社会等为主题的文章占了该报内容的大半（参见表4）。因此，本节要谈的是何震等天义派的妇女解放论。

中国传统社会中，男女关系始终被视为像天与地、阴与阳那样永不可改变的尊卑关系。近代知识分子为了提高妇女社会地位，恢复妇女诸种社会权利，以实现女性作为社会成员的价值而进行文化革新。这种妇女解放运动常常伴随政治革命而发生，往往又是政治革命的继续和发展，是比政治革命更深层次的革命，即社会革命。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不缠足”与“兴女学”运动已经形成了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潮。到20世纪初，随着革命派的出现及其革命思想的传播，妇女解放运动有了新起色。特别是女性运动家秋瑾的被处刑，代表了清末女性解放运动的第二次高潮<sup>①</sup>。这时期，有几个显著特点，即女子参政权问题的提倡及对“贤母良妻”主义的怀疑等女权意识的加强，婚姻与家庭问题认识的深化，女性劳动、经济问题和教育问题的重视等，这在天义派的妇女解放思想中具有自己的特色。笔者首先谈到男女问题和家庭问题这两方面。

<sup>①</sup> 参见吕美颐、郑永福《中国妇女运动（1840～1921）》绪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男女问题** 《天义》报前期的一个特点是在“男女革命”问题上。该报创刊号第一篇文章《女子宣布书》中已经提出“男子者，女子之大敌”的口号。天义派视男女为对立的两大阶级，他们认为，“女子一日不与男子平等，则此恨终不磨”，“世界固有之阶级以男女阶级最严”，“故欲破固有之阶级，必自破男女阶级始”，并且“男女之革命，即与种族、政治、经济等诸革命并行成”<sup>①</sup>。他们甚至把男子一概看做女子的敌手而鼓吹女子向男子“复仇”。何震说：“古人言虐我则仇，今男子之子女子也，既无一而非虐，则女子之于男子也，亦无一而非仇。”“女子欲求平等，非徒用抵制之策已也，必以暴力强制男子，使彼不得不与己平。”<sup>②</sup>这种复仇感情反映了中国妇女对夫权压迫的强烈不满。

何震等人在有关男女不平等原因的解釋上具有独特的观点，有的认为，女性因生育问题而制约了自己的生活，她们不能与男性一起参加战争，而男性具有参加战争的特权，并且他们利用这种权利而压迫整个女性。还有，由于男子参加战争而死亡，男子比女子人口少得多，这种男子人口不足现象最终发生了封建的蓄妾制度<sup>③</sup>。因此，天义派的另一个领袖何震支持女性参加战争，她说“女子受制于男固属非公，以女子而受制于女亦属失平”<sup>④</sup>。何震更愤激地说：“不惟受制于男，亦且受制于女，则谓此境为世界最惨之社会可也，则为此苦为中国女子特殊之苦亦可也。”<sup>⑤</sup>她认识到女子相互之间也存在支配和被支配关系，例如“女主之于婢女”的抑压、“君姑之于童养媳”的抑压等。这样，她认为

① 震述：《女子宣布书》，《天义》第1卷，1907年6月10日。

② 震述：《女子宣布书》。

③ 守民：《论女子受制之原因》。

④ 震述：《女子复仇论》（一），《天义》第2号，1907年6月25日。

⑤ 震述：《论中国女子所受之惨毒》，《天义》第15卷，1908年1月15日。

女权伸张不仅应排斥男子的强权，在同一逻辑上女子的强权也应排斥。天义派宣传的“男女平等”不但反对男子对女子的压抑，而且反对男子对男子的束缚及女子对女子的一切束缚，最终人们都实现互相平等的关系。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何震等人的绝对平等主义的思想意识。

上述的绝对平等原则在为解决男女问题提出的七条纲领中很明确地表现出来。天义派“男女革命”主张是：①实行一夫一妻制；②女子出嫁后不从夫姓，以父母姓并列；③男女并重，“视女犹子”；④男女养育同等，教育同等，职务同等；⑤夫妇感情不和可以分离；⑥以初婚之男配初婚之女，男子再娶只能娶再婚之女，女子再嫁只能嫁再婚之男；⑦废除娼妓。他们甚至认为自由结婚也是违背平等原理，所以反对自由结婚<sup>①</sup>。日本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对该报宣传的“男女革命”十分感兴趣，但7条主张中，第6条的过激内容他也不能接受。由此，幸德秋水写信给何震说到：“夫妇关系之第一要件，在子男女相恋相爱之情。纵令初婚之夫妇心中，无相恋相爱之情，则固有妨于夫妇之道。又令再婚之男与初婚之女，真克爱恋和谐，何害其为夫妇乎”<sup>②</sup>。他曾特邀何震与堺利彦（日本社会主义者，女性问题专家）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对此，何震在案语中提出，“盖幸德君及堺君之意，在于实行人类完全之自由。而震意，则在人类完全之平等。立说之点，稍有不同”<sup>③</sup>。

中期以后，《天义》报论调中女子复仇论的态度渐渐起了变化，作者们把男女问题与社会、经济方面等问题具体结合起来谈论妇女解放。其变化原因可能是感觉到复仇论的非现实性，或是

① 震述：《女子宣布书》。

② 《幸德秋水来函》，《天义》第3卷，1907年7月10日。

③ 《幸德秋水来函》（震附记），《天义》第3卷，1907年7月10日。

通过幸德秋水等人的帮助更理解了无政府女性解放论，其代表性的文章是《女性解放问题》一文。在该文中何震改变了初期主张的结婚和离婚自由、一夫一妻制、男女共同教育及共同社交场出入等的种种态度。她认为这些主张不过“肉体上之解放”，而为了实现真正自由和平等，惟无政府革命能解决男女之间的根本问题<sup>①</sup>。对资本制式学堂和工场批判的《论女子当知共产主义》（第8、9、10卷合册）、军备主义（军国主义）给予女性的戕害的《女子非军备主义》（第11、12卷合册）等文都通过各种形式来强调上述论调。到《天义》报后期及《衡报》时期，鼓吹“女子复仇”式男女革命文章更加减少，原因之一在于天义派内部中的一些批评。例如，张继在1908年4月从欧洲来信，他写到，“《天义》总需接续出版，因东方吾党之机关，除日人所刊《平民新闻》外，惟有此报。惟需将女子复仇诸语稍加改变，当以自由恋爱为最确当，且西方革命党舍英国外，亦鲜有男女之界者，惟以社会革命为主而已”<sup>②</sup>。这样，把男女问题归属于社会经济问题是受到西方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同时我们可以了解《衡报》时期以宣传社会经济解放论为主的主要原因。

**家庭问题** 当时在共和革命派的一个刊物中，家庭立宪者写的《家庭革命说》一文是讨论家族与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文章。该文主张打破家族束缚后才会找到政治活动的自由，家庭爱情断绝后才会获得政治快乐的回复。在这里家族处在国家对立物的地位，而解决家族制度的疾苦就是家庭革命。简单说，作者认为政治革命以“家庭革命”为前提<sup>③</sup>。丁初娥写的《女子家庭革命说》一文中说，“政治之革命，以争国民全体之自由，家庭之革

① 震述：《女性解放问题》（一），《天义》第7卷，1907年9月15日。

② 《张继君由巴黎来函》，《衡报》第4号，1908年5月28日。

③ 家庭立宪者：《家庭革命说》，《江苏》第7期，1904年1月。

命，以争国民个人之自由，其目的同”。她认为家长制就是第二的君主权力，如果说君主直接地压制政治革命的话，家庭则是间接地压制政治革命<sup>①</sup>。这些主张都是在女性解放和家族革命从属于国家革命的基础上提出的，它的特点与梁启超等君主立宪派的妇女解放论都有共同的逻辑<sup>②</sup>。

对此，在妇女解放的问题上，天义派进一步批判封建道德和权力。他们指责封建时代通过法律支配中国女性，这种法律是在封建教育基础上形成的，它的根据是儒家的三纲说等。天义派在《公论三则》的三篇小文章中指出：首先，作者认为封建帝王是“以一男配无量之女”，“实男界之娼妓”，而“男界中之最贱者，以帝王为最”，“欲诛男子，必先诛亚洲之帝王”（《帝王与娼妓》）。其次，今日无形之大盗是政府和资本家，平民都是被盗的人。老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因此，作者主张先废除圣人之书籍而后评论大盗之罪恶（《大盗与政府》）。再次，有关权力和道德问题中，本来权力以有形制约人间，道德以无形制约人间，是“强者护身之具”，而为了扫荡权力，先应该扫荡现在的道德（《道德与权力》）<sup>③</sup>。如上所述，天义派否定现存一切道德和权力的态度反映了对家族制、三纲论的无条件废止。

中国的封建家族制度是以男子为中心的大家族制度，这种制度的特点就是家长权威的绝对化，而在父子、夫妇、长幼的

① 丁初娥：《女子家庭革命说》，《女子世界》第4期，1904年4月。

②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写的《变法通议——兴女学》一文中强调女子教育的必要性。他认为女子教育的目的是通过女子经济的独立和贤母良妻的育成，最终实现强国保存。那时，他不太注意女性个人的个性人格发达等问题（〔日〕中山义弘：《近代中国における女性解放の思想と行动》，北九州中国书店，1983，第82～83页）。

③ 震述：《公论三则》，《天义》第1卷，1907年6月10日。



血缘关系基础上——方强迫另一方服从。天义派汉一（可能是刘师培）在著名的“毁家论”中宣称，“欲开社会革命之幕者，必自破家始”。而志达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部分译文的按语中，激烈批判欧洲的财婚制<sup>①</sup>。婚姻问题往往成为新旧道德观念冲突的焦点，因为它从本质上是对“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否定。有关三纲问题中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是高亚宾写的《废纲篇》一文。她说，“三纲之说，是屠杀民族之利刀也。而夫妇一伦，又奇毒殊药炼冶利刀，而神屠杀之用也”；又说，“夫妇居室为不平等之牢狱，为束缚人之酷刑”。文章提出，“夫妇之伦宜先废去也”<sup>②</sup>。天义派反复说，儒家“立夫为妻纲之说，一若天之生人，厚于男而薄于女。欲伸男子之权，则以女子为附属于男，又虑女子不甘附属也，则倡服从之说，并责女子以从一而终”等。这样，他们对三纲批判中较注意的地方就是“夫为妻纲”这一条。天义派的最终主张是解体家庭和实行共产。

另外，《家庭与教育》（摘自《新世纪》之《革命原理》一文）中，在“家庭为专制政体之胚胎”前提上，为了妇女解放提出了两种方案，即经济自立和教育普及。它说，“经济自立，使女子无复仰食子男，则女子自不受男子之压制”。还说，“教育亦然，必得教育普及，而后无贵贱无等级”<sup>③</sup>。作者认为，“家庭者，所以私其教育者也。古今之家庭，不但无益于教育，而且害之”。所以他强调教育普及时应遵守公平无私的态度。这样，新世纪派的教育论——家庭革命和教育革命的联系及公共教育和家

① 志达：《女子问题研究》（《因格尔斯学说》），《天义》第16--19卷合册，1908年。

② 高亚宾：《废纲篇》，《天义》第11、12卷合册，1907年11月29日。

③ 真译：《家庭与教育》，《天义》第11、12卷合册，1907年11月29日。

庭教育的区别等——反映在《天义》文章上。该报另一些论文中也有类似的种种主张。例如《女子教育问题》一文，批判资本主义教育制度，主张“迷信信鬼”的奴隶教育必须由无政府教育代替。作者说，“今为女子解散（放）计，必屏斥一切之旧教育，而代以新教育。盖宗教、家政二科，必宜废弃者也。论理一科，亦宜屏除往昔思想，而代以新思想，即排斥昔日腐败道德，而导以互助、博爱新道德是也。若工艺一科，宜更易其学习此科之目的，此则吾辈对于教育问题之宗旨也”<sup>①</sup>。文章提出家庭、国家、社会革命都是从教育革命开始的，“教育革命实一切革命之权舆”。有趣的是，天义派常批判“贤母良妻”式日本教育制度，认为贤母良妻教育是奴隶教育，甚至认为日本是“三纲之国”<sup>②</sup>。这与戊戌变法时期以废止缠足、兴办女学为主的状况比较起来在理论上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

## 2. 女性和社会革命

1903年，作者署名为“爱自由者金一”（金天翻）出版了一本鼓吹妇女解放并参加革命的《女界钟》。在文章中力倡男女平等、争取女权和教育权。他较重视婚姻自主权、经济独立权及女子教育权等诸权利，并且公开提出了妇女参政的问题。更为时论所注意的是妇女参与政治生活的问题<sup>③</sup>。1904年，丁初娥在上海创刊的《女子世界》在当时女性杂志中有很大的影响力，该报创刊宗旨是反对封建礼教、宣传男女平等及发扬女性爱国精神等。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教育会会员。同年，在东京，秋瑾在

① 志达：《女子教育问题》，《天义》第13、14卷合册，1907年12月30日。

② 参见《呜呼三纲之国》，《天义》第4卷，1907年7月25日。

③ 1904年，金天翻翻译出版了烟山专太郎的《近世无政府主义》一书。此书后以《自由血》为题而风行一时。

她主编的《白话》月刊上发表了有名的《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一文，以通俗直白的语言痛述妇女历来所受的身心之苦，鼓励大家奋起斗争。1907年，秋瑾回国后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报》。秋瑾死后，女同盟会员中一部分人在上海创办了另一个女性杂志《神州女报》。这两种杂志都主张妇女解放的主要内容是在家庭革命问题上，即反对家长制和反对男尊女卑。她们强调的是“政治革命”以家庭革命为前提，而宣传女性参政权和女性劳动权的获得。当时共和派注重的地方是推翻清朝等的政治革命问题，不是妇女解放等社会文化革新。例如，有人认为，将来中国建设民主共和国后实施普通选举制，但那时应采用一定程度的限制，而在其限制规定中包含女子<sup>①</sup>。这种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时同盟会革命派对妇女选举权及其妇女解放问题的基本看法。

综上所述，1907年前的整个中国女权运动都属于以“国家”为主的民族主义性质。当时，女权主义者的基本观点不是证明自然权力，而是立足于包括妇女在内的国家的需要，即要“富强”或“救国”。相反，何震创立的“女子复权会”（1907年）的宗旨及实现的方法则完全不一样。其大意为：确尽女子世界之天职，力挽数千年重男轻女之风气。对女界方法有二，一是以暴力强制男子，二是干涉甘受压抑的女子；对世界方法有二，一是以暴力破坏社会，二是反对统治者和资本家<sup>②</sup>。他们一面言男女平等，一面言无政府。而女子复权会的机关刊物《天义》报则更深刻、更全面地揭露和控诉了封建专制主义对妇女的压迫，特别是

① 汪精卫：《再验“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民报》第16号，1906年9月25日。

② 〔日〕石井洋子：《辛亥革命期的留日女子学生》，第45页（转引孙石月《中国近代女子留学史》，中国和平出版社，1995，第109页）。

它比较注意下层劳动妇女的苦难。如前所述，该报的论调渐渐消除了初期的男子复仇论的感情色彩，而提出了私有财产制是女性受压抑的根本原因，并讨论了女性解放和阶级斗争的种种关系。那时，天义派揭露了西方资产阶级所谓男女平等、结婚自由的局限性和虚伪性。认为欧美诸国妇女的社会地位虽有所改善，但这种妇女解放不是精神上的解放，不是真正的女性解放。这样，他们与其他革命派不一样，更强调女权主义与国民主义的区别，指出“女子的解放”并不是“为了民族起见”，而是出于道义上的需要<sup>①</sup>。东京无政府派在社会革命上有关劳动权、参政权问题中较鲜明地表现出反资本主义、反议会主义色彩。下面，简单地谈到天义派对这两个问题的独特看法。

第一，关于劳动权。从女性经济的自立问题来说，我们首先应注意的是女性劳动权。其代表性文章是畏公写的《女子劳动问题》一文。当时，因机械工业的发达和家内手工业的发达，女性劳动力渐渐流出工场。同时因物价暴腾的影响，男子的一人赁金不能扶养一个家庭。为了解决这种矛盾出现了女性参加劳动的问题。戊戌时期，变法派的梁启超已经从女性参加社会劳动到经济的自立，再到民族自立的观点上提出了女性劳动问题。与梁启超相反，天义派认为这种资产阶级“富强之学”产生了“劳力买卖之奴婢制度”，因此，他们不但反对妇女劳动，而且不赞成女性就业，认为那是“使女子日趋于劳苦”，是在减轻男子的负担<sup>②</sup>。在该文中，作者正确地指出，社会上产生娼妓、侍妾的原因是由于“生计”问题造成的，这不是社会风俗问题。他认为为了少数富裕层女性的奢侈和掠夺，多数女性的劳动是不公平的。通过女

<sup>①</sup> [美] Peter Zarrow, "He Zhen and Anarcho-Feminism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7, No.4, 1988, p.796.

<sup>②</sup> 畏公：《论女子劳动问题》（一），《天义》第5卷，1907年8月10日。

性劳动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传统家庭的压力，但这不是真正解放，而且女性因肉体劳动而更增加苦痛<sup>①</sup>。此外，天义派还提出娼妓、妾、下女、女工问题不是女性的错误，是社会结构中派生的一种社会恶果。在《惨哉女工》（第8、9、10卷合册）、《金华织布局虐待工女记》（第15卷）等文中激烈地批判妇女劳动及少年劳动，他们最终提出劳动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法就是实行无政府共产革命。

第二，关于参政权。《天义》报登载幸德秋水对日本妇女所言的《妇女与政治》（第3卷）一文，和介绍英国妇女为选举权斗争的《妇女选举权问题》（第4卷和第7卷）等文。这些文章都是有关女性参政权问题的译文。文章记载的目的很简单，译者自己说，“妇人参政为近日一大问题。然其争参政之权，即系承认有国家有政府也。故本社之肯在于灭绝人治、弭消男子之特权。使男女归于平等，不仅以妇人参政为目的也”<sup>②</sup>。天义派共同认为，“以议会政策为目的者，无论出何党派，决无有利平民之一日”<sup>③</sup>，而“政治罪恶论所言选举之弊”。后来，在《异哉万国社会党对于女子撰（选）举权之议案》（第13、14卷合册）中又说，“社会党要求选举，社会主义之大耻也。女子要求选举，女子之大愚也”，“采用议会政策者，不惟失其纯粹之宗旨，且必与公平之真理相违。深望世界妇女不为社会党邪说所诱，而以直接行动为惟一政策也”<sup>④</sup>。他们对于女性参政权运动的反对意思

① 畏公：《（论）女子劳动问题》（二），《天义》第6卷，1907年9月1日。

② 独应：《妇女选举权问题》（二）（按语），《天义》第7卷，1907年9月15日。

③ 申叔：《社会主义与国会政策》（一），《天义》第13、14卷合册，1907年12月30日。

④ 《异哉万国社会党对于女子选举权之提案》，《天义》第13、14卷，1907年12月30日。

不但能够明白，而且他们对于反对议会主义和支持直接行动论（主要方法是总同盟罢工）的态度也十分明确。

那么，天义派的反议会主义与女性解放问题是什么关系呢？他们认为，仅仅少数女性参加政治，这不能帮助多数女性，而且她们只坚持上层女性的利益，由此，反而使下层女性的被害更严重。何震说，“以少数参政之女子，处于主治之位，使多数无权之女子，受其统治，不独男女不平等，即女界之中，亦生不平等之阶级”<sup>①</sup>。她认为除男子对女子支配必须反对外，而且反对女性内部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她一直坚持绝对不愿假自由、假平等的观点，强烈地追求真自由、真平等。这里的假自由、假平等指一种资产阶级女性解放论的经济自立及参政权的获得。另外，在《女子非军备主义论》（第11、12卷合册）一文中，何震揭露了军国主义给妇女的种种弊端，这与反议会主义是在同一逻辑上来反对军备主义。

上述的独特观点，可以说是受到欧洲、日本社会主义女性解放论影响的结果。例如，克鲁泡特金所著《面包略取》中有关女性问题部分以《快愉之劳动》为题目连载在《天义》（第13、14卷合册）上。在这里，女性解放不但要从各种社会不平等中得到解放，而且表明女性应该从家事劳动中得到解放。作者主张人类解放内容中当然包括女性解放<sup>②</sup>。该报部分翻译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有关西洋财婚制度的批判内容，并在编者按语中提出：“彼以今之结婚均由财产，故由法律上言之，虽结婚由于男女之契约，实则均由经济之关系而生耳，无异雇主之子工人也。关于彼说，则女子欲求解放，必自经济革命始，彰

<sup>①</sup> 震述：《妇人（女子）解放问题》（二），《天义》第8、9、10卷合册，1907年10月30日。

<sup>②</sup> 《快愉之劳动》，《天义》第13、14卷合册，1907年12月30日。

彰明矣”<sup>①</sup>。另外，中国无政府派的这种态度充分地反映了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等人的直接行动论的观点。那时，幸德秋水宣传的直接行动论中的反议会、非军备主义与反对女性经济自立及女性参政权的态度都是与天义派的主张基本一致的<sup>②</sup>。

从女性解放与无政府主义关系方面来说，《人类均力说》最后部分，在何震附记的文章中简单地整理好了，即“男子不以家政倚其女，女子不以衣食仰其男。而相倚相役之风可以尽革”。这样，男女职务平等后，“则重男轻女之说，无自而生”，而“此均力主义，所由与男女平等之说相表里也”<sup>③</sup>。由此，作者认为，女子要真正独立和解放，就必须实现社会共产制和无政府制，“今日之女子，与其对男子争权，不若尽履人治，迫男子尽去其特权，退与女平，使世界无受制之女，亦无受制之男。夫是之为解放女子，夫是之为根本改革”<sup>④</sup>。真正的变革之途，不是改良政府而是废灭政府。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天义派的妇女解放论中一直存在着刘师培所说的“欲维持人类之平等权，宁限制个人之自由权”<sup>⑤</sup>式的平等原则。

## 小 结

国粹派刘师培主张的“国学”是“君学”的对立物，他宣传

① 志达：《女子问题研究》，《天义》第16—19卷合册，1908年。

② 天义派的女性解放论可能是受到幸德秋水写的《妇人解放与社会主义》（《世界妇人》第16号）一文的影响（〔日〕小野和子：《中国女性史》，平凡社，1978，第97页）。

③ 申叔：《人类均力说》（何震：附记）。

④ 震述：《妇人（女子）解放问题》（二）。

⑤ 申叔：《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一）。

的“保存国粹”是专制文化的反义词。注重批判君主专制和学术结合的封建时代，如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一样，刘师培强烈希望中国古代的再建。为了“新”的民族精神的恢复，他激烈地抨击封建文化，这就是传统文化内部的自我革新倾向的表现。刘师培从国粹派到无政府派的转变过程表现在政治思想上有较大的变化，但在他的意识里面一直存在对传统学术的热爱。从文化思想方面来说，我们通过家族、三纲、孔子、文字、教育、女性观等的变化过程中看到的是，这两个时期绝不是相互断绝的，可以说，是在同一思维逻辑上展开的。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不但受克鲁泡特金、幸德秋水等人的西学影响，而且也建立在自己国学知识的历史根据上。他特别相信传统时代已有无政府主义，而无政府共产社会就是为了国粹复兴的最完善社会。有趣的是，国学和无政府主义结合后，刘师培开始怀疑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在对其批判过程中，他发现了农民和劳动者等平民的存在而开始较明确地揭露帝国主义种种弊端。

刘师培所领导天义派的“中国式”无政府主义的最大特色是在“平等”主义原则上。他们认为西洋无政府主义主张的“绝对自由”不是第一的意义，甚至认为为了人类平等可以制约一定的自由。何震等人的妇女解放论也是在男女绝对平等主义的原则上构成的，其实，这种平等意识与传统士大夫的“平均”意识是相似的。我们可以说，在《天义》报中提出的无政府世界观是一种传统的“平均”意识再经过解释的“平等”的世界观。天义派以来，传统学术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结合企图一直存在着。例如，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党（社会党）人中的佛教式无政府主义，新文化运动时期朱谦之等人的无政府个人主义，太朴的所谓“中国式无政府主义”，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景梅九主编的《学汇》杂志及边燮清写的《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略说》等文中仍可以发现如刘师培式无政府主义的解释。美国著名学者对近代中国



思想史曾提出一个有名的论断，认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大体是在理智方面选择了西方的价值，而在情感方面却丢不开中国的旧传统，其较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刘师培<sup>①</sup>。

---

<sup>①</sup> [美] 李文孙 (Joseph Levenson): *Liang ch'i - 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和 *Confusio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3 vols) (转引余英时《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347页)。

## 第三章 以科学反对传统文化

### ——“新世纪”派的文化思想

本章旨在通过《新世纪》<sup>①</sup>杂志来着重分析“新世纪”派的文化思想。《新世纪》于1907年6月22日创刊于巴黎，最初为周刊（后来改为月刊），以“La Novaj Tempoj”（世界语名称）为副标题而发行，1910年5月21日停刊，共出121期。由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负责编辑，张静江负责财务。在《新世纪》中，吴稚晖以燃、燃料、夷、四无等为笔名；李石曾以真、真民为笔名；褚民谊也使用了民、千夜等的笔名。在发刊词中宣言：“本报议论，皆凭公理与良心发挥，冀为一种刻刻进化，日日更新之革命报。”<sup>②</sup>新世纪派在相信近代科学的绝对性的信念中，宣传反传统的激进文化思想。他们在进化论的“新”解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基础上，追求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无政府理想社会的实现。新世纪派认为宗教的本质就是一种迷信，没有什么科学的根据。因此，他们树立了以无政府教育作为代替宗教价值体系的新道德。该派一贯坚持“尊今薄古”的反国粹主义态度，认为当时中国所有的最大问题在对“传统文化”的夸大相信之中。因此，他们激烈抨击构成传统社会的各种文化因素，例如

---

① 笔者分析的资料是在“中央编译局”所藏的《新世纪》（1947）重印本。

② 《新世纪发刊之趣意》，《新世纪》第1号，1907年6月22日。

家庭、三纲、孔子、女性等。他们特别不满意章太炎等国粹派人士，因此在《新世纪》中大量连载反对国粹的文章，甚至主张废止汉文而使用世界语。新世纪派提倡的各种革命论可以说是辛亥革命前期最急进性的、最根本性的主张。

## 第一节 提倡科学、道德，批判宗教、迷信

### 1. 科学，互助，无政府

《新世纪》是清末革命派刊物中出版时间最长的刊物之一。这份刊物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改革、革命运动中，是与《新民丛报》、《民报》同样重要并值得深入进行专题研究的三大媒介之一<sup>①</sup>。新世纪派的思想特点在于以科学主义为普遍真理，并且他们是基于在对有关进化论和伦理学“新”的解释基础上来宣传无政府主义。事实上，在近代中国科学主义确立的真正初始是自《新世纪》，该报创刊号上说：“科学公理之发明，革命风潮之膨胀，实十九、二十世纪人类之特色也。此二者相乘相因，以行社会进化自然之公理。盖公理即革命所欲达之目的，而革命为求公理之作用。故舍公理无所谓革命，舍革命无法以伸公理。”<sup>②</sup>这样，新世纪派把无政府主义当做科学的真理，热情地宣扬无政府主义。当时，他们认识到为了了解近代西洋科学，迫切地需要自然科学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即理性主义和合理主义。该派采纳的研究方法是一种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即归纳法和演绎法。吴稚晖等人把科学方法紧密地融入他们的新社会概念中，由科学教育培

<sup>①</sup> 陈孟坚：《民报与辛亥革命》，正中书局，1986，第214~215页。

<sup>②</sup> 《新世纪之革命》：《新世纪》第1号，1907年6月22日。

育的新道德，将使新的无政府社会得到实现<sup>①</sup>。这可以说是新世纪派共同具有的科学主义思想。戊戌时期康有为等人把科学作为自己变法理论中的一个思想武器，但他们与新世纪派的近代科学的信念比较起来还存在一定的差别。

《新世纪》宣扬近代科学的实质内容是什么？这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风靡世界的西方进化论。众所周知的是，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过去的研究已经注意到进化论的历史意义，进化论的世界观不但是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过程中，而且是在无政府主义社会思想形成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新世纪派接受的进化论不是斯宾塞（包含赫胥黎）主张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是克鲁泡特金主张的“互助论”。

克鲁泡特金说：“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建立在以现代的机器方法解释各种现象的基础之上的宇宙观，这些现象包括了整个自然界，其中也有人类社会生活及其各种政治的、经济的和道德的问题。”<sup>②</sup>他的无政府理论来源借鉴于达尔文的进化论，从而把生物进化的规律引用来考察人类社会生活。克氏认为生物界除了“生存竞争”以外，还有“互相扶助”的一面。凡是能生存下来的，便是善于互助的生物。认为任何生物都不是个体生活的，而是群居生活，在一群之内，各单个生物之间只有互助，而无竞争，他常用蜜蜂等群居营生这一自然现象作为例证来解释他本人的论旨，人类亦不例外，具有强烈的互助本能。要使人类向前发展，互助是不可缺少的原动力。同时，克鲁泡特金不同意社会达

① 有人已经谈到吴稚晖和陈独秀是中国哲学唯物论的最好典型。其中，新世纪派的领导者吴稚晖在哲学上极为推崇唯物主义的文明，但同时气质上他却是个唯心主义者（〔美〕郭颖颐著、雷颐译《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22、29页）。

② 克鲁泡特金著/凌霜、震天、天均译《近世科学和安那其主义》，上海自由书店，1928，第60页。

尔文主义者把生存竞争看做是进化的主要因素。对此，他提出了相反的论点，认为互助才是一切生物和人类进化的真正因素，“以互助和互援的办法”一定可以“消除竞争”。他所阐述的“互助为一个自然法则和进化的要素”，给达尔文主义“弥补一个重大的空白”<sup>①</sup>。近代中国较流行的“互助”一词是来自于克鲁泡特金写的《互助论》一书，在《新世纪》上通过李石曾的翻译而首次介绍给中国知识界。

克鲁泡特金又说，“互助这一原则的最大重要性，还是在道德方面表现最充分，互助是我们道德观念的真正基础”<sup>②</sup>。这样，他提出道德价值的最大最高层次是建立在“互助”基础之上的。由此，克氏的进化论思想中的最大论敌就是斯宾塞（包含赫胥黎）等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上述的观点直接影响了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新世纪派认为，“进化者，前进而不止，更化而无穷之谓也。无一事一物不进者，此天然之自然”，“故知道者，有进而无止，无善而可常，此之谓进化，故进化之理为万变之原”<sup>③</sup>。认为社会发展历史就是人性进化的历史，也是生物之间相互扶助发展的历史。他们解释克鲁泡特金的社会进化原理时常用“人道进化由未尽善而之较为尽善”，或“人道进化由未幸乐而之较为幸乐”等<sup>④</sup>的表现方法。在这里，我们注意的是新世纪派是用克氏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较善”的渐进性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发展

① 克鲁泡特金著、李平沅译《互助论》，商务印书馆，1963，中译本序言，第2页。

② 克鲁泡特金著、李平沅译《互助论》，商务印书馆，1963，中译本序言，第264页。

③ 真：《进化与革命》，《新世纪》第20号，1907年11月2日。

④ 例如，保罗·爱露斯、真民译《世界七个无政府主义者》，《新世纪丛书》（五），1907；真：《驳新世纪丛书革命附答》，《新世纪》第5号，1907年7月20日；民：《普及革命》，《新世纪》第15号，1907年9月20日等文。

过程。有人曾认为，新世纪派理论的一大特色是在“较善”逻辑上，它是向“至善”（=穷极）的理想世界进行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期<sup>①</sup>。

新世纪派还接受了克鲁泡特金的好友邵可倡的“进化革命论”。无政府共产主义者<sup>②</sup>邵可倡认为进化表示事物的渐变过程，而革命则是渐变过程的中断，表现为事物的突变，二者有联系，又有质的区别，是对立的统一。他说：“我们可以说进化与革命是同一现象的连续，进化先于革命，革命又先于新的为未来革命之母的进化。”<sup>③</sup>就是说进化与革命只是同一现象的两个阶段，只有幅度的区别，而无实质的不同。而他认为进化一般表现于精神的领域，而革命多表现于人们之间实际关系的领域，后者是由前者制约的<sup>④</sup>。从他的进化和革命两者关系解释中常看得到的是受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影响。

与邵可倡一样，新世纪派把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革命视为社会进化的一部分，认为革命就是扫除进化的障碍物，并更加促进进化。但他们在接受邵可倡的进化革命论中又具有自己的特色。例如，在翻译过程中，李石曾认为把 Revolution（革命）解释为

① 有人提出，新世纪派（主要是李石曾）的革命思想体现在“主义”和“作用”的逻辑过程中。这“主义”指革命的最终目标、最高纲领，“作用”指革命过程的现实目标。其中，“至善（无穷）”指无政府理想社会，而“较善（较乐）”指过渡期时期。在“较善”逻辑上可以包括民族主义革命（参见〔日〕嵯峨隆《辛亥革命前の李石曾》，《石川忠雄教授还历纪念论文集》，庆应通信，1982，第661～694页）。

② “无政府共产主义”这一词最初使用者可能是邵可倡（见〔日〕石川三四郎《日本无政府主义の由来》，《日本无政府主义运动史》，黑色战线社，第1页）。

③ 邵可倡、毕修勺译《进化与革命》，平明书店，1947，第5页。

④ 参见汤庭芬《中国无政府主义研究》，法律出版社，1991，第61～62页。汤庭芬认为，新世纪派褚民谊写的《普及革命》一文，就是邵可倡写的《进化和革命》的主张复制来的。

Re-Evolution (进化的连续), 理解为永远进化的自然界的一种现象。他说: “革命之名词, 来自西文, 其字作 Revolution, Re 犹言更也、重也, Evolution 犹言进化也。故革命犹重进化也……今之释革命, 曰诛不屑政府, 亦更新之意耳……排满诚革命之一端, 而不足以尽革命。”<sup>①</sup> 再说, “革命即革去阻进化者也”。李石曾似乎是把进化区分为两回事, 把改良作为渐变的进化而将革命当做突变的进化。对吴稚晖来说, 革命是一种除旧布新, 是一种进步, 永无休止地循着真理公道而进化。他的无政府思想, 亦即根基于此。但他说: “革命者, 非‘杀你’之谓也……原义命为天命, 天即理也。即谓更改道理上所应当布置之条件。此与西文 Revolution ‘改良’之义密合……此乃进化之自然。”<sup>②</sup> 有趣的是, 吴稚晖“Revolution”的翻译词就是“改良”而不是“革命”。正因如此, 新世纪派看待革命与改良这些词, 有时相互补充地使用, 有时又在同样的意义上使用。虽然他们希望通过改良的方法而达到目的, 但是这种改良方法并不能达到本来的目的, 他们只能通过暴力革命的方法而达到理想的目标。

由上可知, 新世纪派宣传的进化论, 是结合了克鲁泡特金的“相互扶助论”和邵可倡的“进化革命说”而形成的一种“新”的进化论<sup>③</sup>。褚民谊说, “甲互助, 则优劣俱胜; 乙不互助, 则优劣俱败; 丙竞争, 则优胜劣败; 丁不竞争, 则优败劣胜”。还有, “兽与人较, 则兽之竞争长于人, 其互助消于人。野蛮人与文明人较, 则文明人之互助高于野蛮人, 其竞争低于野蛮人, 此

① 真民:《革命》,《新世纪丛书》(一),1907年。

② 燃:《就地正法》,《新世纪》第78号,1908年12月19日。

③ 新世纪派可以说都是克鲁泡特金主义者。《新世纪》报译载的无政府主义论著,大多是克鲁泡特金的作品,如《互助论》、《法律与强权》、《国家及其过去之任务》、《面包略取》、《狱中逃狱》等,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了该派的思想性格。

不易之理也”<sup>①</sup>。在这种解释基础上，新世纪派提出的是：竞争固然是天则，秩序也是天则；无竞争则无进步，无互助则更无进步；社会发展未必依赖竞争，竞争也未必一定能促进人类进化，只有竞争与互助并重，社会才能自然地进化发展；而要做到竞争与互助并重，就必须彻底消除国家、政府、权威等等使差异存在的东西。这样，“互助”比“竞争”好的观点就成为清末无政府派的共同特点。新世纪派在接受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的同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又有克服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内部矛盾的愿望。《新世纪》不但积极地接受西方无政府主义各种理论，而且该报把科学、互助的无政府理论具体地应用于进行中国社会的分析及批判。

有趣的是，新世纪派接受西方无政府主义时不能避免用传统言语翻译的不彻底性。前章记述过的“天义派”刘师培无政府主义思想中，传统哲学用语和无政府主义结合这一现象已经典型地表现出来。巴黎无政府派也不能不面对在这种“新主义”翻译接受中的难题<sup>②</sup>。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在宣传西洋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中经常使用“大同”、“公理”、“良心”等的传统词语，其中，“大同”指理想社会即无政府共产社会，“公理”代表自然和社会

① 民：《续无政府说》，《新世纪》第36号，1908年2月29日。

② 有些论者认为，吴稚晖是在传统思想基础上接受科学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时期不论存在对传统的强烈排拒与否，但是在他的意识体系中仍存在着传统主义的影响（〔日〕嵯峨隆：《近代中国アナキズムの研究》，研文出版，1994，第192页）。李石曾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古典哲学的影响，但他的无政府主义和传统思想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差异（〔日〕嵯峨隆：《近代中国アナキズムの研究》，第141～142页）。港台学者一般认为吴稚晖是一位“反理学的思想家”或“反理学的士大夫”（参见郭湛波《近代中国思想史》，龙门书店，1973，第215～222页；李文能：《吴敬恒对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的影响》，正中书局，1977；张文伯：《吴稚晖先生传记》，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等）。



的普遍法则即科学、真理的同义词，还有，“良心”在这里指一种自然道德。在这里，我们注意的是，与刘师培相反，新世纪派常用的一些传统语汇具有自己的特色。例如，李石曾认为进化淘汰过程中生存者不谓“强者”，是谓“良者”。在有关“良”这一概念规定的部分中说，“于进化淘汰之理言之，惟良者存……良则存，公理也；不良则亡，亦公理也，故求良而已……进化也、革命也无他，即求良也”<sup>①</sup>。有人曾提出，新世纪派的道德论一方面接受克鲁泡特金说的道德论——“互助是本能的、感情的产物”——为基本前提，而另一方面他们注意的是在互助、良心、博爱等的概念内含中的“知识”的因素<sup>②</sup>。这样的话，上述的“良心”不只是本能的感情的东西，并且是一种包括知识的东西。近代时期思想家的有关翻译及其现代词汇问题，可以说是为了理解近代社会思潮应重视的一个关键问题。

## 2. 以无政府教育代替宗教

**论道德、教育** 在20世纪初的革命思潮中，新世纪派社会革命论中的政治主张无疑是最为激进的，它可谓是政治激进与文化激进集于一体。该派把社会革命分为政治、经济和道德三大方面。其中，道德问题包括相当程度的广泛内容，他们主张的“道德革命”和在本章中的“文化革命”的含意差不多相同。新世纪派对于创立一种无政府主义的伦理学说非常重视，认为伦理学说不仅是整个无政府共产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在他们看来，一种具有指导作用的道德原理和崇高的道德理想是进行社会革命和建设无政府

<sup>①</sup> 真民：《进化与革命》，《新世纪》第20号，1907年11月2日。

<sup>②</sup> 〔韩〕朴济均：《中国‘巴黎小组’（1907～1921）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实践》，庆北大学校博士学位论文，1996，第37～48页。

共产主义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其实，新世纪派并不是近代时期道德革命的最早提出者，梁启超早就公开而明确地提出道德革命的口号。他的《新民说》的中心思想就是通过国民的自新即通过国民道德的改良、提高，来实现社会的改造，实现国家的富强，它可以说是一种道德决定论。梁启超提倡的“公德”和“私德”概念是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边沁、穆勒、斯宾塞等的伦理观影响的结果。但他的国民概念更接近于以集体主义取向为核心的古代希腊的国民，而不接近于以个人主义作为一个重要因素的近代国家的国民<sup>①</sup>。

与此相反，巴黎中国无政府派不仅仅注意于以个人自由为中心的个体意识的解放，更注重于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博爱为原则的整体意识的高扬。他们是在“性善说”的观点基础上认为人性的本质是“爱”的。并把“爱”分别为“有情之爱”（父母、子女、昆弟、姊妹、亲戚）、“无知识之爱”（君臣、国家、种族）和“有知识之爱”（博爱）。其中“真爱”就是“博爱”。“有知识之爱”出于天然，而根于良心。褚民谊说，“无亲无疏，互相扶助，四海一家，天下大同，无君臣、父子、夫妇、昆弟之别，只有朋友之爱，爱以是为博”；“人类平等，享受共同，无国界种界之分，只有人类之爱，爱以是为博”<sup>②</sup>。新世纪派把这种“人性博爱论”用来重新阐释西方资产阶级道德。例如，“故己不愿受强权，而亦不忍强权人也，是谓平等；己不愿受压制，而亦不忍压制人也，是为自由；不欲人之私利，而亦不欲私利一己也，是为博爱”<sup>③</sup>。另外，吴稚晖是在唯物论与互助论结合过程中反复

① [美] 张灏 (Hao Chang):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 (1890~1907)》 (1971年作),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3年翻译版, 第155页。

② 民: 《续普及革命》, 《新世纪》第23号, 1907年11月23日。

③ 民: 《续无政府说》, 《新世纪》第47号, 1908年5月16日。

强调了物质的“力”、生命的“力”，而褚民谊则把这种“力”和“爱”两者结合后提出所谓“爱力”（或“吸力”）概念。他宣传的所谓“爱力说”是自己以生命活力为基础的伦理观念。如此，新世纪派的平等、自由、博爱概念及对“爱力”的认识可能是受除克鲁泡特金外还有法国伦理学家居友（J.M.Guyau）的影响。中国无政府派可以说是近代时期最注意“个人”自由的一个派别，但与其他中国近代思想家一样，在他们的道德观里具有较重视“群体”的思想倾向。

吴稚晖在《谈无政府主义之闲天》的一篇文章中论述道：

无政府三个字，乃世间最吉祥的名词……果其互相消除国界，即最粗浅之一端。各舍其万有不同之文字，公用一种文字，用其全力之七八，予人以科学之智识，更用其二三。教以无政府之道德，行如是之教育，课将来之效果，虽欲不无政府而不得。无政府者有“道德”而无“法律”；惟“各尽所能”，而不可谓之“义务”；惟“各取所需”，而不可谓之“权利”；人人“自范于真理公道”，而无“治人与被治者”；此之谓无政府。<sup>①</sup>

从上面引文中，我们很容易看到新世纪派对科学、道德及教育的深信，以及无义务、无权利的无政府伦理观。新世纪派认为科学、道德和教育三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分的关系，无政府道德通过无政府教育实现其价值，而无政府教育其构成内容也就是科学和道德教育。当然，如上述科学与道德也是相互密切联系，甚至是同一性格。与这些无政府主义价值相对立的价值就是宗教和迷信。它们是非科学的、伪道德的、伪教育的东西。新世纪派谈到

<sup>①</sup> X与X：《谈无政府之闲天》，《新世纪》第49号，1908年5月30日。

道德与宗教的关系时，有人也承认平等、博爱的良德是宗教内容中的“一个部分”。但认为“改良宗教”仍然是宗教，不能代替道德。还有，从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来说更是势不两立，认为“科学求真理，而宗教尚妄诞；科学重实验，而宗教尚虚伪”<sup>①</sup>。那么，无政府派以科学、道德代替宗教的具体方法是什么？他们共同提出的答案就是“教育”。褚民谊在有关教育和革命问题中谈到，“今世纪，科学日以（益）发达，真理日以（益）显明，当以正当的教育代宗教，以真理的科学破迷信，而不当以宗教代教育替科学也。不知出此，而惟斤斤以宗教为补救之道，其谬误为何如哉”<sup>②</sup>。作者认为有政府的教育与人道不合，应当以无政府教育代替宗教。他还认为，“道德本于行为，行为本于心理，心理本于知识，是故开展人之知识，即通达人之心理也，通达人之心理，即真诚人之行为也，真诚人之行为，即公正人之道德也。教育者，开展人之知识也”<sup>③</sup>。

中国无政府派认为教育手段应当列为社会革命方法中的首位。特别对新世纪派来说，暗杀、革命军的武装起义、总同盟罢工等实现无政府革命的方法都较重视，但这些都不是最完善的革命方法。他们首先强调的是“以书报为传达”和“以演说为鼓吹”的革命宣传方法，并且他们只是在促进建设无政府主义社会范围内，而选择了其他暴力强制的方法<sup>④</sup>。巴黎无政府派认为中国革命必须依靠暴力革命，但立即消灭国家是不可能的，而只能通过渐进性的改革，并要进行长期的解决。有关革命方法的代表性文章是吴稚晖写的《无政府主义以教育为革命

① 民：《再续普及革命》，《新世纪》第18号，1907年10月19日。

② 民：《再续普及革命》，《新世纪》第18号，1907年10月19日。

③ 民：《续无政府说》，《新世纪》第41号，1908年4月4日。

④ 参见汤庭芬《关于新世纪派的“社会革命手段”问题》，《江汉论坛》，1985年第12期。

说》一文，他说：

无政府主义之革命……即以教育为革命而已。其实日日教育，亦即日日革命。教育之效果小著，略改社会之小习惯，即小革命，在中国人近日习惯之名词，不以为革命，止曰改良，或曰改良社会。教育之效果大著，骤然全体争改易其旧习惯，即大革命，在中国亦以为革命，不曰社会革命，即曰某某革命……直无所谓革命有造成之一日。真理公道，日日倾向于进步，即教育须臾不可息，亦即革命无时可成止。<sup>①</sup>

吴稚晖认为正是传统科举制度的矛盾和对西方新文明的无知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后。他认为为了在中国实行社会革命，必先普及革命思想，即通过教育手段，传播革命真理，使社会革命成为人人自觉的革命。他认为教育的好坏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之标志。那么，无政府教育的实际内容是什么？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谈道，“无政府主义者，其主张即唤起人民之公德心，注意于个人与社会之相互，而以舍弃一切权利，谋共同之幸乐……革命者，不过教育普及以后，人人据弃其旧习惯，而改易一新生活，乃为必生之效果”<sup>②</sup>。由此认为，“公德者，乃教育之极，则有教育与无教育之分别，即可以毫无公德心与富于公德心为断”<sup>③</sup>。他所说的公德心包括平等、自由、博爱、真理、公道等的价值而

① 燃：《无政府主义以教育为革命说》，《新世纪》第65号，1908年9月19日。

② 燃：《无政府主义以教育为革命说》，《新世纪》第65号，1908年9月19日。

③ 燃：《无政府主义以教育为革命说》，《新世纪》第65号，1908年9月19日。

排除功名之心、利害之见等的私德心。这样，他的教育观的核心在于对人的思想改造上，对人类施行真理化公道的教育，提高了全世界的公德心，无政府社会也就必然到来了。吴稚晖重视教育并“以教育为革命”的观点，不是在法国吸收无政府主义后突然提出来的，其起源应在他在上海时期的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运动时期就已经产生了<sup>①</sup>。

吴稚晖的教育认识给了李石曾、褚民谊等人以深刻影响，褚民谊说“教育者，实人力的进化之原动力”<sup>②</sup>。又说，“私学者何，谋生养家富国强种（一种族）之学也……公学者何，图社会之改良，谋世界之进化之学也”<sup>③</sup>。他把学问分为“公学”和“私学”两种，据“本于良心，合于公理”批判私学。褚民谊甚至认为，“教育而不革命，则所教育者，总无新象；革命而无教育，则所革命者，总无良果。吾谓人力之进化之所以必有积极的教育与消极的革命并行者，此也”<sup>④</sup>。这样，在无政府社会建设过程中教育是“积极”的方法，而革命是“消极”的方法。李石曾写的同一题目的两篇文章《谈学》（第7号和第21号）中提出了他对教育问题的看法。前一文中他认为改良社会的方法是“传达主义”（公理）和“增长智能”（科学）两种，通过“传达主义”和“增长智能”等的表达强调了自然科学和新道德等的现代学问接受的必要性。他简单地概括说，公

① 上海时期，吴稚晖思想的特点在两个方面，即重视教育而信赖学生。当时他认为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因此反对康有为的孔教运动。并且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之间主导权纷争时，吴稚晖由于强力支持学生的立场，因而与教育会的章太炎之间发生了纠葛和对立（〔日〕嵯峨隆：《吴稚晖の出发》，《东亚》227号，1986年，第40页）。

② 民：《续无政府说》，《新世纪》第41号，1908年4月4日。

③ 民：《千夜杂说》，《新世纪》第21号，1907年11月9日。

④ 民：《续无政府说》，《新世纪》第47号，1908年5月16日。

学（纯科学、论理学）即科学，私学（政法、词章）即非科学<sup>①</sup>。后一文中李石曾又强调科学教育的必要性而进一步批判“政法”（官学）。他把学问分为“真学”和“伪学”两种，然后对为功名利禄而求学问和为祖国主义而求学问进行了批判<sup>②</sup>。新世纪派主张的学问是“新”的近代学问，而它的性格是与传统学问相对立的。

综上所述，新世纪派认为中国社会问题起因于中国人的无知，为了克服这种无知而迫切需要西方近代知识。同时认为知识由学问中产生，而学问由教育中产生。因此，“教育普及”就是巴黎无政府派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另外，与互助论一样，新世纪派的无政府教育论显然是受到了克鲁泡特金的教育思想影响。由此，他们强调肉体劳动和精神劳动的结合，以及强调劳动者和知识分子的结合，这些思想一直贯穿在他们民国时期的教育运动之中。一面劳动一面学习的“勤工俭学”模式在这时期已经由他们介绍并开始进行部分的实践。新世纪派所谓“以教育为革命”说在民国成立后成为他们活动的重要构成部分。

**论宗教、迷信** 西洋无政府主义者厌恶并排斥宗教的压制和拘束。例如，蒲鲁东强烈地主张真正的道德就是从对宗教和神的斗争中来实现，巴枯宁也认为如果没有宗教，那么国家就不能存在。他们批判的焦点不是宗教本身，而更注意的是教会的组织和制度。因为教会就是一切权威的重要来源，它桎梏了个人的价值判断和感情表现。同时它结合世俗的政治权力后，使国家行为合理化。克鲁泡特金是国际性的一位自然科学家，所以他从自然科学角度上进行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样，新世纪派主张的道德革命的实质内容就是以无政府道德代替宗教。

① 真：《谈学》（一），《新世纪》第7号，1907年8月3日。

② 真：《谈学》（二），《新世纪》第21号，1907年11月9日。

新世纪派对宗教的批判与无宗教主张从《新世纪》创刊时期就已经开始。他们在进化论基础上将科学与迷信对立起来，认为鬼神、天、上帝及祖宗崇拜就是野蛮时代的宗教或迷信。吴稚晖在《宗教问题》一文的按语中把有宗教和无宗教问题转变为宗教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并对立起来：“社会主义，亦可云非宗教主义，宗教主义亦可云非社会主义。”<sup>①</sup>他认为宗教就是人和怪物之间的主义，而社会主义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主义。传统时代宗教利用所谓的道德而抑压其所不利于宗教的东西，到现在人类在通过“良德”扩充的进化过程中，渐渐成立社会主义而渐渐开始反对宗教主义。他认为三纲五常等的“旧道德为宗教主义”，无我博爱等的“新道德为社会主义”<sup>②</sup>。褚民谊也认为宗教是野蛮过渡时代的产物。他谈到：“有宗教，则革命不得普及；欲普及革命，不得不反对宗教。有宗教，则科学不得发达；欲发达科学，不得不反对宗教。故反对宗教，一以普及革命，一以发达科学，诚对于社会之急务矣。”<sup>③</sup>这样，为了普及革命和发达科学不可不反对宗教。另一篇文章中，褚民谊利用吴稚晖在《宗教问题》中的宗教观，批评梁启超宣传的“改良宗教，以造就人格”式议论<sup>④</sup>。因此，新世纪派对无神论的信念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思想家中的最早代表。该派与康有为等人不同，他们的科学主义以理性主义的西方形式来反对一切宗教，特别是在传统儒教的宗教化、国教化问题上。如果儒教成为宗教或国教的话，它就会排斥异说而使国家成为一个专制

① 某君由北海道、燃案：《宗教问题》（一），《新世纪》第54号，1908年7月4日。

② 某君由北海道、燃案：《宗教问题》（二），《新世纪》第55号，1908年7月11日。

③ 民：《再续普及革命》，《新世纪》第18号，1907年10月19日。

④ 民：《续无政府说》，《新世纪》第47号，1908年5月16日。



国家。在这里，我们注意的是新世纪派把传统儒教视为一种宗教意识形态，这种观点成为他们对儒教进行批判的根据。

巴黎无政府派认为构成宗教的主要因素就是鬼神、迷信、虚伪等。褚民谊说，“宗教者，亦有其特素特味特性也。宗教之素者，鬼神也；其味，迷信也；其性，虚伪也。以重科学、凭公理之社会主义较，何啻霄壤之隔”<sup>①</sup>。这样，在作者看来，宗教的“有鬼神，重迷信，贵虚伪”的主张，不利于科学昌明时代的社会发展，也曾有碍于野蛮时代的社会进化。李石曾也说，“与科学及公理为反对者，即迷信与强权也。于宗教中，用祸福毁誉之迷信，行思想之强权。于政治中，用伪道德之迷信，行长上之强权。于家庭中，兼容以上之两种迷信，行两种之强权”<sup>②</sup>，吴稚晖同样说，“科学者，进化之利器也；迷信者，思想之桎梏也。二者固绝对的不同物。以有科学之发明，故始有今日之文明；以未行迷信之革命，故仅止于今日之文明”<sup>③</sup>。作者强调人类欲进于幸福，必先破除迷信。“迷信”是“世界强权所基”，“迷信”又必借助“恐惧”；“恐惧”又是来自于对未知力量的无可奈何，即宗教的恐惧。还有，“不信鬼神”，这也是早期无政府主义者的鲜明特点。他们认为鬼神观念的发生原因是在从对祖宗神灵的崇拜、教主圣贤的宣扬、家族社会的影响、统治阶级的利用中遗传来的。鬼神不过是“妄想”、“想象”、“幻语”，它是古人因不懂得近代科学而“创造”的东西<sup>④</sup>。

新世纪派进一步批判传统的“天”和“上帝”等的观念。李石曾说，“古人生于天地间，而不知天地为何物，闻风雨而惊，

① 民：《续无政府说》，《新世纪》第47号，1908年5月16日。

② 真：《祖宗革命——家庭革命之一》，《新世纪》第2号，1907年6月29日。

③ 绝圣：《排孔证言》，《新世纪》第52号，1908年6月20日。

④ 参见肖万源《中国近代思想家的宗教和鬼神观》，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第248～264页。

见日蚀月蚀而惊，凡一切不能解者，皆归之于上帝。故上帝者乃凭人之妄想，而创造者也”。作者认为古人因为没有天文学知识，所以不能解释自然现象，则归结为“上帝”。还提出，“后来之人，不识先人为何物，不知其死何之，深夜闻声而惊，中宵梦思而惊，凡一切无可考证之谬想，皆归之于祖宗之神灵”<sup>①</sup>。认为古人因为没有生物学知识，所以不能理解生理现象，则归结为“神灵”。最终宣言“上帝”和“神灵”两者都是“凭人之妄想、而创造者也”。吴稚晖同样认为“天”的“运命”将会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昌明而“告终”，认为人格神的“天”是不存在的，“天”不过是物质，是自然界。人格神的“天”与人事没有关系<sup>②</sup>。有趣的是新世纪派已经将“上帝”与“神灵”两者联系起来准备攻击中国传统中的封建文化主要因素即“祖宗”。如上所述，信仰唯物论思想的新世纪派头脑里不存在着宗教性的迷信、鬼神概念。同时他们全面否定了传统的“天命”、“天子”等的存在而批驳了君权神授论等。

提倡科学、道德革命的新世纪派，对中国传统文化提出的第一次革命口号就是“祖宗革命”，其最初文章是李石曾写的《祖宗革命》（第2号和第3号）一文。其中，李石曾大胆地宣言：

祖宗迷信之反背科学，有伤公理，为知道者所最不能堪者也。革命无非为求伸公理而已。然支那人生平最早所遇不

① 真：《祖宗革命——家庭革命之一》。

② 吴稚晖对“天”的起源来说：“天，野蛮之崇拜风雷日月，不必其为天也，即彼认为天之创造能力之所寄，苟稍神奇者，已僭伏而莫敢或狎，此亦必为世人所公认。当此之时，则天之威力最尊，嗣是天有民德之可以相胜，天有魔鬼之足以相忧。求天之故愈多，而褻天之情亦见”（四无：《无父无君无法无天》，《新世纪》第52号，1908年6月20日）。

合公理之事，未有如崇拜祖宗者也。是故祖宗革命，为支那革命党之〈初学试验品〉无疑。若生于新世纪，其智力不能知祖宗迷信之谬妄，吾敢断其无新世纪革命党之资格！若已知祖宗革命之正当而不肯实行者，是甘心服从专制，反对公道，吾亦敢断其非新世纪之革命党！<sup>①</sup>

作者在上述文章中充分地表达了对近代科学的坚决信念和对传统迷信的强烈愤怒。对于祖宗他认为，近代科学告诉我们“祖宗仅为传种之古生物”，而“吾之祖宗非他，即已亡之生物”<sup>②</sup>。这样，祖宗没有神灵。说祖宗有“神灵”作用，是违反科学事实的。李石曾还列举祖宗迷信的四大罪恶：第一，“反背真理，颠倒是非”。阻碍知识之改良，阻碍人民之进化；第二，“肆行迷信之专制，侵犯子孙自有之人权”；第三，“耗民力民财于无用之地”。富贵者丧祭之浪费，无形之中伤害民生；第四，“攘夺生民养民之源”。攘可耗之田为墓地，忍听耕者之流离。如此，祖宗迷信之罪恶，皆由人为，“不主祖宗革命者非自愚则自私”，“凡有道之革命党必主张祖宗革命”。祖宗革命的方法是：通过舆论宣传，破除千万之迷信；以公理拒斥含有祖宗迷信性质之礼仪；平坟墓，火神牌，以为警世之钟和传布之法；从自身做起，以科学及公理为务，不再施行祖宗崇拜<sup>③</sup>。在新世纪派看来，祖宗迷信是强权政治的思想基础，是政府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他们与中国同盟会的革命派不一样，批评了有些同盟会员（可能是国粹派）崇尚黄帝及汉民族始祖的各种行为。例如，李石曾在《民报》记载的章太炎演说

① 真：《祖宗革命——家庭革命之一》。

② 真：《祖宗革命——家庭革命之一》。

③ 真：《续祖宗革命》，《新世纪》第4号，1907年7月13日。

文批评中谈道，“此文<sup>①</sup>实具三种迷信。一崇拜帝王，二崇拜祖宗，三仇视异族。此实吾辈所谓旧世纪之革命矣”<sup>②</sup>。所以，他们在进化论的角度上提出的“吾祖宗之程度，不及吾人”，这“尊今薄古”的态度成为新世纪派反传统主义文化观的重要基础。

## 第二节 尊今薄古：家庭，三纲，孔子，女性

### 1. 家庭、三纲及“孔丘之革命”

《新世纪》初期以报纸形式（每次4页）出版，自第53号（即第二年第1期）以后以书册形式（每册14页）出版，同时字体增大和版面增多。大概到1908年夏天，他们更增加了对文化方面的关心和注意，因此，有关反传统主义的文化问题的文章渐渐增加。如果说《新世纪》初期文章比较注重无政府主义理论宣传及其原理传播的话，这时期相对来说比较注重于对传统文化的无情批判。这种现象与《新世纪》后期加重有关批判清朝及批判中国现实政治的倾向对照起来，可以说成为它的一个特色。新世纪派对待文化问题的最大特点在于利用西方理论来适用于中国的实际，他们展开了对中国封建文化体系性的批判并对此一直保持

① 李石曾批判章太炎的演说部分是：“以皇祖轩辕之灵，洋溢八表……白日有灭，星球有尽，种族神灵，远大无极。敢昭告于尔丕显皇祖轩辕烈祖金天高阳禹辛陶唐有虞夏商周秦汉新魏晋宋齐梁陈隋唐梁周宋明延平太平之明王圣帝，相我子孙，宣扬国光……我先皇亦永有依归”（民意：《纪十二月二日本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事及演说辞》，《民报》第10号，1906年12月20日，第81~82页）。

② 真：《续祖宗革命》。

着否定态度。该派在宣传西方无政府主义时，自然感到在中国阻碍个人绝对自由的主要障碍是封建的宗族宗法制度、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以及体现这种制度的理论根据即孔子学说。因此，他们大力宣传“祖宗革命”、“家庭革命”、“三纲革命”和“女界革命”，并主张“孔丘之革命”。认为长期统治人们头脑的崇拜祖宗、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等观念，都是不脱迷信的习惯，违背科学，有伤真理，是维护强权，必须彻底革除，以“助人道进化”。他们的这种认识具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sup>①</sup>。

**家庭——强权的基础** 新世纪派的所谓“公理”是科学的和进化的必然。公理主要反对的是一切形态的“强权”。强权不仅指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帝王、贵族及臣仆，甚至包括一切官吏。同时它还包括尊卑、贵贱、贫富、智愚、男女阶级的有形与无形差别的制度和思想，例如政府、议会、法律、纲常、伦理、宗教、祖宗、迷信与风俗等，其中一个突出的批判对象就是传统家族制度，他们认为传统家庭是专制强权的基础。无政府主义者抨击家庭是因为它不仅对其成员造成抑压，而且与国家一样，它本来是反社会的东西<sup>②</sup>。康有为前此几年已经在《大同书》中指出，家庭是人类诸苦的根源之一。他在《大同书》中论述到：

夫欲人性皆善，人格皆齐，人体得养，人格皆具，人体皆健，人质皆和平广大，风俗道化皆美，所谓太平也。然欲致其道，舍去家无由。故家者，据乱世、升平世之要，而太平世最妨害之物也。以有家而欲至太平，是泛绝流断港，而

① 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二卷：中国同盟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248页。

② 笔者认为新世纪派以科学、公理为批判迷信、强权的两个主要对象就是国家和家庭。

欲至于通津也。不宁唯是，欲至太平而有家，是犹负土而浚川，添薪以求火也，愈行而愈阻矣。故欲至太平独立性善之美，惟有去国而已，去家而已。<sup>①</sup>

因此，在康有为设计的大同社会中，家庭已经不复存在。认为要“去产界”、“去级界”，乃至“去国界”，都必须首先“自去人之家始”。在他看来，人有了家庭，就会产生自私之心，“必思所以富其家而传其后”，于是，人本来的善性就会变恶。“家者，据乱世、升平世之要，而太平世最妨害之物也”，“欲至太平大同，必在去家”<sup>②</sup>。“去家界为天民”被康氏认为是致“大同”的最重要的理论<sup>③</sup>。以后他的弟子梁启超说《大同书》“全书数十万言，于人生乐苦之根源，善恶之标准，言之极详辩，然后说明其立法之理由。其最要关键，在毁灭家族”<sup>④</sup>。这一句概括充分地说明康氏著述《大同书》的目的。《大同书》所提出的大同社会与新世纪派设想的无政府社会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对两者之间文化观进行比较是较有益的。

新世纪派与康有为同样认为家庭是“万恶之源”。他们主张

① 康有为：《大同书》己部《去家界为天民》，朱维铮主编《康有为大同论二种》，三联书店，1998，第249页。

②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又谈到：“故全世界人欲去家界之累乎？在明男女平等各有独立之权始矣，此天子人之权也。全世界人欲去私产之害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子人之权也。全世界人欲去国之争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子人之权也。全世界人欲去种界之争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子人之权也。全世界人欲致大同之世、太平之境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子人之权也……”（康有为：《大同书》庚部《去产界公生业》，朱维铮主编，《康有为大同论二种》，第315页）。

③ 参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第136~142页。

④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24，中华书局，1954。

无政府革命应当从摧毁家庭组织结构开始，其代表性文章就是作者名为“鞠普”写的《毁家谭》一文。在文章中提出：

原人之始，本无所谓家也，有群而已。自有家而后各私其妻，于是有夫权。自有家而后各私其子，于是有父权。私而不已则必争，争而不已则必乱，欲平争止乱，于是有君权。夫夫权、父权、君权，皆强权也，皆不容于大同之世者也，然溯其始，则起于有家，故家者，实万恶之源也。<sup>①</sup>

作者认为家庭妨害进化。在原始社会，并没有家庭这种组织形式，只有男女混杂的人群，既没有私有观念，也没有强权。而夫权、父权、君权都是以家庭为基础产生出来的强权，这种强权一旦形成之后，人类社会就出现了种种不平现象。另外，作者认为家庭束缚自由、造成了不平等。他说，“治水者必治其源，伐木者必拔其本”，“人生天地间，独往独来，无畏无惧，本极自由也。自有家而奔走衣食，日不暇给矣。自有家而悲欢离合，百苦丛生矣。家之为累，固人人能知之，人人能言之”，“人类本极平等，无所谓富贵贫贱也。自有家而传其世职，受其遗产，于是阶级分矣。自有家而农之子恒为农，士之子恒为士，于是智愚判矣”<sup>②</sup>。因此，要想得到“去强权”、“欲得自由、平等”，“必自毁家始”。新世纪派反复强调“家庭者，实亦专制政府之胚胎也……实社会革命之要端而人道进化之表证也”<sup>③</sup>。

有趣的是，上述鞠普的文章内容与天义派的“家族革命论”很相似。《新世纪》中的《毁家谭》（1908年5月30日）与《天

① 鞠普来稿：《毁家谭》，《新世纪》第49号，1908年5月30日。

② 鞠普来稿：《毁家谭》，《新世纪》第49号，1908年5月30日。

③ 革新之一人、真译《续革命原理》，《新世纪》第30号，1908年1月18日。

义》报中的《毁家论》（1907年7月25日）所说的家庭革命，强调的地方都是伦理观念的根本变革，由家庭伦理转为社会伦理，使父子兄弟夫妇之间“互尽其伦理”，矫正过去的不平等关系，“而使之均平耳”。信奉社会平等既是无政府主义者呼吁个人解放的基础，也是他们批评家族主义的前提，这使得他们开辟了中国社会思想的新世界。并且两者不但都主张“家庭解体”，而且主张“不婚之说”。更有趣的是，在《新世纪》第36号《续革命原理》（1908年2月29日）中，已经介绍了《天义》报第4卷记载过的《毁家论》一文。由此观之，这两文之间可能存在一种继承关系。

《毁家谭》一文的解体家庭的主张大体上反映了当时新世纪派的家族观，它与康有为《大同书》的家族观也很相似，但康有为部分肯定了家族的存在意义。他反复说“家为人类相保之良法”，而“虽无国无身而未有无家者也”<sup>①</sup>。这种现象在《大同书》里处处可见。另外，在有关国家问题上，康有为《大同书》中认为“夫有国者，人道团体之始，必不得已，而于生人之害，未有宏巨硕大若斯之甚者也”，所以他提出首先去除军队和国界后建设世界政府的设想。对此，中国无政府派认为，在“政府者万恶之源”的观点上建立世界政府的设想不过是“以暴易暴”。这样，两派之间在对待政府存在与否的态度上存在较明显的差别。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家庭”问题的批判，是与其对封建意识形态的“三纲”以及它的提倡者“孔子”及其主要的受害者“女性”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这一切具体地表现在《新世纪》的众多文章之中。

**封建礼教和三纲革命** 有关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已经在变法派思想中比较明确地表现出来。19世纪80年代康有为怀疑封建等级制度，当时，他反对封建家族制度，反对男尊女卑、夫为妻纲

<sup>①</sup> 康有为：《大同书》已部《去家界为天民》，朱维铮主编《康有为大同论二种》，第230页。



的封建伦常，要求实现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和个性解放。到戊戌变法时期，谭嗣同对封建伦常的批判主要表现在“君为臣纲”的价值体系中，他的战斗性的伦理观反映了当时一些有识之士的移风易俗的观念。到20世纪初，梁启超提倡的“新民说”也是强调新时代新国民的伦理道德，与戊戌时期伦理观相比可以说已形成一个意识形态。但变法派对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的批判又无法突破他们自身的思想局限，他们尽管激烈地批判“三纲”，但同时又在现实中不同程度地承认它的某些“合理性”。例如，康有为对自己家庭就充满着“孝”的观念，所以，他又自相矛盾地对封建亲子关系中的“孝”的必要性进行辩护。他说，“故人子而经父母之顾复、抚育、教学者，宜立孝以报其德，吾取中国也，吾从孔子也”<sup>①</sup>。谭嗣同反对封建礼教的激烈程度，超过了同时代的康有为等人，但他对于君主问题，一方面指责“君为独夫民贼”，暴君“皆大盗也”，另一方面又赞扬光绪帝“圣恩高厚”，并且表现出应“救我圣主”等的矛盾态度。梁启超也认为，光绪皇帝与古今的专制皇帝根本不同，他是“真能以子弟视其民”的开明君主，好似“慈母”一般，在这位“圣君”的统治下，爱国和忠君是一致的<sup>②</sup>。因此，从康有为的“孝”观念及变法派对光绪帝的同情感中可以看到他们对三纲批判的不彻底性。

与此相反，新世纪派与变法派比较起来，批判的程度则更激进、更根本。他们认为，以古人“为万岁标准”的中国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是阻碍西方革命文化输入传播的思想障碍。其中纲常名教是封建文化的核心，无政府主义者呼吁进行纲常伦纪革命。《新

<sup>①</sup> 康有为：《大同书》己部（去家界为天民），朱维铮主编《康有为大同论二种》，第237页。

<sup>②</sup> 张岂之、陈国庆：《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中华书局，1993，第173页。

世纪》所发表的有关封建礼教激进主张的代表性论文是“四无论”，即“无父无君无法无天”。作者认为这四个“无”“乃成立无政府之要素”。君、天、父、法分别代表了野蛮时代人们对君权、神权、父权、强权的隶属关系。又认为，“无君与无天两事，不必待无政府时代，而革命已告成功”，但“无父与无法二要素，而无政府之成立，尚无其期”。还有，就这四者的关系来说，“‘君’者无理由之‘法’，‘法’者有理由之‘君’”，“‘天’者无凭据之‘父’，‘父’者有凭据之‘天’”<sup>①</sup>。巴黎无政府派认为，“四无”中应以消灭所谓“圣人”为目的。孔丘、孟轲的圣人徽号，是经过宋、元朝朱熹等理学家改良，使圣人迷信、圣人崇拜本来不是传统而变为“铁铸”的传统。在这里，我们直接看到的是新世纪派攻击封建礼教的重要批判对象就是“三纲”和“孔子”。

巴黎无政府主义者在《三纲革命》一文中正式提出了“三纲革命”的口号。作者李石曾从个人价值观出发彻底否定君臣、父子、夫妇的隶属关系，他从宗教迷信与科学真理的对立角度上提出了君为臣纲与“人人平等”、父为子纲与“父子平等”、夫为妻纲与“男女平等”的对立格局。首先，以“君为臣纲”问题来说，李石曾批评说，“君与臣皆野蛮世界之代表，于新世纪中，君与臣皆当除灭。惟有人与社会，人人平等”<sup>②</sup>。吴稚晖也说，“绝无关系之‘君’，全恃强权成立者，乃首先推倒”<sup>③</sup>。持“排满不若言排皇”激进主张的新世纪派已经超越了立宪派和共和派较注意的君臣问题。由此，他们对君为臣纲这一问题不太感兴趣。

其次，事实上在李石曾的《三纲革命》一文中最注重批判的是“父为子纲”问题。他说，“就科学言之，父之生子，惟一生

① 四无：《无父无君无法无天》，《新世纪》第52号，1908年6月20日。

② 真：《三纲革命》，《新世纪》第11期，1907年8月31日。

③ 四无：《无父无君无法无天》，《新世纪》第52号，1908年6月20日。

理之问题，一先生，一后生而已，故有长幼之遗传，而无尊卑之义理”。作者从生物学角度上解释父子关系，父子伦理也只是“皆非出于理，而出于势，势力即强权，乃反背真理者”<sup>①</sup>。因此李石曾是与进化论结合起来分析其父子相互之间的权力关系，他特别注重批判“父为子纲”中的“慈”和“孝”这一权力关系。他说：“父愿其子孝，且用强迫威骇以得之，而子变为奴隶禽兽矣，故孝者父之私利也。子欲其父慈，（产业）欲其有利与己，用媚以求之，或以孝之美名为升官发财之运动法，于前之说，（遗产）则父母为马牛，于后之说，（孝之美名）则父母为傀儡，故慈者子之私利也”。为了解决这种矛盾关系，李石曾在父子平等的原则上提出了两者之间的合理关系，他说：“子幼不能自立，父母养之，此乃父母之义务，子女之权利。父母衰老不能动作，子女养之，此亦子女之义务，父母之权利。故父母子女之义务平、权利等。故父母之子女，无非平等而已，此即自然之人道也”<sup>②</sup>。吴稚晖也同样地说：“人类者，当改良而为完全有爱情之一物。其时不但父子可废，即朋友之名，亦在消除之数。是父之运命，不久必将告终”<sup>③</sup>。这里我们想起以后新文化运动时期吴稚晖和陈独秀关于“孝”的争论。

再次，以“夫为妻纲”问题来说，《新世纪》跟《天义》报一样，在不少文章里谈到夫妇关系及女性解放问题。例如，《女界革命》、《男女之革命》、《男女杂交说》、《女德篇》、《无家庭主义》等，这些文章都全面否定了夫为妻纲的现实意义。他们认为“男女之结合，不外乎生理之一问题”，甚至提出了实行完全自由恋爱而废止结婚制度的极端主张。上述文章中李石曾一直坚持

① 真：《三纲革命》，《新世纪》第11期，1907年8月31日。

② 真：《三纲革命》，《新世纪》第11期，1907年8月31日。

③ 四无：《无父无君无法无天》，《新世纪》第52号，1908年6月20日。

“父子平等”、“男女平等”、“人人平等”的观点。总体来说，新世纪派认为“三纲五常，中国惟一之道德”<sup>①</sup>，还提出，“所谓三纲，出于狡者之创造，以伪道德之迷信，保君父等之强权也”<sup>②</sup>。维护三纲就是维护强权，是与人人自由、社会平等的原则相违背的，更是实现无政府社会的巨大障碍。由此，三纲革命也应包含在新世纪派主张的诸革命之中。

**“行孔丘之革命”** 变法派批判封建纲常及三纲，但始终不敢正面攻击传统伦理学说的最高权威——孔子。除康、梁以外，甚至变法派中最急进的思想家谭嗣同也主张光大孔子之道和孔教，他只希望“孔教之有路德”，对它做一些改革。显然，他们是在继续尊孔的旗帜下批判封建纲常名教，但封建的纲常礼教同孔子和儒学是密不可分的。20世纪初，在革命派的有些文章中可以发现有关对孔子的批评。例如，1903年，《童子世界》的《法古》一文对于解放教条思想和冲破孔学束缚的问题，论述得既深刻又通俗。文章把历史上的孔子与帝王权贵们捧起来的孔子相区别，指出历代帝王推尊孔子都是为了要人们“尊君服从”的实质。1906年，《复报》的《中国尊君之谬想》一文，也谈到封建孔学与专制统治之间的联系<sup>③</sup>。但是，他们注重批判的是孔学和孔教而不是孔子本人。

《新世纪》创刊号在《此之谓中国圣人》一文中已经把孔子贬低而使用“孔丘”名称，并把他描写成为在野蛮时代中比别人多一些知识的一个人物<sup>④</sup>，实际上，这意味着新世纪派开始了对

① 民：《续无政府说》，《新世纪》第38号，1908年3月14日。

② 真：《三纲革命》，《新世纪》第11期，1907年8月31日。

③ 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第445～447页。

④ “圣人者，即野蛮时代最狡猾之一人，孔丘生在野蛮时代，能比别人多识得几个字，多通一点世故，略晓得一点人道”（《此之谓中国圣人》，《新世纪》第1号，1907年6月22日）。

孔子的批判。其后，《三纲革命》（第11号）及《好古》（第24号）等文中，他们进一步指出“作纲常伦纪者，圣贤也”，因而主张“圣贤革命”<sup>①</sup>。这“圣贤”概念里包含着从孔孟到宋明理学家等整个封建时期的大儒。还有，“后世推重孔子为至圣，而排斥百家，奉孔门之一言一语为金科玉律，而不因时省察，不随事更化，徒株守拘泥”<sup>②</sup>。当时，新世纪派把儒学和孔子联系起来，用“科学”这一武器批判了过分夸大尊重孔子以及儒学内部的非科学性问题，但该派与其他革命派一样还没有达到对孔子“本身”的完全否定。到1908年6月，在《新世纪》（第52号）中的《排孔征言》一文明确地否定了孔子存在的现实意义<sup>③</sup>，这一文章可以说在近代比较全面地提出了反孔革命的口号。

支那者，政教混合之国也，亦恐惧，亦迷信，故至今日始梦吃立宪。为此厉阶者，非孔丘乎！孔丘之为宗教家否，吾不过问。惟自政府之所利用，人民之所迷信之一方面观之，虽喙长三尺者，能辨其无宗教之现象乎？呜呼，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以荼毒吾同胞者，二千余年矣。今又凭依其大祀之牌位，以与同胞酬酌。立宪党之如何舞蹈，吾不能知。独怪热心革命者，或发扬周秦诸子，或排斥宋元诸人，而于孔丘则不一注意。夫大祀牌位，一日不入火刹，政治革命，一日不克奏功，更何问男女革命，更何问无政府革命。擒贼先擒王，不之知，抑毋亦有所迷信乎！吾请正告曰：欲世界人进于幸福，必先破迷信；欲支那人之进于幸福，必先

① 真：《三纲革命》，《新世纪》第11期，1907年8月31日。

② 民：《好古》，《新世纪》第24号，1907年11月30日。

③ [日] 岛田虔次：《辛亥革命期の孔子问题》，《辛亥革命の研究》，筑摩书房，1978，第30页。

以孔丘之革命。<sup>①</sup>

作者“绝圣”（吴稚晖）认为“孔丘之革命”之所以必要，是由于长期以来，“孔毒之人人深，非用刮骨破疽之术不能庆更生”。因而他明确地提出“请行孔丘之革命，以破支那人之迷信”。同时攻击专制君主长期利用的孔学和康有为等头目提出的创立孔教的主张。另外《新世纪》笔阵也曾给予种种讥讽的批评。因此，巴黎无政府派共同认为孔子是封建文化的代表，孔学则是封建文化的堡垒，批判封建文化的出发点应是批判孔子及孔学（孔教）。所以，他们进行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象征物——孔子——的革命，这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先声<sup>②</sup>。

综上所述，新世纪派对家族制度、三纲伦理、封建礼教及孔

① 绝圣：《排孔证言》，《新世纪》第52号，1908年6月20日。

② 日本的岛田虔次认为，辛亥革命前夕，反孔子儒学的动向才在革命派中的无政府主义及社会主义派中开始出现。但仍未对“指名孔子儒教作集中的攻击”，并且认为“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中的反儒反孔运动，恐怕是清末革命派中这一派的直系”（〔日〕岛田虔次：《辛亥革命期の孔子问题》，第29～31页）。陈万雄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提出了相反意见。首先，革命派反孔反儒的思想言论早在20世纪伊始已出现，不待“革命前夕”而后然，甚至可以说是与革命思想同时发皇的。其次，革命派中的反孔子儒教观，也不囿于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系统。在无政府主义刊物出现之前，其言论之激切比之后现的无政府主义者亦有过之而无不及。再次，从思想的发展和人际的关系看，清末时代的所谓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系统的反传统思想之于五四时代，并无直接的承受关系（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第121～122页）：笔者认为，20世纪初革命派的反孔言论只是部分的而不是全面的。相反，新世纪派等中国无政府派的反孔言论则是与家族、三纲、女性、宗教、文字等整个封建文化联系起来进行总体性的批判。可以说，与其他革命派相比较来说更有体系性、更有根本性。还有，清末无政府派与“五四”时代新青年派之间具有密切关系，这一问题将在第5章中进行探讨。由此，笔者大体上同意岛田虔次的意见。

子问题的批判和攻击，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与变法派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文化革新论存在着继承关系，但同时不少问题上已经超过前人所说的文化革新。例如，上述新世纪派更根本地否定了祖宗崇拜、传统家族制度、父子之间“孝”、爱国忠君观念、孔子尊重倾向等。

## 2. 女界革命论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共同具有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妇女解放问题，新世纪派对女性问题的注意在《新世纪》创刊号《歌帖》一文中能够看到。作者通过“禁锢”这一词来描写女性受抑压的状态，以后，在该报登载的20余篇的文章专门谈到女性问题（参见表6）。新世纪派对家庭、夫妇、女性问题的看法与康有为的《大同书》<sup>①</sup>和刘师培、何震的《天义》报中的女性解放论有相似的地方。他们都认为，要废除家庭，最重要的是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并且在男女平等原则的基础上，主张恋爱自由和婚姻自由。他们构想的大同社会里，妇女占有同男子一样的地位，享受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在这理想社会中没有夫妻旧名，也就不可能有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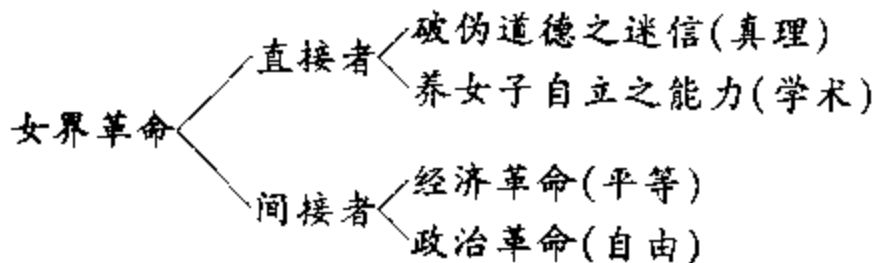
新世纪派高度评价女界革命的意义。在现实社会中“男女之不平等，实公理所最不能容者”<sup>②</sup>，“男女革命破伪道德为第一要图”<sup>③</sup>。与批判其他封建文化一样，他们在科学与迷信的对立角度

① 对于“夫为妻纲”，康有为批判得最为详细。他不但在《大同书》很多部章中，把批判“夫为妻纲”、宣传男女平等作为重要内容，而且以戊部《去形界保独立》的全部篇幅，庚部第十章《总论欲行农工商之大同则在明男女人权始》的全章篇幅，专论这一问题（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第237页）。

② 真节录：《女界革命》，《新世纪》第5号，1907年7月20日。

③ 真：《男女之革命》，《新世纪》第7号，1907年8月3日。

上批评了有关女子问题中的不平等和伪道德。该派的女子革命论具有两个重要的地方，即教育平等和经济独立。其一，教育方面：李石曾说，“女子之脑关，固无异于男子，故其智识亦不相上下”，“女子之能力，固不逊于男子”<sup>①</sup>。文章希望通过女子教育权的争取，打破伪道德的迷信而育成女子自立的能力。鞠普也曾作《女德篇》一文，为了打破对有关女性的普遍偏见，从慈善、名誉、爱情、坚忍、智慧以及勤劳等六个方面论证了女子优于男子，两人都为了给妇女解放寻找根据，强有力地批判了所谓“贞淫之说”。他们提出的是，女子与男子在天赋上并无差别，如能得到同样的教育，定会有相同的成就。其二，经济方面：李石曾说：“若经济之问题解决，则女子之自由自得，故经济革命，亦实女界革命之一大因也”<sup>②</sup>。作者认为在个人生活中经济问题和爱情问题最重要，其中男女平等可以从自由结合中实现，而自由结合则是从经济革命中开始的。认为正式妻和娼妓之差别不过只是贫富问题，娼妓和工人之差别也不过前者卖身体而后者卖劳动。新世纪派不但将女性解放问题跟教育平等相联系，而且认为经济自立的实现与否是女性解放的关键。另外，巴黎无政府派较早注意到妇女参政权问题<sup>③</sup>。李石曾提出的所谓“女界革命”列表<sup>④</sup>就是：



① 真：《续男女革命》，《新世纪》第8号，1907年8月10日。

② 真：《续男女革命》，《新世纪》第8号，1907年8月10日。

③ 参见醒、燃《英妇力争选举之运动》，《新世纪》第27号，1907年12月21日。

④ 真：《续男女革命》，《新世纪》第8号，1907年8月10日。



如此，关于实现女界革命的课题是：一、道德解放；二、教育平等；三、经济自立；四、无政府革命等四大原则。

新世纪派又提出了“自由恋爱”和“结婚废止”的种种主张。鞠普来稿《男女杂交说》一文中说：“不杂交者种不进”，“不杂交者种不强”，“不杂交者种不智”，“不杂交者种不良”<sup>①</sup>。这里“杂交”一词的含意就是不同种族间的通婚并且包括自由恋爱。在同一文章的按语中吴稚晖指出，男女结合应当完全出自爱情，甚至认为这种关系所生育的子女要优于包办婚姻之子女，而出自种族间混杂联姻的后代将更优良<sup>②</sup>。鞠普又说，“人群之不进化，爱情之不普及，实婚姻之未废也。今欲人群进，爱情普，必自废婚姻始”<sup>③</sup>，作者认为，男女结合由于两者之间的爱情，如爱情断绝应离开。这样，他们认为，婚姻制度是组成家庭的基础，若毁家必须废除婚姻制度。新世纪派还主张废除纳妾制度和娼妓制度等。另外，吴稚晖、李石曾等人批判西方女性，认为她们也不过是男性的一个玩偶。由此，他们最终要求废除婚姻而允许配偶双方自由离合。与《天义》报比较起来，在《新世纪》文章中有关压抑女性、虐待妇女等的暴露性记事不太多。

新世纪派在谈到恋爱自由、废除结婚问题中，他们常从生理学和卫生学角度上分析这些问题。例如，李石曾说，“男女体质及生理，除有关生殖器者，此外无异，男女生殖器中各含有特质，二质相合而为孕，缺一不可，由此而知男女之关系，无少轻重”，“男女之相交也，因无可限定之成例，如甲男与甲女交可生

① 鞠普来稿：《男女杂交说》，《新世纪》第42号，1908年4月11日。

② 鞠普来稿：《男女杂交说》吴稚晖按语，《新世纪》第42号，1908年4月11日。

③ 鞠普来稿：《男女杂交说》吴稚晖按语，《新世纪》第42号，1908年4月11日。

丙，如乙男与甲女亦可生丁，然则甲甲与甲乙之结果无异”<sup>①</sup>。吴稚晖又说，公娼问题“毫无廉耻之问题，止有卫生之问题。男女交媾，本为生理上之情欲，与饥食渴饮，同一绝不足奇之条件”<sup>②</sup>。有人曾提出，不管新世纪派如何宣传妇女需要自我改进以摆脱对男性家长统治的依赖，然而他们优越的男性意识却秘密地潜人其中<sup>③</sup>。

巴黎无政府派提出的女性解放的具体方法是，第一，提供男女自由恋爱结合的场所。“世俗以不正式结婚为苟合，以所育之子为私生，陋俗相沿，习非成是，故迫为婚礼耳。今使破除贞淫之说，复多设会场旅馆，为男女相聚之所，相爱而合，相恶则离，俾各遂其情，则必无乐于结婚者矣”。第二，通过女子教育而实现女子自立。“女子无教育，无事业，故有不能自立”，“今使大倡男女同校、男女同业之义，俾女子均能自立，必无有欲依赖男子，以受其压制者矣”。第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凡不婚之男女，平时则出其余财余力，以助公会，有事则人居公院，以生养休息，而公会公院一切职务，亦由不婚之男女自任之，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推而广之，“至以世界为一家”<sup>④</sup>。这些主张显然是为了唤醒封建儒教伦理、家族制度压制下的女性人格，这可以说是真正的女性解放运动的开始。新世纪派的恋爱结婚、废止结婚等的主张与天义派的女性解放论有相似的地方。但在女性经济自立及女性参政权等问题上与天义派的见解有所不同。其中

① 真：《男女之革命》，《新世纪》第7号，1907年8月3日。

② 初来欧洲者：《观娼感念》吴稚晖按语，《新世纪》第54号，1908年7月4日。

③ [美] 费侠莉 (Charolitte Furth)：《思想的转变：从改良运动到五四运动 (1895~1920)》，见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翻译版，第409页。

④ 鞠普来稿：《毁家谭》。

原因可能是与该派活动的地方——巴黎——具有直接的关系，他们受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更正统、更原则。

巴黎无政府派除了对封建礼教、三纲、孔子及女性抑压的理论进行批判以外，他们还旧风俗及社会恶习展开了生动的批判。在《新世纪》中辛辣地批判了从阿片、肉食、奴隶、人力车、死刑制度及饮酒问题到辫发等的社会问题。其实，该报论调中的一个特色是，除了纯粹理论性的著述以外，作者们还通过露骨的讽刺和比喻等方法，让读者很有兴趣地接受反传统主义宣传，这种记述方法大多数在有关国粹及清朝的诘难文章中能够看得到。而吴稚晖可以说是这种通俗文学的叙述方法的代表人物。在《新世纪》文章中，吴氏自由自在演说的讽刺文章不可胜数，而在其他作者写的文章中也可以发现。例如，褚民谊的《辫子》一文是较典型的例子。他为了批判辫发的恶习，反而强调辫发的各种有用性，通过这种反讽比喻方法，来批评“辫子”这一恶习<sup>①</sup>。又《革命丛书》(3)在《告少年》广告中，作者为了讽刺清朝政府，编制了“帝王延寿汤”(祸民堂良方)一则广告，它的制作材料是忠君、爱国、守法、感恩、安分、守己、尊尊、长长、高官、厚禄、罚过、奖功等<sup>②</sup>。如此，他们对社会恶习的剔抉意志一直到民国初期在进德会等的道德启蒙运动中再次出现<sup>③</sup>。

当时，大多数进步性的革命派杂志的基本论调是局限在排满革命论和共和革命论范围内，为了进行政治革命，他们还没提出对封建礼教、家族制度和抑压女性的根本否定。对此，中国无政府派为了无政府社会革命，同时提出了家族革命、三纲革命、女

① 参见民：《辫子》，《新世纪》第81、91、94、95、100号，1909年3月20日至6月5日。

② 克鲁泡特金、真民译《告少年》(广告)，《新世纪丛书》(三)，1907年。

③ 有意味的是，在《新世纪》第114号上连载过的《知与行》(一民来稿)一文，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与民初的“进德会”的基本精神几近相似。

性革命等的种种文化革命主张。表面上，他们的各种革命主张比较复杂，但这种全方位的革命宣传本来就是无政府派的共同特色。他们的文化革命与政治、经济革命之间的关系也并不存在其先后、轻重关系，这一激进的文化革命主张持续发展起来，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再一次兴起了。

### 第三节 否定“保存国粹”，宣传“万国新语”

#### 1. 批评“好古”的国粹主义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问题。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有些人，如革命派中的国粹派人士章太炎、刘师培、邓实等人，往往以汉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为排满革命的武器，因而，他们一方面接受了西洋的各种学术文化理论，一方面又要求保存并发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即“国粹”。相反，新世纪派针对当时许多人“是古非今”的倾向，明确提出“尊今薄古”的口号。其代表性文章之一就是褚民谊写的《好古》一文。作者提出“中国之所以不能随世运而进，好落人后者，以尊古薄今也。泰西之所以实事求是，精益求精者，以尊今薄古也”。在定义两个概念后他激昂地抨击“好古”、“国粹”，“中国人最富好古思想，老大帝国之本来面目也”，“数千年老大帝国之国粹，犹数百年陈尸枯骨之骨髓，虽欲保存，其奈臭味污秽，令人掩鼻作呕何，徒增阻力于青年之吸受新理新学也”。褚氏继续论述道：

惟尊今薄古，故能今胜于古，而进化无极也。惟尊古薄今，故谓古人为圣人，无所不知，所言无不合理。今人之所言者，虽异于古，然皆古人之唾余也。每受一新理新学，必

附会古人，妄用典故，乱引陈语，何者为某人所曾言，何者为某人所已为。帝国主义的膨胀，则成吉思汗而为东亚拿破仑矣。复仇主义昌盛，则朱元璋而为中国真德矣。民族思想发达，而黄帝轩辕氏为汉民之鼻祖矣。革命风潮普及，而洪秀全为失败之加里波的矣。景教流行，而孔子为教主矣。民权之说入，而黄梨洲奉为卢骚矣。无政府主义盛，则老子为发明家矣。大同博爱主义兴，则墨子为首倡者矣。理化薄为戏法，共产疑为井田。总之，西人之新理新学，皆吾中国古人所已道者也。<sup>①</sup>

在文章里，可以看到，作者的批评对象是包括张之洞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康有为式“托古改制”论、孔教运动及国粹派式一面接受西学、一面保存国粹的折中性的中西文化观。这里国粹派的范畴应包含除了革命派之中的国粹派外还包含一部分开明的清朝官吏（张之洞、端方等人）及立宪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由此，对于国粹主义的批评，不仅是文化思想上的斗争，而且也具有明显的政治斗争色彩。那么，褚民谊著述《好古》的本来目的是什么呢？褚氏认为，“近数十年间，外来之新理新学，逐渐输入，为中国人者，宜悉吸受至理精学，以扫荡数千年鄙陋嚼蜡之旧说，汇合东西洋之大哲硕士，以力求日新，而中国人不此之务，顽固者拒之，有若蛇蝎，开通者亦不尽力以提倡之，或尽力焉，而为截长补短之策”<sup>②</sup>。由此可知，他所极力提倡的是对新学理之全盘接受，因为新学理之出必有其时势上的需要。为了强调新学理的必要性，他更具体地批评了“崇拜古人”、“颂仰旧说”的遗传性和“溺于境遇”、“安于习惯”的惰性。褚民谊

① 民：《好古》，《新世纪》第24号，1907年11月30日。

② 民：《好古》，《新世纪》第24号，1907年11月30日。

认为好古不过只是“奴隶性”的反映<sup>①</sup>。其中，有关“颂仰旧说”部分中，他指出“文字之难”、“君权之盛”、“交通之难”就是抑压思想自由的三大原因。褚民谊虽然反对崇拜祖宗、迷信孔丘，但是对古人、古书并不是任意地一概否定，而且还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如何正确处理“古”与“今”的关系问题<sup>②</sup>。

在新世纪派成员中最激烈的反国粹主义者可能是吴稚晖。他说：

吾生平最不满意于历史家，尤憾于学者中之所谓历史派，凡遇一事，非曰历史上之所使然，则曰证诸历史斯不可易……近数年来，中国之号称识者，动则称扬国粹。环海内外，新刊之报章书籍，或曰保存国粹，或曰发挥国粹，甚者则曰国粹之不讲则中国其真不可救药。呜呼！此岂好现象乎！吾敢一言而断之曰：是受历史之毒……夫中国之历史，绵延四千余载，国之精华，焉敢云无。（此余说之稍异于吾友民氏（指褚民谊）好古之成见）。<sup>③</sup>

如此，吴稚晖不满的是，不仅从历史中找理论根据的历史学方法，而且不满保存国粹、发扬国粹云云的爱国主义倾向。与批判历史学一样，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从进化论的角度上批评传统考证学方法<sup>④</sup>，吴稚晖的激进程度已经远远超过褚民谊。褚民

① 参见民《好古之成见》，《新世纪》第26、28、30、31号，1907年12月14日，1908年1月4、18、25日。

② 路哲：《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稿》，第107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

③ 反：《国粹之处分》，《新世纪》第44号，1908年4月25日。

④ “科学与考据之学，相似而不同：一则尚实验，故并教师之讲义，恐其不可信。一则尚师说，故取古书之旧说，可以为论据。文野之判，自有毫厘千里之结果也。质而言之，凡取准于规矩律度者，文明之科学，进化之标则也。凡仅恃于引经据典者，野蛮之旧习，进化之魔障也”（鞠普来稿《男女杂说》吴稚晖按语）。

谊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曾在全世界文明中占首位，但这已属过去之事，今天应师法新文明，不应师法旧文明。吴氏认为不仅国粹主义是不正确的，而且它不过是“自画之代名词”<sup>①</sup>。因此，为了代替“国粹”一词，他有时使用“公粹”一词，它就是指科学。吴稚晖更急进地全面否定了国粹本身的存在与否，他为“国粹”设想了一个理想的去处——博物馆。巴黎无政府派批评国粹的主要内容，即传统文化已经是“不正当之道理”，他们甚至认为中国文化发展与否表现在对国粹的处分问题上，因而“无政府党之言曰：世界之进步如何，当视政府及私产二者受若何之处分。余曰中国文化进退之如何，当视国粹之受若何处分。世之学者，其三思之”<sup>②</sup>。

我们为了进一步理解新世纪派“尊今薄古”的态度，今举一例以说明。该派无疑很相信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理论，但是，在对于好古问题上，李石曾在克鲁泡特金《国家及其过去之任务》译文的按语中说：“以天然之自由相互，与后世无政府主义，由人类道德进化，所得之自由相互，目为同物，此即好古之成见。克氏旧学过深，故此等观念，在本书随处流露，实克氏之弱点。”<sup>③</sup>这样，李石曾不认为无政府主义是自古就有的，而是视其为社会进化的结果。由此可见，新世纪派尊今薄古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

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是，在《新世纪》连载记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传统主义解释，其代表性文章是笔名为“鞠

---

① 夷：《致爱新觉罗载洋君书》，《新世纪》第99号，1909年5月29日。

② 反：《国粹之处分》。

③ 克鲁泡特金文、真译《续国家及其过去之任务》李石曾按语，《新世纪》第81号，1909年1月23日。

普”写的一系列文章<sup>①</sup>。鞠普是谁？这个问题到现在仍不太清楚，但较明白的是他是有传统学问的一个人。在鞠普的文章中，“老言自然，墨言兼爱，佛言极乐，耶言平等，与夫今之无政府党、社会党，皆大同主义也”<sup>②</sup>，并且，他把《礼记·礼运》大同一章解释为“废政府之说”、“废家族之说”、“废金钱之说”、“废法律之说”。作者认为无政府就是大同社会，在《人类原始说》中利用大量的典籍来证明人类进化，又在《论习惯之碍进化》中利用文字学知识而证明惯习的进化过程。《男女杂交说》、《女德篇》、《毁家谈》等文也典型地表现出中国无政府派的共同看法。通过这些文章可以看出，作者对传统学术的理解已达到一定的水平，并且他的文章与《天义》报的主要论调也很相似。例如，将西方无政府主义和中国传统学术联系起来分析无政府理论，还有对家庭、三纲、女性等有关封建礼俗问题具有尖锐批判意识等。我们对鞠普和天义派之间有无关系不清楚，我们注意的是，鞠普以传统学术来解释无政府主义并不完全表达新世纪派主要成员的观点。其实，《新世纪》虽然接受发表鞠普写的种种文章，但是编辑对于他的传统取向论调并不满意。由此，吴稚晖等人通过按语形式，批评了鞠普传统主义式的论述方法。如“同人（《新世纪》编辑者）对于某君（鞠普）所引之古书，宁皆过而非之，排斥为稗史之怪诞或神话之荒唐”<sup>③</sup>。其实，新世纪派的作者们（特别是吴稚晖）具有的古典知识都相当丰富。但是，因他们的反国粹主义态度更明确，所以他们一直反对传统学术和无政府主

① 在《新世纪》上鞠普的文章有《“礼运”大同释义》（第38号）、《人类原始说》（第39号）、《大同释义》（第41号）、《男女杂交说》（第42号）、《大同心理》（第46号）、《女德篇》（第48号）、《毁家谈》（第49号）、《论习惯之碍进化》（第50号）等。

② 荷兰来稿：《“礼运”大同释义》，《新世纪》第38号，1908年3月13日。

③ 荷兰来稿：《人类原始说》吴稚晖按语，《新世纪》第39号，1908年3月21日。



义的混合折中倾向。不少国内研究者已经指出新世纪派就是近代中国“西化派”的鼻祖<sup>①</sup>。

在《新世纪》第13号（1907年9月14日）上以《吾道不孤》为题目的记事，第一次介绍了有关东京天义派的“社会主义讲习会”。在其题目中可以看出，新世纪派对天义派颇有好感，他们继续记载有关天义派的记事及其种种广告<sup>②</sup>。在《天义》报

① 参见蒋俊《“新世纪派”思想研究》，《文史哲》（济南），1991年第2期。有人认为新世纪派中西文化观在本质上属于当时流行的“欧化”思潮的范畴，但是，他们与简单地以“类文化”概念模糊文化时代差异的国粹思想相比，显示出更多的文化创新意识。并且该派提出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是对其赞美资本主义文化的一种反省，具有一定的理性批判精神（张明：《新世纪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7年，第22~23页）。

② 在《新世纪》中的有关《天义》报记事表：

	题 名	作者（译者）	号/发表时间
在《新 世 纪》有 关“天 义”报 记事	吾道不孤		第13号/1907.9.14
	革命界之新报	本馆	第16号/1907.10.5
	革命界之新报	本馆	第17号/1907.10.20
	续与赞成立宪之同胞一谈 （记载“政府者万恶之源 也”：《天义》第3卷）	无恬来稿	第17号/1907.10.20
	保满与排满（《天义》第 3号）	志达	第21号/1907.11.9
	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 会记事	录《天义》报	第22号/1908.11.16
	书天义报社会主义讲习会 第一次开会记事後	无政府党分子来 稿	第24号/1908.11.30
	续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 开会记事	录《天义》报附 张	第25号/1907.12.7
	续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 开会记事	录《天义》报附 张	第26号/1907.12.14
	读《书後》之意见		第27号/1907.12.21
	续无政府说（记载“毁家 谈”：《天义》第4卷）	向疑来稿 民	第36号/1908.2.29
	东京报界		第79号/1908.12.26
	续暗杀进步	夷 燃料	第105号/1909.7.24
	鳞鳞爪爪	革命党一分子君 来稿	第109号/1909.8.21
	劝劝劝	燃	第115号/1909.11.13
党人		第117号/1910.1.22	

中也可以看到《新世纪》的广告等，甚至他们两杂志共同构建了法国和日本之间的相互贩卖网。例如，在《新世纪》中连载《天义》的《政府者万恶之源也》、《保满与排满》、《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记事》、《毁家论》等文章。特别是该报曾登载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记事时的刘师培评论，而在《天义》报中也连载了李石曾翻译的《家庭与革命》一文。在东京发生所谓“赤旗事件”后，天义派的主要领导者张继于1908年初从日本逃亡到欧洲以后，他与法国的新世纪派合流，这可以说是他们两团体之间友好交流的一个事例。

但是，如水和火一样，新世纪派与天义派之间在意识趋向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即从文化思想方面来说两者各具有“反对国粹”和“保存国粹”的相反观点。1907~1908年之间，新世纪派在关于社会主义讲习会记事中大体上尊重天义派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只是部分批判他们的非科学性的态度。例如，巴黎无政府派不能同意刘师培说的“苟欲进于无政府，无所谓中国最易”式看法<sup>①</sup>。当时，有的作者就刘氏“讲习会”中发表的内容进行了具体分析，最终揭露了刘师培无政府论的种种矛盾<sup>②</sup>。到1909年，所谓刘师培“变节”以后新世纪派正式开始了对刘师培式国粹主义及似是而非无政府主义的激烈批判。刘师培转向端方，这一事件对新世纪派的冲击相当大，其后，对天义派的好感逐渐转变为敌意。例如，在《新世纪》一记事中描写的堕落国粹者就是刘师培其人，同时批判继续宣传国粹的一个新闻社<sup>③</sup>，并且在有关世界语传播的另一记事中直接攻击《国粹学报》<sup>④</sup>。与天义派

① 无政府党分子来稿：《书天义报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记事后》，《新世纪》第24号，1907年11月30日。

② 问疑来稿：《读〈书后〉之意见》，《新世纪》第27号，1907年12月21日。

③ 燃：《书民吁报告白后》，《新世纪》第115号，1909年11月13日。

④ 上海沐君来稿：《辟谬》按语，《新世纪》第118号，1910年2月19日。

的同志关系解体后，巴黎无政府派更激进地提出反对国粹的口号。该派否定“好古”的国粹主义的较典型的态度在文字问题中能看出，特别是在吴稚晖与章太炎之间较长时期进行的所谓“世界语论争”之中更明显表现出来。

## 2. 文字革命论与世界语论争

**论“万国新语”** 巴黎新世纪派是“万国新语”在中国最早的、也是最热情的介绍者和传播者。《新世纪》出版不久即开始介绍万国新语。早期笔名为“醒”的作者在介绍欧洲世界语运动情况时指出，“欲求万国弭兵，必先使万国新语通行各国，盖万国新语，实求世界和平之先导也，亦即大同主义实行之张本也”<sup>①</sup>。本来“万国新语”是 Esperanto 的最初汉译名称，又译为“爱斯不难读”，后来沿用日本译名“世界语”（世界新语）。它是 1887 年由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甫（石门华：Zamenhop, 1859～1917）创制，他发明世界语的目的，包含有人类一家、世界大同的理想。此后，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也开始重视推广世界语，借此促进其无政府、无国界理想的实现。《天义》、《新世纪》都曾提倡过世界语，而新世纪派比天义派更具体地提出了改革或废除汉字，推广世界语的主张。

李石曾认为中国式“象形、表意之文必代之以合声之文，此之谓文字革命”，取合声的西文较中国文更进步，但西文也有文法不规则现象等不少缺点。由此，在进化原理上将采用世界文字是进化的必然过程。“从进化淘汰之理，则劣器当废，欲废劣器，必先废劣字”<sup>②</sup>。同时，他批评了反对文字革命的国粹主义者。他说，“粹之字意即良也。若国粹名果符其实，则

① 醒：《万国新语》，《新世纪》第 6 号，1907 年 7 月 27 日。

② 真：《进化与革命》，《新世纪》第 20 号，1907 年 11 月 2 日。

必存，便无所用其保矣。若其名不符实，即不良，则必当革。不能因其为国而保也”<sup>①</sup>。褚民谊也认为，文字难于阅读，不易得新知，则必以古人旧说为崇仰，故为改良之方法有二。第一，“苟有人发明拼音之法，造成字母，注于原字旁，以便阅读，为文皆以浅显最近于语言者，全国一致，强迫以一定发音，数十年后，当可普及，一能阅读，则以字母记载其所语便易矣，盖中国文字之易于记载，胜于各国，无语尾之变化，无时间之差别”。第二，“苟以中国文字尚为不便则改他种文字之适于中国者，或径用万国新字亦可，总之，开通常识，当以改良文字为一要着，不然，终不能收大效果也，人民有常识，则思想发达，自不以旧说为可崇仰也”<sup>②</sup>。这是《新世纪》前期对于革新汉字的看法。

其后，在《新世纪》上连载的《万国新语之进步》文章中更具体地介绍了世界语的历史及其特点。作者“醒”通过对世界语和各国语比较后提出了世界语文法的简单性，他不满意上述褚民谊文字改革主张，果敢地论述：“苟吾辈而欲使中国日进于文明，教育普及全国，则非废其目下中国之文字而采用万国新语不可”<sup>③</sup>。作者认为英文虽然较良于中文但不是最好的文字，如采用英文可能发生种种矛盾，因而采用万国新语是最好的方法。“醒”在又发表的《编造中国新语凡例》中认为，为了推行万国新语而首先应发起中国新语，它是从中国语到万国新语的移行阶段中的一种过渡性的文法。作者还提出了“编字典、创月刊”等主张<sup>④</sup>。

① 真：《进化与革命》，《新世纪》第20号，1907年11月2日。

② 民：《续好古之成见》，《新世纪》第30号，1908年1月18日。

③ 醒：《续万国新语之进步》，《新世纪》第36号，1908年2月19日。

④ 醒：《编造中国新语凡例》，《新世纪》第40号，1908年3月28日。

有趣的是，在上述《凡例》中吴稚晖通过按语形式正式展开了世界语宣传，他评价了“醒”论议的“采用一种欧文”、“用罗马字母、反切中国语音”、“用万国新语”三种方法。在文章中他已经不太满意“醒”提出的折中性的中国新语提案，而是更激进地提出了全面接收世界语的主张<sup>①</sup>。《新世纪》的读者们也支持文字革命，例如，新语会会员某君说，“编造中国新语，徒生枝节，其结果不外多造一难题。中国人之学万国新语者，二三月可成功”<sup>②</sup>。笃信子说：“中国略有野蛮之符号，中国尚未有文字，万国新语便是中国之文字。中国热心人，愿求其同类作识字人者，自己学万国新语，教人学万国新语。”<sup>③</sup> 苏格兰君也认为，“守古为支那第一病源，汉文为最大多数支那人最笃信保守之物。故今日救支那之第一要策，在废除汉文”<sup>④</sup>。更为有趣的是，差不多同一时期在东京的《天义》报中刘师培撰述了《ESPERANTO 词例通释总序》一文，并且登载了《ESPERANTO 词例通释》中一部分。刘师培是在与“醒”同一观点上介绍宣传了 Esperanto，即万国新语，并提出了育成 Esperanto 教师和发刊 Esperanto 书籍等的主张<sup>⑤</sup>。但有所不同的是，刘氏提出的是一种世界语文法书，而“醒”氏提案的是一种过渡性的文法改良。“醒”、吴稚晖、刘师培等中国无政府派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最早较具体地宣传世界语的社团。

事实上，在新世纪派成员中主张采用世界语的最主要代表就是吴稚晖。除了在《凡例》中的大量按语以外，他又写了《新语问题之杂答》（第 44、45 号）、《书验中国用万国新语说

① 燃：《新语问题之杂答》，《新世纪》第 44 号，1908 年 4 月 25 日。

② 燃：《新语问题之杂答》，《新世纪》第 44 号，1908 年 4 月 25 日。

③ 燃：《新语问题之杂答》，《新世纪》第 44 号，1908 年 4 月 25 日。

④ 苏格兰君来稿：《废除汉字议》，《新世纪》第 69 号，1908 年 10 月 17 日。

⑤ 申叔：《ESPERANTO 词例通释总序》，《天义》第 16~19 卷合册，1908。

后》(第57号)、《废除汉文议(案语)》(第69、71号)、《书神洲日报东学西渐篇后》(第101、102、103号)及其与章太炎之间有关世界语论争等一系列文章,在这里他更具体地宣传废止中国语和提倡世界语。吴稚晖本来就是一个勇于冲击传统观念的革命党人,他认为中国社会停滞的最大问题在于教育和知识的误用。为了防止知识独占、增大教育的效果,他提出了文字改革主张并进而主张废止汉字,他的采用世界语主张是与反对保存国粹主张联系起来一致进行的。吴稚晖对文字改革的热望可以从他赴欧洲以前就能发现。其实,开中国拼音字母之先河之一就是吴稚晖于光绪22年(1896年)所创的“豆芽字母”。豆芽字母系吴稚晖在苏州陈容民家课教其子时,按康熙字典之等韵所创的一套拼音字母,字母采独体篆文,亦有自创简笔,形似豆芽。豆芽字母只用于教授其家人及亲友拼写本乡方音,作为通信工具,并未公之于世<sup>①</sup>。还有,在爱国学社时期吴稚晖研究考察日本语的简便学习方法,同时也研究开发中国语新的注音字母<sup>②</sup>。大体上,新世纪派废弃汉字的主张有过于简单的地方,但在如何将汉字译成世界语,在中国如何推广世界语等方面的探讨,还是有意义的。

**世界语论争** 《新世纪》宣传文字革命的言论引起了国粹派的愤怒,国粹派领袖章太炎在《民报》上也由此发表关于新世纪派的种种谬误。对此,吴稚晖给章太炎写公开书信并最终引发成两者间的论争。本来吴稚晖和章太炎之间的论争有过几次,其论争的发端是清末《苏报》案事件。论争起自于章太炎,章氏撰

① 王云五主编《民国吴稚晖先生敬恒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第19页。

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四),中华书局,1963,第76页。

《邹容传》刊载在东京印行的《革命评论》第10号上，苏报案发生之初，吴稚晖与俞明夷晤面一事极尽攻讦，吴氏见到这一文章自然愤慨，因而在《新世纪》第28号（1908年1月4日）封而刊头下以《外来广告》标题刊出致章太炎书并提出质问。章氏即在《民报》第19号（1908年2月25日）刊出复吴稚晖（吴敬恒）书，旋即吴氏又在《新世纪》第44号（1908年4月25日）撰文驳斥。章太炎再于《民报》第22号（1908年7月10日）进行反击，吴稚晖复于《新世纪》第63号（1908年9月5日）驳辩。这些论争内容都是有关《苏报》案中吴稚晖的“告密”问题。

章太炎到日本以后部分地接受幸德秋水等人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并且积极参加“亚洲和亲会”和“社会主义讲习会”的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是他与刘师培等天义派关系亲密，这一时期在章氏思想中无政府主义色彩较浓厚。研究者们已经注意到章太炎在《五无论》（1907年9月）、《国家论》（1907年10月）等文中的无政府主义因素，但是他的无政府倾向和新世纪派的无政府主义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例如，章太炎在《具分进化论》（1906年9月）、《社会通论商兑》（1907年3月）等文中已经提出对西方进化论的根本怀疑，以后章氏集中批判“公理”、“进化”、“唯物”、“自然”等进化论概念。其实，这些概念就是构成新世纪派思想的核心观念。章太炎在《排满评议》（1908年6月）一文中直接攻击中国无政府派，他宣言“无政府主义者，与中国情状不相应，是亦无当者”，“言无政府主义不如言无生主义”，“言无政府主义不如言民族主义”<sup>①</sup>。章氏具体批评了新世纪派式“公理”和“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并且否定了新世纪派“反对强权”的

<sup>①</sup> 太炎：《排满评议》，《民报》第21号，1908年6月10日。

逻辑<sup>①</sup>。这一文章自然引起了吴稚晖的愤怒，由此他写《书排满评议后》一文来反击章太炎的民族主义。他认为民族革命只不过起了进一步的作用，因此章氏的“所谓革命的民族主义，实则乃一作用，非主义也”<sup>②</sup>。他认为民族主义不过是一种复仇的革命，而共和主义也是不安定的一个过渡物，所以一再强调无政府主义大同革命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sup>③</sup>。吴章之间感情上、政治上的对立里面一直存在着两者在文化取向方面的根本差别。章太炎与刘师培一样，为了批评西方的“近代”，而重新探究中国的“古代”，但他追求的国粹不是专制封建性的，而是革命性的东西。章氏在主编《民报》时期以国粹为主的编辑方针当然不能避免与新世纪派的纠葛和对立。章太炎的“保存国粹”和吴稚晖的“反对国粹”的主要冲突是在文字革命上，即在世界语问题上。

章太炎对新世纪倡导万国新语（世界语）及《编造中国新语凡例》，做了详细的批驳。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民报》第21号）一文中，他指出欲将万国新语用于中国，其谬有二<sup>④</sup>。其一，为欲求中国语文统一，不当用源自欧洲之万国新语，因中外势异言殊。万国新语虽称万国，但其源本于希腊、

① 有人认为章太炎强调的是，通过对抑压的抵抗而确立人间意识的主体性。有人认为他的这种态度可以说是“纯粹”无政府主义的（参见〔日〕丸山松幸《中国近代の革命思想》，东京，研文出版，1982，第99～100页）。章太炎以观念性的哲学来批判新世纪派，是与五四时期朱谦之对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批判一脉相通的（参见〔日〕坂井洋史《近代中国のアナキズム批判—章炳麟と朱谦之をめぐる》，《一桥论丛》第101卷3号，1989）。

② 燃料：《书排满评议后》，《新世纪》第57号，1908年7月25日。

③ 四无：《无政府主义可以坚持革命党之责任心》，《新世纪》第58号，1908年8月1日。

④ 参见安嘉芳《“新世纪”之始末及其言论之分析》，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1978，第173～176页。



拉丁等文，取其最普通易晓者，糅合而成一种，于他洲并未有所取。其二，新世纪派认为语文之进化是依象形而进于拼音字母，因拼音字母人人易读，于传达知识最为有效。而章氏认为“语文文字者，所以为别，声繁则易别而为优，声简则难别而为劣”<sup>①</sup>。对此，吴稚晖也发表《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后》等文以反驳章太炎论点之非。他说，“语言文字之为用，无他，供人与人相互者也。既为人与人相互之具，即不当听其刚柔移敛，随五土之宜，一任天然之吹万而不同，而不加以人力齐一之改良”，“中国文字，本统一也。而言语则必有一种适宜之音字，附属于旧有之文字以为用，于是声音亦不得不齐一，有如日本之以东京语音，齐一通国也。此相互利益增进之第一步也”。吴稚晖在结尾部分讽刺章太炎说，“作者尚怀羊毫竹纸之智识，则我辈对语，岂能相喻。听作者自为诂经精舍之獭祭课卷，我辈亦自为万国新语之摇旗小卒，各行其是可也”<sup>②</sup>。那时新世纪派对国粹主义的批判达到最高点，说“汉文文学博士，即可适用于野蛮事业之书记员”，又说“国粹，分明以此为野蛮国学说之最精粹者”<sup>③</sup>。

吴章之间的冲突愈来愈发展并渐渐引发为哲学、文化上的斗争。章太炎又发表《规“新世纪”》长文刊载在《民报》（第25号）上。章氏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在他的《排满评议》、《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发表后，《新世纪》也“各为《书后》”。由此章太炎从哲学和语言文字两方面直接批判了巴黎无政府派。文章指出：“彼欲以万国新语，节国文者犹是，况挟其功

① 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民报》第21号，1908年6月10日。

② 燃料：《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新世纪》第57号，1908年6月25日。

③ 苏格兰君来稿：《续废除汉字议》，《新世纪》第71号，1908年10月31日。

利之心，羨纷华每怀靡及，恨轩辕厉山为黄人，今已一朝堕藩，不得蜕化为大秦哲白文明之族，其欲以中国为远西藩地者久，则欲绝其文字，杜其语言。令历史不燔烧而自断灭，斯民无感怀邦族之心亦宜”<sup>①</sup>。章太炎一直坚持“语言各含国性以成名”的观点，坚持中国的语言文字，以激起“爱国保种的力量”。这样，吴章之争就发展成为革命派两大刊物《民报》与《新世纪》之间的论争。

1909年6月，吴稚晖在《新世纪》上发表《书神州日报东学西渐篇后》（第101、102、103号）长文。文章评价了过去他本人写的《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后》，并指出：“彼文之意，以为上策必径弃中国之语言文字，改习万国新语。其次则改用现在欧洲科学精进国之文字。其次则在中国文字上附加读音。”但在这里我们应注意的是，吴稚晖已有改善汉文之意，而非完全采用万国新语。而他仍反复强调为了普及知识应需要经过文字改革的统一的中国语，所以提出了一个过渡期措施——中国语音韵统一。吴氏对于补救中国文字缺点，和造字母以统一读音之事，已有详尽的设计。同时期，章太炎虽然不赞成文字革命本身，但也看到“汉文之深密”，需要有“使易能易知”的教授方法，为此他也设计了一个汉语注音方案，希望通过方言统一鼓吹民族精神。因此，吴章之间的论争可以说为清末切音字和民初注音字母的出现奠定了基础<sup>②</sup>。

另外，为了理解吴稚晖和章太炎的学术论争，我们应注意的是在政治上中国同盟会革命派内部发生的分裂和矛盾问题。在《民报》经费问题上发生的孙中山与章太炎、陶成章等人的

<sup>①</sup> 太炎：《规“新世纪”》，《民报》第24号，1908年10月10日。

<sup>②</sup> 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第139页。

对立及其同盟会的分裂这一著名事件与吴章之争也有密接关系。当时孙中山对章太炎在《民报》上大谈“国粹”甚为不满，认为这时的《民报》不能信赖。章太炎、刘师培等所谓“讲习会”派也试图获得同盟会的领导权。在同盟会内部进行权力斗争时，为了反驳章太炎、陶成章对孙中山的攻击，孙中山请吴稚晖“为长文一篇，加以公道之评判”。由此，吴稚晖在《新世纪》连续登载《劝革命党》、《党人》等文章，反击章太炎等人的民报复刊和金钱问题，而为孙中山的种种政治立场辩护。甚至吴稚晖极力斥责章太炎与刘师培、何震夫妇为清朝高官端方的“奸细”，认为他们出卖革命而投靠清政府。在这场政治论争中，章太炎也极力认为吴稚晖和新世纪派是“非革命党也，非无政府党也”。

综上所述，从文化思想方面来说，同盟会分裂事件里面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具有保存国粹和反对国粹或传统和反传统的文化意识方面的对立。与前几年康、梁的变法派与章、刘的革命派将学术性的今文古文论争结合改良和革命政治斗争一样，吴稚晖与章太炎之间的无政府主义、世界语论争也引起了革命派内部的政治分化。可以说，近代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将学术和政治相结合这一现象成为近代中国的一个独特特点。特别是吴章之间的世界语论争成为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新青年》为中心展开的世界语论争的起源。

## 小 结

近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利用了固有的“大同”一词，但它以进化论为根据，肯定理想在于未来，这和古代人所讲“大同”是根本不同的。例如，康有为写的《大同书》中，他的理想是一个自

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的乌托邦，他设想的“大同”社会不是存在于古代而是存在于未来，这种认识转换可以说含有一定的革命性质。新世纪派也常把无政府社会认为是“大同”社会<sup>①</sup>。他们设想的无政府社会与康有为的“大同”社会基本一致，即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未来社会。新世纪派的无政府革命论是包括排满革命论在内的反对种族主义的革命，该派无论是批判军国主义、祖国主义还是对帝国主义问题的认识都相当深刻。但是，大体上可以说他们更注意的是中国本身的革命。并且他们基本上同意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族制度就是“万恶的根源”的观点，所以中国无政府派批判家族制度的虚伪性，揭露封建家族制的支柱封建礼教和三纲伦理。同时进行以批判孔子为主的儒家文化的革命，宣传女性的完全解放，这是与天义派共同具有的特色。新世纪派尽管发表了大量的有关文化方面的文章，并且具有一定的深度和系统性，但由于他们急于改造传统中国的心理，以及对西方相关理论的一概接受，所以使得他们对理想中国的设想在其他人看来也只是一个空想。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天义派的“平等”的世界观与新世纪派的所谓“大同”的世界观比较起来，其在解释无政府主义的核心概念上具有根本性的意识取向的差异。即天义派的“平等”是由传统“平均”而来的，而新世纪派的“大同”则是传统世界观

---

<sup>①</sup> 例如，吴稚晖说，“抱大同主义之人，凡遇执强权者必排之……强权白人，抱大同主义者，何尝不竭力排之”（夷：《支那近日之舆论》，《新世纪》第64号，1908年9月12日）。李石曾又说，无政府主义实现之日，即“战争息，国界无，此之谓大同世界”（真民：《革命》，《新世纪丛书》（--），1907）。褚民谊也说无政府主义就是要“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以冀大同”（民：《（伸论）民族、民权、社会（三主义之异同再答来书新世纪发刊之趣意）》，《新世纪》第6号，1907年7月27日）。

的逆转<sup>①</sup>。因此，新世纪派与天义派的最大差别是，与东京派不一样，巴黎无政府派在“尊今薄古”的旗帜下，彻底批判国粹主义思潮。其实，刘师培的理想社会与道家的理想社会相似，对此，新世纪派的无政府主义在进化和进步概念基础上强调其与道家的理想主义绝无关系，他们试图以“科学”代替“传统”。巴黎无政府派否定“好古”的国粹主义，这一特点在“万国新语”问题上表现得很明显。吴稚晖认为汉字是非科学的东西，是封建文化的代表性遗产，所以他不停地宣传废止汉字而主张用世界语来代替。他的文字革命论与国粹派领袖章太炎之间曾发生了一场论争，这场论争的主要原因是在对传统文化的看法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新世纪派的反传统主义持续长达十年之久，并且成为20世纪20年代初期十分突出的一场争论的先声。

---

<sup>①</sup> “在19世纪的西方，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通过技术进步来寻求解放，像圣西门那样以对未来的科学幻想来呼唤乌托邦；另一种更像傅立叶，在阿卡狄亚洁净的纯朴和亲密合作中寻找幸福。这两种类型的幻想都被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小组接受了”（〔美〕费侠莉（Charolitte Furth）：《思想的转变：从改良运动到五四运动（1895~1920）》，《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第402页）。这一段话很有意义。

## 第四章 民国初无政府派的 反复古主义

本章主要论述民国成立后在清末无政府派影响下形成的两个社会主义社团，即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含“新”社会党）和师复的所谓“民声派”。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虽以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为主提出“三无主义”，即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主张，但本质上是属于具有各种政治派别联合性质的一种改良主义派别。不过，我们应注意江亢虎对家庭及对妇女问题的主张和活动。中国社会党第二次联合大会后，沙淦、太虚等无政府主义者决定与中国社会党分离，另外组建所谓“新”社会党。他们正式宣言实行无政府主义，坚持反强权主义主张，在文化思想上则表现出反传统主义的浓厚色彩，以及传统和无政府主义相结合的两点观点共存的局面。

一般认为，师复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但他最早却是一个排满革命论者，接受无政府主义后，其前期注重批判传统伦理道德，而后期注重宣传无政府主义原理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在他的反复古主义文化观中，我们还能发现他的战斗性的思想和活动的实质。如果说清末新世纪派和天义派注重宣传无政府主义理论的话，那么，民国初师复的无政府活动除了进行宣传无政府理论外，还从事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这一任务。虽然他的思想中独创性的观点并不多，但他进一步解释和宣

传了原来《新世纪》宣传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理论，并期望在中国社会内进行实践。

## 第一节 中国社会党（含“新”社会党）与文化革新论

### 1. 江亢虎和“三无主义”

江亢虎（1883~1954），原名绍铨，江西弋阳人。1901年春到日本考察政治，回国后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聘任北洋编译局总办和北洋官报总纂。1902年再次到日本留学，1904年回国，任刑部主事和京师大学堂的日文教习。1905年在北京最早创办“女学讲习所”，培养女学教师，后来女子讲习所增加至四所，并存在了五年多时间。1906年，他还发起组织“女学慈善会”，这大概也是中国近代女子进行集体社会活动的开端。1907年，江亢虎第三次在日本时，常以中国留学生代表身份出席日本社会党集会，开始接触正在日本广泛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他通过日本无政府党人幸德秋水的宣传，阅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第二国际著名领袖倍倍尔写的名著《妇女和社会主义》，决心研究妇女和家庭问题。同时，江亢虎受幸德秋水、堺利彦等人的影响，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某些主张。后来，江氏回忆说：“余极信仰社会主义，而亦极喜研究无政府主义，故无政府主义之人中国，余亦为其介绍之一人。”<sup>①</sup>事实上，江亢虎的社会主义带有较浓厚的无政府主义色彩，当时他已经提出“欲求安乐，

<sup>①</sup> 江亢虎：《中国无政府主义之活动及余个人之意见》（1914年作），《江亢虎文存初编》（以下《文存初编》），上海中华书局，1932，第124页。

必举其苦的根本掀翻之，由有宗教变而为无宗教，由有国家变而为无国家，由有家庭变而为无家庭”<sup>①</sup>。这就是他自鸣得意的所谓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的“三无主义”学说。据江氏自述，早在第二次赴日，即1903年时，孙中山在东京倡三民主义主张，他即标新立异独揭三无主义<sup>②</sup>。

江亢虎之醉心于社会主义，很显然是在他1909~1910年去欧洲游历之后。他在滞留欧洲之际，曾与主张无政府主义的新世纪派有过来往。1909年，以“(徐)安诚”为化名写成《无家庭主义》和《自由营业管见》两文投稿于《新世纪》(第93号、第97号)。江亢虎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光绪宣统之交，吴稚晖、李石曾、张溥泉诸君创设《新世纪》周报于巴黎，实华文无政府言论机关之先河。先是，余曾倡导三无主义之说，即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是也，尝投稿此报中”<sup>③</sup>。他的《无家庭主义》一文仍宣传了在日本留学时期形成的三无论，在文章中攻击传统婚姻家庭制度，尤其注重批评三纲问题<sup>④</sup>。1910年7月，他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留学时发表的《无家庭主义意见书》中，更具体地反对有家庭夫妇，并列举六弊，以为“欲求亲爱自由平等快乐者必先破家庭。破家庭较之废弃宗教、倾政府，论事则根

① 江亢虎：《三无主义悬论上篇》(1910年作)，《洪水集》(以下《洪水集》)，上海社会出版社，1913，第36页。

② “方孙中山君之盛倡三民主义于日东也。余方弱冠，留学彼中。标新领异，独揭三无主义之说。除张溥泉(张继)君外，无应和者”(江亢虎：《三无主义悬论上篇》，《洪水集》，第37页)。

③ 江亢虎：《中国无政府主义之活动及余个人之意见》，《文存初编》，第123页。

④ 某君来稿(徐安诚)：《无家庭主义》，《新世纪》第93号，1909年4月17日。



本之图，而程功则咄嗟立办，更不难以和平手段得之”<sup>①</sup>。同时，他主张自由恋爱、公共教养、废止财产三大事。他宣传的所谓“三无主义”，在《三无主义悬论上篇》中清楚地阐述其大旨。他说：

夫宗教国家家庭云者，非天然物而人造物……方其未有宗教也，心志昏迷，事为跋扈，有宗教而趋向一，则人安乐矣。方其未有国家也，兴仆仓皇，杀歙无艺，有国家而经界定，则人安乐矣。方其未有家庭也，群雄竞雌，流血相逐，有家庭而配偶别，则人安乐矣……有宗教而宗教之苦生，有国家而国家之苦生，有家庭而家庭之苦生，其于安乐犹未也。于是宗教则由多神变而为一神，国家则由专制变而为立宪共和，家庭则由不自由结婚变而为自由结婚。凡以求比较的安乐而已。然至吾人今日观之，一神教有一神教之苦，立宪共和有立宪共和之苦，自由结婚有自由结婚之苦，则其于安乐亦犹未也。欲求安乐，必去其苦之根源掀翻之……故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者，吾人今日目的之注点所在<sup>②</sup>。

另外，《自由营业管见》一文是有关经济方面的内容，文中认为无政府主义式“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实行起来有困难，不如“自由营业较良”，并提出了一个基本上不触动生产关系的可以“自由营业，遗产归公”的社会改良主张<sup>③</sup>。对此，吴稚晖在《新世纪》第98号答辩中批评了江亢虎的改良性的某

① 江亢虎：《无家庭主义意见书》，《洪水集》，第3-4页（这篇论文以“徐徐”为笔名，《社会党月刊》第1期中再次刊载）。

② 江亢虎：《三无主义悬论上篇》，第35-36页。

③ 安诚君来稿：《自由营业管见》，《新世纪》第97号，1909年5月15日。

些看法。吴氏对江氏的观点评价说：“要之自由营业，岂但无拂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而即此两语实际推行之一术也。同人对于进化之作用，亦常常言及之。惟安城君云‘生前富贵贫贱，看似不平等，其实至平等’，则与君之对待未成人及死后之收产法，似乎已自相冲突，不识能示其至平等之理由乎。”<sup>①</sup>不久，江氏又提出“地税归公”、“遗产归公”之学说。

辛亥革命前，江亢虎思想的一个特色表现在教育运动方面，特别是在教育平等和女性教育等妇女解放问题上具有进步性的作用。他的无家庭主义与女性问题之间具有密切关系，1911年4月，从国外回来不久的江亢虎发表的《忠告女同胞文》讨论了这些问题。文章中，他强调女性教育（“求学问”）而批判三从之说（“绝依赖”），还反复主张女性经济自立（“谋生计”）问题。并且他将迷信分类为宗教、礼教、风俗三个方面，从进化论的角度集中批判宗教问题（“破迷信”）<sup>②</sup>。在女性教育问题上，江亢虎注重批评的是“贤母良妻”式教育和国家主义教育。他在有关文章中提出：“中国女子教育完全一家庭教育面已……故其恒言曰，贤母良妻。”“其后国家主义之教育大盛……于是女子教育似亦由家庭主义进于国家主义……故又有恒言曰，女子者国民之母也。”对此，他说：“余对于女子教育之意见，自初迄今断然排斥家庭主义和国家主义，而主张世界的个人主义。”他还反复宣传女性“职业自由”和“生计独立”的必要性<sup>③</sup>。江氏认为，恋爱自由、生计独立、教育公共、遗产废除等就是无家庭革命的前提条件<sup>④</sup>。如上所述，江亢虎受到日本、欧洲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

① 夷：《书自由营业管见后》，《新世纪》第98号，1909年5月22日。

② 江亢虎：《忠告女同胞文》，《文存初编》，第7~15页。

③ 江亢虎：《中国女学古今谭》，《文存初编》，第141页。

④ 江亢虎：《家庭问题（三）》，《江亢虎博士演讲录》（第2辑）（以下《演讲录》），东南大学出版部，1922，第132~135页。

特别是与新世纪派的交流，很可能对他的三无主义思想的形成起了不少作用。

1911年6月1日，江亢虎应邀在杭州惠兴女校作题为“社会主义与女学之关系”的演讲，与上述《忠告女同胞文》一样，它是辛亥革命前宣传女性教育问题的代表性讲演。但我们应注意的是，这次讲演可以说是首次在中国亮出社会主义旗号，公开鼓吹“社会主义要从女学做起”。他在同名演说文《社会主义与女学之关系》中认为，在“社会党学说之流行、实力之膨胀著著进步”的前提下，社会主义“最初一步，要必自改革现在的家庭制度始。故与女子教育，实有最密切之关系”，并且应该将教育平等、经济自立和家庭伦理问题联系起来要求社会主义的进步<sup>①</sup>。这被江亢虎自称为“中国国内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第一次讲演”，即为浙江巡抚获悉指其为“洪水猛兽”，并下令将其驱逐出境，他被迫逃往上海避祸。消息传出，江氏因此而声名大振，加快了他决心在中国倡导社会主义的步伐。同年7月10日，江亢虎在上海张园公开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研究会”，并进行公开宣讲。宣讲者达20人左右，听讲者竟有数百人之多。该会“除研究学说外，单注重鼓吹二字，至于实行，当别为组织”<sup>②</sup>。因此，这一团体可以说是学术性团体而不是政治性团体。他在《演说词》中定义自己的社会主义为：“教育公共、营业自由、财产独立”三个方面，不久，追加“废除遗产制度”一项<sup>③</sup>。据江亢虎的回忆，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之后，“惜阴公会”、“天铎报馆”、“女子进行社”三个团体最早支持了他的活动<sup>④</sup>，这些团体

① 江亢虎：《社会主义与女学之关系》，《洪水集》，第16页。

② 江亢虎：《社会主义研究会宣言》，《洪水集》，第26页。

③ 江亢虎：《社会主义商榷案》，《社会杂志》第1期，1911年12月。

④ 江亢虎：《惜阴公会演说词》（后记），《洪水集》，第21-22页。

与江氏的关系很密切。

与此同时，该会推出了自己的机关报《社会星》，开始了公开的社会主义宣传工作。《社会星》杂志在上海创刊为周刊，女子进行社为发行机关。该刊登载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开会记》、《社会主义研究会开会宣言》，以及介绍地税归公、世界语等问题的文章，自称“中国第一社会主义杂志”。宣布宗旨四条：第一，“输布全世界广义的社会主义学说”；第二，“详载国内外社会主义进行者或反对者及一切与有关系之事情”；第三，“发挥中国古来社会主义之思想”；第四，“交通近世社会主义之言论”<sup>①</sup>。它是研究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情况和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有价值的史料，发行三期后停刊，后来通过惜阴公会的帮助，改名为《社会杂志》继续发行<sup>②</sup>。

江亢虎本人自幼深受儒学熏陶，并虚构过所谓“大同之治”的理想社会。后来数度出国考察，进而发现西方盛行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主张，与他原来构想的“大同之治”，竟“暗合十之八九”<sup>③</sup>。江亢虎认为“大同”“已隐约发现于神话时代，周秦之间流传极盛”<sup>④</sup>。他说，“易书诗之记载，孔孟之绪言，周秦诸子之著作，其吻合社会主义者，随在而是”<sup>⑤</sup>。在《社会主义述古绪言》一文中，他力图从中国古代的典籍中发掘现代社会主义思想的渊源。他认为：“黄老之学说似托尔斯泰，庄列之学说似布尔东、巴苦宁，王充之学说似柏拉图，孟、荀、申、韩、商鞅之学

① 元文（江亢虎）在《发刊词》中说：“社会主义者，二十世纪最流行之主义也。其在中国，则本杂志实为社会主义最初惟一之言论机关。”“本杂志发刊为社会主义在中国言论机关成立之始”（《社会星》第1期，1911年7月）。

② 江亢虎：《社会星发刊词》（后记），《洪水集》，第25页。

③ 江亢虎：《社会主义与女学之关系》，《洪水集》，第16页。

④ 元文：《发刊词》，《洪水集》，第3页。

⑤ 江亢虎：《社会主义研究会宣言》，《洪水集》，第27页。

说似国家社会主义，杨朱为我似个人无政府主义，墨翟兼爱似共产无政府主义”。他的这种社会主义，在学说上直接来源于孔孟的大同之世；在制度上因袭于孟子倡导的井田制；在风俗上渊源于古已有之的“内外分治，各尽所能，饮食同席，各取所需”的老传统<sup>①</sup>。他在分析社会主义在中国不发达原因时提出，“社会主义之思想，中国古来有之。而与泰西不同者，一多属理想的，而未进入于科学的；一多属道德伦理政治方面，而未注重于经济方面；一多属哲学家、文学家、政论家，而未普及于实业家、劳动家。此所以社会主义之学说，其成立流传发达皆较泰西为后也”<sup>②</sup>。这种传统主义的解释方法，很容易与清末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相似。

辛亥革命之后，江亢虎对于无政府主义在认识上没有大的变化，但在某些方面的认识内容增加了。他一直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核心是三无主义，而这时提出了“二各”和“五非”等概念和种种社会经济理论。他说：“以恋爱自由、教育平等、遗产归公为初步，以个人自治、世界大同为依归，以二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五非（非私产主义、非家族主义、非宗教主义、非军国主义、非祖国主义）为究竟，而其方法则唯普遍鼓吹、取得大多数之同意，以一致进行。”<sup>③</sup>江亢虎还发起成立所谓“三二学社”。“三”即三无：无宗教、无家庭、无政府；“二”即二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他认为：“三无二各是无政府主义的精髓”。其宣传内容中，“地税归公”和“遗产归公”等主张与过去在《新世纪》上发表的“自由经营”观点结合起来，就成为他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江亢虎与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一样，

① 江亢虎：《中国古来社会主义之思想》，《文存初编》，第126—127页。

② 江亢虎：《文存初编》，第127页。

③ 江亢虎：《孙中山社会主义讲演集弁言》，《洪水集》，第83页。

提出了“地税归公”的主张，认为中国古代井田制度就是一种地税归公制度之一<sup>①</sup>。他憎恨世俗的遗产继承制，认为它决定了人们政治经济地位先天的不平等，“实人世间一切罪恶之源泉”<sup>②</sup>。与此同时，他将其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相比较，宣传自己经济理论的优越性。当然，这绝不是无政府主义的经济论<sup>③</sup>。

其实，从他较早写的《洪水集》和《江亢虎文存初编》两部著作来看，我们常发现他试图将中国古代大同理想社会的因素和西方近代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两者相结合。例如，他认为：“中国古哲学家有如黄老杨墨之说，多属个人无政府主义或共产无政府主义思想，庄子谓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其代表也。”<sup>④</sup>他喜欢将“无政府主义”一词表述为“无治主义”。江亢虎社会主义的最大特色表现在折衷主义的色彩上，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混合、国家社会主义和个人社会主义的混合、新世纪派和天义派式解释的混合，甚至三民主义和三无主义的混合等。从江氏个人性格来说，他过分地强调自己理论的“最初”、“惟一”的特点和各种活动的历史意义，但在他的逻辑思维和行动之中却往往发生自相矛盾和优柔寡断的问题，这些问题后来被师复集中地进行了批判。

江亢虎反复强调三无主义就是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结合的最理想的社会主义，但是，他的政治观和无政府主义之间却存在着相当的差异。所谓“极喜欢研究无政府主义”的江亢虎，一方面说，“鄙人本自附于社会主义，其于无政府主义非反对亦非主张，惟尝创为三无之说：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而对政治经济之

① 参见元文《介绍地税归公之学说》，《社会星》第2期，1911年8月。

② 参见江亢虎《社会主义学说》，《文存初编》，第91~100页。

③ 参见江亢虎《孙中山社会主义讲演集弁言》。

④ 江亢虎：《中国无政府主义之活动及余个人之意见》，《文存初编》，第123页。

意见，则明白宣布土地、资本、机器三者当归公有……”<sup>①</sup>；另一方面，则信守国家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斯宾塞模式，相信经济发展有赖于在生产活动中利用人类天生的竞争本能。由此，他不同意无政府主义者的共产主义式分配主张和彻底废除国家的主张。实际上，他废除遗产继承权的主张和无政府主义者废除一切私有财产的主张也是有区别的。后来（到1916年），江氏把国家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两者都加以否定，他说：“社会主义必为大同主义，凡非大同主义，即非社会主义。若国家社会主义专以国家为本位，无政府社会主义纯以个人为中心，皆不可谓大同主义。故不可谓为社会主义，鄙见如是。”<sup>②</sup>那么，他说的“大同”的社会主义或“世界”社会主义是什么？很可能连他本人也不太清楚。简单地说，江亢虎的社会主义是既有法、意等国盛行的无政府主义的因素、英国费边主义的痕迹，也有美国乔治主义的影响。

江亢虎的文化思想与《天义》的文化思想基本一样，主要是表现在妇女解放问题上具有进步性的色彩。他认为中国宗法社会的显著特征是三纲五常，它“是宗法社会能保持之真骨髓”<sup>③</sup>。于是废除国家强权、婚姻制度与宗教束缚，很自然地与反对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联系起来。而且要打破这种不平等，必须废除家庭。而废除家庭必须首先废除婚姻，取消人们稳定的血缘继承关系，在两性生活上实行“自由而不结婚，即自由恋爱”<sup>④</sup>。他的男女平等论和无家庭主义集中反映在关于《女权问题》和《家庭问题》的几次讲演中<sup>⑤</sup>。

① 江亢虎：《社会主义学说》，《文存初编》，第98页。

② 江亢虎：《将来之中国社会党》，《文存初编》，第149页。

③ 江亢虎：《家庭问题（一）》，《演讲录》（第2辑），第120页。

④ 江亢虎：《女权问题（三）》，《演讲录》（第2辑），第99页。

⑤ 有关女权、家庭问题8次讲演参见江亢虎《演讲录》，第79--142页。

还有，江亢虎主张保护个性自由，他认为“个人者社会之分子”，“社会者个人之团体”<sup>①</sup>，无个人即无团体，君主政体之下以国家或家族为本位，牺牲个人自由的现象是极不合理的<sup>②</sup>。他于辛亥革命前已经发起“个人会”而宣传“个人主义”，在《个人》一文中谈到个人与世界、国家、家庭、民族、宗教等的关系，并强调“个人之价值”和宣扬“世界之一个人”<sup>③</sup>。有人曾认为，江亢虎的特点是强调个人主义、强调独立谋生的必要、废除遗产等，这些全都是他在讨论妇女问题时最初表达过的观点。他的社会主义，在更大程度上是反家庭的而不是反资本主义的<sup>④</sup>。

## 2. 中国社会党：广义，纯粹，无治

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1911年11月5日，江亢虎以社会主义研究会发起人的名义召集特别会议，提出“改造社会党”，宣布了由他一手制定的党纲八条：“1. 赞同共和；2. 融化种界；3. 改良法律，尊重个人；4. 破除世袭遗产制度；5. 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6. 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7. 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8. 限制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sup>⑤</sup>最初开会时，只有在上海的研究会员50余人。中国社会党以“赞同共和”成为最早支持辛亥革命的一个政治团体。江亢虎对《党纲》中的“共和”解释说：“世界政体进化，由专制而立宪，由

① 江亢虎：《拟发起个人会意见》，《洪水集》，第7页。

② 李良玉：《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第113--116页。

③ 元文：《个人》，《社会星》第1期，1911年7月。

④ 〔美〕Arif Dirlik、E.S.Krebs，“Socialism and Anarchism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Modern China*，1981.4，p.131.

⑤ 《中国社会党规章》，《天铎报》1911年11月24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第173页）。



立宪而共和。共和虽非致治之极轨，而在今日实较善之制度，亦必经之阶梯也。民军既定为国是，本党亦极表同情，切望吾人顾名思义，实力推行耳。”<sup>①</sup> 其他项目则充分反映了江亢虎个人的政治趋向。江亢虎和中国社会党人常自称为中国有史以来一切政治团体中第一个“自承认为党者”，中国社会党也是首次以社会主义为旗帜、以社会主义者为成员的政党。

中国社会党上海本部成立后，天津、北京、南昌、绍兴、苏州、重庆等地纷纷成立支部。中国社会党的发展过程，大体上是循着先江、浙，后南方各省，最后京、津等北方省区这个顺序进行的。据统计，1911年11月创党时党员50余人，1912年1月支部30余个、党员3000余人，1912年3月支部90余个、党员3.5万余人，1912年8月支部400余个、党员20万余人，到1912年底支部490余个、党员52.3万余人<sup>②</sup>。至1913年8月被袁世凯下令解散时，它已是一个规模相当巨大和具有一定影响的政党了。

中国社会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宣布不参加政治运动，不设党魁，党中义务与权利一切平等，党员只要信仰社会主义未来理想，对社会主义各派主张则允许自由选择不加限制。因此，党内就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观点。数月之后，党内很自然地分成几派。大体上可分为两派：一派坚决主张进一步脱离国家政府，并不惜公开宣布纯粹社会主义宗旨，直至实行激烈的革命手段实现最终目的，这是受新世纪派影响的沙淦、乐无等无政府派；一派则坚持继续遵守前议方针，仅以宣传教育为手段，既不参加政治生活谋取权力，也不脱离现实生活而与国家社会为敌，即可能是受孙

<sup>①</sup> 江亢虎：《中国社会党宣言》，《洪水集》，第54页。

<sup>②</sup> 参见江亢虎《洪水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等。

中山影响的殷仁、蔡鼎成<sup>①</sup>等国家社会主义派。另外，江亢虎一派则折中两派之主张，认为“社会主义、民生主义、共产主义皆一主义”，并自己认为他们是多数派<sup>②</sup>。江氏主持的《社会党月刊》中发表的《中国社会党主张社会主义之派别比较表》提出：

一、世界社会主义（本府及多数支部主张此主义）（指江亢虎一派——笔者注）。

一、无政府主义（吴稚晖、李石曾、张继等党人及心社同人多主张此主义）。

一、国家社会主义（孙中山、殷仁等少数支部主张此主义）<sup>③</sup>。

在民国初年，中国社会党始终与孙中山和新世纪派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本来江亢虎的“地税归公”的主张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的主张是相似的。两人都接受了亨利·乔治的地税论，并且他们在社会主义认识上也有共同的语言，都是改良的社会主义信徒。在孙和江两人的谈话中，孙中山说：“余对此主义（指社会主义）竭力赞成……贵党（指社会党）提倡良为佩服，余意必广为鼓吹，使其理论普及全国人民心目中。”江亢虎则说：“先生之民生主义、平均地权、专征地税之说，实与本党宗旨相同。”<sup>④</sup>

① 国家社会主义派的观点参见蔡鼎成《社会主义之进行、以国家社会主义为手段、以世界社会主义为目的》，《社会世界》第3期，1912年6月15日。

② 煮尘辑述：《社会主义之名称》，《新世界》第3期，1912年6月16日。

③ 《社会党月刊》编辑部：《中国社会党主张社会主义之派别比较表》，《社会党月刊》第3期，1912年9月。

④ 孙中山：《与江亢虎的谈话》，《大总统与社会党》，《民立报》1912年1月1日（见林代昭、潘国华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第308页）。

直到孙中山临时大总统解职以后，江亢虎一直支持孙中山的各种政策。孙中山也应中国社会党之约，在其上海本部作了持续三天的讲演。孙中山在讲演中，建议社会党必须改造成为正式政党。孙氏自称：“余实完全社会主义家也。”<sup>①</sup>

新世纪派的吴稚晖也在1912年召开的中国社会党集会的讲演会上宣传无政府主义，并主张反对军阀主义和军国主义，以及为了实现无政府社会强调教育改革的重要性。与孙中山相反，他说，“前日晤江亢虎君，彼问我以社会党应否改为政党问题，鄙人答以不必改。吾党以广义号召，虽无明划何种之界说，然自然之趋向，必以无政府为归宿”<sup>②</sup>。这样，吴稚晖希望中国社会党不是议会性政党，而只是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过程中担负其重要作用。当时，江亢虎企图借助于袁世凯政府推行某些社会改良政策，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因此，他与袁世凯、黎元洪大总统等政府高级官僚的关系也较密切<sup>③</sup>。

中国社会党成立前后，在国内已经发生了小规模有关社会主义的论战。例如，江亢虎的《社会主义商榷案》针对宋教仁的《社会主义商榷》；煮尘的《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驳社会主义商兑》针对在《东方杂志》上连载的《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第8卷第6号）、《社会主义商兑》（第9卷第2号）。其中，在宋教仁和江亢虎之间的质疑答辩中，宋教仁对于无政府主义解释

① 孙中山：《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民国元年十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上海中国社会党讲演）中，他把社会主义派别分为：1. 共产社会主义，2. 集产社会主义，3. 国家社会主义，4. 无政府社会主义四种。其中，“盖以国家社会主义，本属于集产社会主义之中。而无政府社会主义，又属于共产社会主义者也”（见林代昭、潘国华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上册），第370页）。

② 《吴稚晖之社会主义谈》，《社会党月刊》第3期，1912年8月。

③ 有关中国社会党的政治态度，参见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专题资料选辑）第一辑，中华书局，197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

说：“无治主义，即所谓无政府主义，在社会主义中最为激烈。其主张之要点，谓国家原为资本家与地主为本位而成立，以是其所施政治法律专以保护彼等为目的，其偏私可谓实甚。故国家及政府万不可不废去之云云。”<sup>①</sup> 对此，江亢虎认为：“无治主义，通称无政府主义。其实并礼教、政治、法律、凡范围的、契约的一切推翻，不止推翻政府已也，译为无治亦宜。无政府党无章程、无规则、无仪式、无组织，惟以合意相联结，实不成其为党也。”<sup>②</sup> 在这里，我们注意的是，宋、江之间论争中共同提出将“无政府主义”改为“无治主义”一词。另外，民国初中国社会主义者特别注重宣传“社会”、“社会学”、“社会主义”、“社会党”等有关“社会”的新用语<sup>③</sup>，不少人接受社会主义=大同主义的模式。当时一般人认为，江亢虎的社会主义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具有代表性的两派，毕竟并已经成为主要社会风潮之一。虽然它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表现出不彻底性，但是在相当程度上已传播到中国许多大城市。

中国社会党在群众中设立了宣传部、新剧社、阅报社、在妇女界组织“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华侨中组织“华侨联合会”等社团，并部分组织工团而召开工人集会。由于该党不以暴力为解决问题的方式，他们选择了一些和平的手段：（1）教育和鼓吹，“徐以主义普灌于社会，候信从者众，则以大多数人民起而执行之”。（2）总同盟罢工，“以大同盟总罢工为惟一之戎装”。并且，他们提

① 渔父：《社会主义商榷》，《民立报》1911年8月13日（见江亢虎《洪水集》，第46页）。

② 江亢虎：《社会主义商榷案》，《洪水集》，第38-39页。

③ 参见煮尘辑述《社会主义之名称》；《时事月旦》编者：《社会、社会学、社会主义、社会党》；江亢虎：《社会主义演说词》；孙中山：《社会主义派别及批评》等（见林大昭、潘国华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上册），第327-328、336-337、363-367、367-387页）。

出了达到社会主义的三条途径：第一，联合世界社会党一致进行；第二，借助现政府的权力，推行社会改良政策；第三，在社会党内部直接施行，办法以“遗产归公”为基础<sup>①</sup>。另外，中国社会党主张在南京、崇明和东沙群岛等地试设几个地税归公的官办“社会主义”试验场。特别是江亢虎在《社会党筹边策》一文中，主张满蒙回藏一律为藩属应该与内地分离，领土、人民间接上隶属于民国，内政实施自治，要求各国公认为永久中立地带，并于其地实行社会主义模范地，兼充“无政府主义”之试验场<sup>②</sup>。

中国社会党为了社会主义之实行，特别注意社会文化团体的组织及其活动。例如，组织“平民学校”、“世界语传习所”、“女子参政同盟会”等。本来，社会党、无政府党人强调对平民的教育和对世界语的宣传，因此，中国社会党成立不久，他们在北京等地已经着手组织平民学校、世界语传习所。在平民学校实施道德教育、公民教育，而普及社会主义之常识。在《缘起简章》中吴稚晖说：“社会主义者，以为人类由教育更良之结果，可不必修以现世界小康之术。”“社会主义者，即一教育笃信家。”<sup>③</sup>宣传世界语也是中国社会党的主要活动之一，他们利用机关杂志中世界语栏目而发起“世界语学社”。当时，有的报刊在报道社会党和其情况时写到，“世界语学社系陆武卿、盛国城、熊子英、吕桐孙诸君所创议，经营有年，成效甚著，兹闻四君皆投身社会党，即将该学社并入社会党中，拟更扩充办法，力图进行”<sup>④</sup>。辛亥革命后，最早发起妇女参政权运动的就是江亢虎的中国社会

① 夏四清：《1911—1913年中国社会党述论》，《深圳大学学报》，1993年第10卷第4期。

② 江亢虎：《社会党筹边策》，《洪水集》，第97～102页。

③ 吴敬恒：《北京社会党创办平民学校缘起简章》（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第191～192页）。

④ 《大总统与社会党》，《民立报》1912年1月2日。

党。1911年11月12日，在上海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女子参政同盟会是以获得妇女参政权为目的，要求会员是年满16岁以上的、具有普通文化程度的女子。其口号是：改良女子教育方法，学校制度与课程设置与男校相同；创办参政研究所，招聘讲师，补习政治、法学；参加各种政治集会和结社；和各国的同志取得联系，相互声援<sup>①</sup>。清末江亢虎活动的最大特色表现在设立学校等教育活动和以男女平等为主的妇女解放运动方面。这些活动在中国社会党社会文化运动中又充分地反映出来。其实，这种特点正是与清末无政府派具有一脉相通的地方。

中国社会党还发行了几种刊物，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杂志就是《社会杂志》。它的前身是“社会主义研究会”机关刊物《社会星》。该杂志出版以后，又相继出版了有关宣传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党的几种杂志。除发行《社会杂志》外<sup>②</sup>，该党在上海等地还办有《社会日报》（后改名《社会党日刊》）<sup>③</sup>、《社会

① 关于女性参政问题，中国社会党内国家社会主义派支持女子参政事，而无政府派批评了这种运动。对此，江亢虎试图调和两派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对无政府党人说：“吾人虽信无治为最高尚之理想，然无治以前，其手续如何，无治以后，其变象如何？”（江亢虎：《复某君书论社会党与女子参政事》，《洪水集》，第79-80页）。那时，江氏渐渐接近了国家社会主义派。

② 《社会杂志》1911年10月创刊于上海，它本来是上海惜阴公会之言论机关。其宗旨四：一、改良社会；二、推阐教育；三、保存国粹；四、尊崇武勇。值得注意的是，其宗旨之一就是“保存国粹”。编辑者说，“夫国学者，国之粹也。国粹不存，国于何有”云云（沁如：《发刊词》，《社会杂志》第1期，辛亥八月）。江氏回忆说，它“以社会教育前提，而社会主义为究竟”（江亢虎：《社会杂志发刊祝词》（后记），《洪水集》，第50页）。

③ 《社会日报》创刊于1912年2月1日，日出四开一小张，自称“本党言论之总机关”。在《发刊词》中提出“三义”：第一，“代表中国社会主义之思想”；第二，“发布本党对于党员非党员之意见”；第三，“纪载及评论国内国外关系社会主义之事情”。此外，“则输入欧美社会主义之学说”（江亢虎：《发刊词》，《洪水集》，第56-58页）。40号后，改名《社会党日刊》。

党月刊》<sup>①</sup>、《新世界》<sup>②</sup>、《人道周报》<sup>③</sup>、《社会世界》<sup>④</sup>等。上述杂志中，无政府主义性格较浓厚的刊物是《人道周报》和《社会世界》两种。通过这些杂志，我们可以了解中国社会党的文化思想。

简单说，中国社会党的文化理论是在江亢虎的“三无主义”基础上形成的，特别是“无家庭主义”成为其理论的主要根据。中国社会党人认为“家庭”是社会不平等的起源，由家庭而产生贫富差别和教育不平等，而教育不平等又会产生知识差别的扩大和各种就业的不平等。家族制中的遗产世袭制度，就是贫富贵贱差别产生的主要原因。他们主张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实现，应该破坏家庭制度。如有的中国社会党人曾说：

家族者，固阻遏平等、牵制自由、隔绝亲爱之本根也。

- 
- ① 《社会党月刊》创刊于1912年3月，共出4期。《社会杂志》（经过《社会月报》时期）改名成为《社会党月刊》，它反映了江亢虎一派的立场。编者自己对中国社会党杂志分类说，“《社会星》时代——《社会杂志》时代——《社会党月刊》时代”（《社会党月刊缘起》，《社会党月刊》第1期，1912年3月1日）。
- ② 《新世界》创刊于1912年5月14日，是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的机关报，由新世界杂志社发行，编辑人煮尘，发行人周继香，停刊时间不详。它注重介绍宣传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学说。
- ③ 《人道周报》1913年1月创刊于上海，中国社会党嘉兴支部所发行，是该党后期的机关刊物。该报提出四大主义，即社会主义、世界语主义、男女平等主义、劳动主义。由于内部的分化，该刊前后期的主旨不完全一致。前期基本上反映了江亢虎一派的观点，后期则重点宣传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现见16期。据江亢虎的回忆，《人道周报》最少发行了20期以上（江亢虎：《人道杂志发刊祝词》（后记），《洪水集》，第82页）。
- ④ 《社会世界》1912年4月创刊于上海，共出5期。其主旨是“改革恶劣社会，促进革新事业，主张平等教育，鼓吹实行共产，维持世界和平，提倡无治主义”。社会世界社的几个主要负责人程恩普、吕大任、沙淦等都属于中国社会党内的无政府派。

本根不除祸岂有艾，吾党抱社会主义者，所以必破家族以绝本根也。然家族制度又有其发生之本根，本根者何，夫妇是已。昔者宗法社会之圣人孔子者，尝谓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其序易卦也。亦曰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则家族之始于夫妇也明矣……实则所谓五伦者朋友最先，太古社会之男女交际朋友而已。由朋友而合为夫妇，由夫妇而有父子兄弟而家族以成。然后以一家为单位积家成国，而最后乃有君臣。是故父子夫妇兄弟三伦，皆属于家族，而以夫妇为其起源。欲破家族制度，不得不自废夫妇之伦始。向者尝主张尽废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四伦，而独存朋友。以朋友属于社会而无碍于平等自由亲爱也。<sup>①</sup>

对于孔子，作者批评说，他只是“宗法社会之圣人”，并指出，“欲实行社会主义必先废孔，废孔则五伦之说亦废。可先废夫妇之伦，而并废父子、兄弟。夫妇、父子、兄弟废而家族制度破”。作者认为，“脱离宗法社会并脱离国家社会，合世界人类而共进于大同，夫是之谓新世界”<sup>②</sup>。与清末新世纪派一样，作者正面攻击孔子；与戊戌时期的谭嗣同也一样，特别强调“朋友”一伦。有些中国社会党人已认为“谭嗣同是东方社会主义之先觉”<sup>③</sup>。

中国社会党人的出身成分各种各样（多数为会党出身者），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也较复杂，有传统主义者，也有反传统主义者。例如，从《社会世界》来看，有人说：“社会主义有精神

① 大白：《新世界》，《新世界》第1期，1912年5月14日。

② 大白：《新世界》第1期。

③ 《东方社会主义之先觉谭嗣同先生》（图），《人道周报》第2号，1913年2月2日。



也，溯稽我国古典丰有社会主义者，杨墨二家是矣……”<sup>①</sup>；“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即真平等也。孔子曰，泛爱众而亲仁（指亲爱）……孔子曰，民可使由之，或亦使民自由之意……”<sup>②</sup>；“社会党者，合孔孟之大同，老庄之无为，墨子之兼爱，以及耶氏释迦之度世主义者也。”<sup>③</sup> 甚至有人认为，儒教的大同、佛教的极乐和耶、回的天堂与社会主义理想同一，即社会主义与宗教之间关系很密切，并没有存在对立因素<sup>④</sup>。这种主张把社会主义附会于中国传统，使我们想起了天义派的某些相似的思想。与此相反，社会党人来稿的《三无主义之研究》一文，则反映了新世纪派的反传统主义的倾向。作者自称信仰“极端社会主义”，即无宗教、无家庭、无政府的“三无主义”；反对封建的纲常伦理，主张打破宗法关系，实行人人平等和男女自由恋爱；并提出实行“无政府”的设想，即，①联络万国社会党，打破国界；②铲除世界之君主国，伸张民权；③采用减政方法，扩张人民自治权利，缩小官治范围；④以契约代替政府；⑤废契约而人道大昌<sup>⑤</sup>。另外，在该杂志中还讨论有关家族和三纲、女性及教育、父子男女关系等道德问题，以及恋爱自由和废除婚姻、个人和社会、鬼神和灵魂、废除姓氏、世界语问题等（参见表7）。这些有关文化革新问题的文章，都是与清末无政府派一样具有共同的思想意识。可是，像江亢虎个人一样，中国社会党中的每个人对于封建文化的革新主张相当不一致。

江亢虎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性质较浓厚的思想意识。因此，中国社会党内不少党员不满意江亢虎

① 蔡铸九：《社会主义述古》，《社会世界》第1期，1912年4月15日。

② 病侠：《说平等亲爱自由》，《社会世界》第1期，1912年4月15日。

③ 唐仲彪：《社会党之观察》，《社会世界》第1期，1912年4月15日。

④ 挟纩：《世间物与社会主义》，《社会世界》第4期，1912年7月15日。

⑤ 社会党人来稿：《三无主义之研究》，《社会世界》第5期，1912年12月。

的改良主义政策，特别是对袁世凯政府的妥协政策，受到了中国社会党内两种势力的反对，除了沙淦、太虚等党内无政府派反对以外，还有中国社会党本部内如陈翼龙<sup>①</sup>等一部分成员。袁世凯暗杀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士主张武装讨袁，中国社会党却反对诉诸武力，主张“法律解决”。后来，“二次革命”爆发后，袁世凯首先下令取缔中国社会党，并捕杀该党反袁派领袖陈翼龙、沙淦等人（1913年8月）。但是，江亢虎对此不能找到明确的策略和方法，他只好遵命解散中国社会党，自己到美国去了。

### 3. “新”社会党：狭义，极端，无强权

在中国社会党第二次联合大会（1912年10月）上，党内无政府派对国家社会主义派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其主要原因即在于承认“国家”与否问题上。在这次大会上，江亢虎表面上调停于两派之间，提出了“于不妨害国家存立范围内，主张纯粹社会主义”的折中口号，实际上他早就倾向于国家社会主义派。但中国社会党各支部大多主张无政府主义，从第二次联合大会表决中国社会党是否参加“政治活动”的结果来看，说明了这一点。站在无政府主义立场上投反对票的有37人，站在国家社会主义立场上投赞成票的仅仅14人<sup>②</sup>。在中国社会党的机关刊物中也出现

---

<sup>①</sup> 陈翼龙（1886～1913.8.6.），湖北罗田人。早年参加过洪门一类会党，当过《新洲日报》记者。曾去日本，与同盟会领袖人物黄兴、宋教仁有过接触。在政治思想上，用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来解释社会主义。辛亥革命后，江亢虎设立中国社会党，陈翼龙是该党最早建立几个支部的发起人，后来成为中国社会党北京部主任干事。他在北京曾开办平民学校，设立法律书报社，发行《生计》杂志。他反对袁世凯的专制主义，到二次革命时，积极从事反袁斗争，终于在1913年8月被袁政府杀害。

<sup>②</sup> 刺虎来稿：《江亢虎之荒谬》，《社会世界》第5期，1912年11月。

用文字主张纯粹社会主义政党者为多，赞成组织完全政党者极少<sup>①</sup>。但江氏仍然强行将他的意见写入中国社会党规章之中。由此，第二次联合大会后，沙淦等无政府主义者决定与中国社会党分离，另外组建无政府主义性质的社会党，即所谓“新”社会党（以下称社会党）。在《社会党缘起及约章》中，他们说明之所以要与中国社会党决裂，实在是因为“社会党无国界，而中国社会党明明有之。社会党反对政府，而中国社会党明明不妨害之。不伦不类，非驴非马。出乡愿手段，陷入类于疑网；用滑头伎俩，阻真理之进行”<sup>②</sup>。他们以“狭义社会主义”、“极端社会主义”等名号，反对中国社会党内的“广义社会主义”、“纯粹社会主义”派（江亢虎宣传的所谓世界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派。

以无政府派为主的社会党以“极端社会主义”为宗旨，提出“二纲六目”的纲领。纲一、“消灭阶级”；目——1. 贫富（实行共产），2. 贵贱（尊重个人），3. 智愚（教育平等）；纲二、“破除界限”；目——1. 国（无远近），2. 家（无亲疏），3. 教（无迷信）。党的任务是：“鼓吹（杂志、书籍、讲演），破坏（实行废除强权、预备世界大革命），建设（育婴院、幼稚院、学校、医院、养老院、农工场、公园）。”该党还对党员规定了“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入政党，不充军警，不奉宗教，不称族姓”的“六不”戒约<sup>③</sup>。他们的“六不”原则很可能是受到辛亥革命后原新世纪派组织过的“进德会”、“六不会”或当时师复组织的“心社”规约内容的直接影响。社会党主要代表人物是愤愤（沙

① 吴相湘：《民国人物传》第3册，第60页，传记文学丛刊，1971。

② 《社会党缘起及约章》（见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第186页）。

③ 《社会党约章》，《社会世界》第5期，1912年11月。

滢)、乐无(太虚)、重忧(吕大任)、鲁哀鸣、徐安镇、华林等人,他们的活动从开始就受到袁世凯政府的弹压,其组织只维持了一二个月。

中国社会党内无政府派杂志《社会世界》刊行到第5期,明确宣布与江亢虎路线诀别,从而加强无政府主义宣传,但他们已不能继续出版其杂志。编辑沙滢离开中国社会党后,参加了社会党刊行的《良心》<sup>①</sup>杂志。另外,《人道周报》的主要编辑徐安镇(笔名安真)是中国社会党本部干事,原来的主张大致与江亢虎相同,到《人道周报》发行后期,袁世凯的独裁愈来愈露骨,于是他的政治态度有了明显变化,更具有浓厚的无政府主义色彩。不久,他就离开《人道周报》,加入沙滢等的《良心》杂志。因此,我们通过对《社会世界》(第5期)、《良心》、《人道周报》(后期)等杂志的分析,大致可以了解无政府社会党的思想倾向。

通过《社会世界》的程恩普、吕大任、沙滢等这些人来看,过去对“民国”、“共和”的追求不过是一场梦幻,这场美梦被袁世凯的铁锤敲醒了,于是他们由失望而走上愤激,由反对袁世凯的独裁政府进而否定一切政府<sup>②</sup>。其核心人物

<sup>①</sup> 《良心》月刊,1913年7、8月,共出两期。主编兼发行人重忧(吕大任),编辑愤愤(沙滢)、乐无(太虚)等人,它实际上是社会党的机关刊物。该报提出四大宗旨:一、改良人群之心理;二、废除社会之恶制;三、联合全球之民党;四、建造大同之世界。可以说,《良心》是国内发行的第一个专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

<sup>②</sup> 有人曾说,“无治主义者,郅治之极轨也。共和之去专制,盖一间尔,仆专制而谋共和,亦仅牺牲帝王个人之幸福,而谋世人一部分之少数幸福耳。若夫为同胞全体、为世界全体谋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则舍无治主义外,其道固末由也”(叔鸾:《中国革命原论》,《人道周报》第15期,1913年5月11日)。

沙淦<sup>①</sup>是中国社会党本部的庶务干事，他反对该党内部的“国家社会主义派”和江亢虎的“广义社会主义派”，而在《狭义社会主义与广义社会主义》等文中已经开始提倡以暗杀暴动为手段的“狭义社会主义”，即无政府主义<sup>②</sup>。他们提出了“自由即共产、平等即无政府”的暧昧模糊的口号<sup>③</sup>，并指出“社会党与中国社会党之十大异点”<sup>④</sup>，尤其激烈地批判江亢虎的“政治活动、纯粹社会主义、恋爱自由、专制主义”四个特点<sup>⑤</sup>。该报刊载的佛教式无政府主义，新世纪派的记事，对于章太炎、刘师培等的批判文章等明显具有自己的特色。这些言论直接影响了《良心》杂志<sup>⑥</sup>，使社会世界社的成员成为良心杂志社的主要成员。《社会世界》（第5期，1912年11月）和《良心》（第1期，1913年7月20日）共同登载了《社会党缘起及约章》和《社会党纲目说明书》，从中，我们可以明确了解两

① 沙淦（？～1913年8月），江苏南通人。他是一个浪迹江湖的郎中，在会党中组织过“侠团”，提出“为社会平所不平”的口号、反映均贫富思想。在重庆，发动由哥老会组成的“汉流唯一社”集体加入中国社会党。他反对江亢虎向袁世凯推销“国家社会主义”，主张“纯粹社会主义”，即无政府主义。1912年11月，沙淦等人发起的“社会党”不称“先生”和“君”等戒约，改名“愤愤”，不到一月，被袁世凯强令解散社会党，但他持续展开强烈的反袁言论。二次革命暴发后，沙淦与吴稚晖等发起“留东俭学会”。1913年8月，被袁政府逮捕杀害。

② 愤侠：《狭义社会主义与广义社会主义》，《社会世界》第1期，1912年4月15日。

③ 乐：“自由即共产也，平等即无政府也”一句见《社会世界》第5期，第67页。

④ 《新闻》，《社会世界》第5期，第70～71页。

⑤ 《江亢虎之四不像》，《社会世界》第5期，第65～67页。

⑥ 中国社会党汉口部干事鲁哀鸣致沙淦的信中说，该部多数人议决“对于党纲实行修改，专主张纯粹社会主义，惟以无政府共产为依归，凡党员不准作官吏、入政党、充议员、当海陆军人，与心社之戒约大致略同”（见《中国社会党汉口部干事哀鸣致愤愤函》，《社会世界》第5期，第114页）。

者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且他们和新世纪派的吴稚晖等人之间的交流也较多<sup>①</sup>。

《良心》杂志创刊号登载的《社会党纲目说明书》指出，人类有一种先天的善良的思想或本能，并把它当做实现无政府主义的主要依据。它认为贫富贵贱的不平等是由于智愚的不平等，故“智愚之阶级，为演成一切阶级界限之总因，然非教育平等则无以医之”<sup>②</sup>。这种以教育平等或普及教育为改造社会的基本手段，是社会党人普遍接受的观点。同时刊载的《无政府之研究》又提出：“无政府之大概，其要不过军国、祖国、宗教、私产、家族五种主义耳。反对军国主义，以免战争；反对祖国主义，以除国界；反对宗教主义，以绝迷信；反对私产主义，以谋共产；反对家族主义，以冀平等。反对五种主义，即反对强权。”<sup>③</sup>很明显，上述观点是从巴黎《新世纪》周报上照搬过来的。在不少问题上，《良心》与《新世纪》都有明显的师承关系，例如，它不仅转载了吴稚晖的文章和李石曾翻译的《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思审自由》等文章，而且伴着《新世纪》的言论，特别强调智愚问题和教育问题。甚至愤愤在一篇文章中还把吴稚晖、李石曾与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并列，称为宣传“社会主义”的先行者<sup>④</sup>。当时，大多数社会党人认为无政府

① 孙中山、吴稚晖、蔡元培等人是《社会世界》的名誉贊成人。“社会世界社”曾发行吴稚晖的《天演学图解》、《荒古原人史》、《上下古今谈》等书（见《社会世界》广告等）。

② 《社会党纲目说明书》，《良心》第1期，1913年7月20日。

③ 迦身：《无政府之研究》，《良心》第1期，1913年7月20日。

④ 蒋俊：《良心》，见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4集，人民出版社，1986，第449页。

主义就是“大同主义”<sup>①</sup>。“大同”的无政府社会包括“平等”、“自由”、“亲爱”、“进化”这四个最高价值。

另外，《人道周报》，宣传的无政府主义与它的编辑者徐安镇（安真）的个人政治趋向有密切关系，他是中国社会党本部的干事，最初因为受吴稚晖、江亢虎等人影响，鼓吹广义社会主义而主张采用和平手段和渐进方法，1912年出版的《天声》和《人道周报》，前期主要就是宣扬这类观点。但宋教仁案发生后，由于对江亢虎的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和对袁世凯的妥协态度的失望，大约从《人道周报》第12期（1913年4月）起，便开始积极宣传无政府主义。从社会党人的共同倾向看，主要是用人道主义观点解释无政府主义学说的某些主张，说“人道主义救世之唯一主义也。人道进化吾人之绝大希望也”<sup>②</sup>。《人道周报》积极宣传男女和工人问题等社会不平等问题，并且该报特别注意世界语的宣传和传播<sup>③</sup>。

综上所述，社会党与中国社会党比较起来，社会党人的杂志里，对传统和无政府主义相结合这类解释的文章显著减少，而有关西方无政府理论的介绍却逐渐增加。但大体上他们的文化思想没有超过新世纪派的思想。其中，在有些人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他们自己的这种特色。例如，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鲁哀鸣在理想世界小说——《极乐地》——中的反传统主义观点和太虚（乐无）及

① 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以《礼记·礼运》篇中的用语，来描绘未来无政府主义社会的远景。社会党人也说，“幼者之生，为继续现社会而生也，现社会自宜公育之；长者之老，为经过现社会而老也，现社会自宜共奉之，是之谓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然不独亲其亲，均安之也，非独不亲其亲也；不独子其子，均慈之也，非独不子其子也……世界于是焉大同”（《社会党纲目说明书》，《良心》第1期，1913年7月20日）。

② 端任：《人道进化之动机》，《人道周报》第3期，1913年2月16日。

③ 真安：《本志宣言》，《人道周报》第1期，1913年1月20日。

华林等人宣传的所谓“佛教式”无政府主义。

鲁哀鸣在 1912 年发表了幻想小说《极乐地》(人道学社发行),作者民国初年加入中国社会党,并任汉口支部负责人。他在小说中描写了一对反抗政府失败后而漂泊海外的夫妇找到无榨取无压迫的极乐世界的故事。这部小说带有明显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可以说这是民国初年流行的一部政治幻想小说。该小说揭露了民国初年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并表现出了激烈的反传统主义意识,它在把社会贫富不均的原因归结为金钱的同时积极批判圣人等偶像崇拜的倾向。《极乐地》作者认为:“圣人是万岁之贼”,“当初那些所谓圣人立了些坏法子,叫什么三纲五常,什么三从四德,这皆是愚人圈套”。人们上了他的当,“把那天赋的自由都失去了”,“从此人权就不平等了”。因而,人们应该起来“赶快打破它”<sup>①</sup>。小说中的主人公就是一个“无法无天无君无圣人”的叛逆者,《极乐地》具体地描述了理想社会的模式。但是,它与刘师培“人类均力”的理想社会并不一样,这里的人从专门科毕业之后,不是立即工作,而是从事三年的侍候人的服务工作,以便锻炼他们的品性。成年人也不是轮流从事各种工作,而是比较固定地从事一种专业生产。平均苦乐的办法是靠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因为这里到处使用先进的机器<sup>②</sup>。科学技术发达的这种乌托邦思想与康有为的《大同书》和新世纪派的理想社会观具有相似的地方<sup>③</sup>。

① 转引蒋俊、李兴芝《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第 165 页。

② 见蒋俊、李兴芝《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第 159~160 页。

③ 蒋俊认为,“中国近代不少人都描述过自己的理想社会,但比较起来,以《极乐地》的描述最为完整、最具有时代精神,因而对后人也更有启发意义。它不像蔡元培的《新年梦》那样粗略和模糊,也不像刘师培的《人类均力说》那样封闭、保守和古色古香。《极乐地》虽然也反对商品经济,赞成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但它憧憬于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共同富裕。它向往技术进步和精神生活的丰富,而且主张吸收西洋的科技成就”(蒋俊:《略论“极乐地”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意义》,《近代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第 103 页)。



在社会党人的主张中，能够自成体系的就是太虚<sup>①</sup>以佛教教义附会无政府主义的一些议论。1911年到1913年间，太虚对无政府主义发生了浓厚兴趣，并且认为佛教教义与无政府主义学说相似，都主张社会平等、普救众生<sup>②</sup>。太虚在《社会世界》上发表的《均贫富浅言》（第2期）一文中认为，平等教育是达到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主要手段。他说，贫富不均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来源，这种现象不仅对贫者不利，也使富者时时感到陷于利权之争的苦恼，因此只有施行“平等教育”才能消除这些罪恶。他还在该报连续发表《广魂魄说》（第3、4、5期）和《社会党与中国社会党之八面观》（第5期）两篇长文，前者在佛教观点上评价孔子的魂魄鬼神说，而后者全面批判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的种种谬误。

太虚在《良心》杂志上发表的几篇文章，都是力图从人类具有共同的本性来说明无政府社会必然实现的原因。这里他则从佛教的教义出发，阐述了这种观点。在《世界之三大罪恶》一文中，认为“私欲心”和“博爱心”是人类先天具有的共同本性。私欲心与恶制度是相互依存的，而博爱心又是和无政府主义相互依存的。去除私欲心的关键在于把阶级界限和恶制度除尽，而恢复人类博爱心的关键则在于启发教育。文章中，作者着重批评了

---

① 太虚（1889～1947），世人称为太虚和尚。浙江崇德人。1905年出家当和尚，1907年他在浙江开始阅读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人的著作，向往革命。1910年在南京跟随佛学大师杨文会研究《楞严经》，同时跟随苏曼殊学习英文。1911年在广州还阅读了托尔斯泰、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一些著作。1912年前后太虚曾与一些革命党人结交往来，与以江亢虎为首的中国社会党人声气相求，同沙淦等社会党人也过从甚密，同师复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接近。当时他认为佛教教义与无政府主义学说相似，都主张社会平等、普救众生。自从1913年8月沙淦被杀害，《良心》杂志被封废后，就不再谈论无政府主义。

② 太虚：《均贫富浅言》，《社会世界》第2期，1912年5月15日。

孔子的伪道德。太虚认为，孔子是“专制政体之大保护家”，“名分是等级制度的护身符，宗法是自由之桎梏”，而封建道德则是“罪恶之保护器械”，“皆预显一名为标准，强人群趋于伪”。他甚至诅咒道德说，“吾殊不解‘道德’二字之意义与罪恶究有何区别也”<sup>①</sup>。太虚把社会政治制度的演变过程套用于宗教方面，得出了宗教最后必然归于消灭的结论。他认为，社会政治制度的演变过程，是从部族到皇权，从皇权到共和，从共和到无政府。而宗教的演变过程则是，从泛神论到一神论，从一神论到无神论，最后归于消灭。未来理想的大同社会，就是无政府、无宗教的极乐世界<sup>②</sup>。太虚本是主张佛教救国的和尚，虽然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某些影响，但他自己说：“我的思想本质仍完全得之佛学的”（见《太虚致吴稚晖书》）<sup>③</sup>。如上所述，鲁哀鸣、太虚两人都明确表现出对儒教文化的反对态度。

另外，华林从佛家“普救众生”的观点出发，提出所谓“无世界主义”，要进行“心性上的革命”。认为无政府主义只提出无政府、无强权、无国家，还不能实现真快乐、真平等，只实行“社会革命”、“经济革命”、“生计革命”，还不能算是真革命。他还解释说，佛家所说的“众生”，并不是只限于人类，还应当包括一切鸟兽虫鱼。它们和人类既然同是生物，当然也有同人类一样生存和进化的权利。他甚至提出：“所以，非仅研究世界语，乃须研究各种兽语，融通成一种语言。”<sup>④</sup> 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从“众生”或“极乐”等词汇中可以看到太虚和华林等人

① 太虚：《世界之三大罪恶》，《良心》第1、2期，1913年7月12日、8月20日。

② 见路哲《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第130页。

③ 转引蒋俊《社会世界》，见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4集，第230页。

④ 华林：《无世界主义》，《良心》第2期，1913年8月20日。

解释的佛教式无政府主义为何物，但这种论调不是社会党主流的基本立场。因为在《良心》杂志上发表的不少文章中，多数作者坚持反对宗教迷信的主张，提出了“反对宗教主义”的口号。但他们不是直接针对太虚、华林的论点，而是从争取个人绝对自由的角度出发来反对宗教。

无论如何，有些社会党人提出的佛教和无政府主义结合的问题具有独特的魅力。其实，清末章太炎的《四无论》等文已经具有佛教色彩。民初除太虚、华林等人以外，甚至后述的师复思想中也能发现佛教的某些影响。这种现象给我们的印象是，无政府主义和佛教之间并没有矛盾或对立的关系，而是存在着相互补充的可能性。另外，儒家的大同、平均观念和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的结合，以及把道家的老庄、鲍敬言等人的思想视为中国古代无政府主义的同一形态，这些都是无政府主义被近代中国所接受的一个主要特色。

## 第二节 师复与无政府共产主义文化论

### 1. 从“刘思复”到“师复”

(刘)师复(1884~1915)，原名绍彬，后名思复，字子麟，广东香山人。师复幼年受过系统的旧学教育，1899年15岁即考中秀才，名列全县第一。但由于他对科举产生嫌恶心理，故放弃了科举道路，而在当地从事社会活动。1901年为了提倡改革，在香山创设“演说社”。1904年留学日本，次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在这时期，他也受到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和俄国虚无党人的影响，开始热衷于暗杀活动，并跟从一个俄国人学习制造炸弹，为

以后搞暗杀做准备<sup>①</sup>。1906年同盟会准备在广东举行起义，派师复回国进行工作。不久，师复与朋友一起在香山办女子学校，给女子以教育的机会。1907年在广州计划暗杀李准，但在制造炸弹的过程中，因爆炸受伤，而一度被捕。一直到1909年，他都被关押在香山监狱。

在狱中他曾阅读了一些有关佛学的著作和介绍无政府主义学说的小册子<sup>②</sup>。刘石心回忆中说：香山监狱时期“我常能把他（师复）需要的书籍带进去，其中包括从香港转来的《新世纪》，这是在巴黎出版的一种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他看得很上心，有时还讲些内中的道理给我听，他赞扬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是崇高的”<sup>③</sup>。但是，因师复的意识内一直存在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所以当时他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一个典型的排满革命论者。在监狱里，师复著述了《奥语解》、《狱中笔记》、《改良监狱议》等著作，并协助同志创办《香山旬报》，以笔名发表过多篇文章。《香山旬报》是他的朋友郑彼岸主办的，是同盟会在石岐的地下机关刊物<sup>④</sup>。这一时期，从师复投稿于《香山旬报》的文章中可以发现辛亥革命以前他的文化思想的几个主要特点，即男女平等意识、强烈的道德意识、对于佛教的醉心和对儒学的批判意识、文字学和社会学的素养等（参见表8）。

那时，师复可以说是一个较彻底的“男女平等”论者，坚决反对“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谴责束缚妇女的封建礼教。例

① 据郑佩刚的记录，师复在日本留学时期（1904—1905年末），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主编的《直言报》和《帝国主义》、《基督抹杀论》、《广长舌》等著作，曾留给他以深刻的印象（郑佩刚：《师复传》（手稿））。

② 参见文定《师复先生传》，《师复文存》（以下《文存》），革新书局，1927，第1—8页。

③ 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第929页。

④ 郑佩刚：《关于刘思复之暗杀活动》，《广州文史资料》第5辑，1962。

如，《造字时代之男女平等观》和《佛教之男女平等观》两篇文章中，他用文字学和佛教知识探讨男女平等的正当性。在对《说文》的“妻”字解释中，他说，“入宗法社会，三从七出学说潮出，野蛮陋风，视为公理……而女子又皆自安卑弱，无才无学，不能与男子争议”<sup>①</sup>。他又用佛教的男女平等论，批评了封建礼教秩序对女性的束缚<sup>②</sup>，坚决主张恢复“女权”，使男女臻于平等。师复对“道德”问题也进行过研究，认为“道德与知识，反比例之物也，智识愈开，道德往往愈下。此事于百年来之欧美验之。于二十年来之中国复验之。欧美有法律，暂未至于溃决，中国无法律，其祸真不堪问也”<sup>③</sup>。此外，对于其他社会陋习，如轻视蛋民、堕民和蓄“世奴”等，他也认为应将之作为野蛮现象而消除。作者欢迎一些地区释放“世奴”和为蛋民倡办学堂的活动，把这些事宜视为人们“平等观念日渐发达”的标志。从师复这时期的文章之中，很容易看出师复对道德重视的态度。他在证明他的这些论旨过程中喜欢采用的方法是传统考证学和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及其方法。

从师复写的文章里，我们往往能发现他对佛教的兴趣，这可能是与清末知识分子对佛教思想的研究热有关<sup>④</sup>。除佛教外，他还学习诸子学和小学等。师复利用“新”解释的儒学知识，从多方面抨击了当时仍然在中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儒教思想。

① 师复：《造字时代之男女平等观》，《香山旬报》1908年10月（见张磊整理《师复集外文（一）》，《中国哲学》第12辑，1984，第507页）。

② 参见师复《佛教之男女平等观》，《香山旬报》1908年10月（见张磊整理《师复集外文（一）》，《中国哲学》第12辑，1984，第508页）等。

③ 师复：《網庵漫语》，《香山旬报》1909年10月（见张磊整理《师复集外文（二）》，《中国哲学》第13辑，1985，第346页）。

④ 美国研究者 Krebs 关于师复研究中较强调佛教对师复的影响（〔美〕E. S. Krebs, *Lou Shi fu and Chinese Anarchism 1905 ~ 1915*, Ph. D. Dissertation, Univ. of Washington Seattle, 1977）。

他指出儒教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长期得到了“独尊”的地位：“儒家自汉武帝后，始专制于学界。二千年间，学者迷信孔氏，尊如帝天”，“历代帝王利其便己，而与推崇”。清廷的倡导理学，也正是“利用孔教尊君之说，以愚黔首”。由此，他坚持对于孔学、孟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及康有为的孔教论等西汉以后一切儒学的批评态度。师复在《網庵谏语》一篇长文里，着重批判儒学和君权的结合以及儒学和宗教的结合这两种现象。其中，特别攻击的对象就是宋明理学和康有为的孔教论，他认为通过脱离孔教的束缚而争取学术思想的自由，就会得到学术的复兴。师复提出“欲破孔教，当自六经与儒家分离始”<sup>①</sup>，这样才会使诸学问复兴。在他的文章中有些地方具有否定孔子的倾向，但大体上来说，重点批判的是孔学和孔教问题。而且师复为了民族国家的建立，主张采用近代学术的分类方法，从而进行传统学问的革新。但他对于欧化思潮来说却一直坚持了怀疑的立场。师复早期的上述看法，是与清末国粹派对孔教、孔学的批判逻辑大体相同的<sup>②</sup>。

师复从出狱到辛亥革命前夕为止，他的主要活动集中在两方面：“专研究巴黎新世纪报倡导之无政府主义”；积极从事暗杀活动<sup>③</sup>。1910年春，他在香港组织“支那暗杀团”，团章把宗旨归结成为“反对强权”。这时期，师复实际上已从同盟会中分化出

① 师复：《網庵谏语》，第349页。

② 参见张磊、余炎光《论刘师复》，《近代中国人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484~490页。

③ 有人提出，师复的革命活动分为三个时期，即同盟会时代（香山监狱收监时期），支那革命团时代（出狱后进行暗杀活动的辛亥革命时期），《民声》时代（暗杀团解散后，通过《民声》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时期）（〔日〕石川洋：《师复と无政府主义—その理论と价值感を中心に》，《史学杂志》第102期第8号，1993年8月，第1443页。

来。师复曾回忆说：“入狱两年余，经种种刺激及研究，而余之思想一变。出狱后组织暗杀团，章程为余所起草，以‘反抗强权’为宗旨，取单纯破坏之手段。自是之后，余虽未尝揭无政府之主张，然敢自信确为反抗强权之革命党，而非复政治之革命党。且以后皆独立运动，与同盟会亦几无关系矣。”<sup>①</sup>当时，师复与江亢虎相似，是受到了日本社会主义者和欧洲及新世纪派的影响。1910年冬汪精卫、黄复生等谋杀清摄政王载沣不成，被捕下狱。对此，师复决定再由支那暗杀团继续进行。但当时北京警备森严，不可能再派人去硬干，而且广东正在积极筹划起义，所以师复暂时保留暗杀计划，积极参加在广东方面进行的革命工作。1911年3月，广州起义在水师提督李准的镇压下失败了。为了报复，师复等人进行了暗杀李准的计划，最终成功了。同年9月，他又参与炸死清朝派来广东的将军凤山的活动。在这些暗杀活动过程中发生了武昌起义，革命成功之后，师复相信专制王朝已经被推翻，于是停止了个人恐怖活动，转而开始了对无政府主义道德原理的宣传与实践。师复于1912年春解散了暗杀团，旋与他的同志们前往西湖游览，并在白云庵居留月余。

1912年5月，他在广州组织宣传社会革命的“晦鸣学舍”，主要成员除师复外有湘田、无等、抱蜀、无为、天放、石心、世元、郑彼岸、郑佩刚、黎昌仁等。其成员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和学习，并以宣传无政府主义为职业，是为中国内地传播无政府主义之第一团体。可以说，“数年前《新世纪》所下之种子，至是乃由晦鸣学舍为之灌溉而培植之”<sup>②</sup>。同年7月，师复在广州与纪彭、彼岸等人又正式组织了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的“心社”，宣

<sup>①</sup> 师复：《验江亢虎》，《民声》第14号，1914年6月13日。

<sup>②</sup> 师复：《致无政府社会党万国大会书》，《民声》第16号，1914年6月27日。

布十二条戒约，从此废姓改名师复。据有人回忆：“在广州《平民日报》、《天民报》上开辟所谓‘心社析疑录’一栏，讨论‘社约’和公开鼓吹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由于青年好奇心的驱使，我们对刘师复和‘心社’活动渐有印象”<sup>①</sup>。

师复出生之后最早的姓名是“刘绍彬”，因为立志反满，思念光复，改名为“刘思复”。辛亥革命之前，师复是一位典型的民族主义者。民国成立后，师复接受无政府主义，于是变成了一位彻头彻尾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放弃了过去的民族国家的理想，但他的清教徒式道德观念却一点也没有发生变化而一直保持下来。由此，他为了反对家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实行，决定废姓氏。此后，他的名字，全不写姓，或另改其他名字。刘思复则改为“师复”，意思就是希望断绝自己的过去。

## 2. “心社”和清除旧恶习

辛亥革命前革命派的主要问题是推翻专制王朝，革命成功后，在一段时间里充满了乐观的情绪。无政府派也对当时的共和政府多少抱着一种信任的态度，所以他们对通过个人道德的自我完善来创造社会道德极感兴趣。因此，1912年2月，原新世纪派的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张静江等人和蔡元培、张继首先发起成立“进德会”、“六不会”等个人道德启蒙团体。对此，师复极力赞成。共和政府成立之后，他最初也并没有考虑立即公开开始进行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活动。据郑佩刚的记录，心社正式成立几个月前，即1912年4月，师复和丁湘田、郑彼岸在杭州讨论了两件事情，一是组织“心社”，二是筹办“红荔山庄”。无政府共产主义实验地“红荔山庄”的计划破产了，但在广州“晦鸣

<sup>①</sup> 秋雪：《回忆刘师复和“心社”活动》，《广州文史资料》第5辑，1962。



学舍”以及“心社”的成立计划却实现了<sup>①</sup>。

晦鸣学舍和心社的成立，标志着无政府主义者在国内活动的新阶段。这两个组织的活动范围和任务是有区别的，前者揭橥出纲领性的8条，包括“共产主义；反对军国主义；工团主义；反对宗教主义；反对家族主义；素食主义；语言统一；万国大同”<sup>②</sup>。它侧重于对外活动，主要任务是传播无政府主义。后者则制定了属于“个人进德”性质的12条社约，包括“1. 不食肉；2. 不饮酒；3. 不吸烟，4. 不用什役；5. 不乘坐人力车轿；6. 不婚姻；7. 不称族姓；8. 不作官吏；9. 不作议员；10. 不入政党；11. 不作海陆军人；12. 不奉宗教”<sup>③</sup>。它侧重于对内活动，促成社员精神上的一致。晦鸣学舍成立后（1912年5月）到《晦鸣录》创刊（1913年8月）的一年余，主要活动只是从事《新世纪》上登载过的各种文章的结集出版。例如，《无政府主义粹言》（收录了《新世纪》中《革命原理》、《普及革命》等18篇文章）、《新世纪丛书》、《无政府主义名著丛刻》（收录了《工人之无政府主义谈》、《告少年》等8篇译文）、《军人之宝筏》等。这样，晦鸣学舍初期的主要活动是介绍新世纪派的无政府主义，而发表自己意见的并不多。

当时，师复最关心的是道德方面而不是政治方面，我们通过《心社趣意书》和师复在杭州、广州准备心社时期（1902年4~5月）写的几篇文章，大概可以了解他的心社戒约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模式。心社的目的就是“本坚卓之志，就简单之途，立为戒约，互相切磋，期破坏一切伪道德恶制度，而以公道的真

① 郑佩刚：《师复传》（手稿）（转引蒋俊、李兴芝《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思潮》，第173页）。

② 师复：《编辑绪言》，《晦鸣录》第1号，1913年8月20日。

③ 师复等：《心社趣意书》，《社会世界》第5期，1912年11月15日。

理的新道德良制度代之”<sup>①</sup>，并提出了上述的12条戒约。

关于第1、2、3戒约：心社同人提倡“欲成高尚之人格，保清明之志气，必自戒斯三者始”<sup>②</sup>。师复在《不吸烟、不饮酒与卫生》一文中认为，这一“卫生”项目是改良人格一要事。因此，他首先提倡科学的卫生，而否定反科学的饮酒和吸烟行为。在恶习与恶劣嗜好中，包括饮酒吸烟，对于酒精、尼古丁等危害人体，他说得颇为详细。师复在生活上具体地提出素食主义、反对肉食的方法<sup>③</sup>。后来，他又写了《素食主义浅说》一文。他将素食分类为“医学的素食主义”和“博爱的素食主义”。如果说前一文较强调医学上的问题的话，后一文则较强调道德上的问题。作者认为，肉食不卫生，“经医家考验，知其中含毒质至多”，污染血液，如脑筋肠胃血络诸病，往往为肉食所致，而且认为肉食者残杀生物以供口腹之欲，是极不人道的，这样做“实无异于肉食兽之残其类”。所以“前者属于卫生问题，后者属于道德问题”。并说“素食主义，自卫生言则为爱己，自道德言则为爱他”。这可能是受托尔斯泰和李石曾等人的影响<sup>④</sup>。有趣的是，过去佛教色彩浓厚的师复曾认为，佛教的“戒杀生”是一种极端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素食主义比较起来，它不具有卫生和道德方面的科学性。

关于第4、5戒约：《不用仆役不乘轿及人力车与平等主义》中，师复指出用仆役及人力车是“绝对违背自由平等之公理”，他说：“用仆役及乘轿者，亦掠他人神圣之劳力所获得之结果（谓逸乐），而以为一己之私乐也。”还说，“由是言之，则由仆役

① 师复等：《社会世界》第5期，1912年11月15日。

② 师复等：《社会世界》第5期，1912年11月15日。

③ 师复：《不吸烟、不饮酒与卫生》，《文存》，1912年5月，第93~100页。

④ 师复：《素食主义浅说》，《民声》第7号，1914年4月25日。

与乘车轿者，不独灭他人之人格，抑亦不敬自己之人格，不尊自己之自由矣”<sup>①</sup>。这样，心社同人在我和别人之间是处于相互平等的原则基础上，反对用仆役或乘轿及人力车的行为。但心社也提出“病者、老人、幼子不在此例”<sup>②</sup>。

关于第6、7戒约：在《废婚姻主义》一文中，师复断言结婚是女子不能与男子平等之根源，认为婚姻制度不过是强者抑压弱者的道具。他指出，就是一夫一妻制，“证之欧美女子，事实上终不脱‘男子之玩物’之范围。种种法律，亦惟男子是利”。除了婚姻制度外，他在男女性欲问题上又说：“夫男女情欲，不过生理之作用，与饥食渴饮，同为一绝不足为奇之条件”。饮食属一人之事，交媾纯为二人之自由。因此，师复反对贞淫之说而主张自由恋爱。何以自由恋爱不容易实现？其原因是除伪道德迷信外，还在于女子之经济不能独立。由此，作者反复强调女性的自由恋爱和经济的自立<sup>③</sup>。师复又认为，“姓”由于代表着血缘关系，它的存在便成为一种人身依附关系的象征，这是与个人主义的精神不符的。“族姓者，自私之物也。有族姓则有长幼尊卑之名分，长者尊于天，幼者卑于地，蔑视公道，丧失人格，莫此为甚”<sup>④</sup>。心社同人在进化论观点上除了族界以外，进一步主张县界、省界、国界的完全废除。如上所述，师复等人认为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和在婚姻基础上形成的种族制度，都是私有制的产物，也是遗产归公的巨大障碍。他们为了解决幼子、老人、女子等家族问题的矛盾，提出了“公共产育院”、“公共养老院”、“女子习艺院”的建立。其实，废结婚和废族姓两个问题与“家族主

① 师复：《不用仆役不乘轿及人力车与平等主义》，《文存》，1912年5月第101-105页。

② 师复等：《心社趣意书》，《文存》。

③ 师复：《废婚姻主义》，《文存》，1912年5月第107-114页。

④ 师复等：《心社意趣书》。

义”是有密切关系的。

关于第 8、9、10、11 戒约：心社同人认为，“有受治之平民，而后有治人之政府。政府者，强权之所树也。官吏者，使用强权者也。议员者，制定强权之法律以授之官吏者也。政党者，官吏议员之营业场也。故三权皆强权。强权即平民之敌也”。这样，各种政治力量都是与人民为敌的强权，而且“一人政途，亦必先灭去其几分之良心，而后可适存于政治社会，虽有贤者，莫能自脱”。因此，他们坚决反对官吏、议员、政党三者<sup>①</sup>。并且，他们认为因为海陆军是“皆杀人者也，扰乱和平者也”，而军人和军队是“政府贵者之利，而平民之害”，所以提出了不做军人和反军国主义的主张，说“是故欲世界大同，必自弭兵始，欲弭兵，必自人人相戒，不作海陆军人始”<sup>②</sup>。

最后第 12 戒约即“不奉宗教”问题，师复宣言称“神者（佛与祖宗亦神之属），无形之强权也”。因为“宗教为保护强权之利器，导人安贫守分，服从强权”，所以反对宗教、迷信在师复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些宗教概念之内包含“圣贤之教”<sup>③</sup>。因此，他特别着力谴责作为中国封建传统思想核心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视之为宗教迷信和伪道德。它与第 6、7 戒约一起，构成了师复的“废家族主义”主张。

与清末天义派、新世纪派及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人一样，师复通过对专制君主制的批判自然地认识到封建社会秩序的支柱——“家族”。因此，在心社戒约中表面上并没有看到关于家族问题的项目，但不婚姻、不称族姓及不奉宗教项目实际上都是

① 师复等：《心社意趣书》。

② 师复等：《心社意趣书》。

③ 师复等：《心社意趣书》。

在讨论家族问题的内容。可以说，辛亥革命之后师复最注意的问题与其他激进主义者一样在于旧家族制度。从心社成立前后他写的《废家族主义》一篇长文中，可以看到这一事实。作者宣称：“家族之起源，由于婚姻，家族之界域，成于族姓。故废婚姻，所以去家族之根源，废族姓，所以泯家族之界域。二者相为表里者也。”<sup>①</sup>这就是说，家族的起源是由于婚姻，而家族的体现是一族的姓，所以通过废止婚姻制度而断绝家族的起源，并通过废止族姓而解体家族的界域。师复在分析了家族和社会、财产、平等三者之间的关系后，从而明确提出废家族的历史意义。他说：

社会者，当以个人为单纯之分子也。自有家族，则以家为社会之单位。个人对于社会，不知有直接应负之责任，而惟私于其家。人人皆私其家，而社会之进化遂为之停滞。财产者，世界之公物，非人所得私有也。自有家族，老者计积蓄，少者冀承产，无人无日不以私产为念。竞争既久，遂成今日贫富悬绝黑暗悲惨之社会。人人平等，无能相辖。自有家族，而青年男女遂皆卑屈服从，无复独立之人格。支那人恒言曰：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君臣。故家族者专制政体之胚胎也。<sup>②</sup>

师复认为，特别是“支那之家庭，非家庭也，一为黑暗之监狱耳”。因此，为了废止家族制度，他提出了婚姻革命和族姓革命。为了实现两个革命，他又提出了纲常名教的革命即“三纲革命”。在三纲问题上师复《废家族主义》的后半部引用了《新世纪》上李石曾写的《三纲革命》全文来代替本人的意见，表明了

① 师复：《废家族主义》，《文存》，1912年5月，第115页。

② 师复：《文存》，第115～116页。

他与新世纪派的想法完全相同。认为夫为妇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的三纲是宗教迷信，人人平等、父子平等和男女平等是科学真理，提倡“家庭革命、圣贤革命、纲常革命”等等<sup>①</sup>。

综上所述，师复受到原新世纪派文化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应把道德改良作为了解无政府革命运动的第一步。而在他的“心社”规约中，可以看到佛教的某些影响。有人曾说，无政府主义一方面追求个人的彻底自由，另一方面实行个人的禁欲生活，这是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批判有关系的。但是，清末民初中国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而传统封建的因素却以很强的力量存在。所以在这样的社会里，进步知识分子着重批判的是维持封建秩序的道德和文化，甚至强调建设近代的精神文明<sup>②</sup>。心社的戒约充分反映了这种心理状态。

心社的12戒约是个人道德规约，但它与后来的晦鸣学舍的社会革命宗旨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例如，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和素食主义；不婚姻、不称族姓和反对家族主义；不奉宗教和反对宗教主义；不作海陆军人和反对军国主义之间都有直接的联系。另外，不用什役、不乘坐人力车轿、不作官吏、不作议员及不入政党规约和共产主义及万国大同主张之间也有密切关系。其实，晦鸣学舍提出的新的宗旨就是“工团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和“语言统一”（世界语）两个问题。

### 3. 《民声》中的反复古主义

1912~1913年间，师复在心社活动中对现实政治的怀疑和不满渐渐增大。他认为，无论是袁世凯的独裁专政，还是孙中山

<sup>①</sup> 师复：《文存》，第117~125页。

<sup>②</sup> 〔日〕有田和夫：《清末におけるアナキズム》，《东方学》30，1965，第86页。

的国民党或是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等路线，都存在不少的矛盾。特别是原新世纪派的张继、吴稚晖的政治活动，对师复的冲击相当大，他不满地说：“张继与吴稚晖，皆中国提倡无政府主义之先进，前数年在《新世纪》操笔论时，持论至激烈。乃张继既作议员，吴稚晖亦时周旋于国民党间，即于政党日益接近，既与社会党无政府党日渐疏离。”<sup>①</sup> 师复曾写信给张继和吴稚晖，对他们有所责难。因此，他与吴稚晖之间在有关进德会规约和政治参与问题上发生了一场论争。吴稚晖在答信中提出，师复对进德会章程有所误解，因为张继是进德会中的甲种会员，所以张继没违反它的规约而可以参加议会云云。并且，对于师复劝告张继脱离政治的主张，吴氏个人公开支持张继的议会活动的现实意义<sup>②</sup>。师复不服吴氏之主张，说，“近日好谈‘反面的社会主义者’，往往谓借政府能力可以达社会主义之目的。此等邪说，实足为社会主义之玷……记者（指师复）于此，不禁为无政府主义痛哭”<sup>③</sup>。可能是这一段时期师复认识到强调个人道德不能达到无政府社会，又认为迫切需要无政府原理的介绍和传播。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1913年8月20日在广州出版《晦鸣录》（一名“平民之声”：La Voco de la Popolo）。出版两期后，迁往澳门，从第3期（1913.12.20）起改名为《民声》。形式包括华文及世界语两部分，主张“倡导社会革命，促进世界大同”。至第4期（1914年初）迁往上海。师复的《民声》与清末无政府派的根本差别，在于忠于无政府主义的原则上，从而否定了民国共和体制本身。师复拒绝一切政治和权力，在追求根本变革的过程中，他通过自己的机关刊物批判民国初流行的非体系性的社

① 师复：《再致吴稚晖书》，《晦鸣录》第2号，1913年8月27日。

② 师复：《晦鸣录》第2号。

③ 师复：《晦鸣录》第2号。

会主义诸思潮。

在这里，我们注意的是，实行个人道德的“心社”和宣传社会革命的《民声》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是师复不能不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师复声称：“盖心社社约只为个人道德问题，而与社会无涉。《晦鸣录》则以倡导社会革命，促进世界大同为宗旨，纯为研究社会问题，而不但拘拘于个人道德而止。”<sup>①</sup>他将《晦鸣录》改名为《民声》后又说，“相戒勿为违背真理之事”为目标的心社和“废绝私有财产、倾覆一切强权以成共产大同之社会”为目标的民声社两者间有差别。心社戒约不过是晦鸣学舍同人内部的规约，师复只同意道德问题是无政府社会革命的第一步<sup>②</sup>。以后在答复恨苍的信中又说：“至个人道德，在无政府共产主义之根本论据，以为必社会改良，然后个人道德可以改良。”在文章中，他明确反对个人无政府主义的“必先改良个人，然后可以改良社会”的观点，认为“若欲人人于有政府之世先具无政府之道德，此可决其不能亦可不必也”<sup>③</sup>。因此心社虽有戒约，但心社以道德问题为准，与以推翻政府及资本制度为目的无政府党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可以说，创刊《民声》的意义就是从注重以“个人道德”为主的文化问题转移到以“社会革命”为主的无政府理论宣传及主张经济革命这一重要方面。因此，在《民声》中虽也反复谈到道德及文化问题（参见表9），但从他的看法中可以看到发生了一些变化。

例如，有关废除姓氏问题上，他说，“废姓者当以破除家族为前提，必能破除家族者方可谓实行废姓”；但他又说，“乃一己

① 师复：《师复启事》，《晦鸣录》第2号，1913年8月23日。

② 师复：《答凡夫书》，《民声》第5号，1914年4月11日。

③ 师复：《答恨苍》，《民声》第20号，1914年7月25日。



之自由，若对于他人，则称之可也。”<sup>①</sup> 有关宗教问题上，他认为“宗教穷不过政府与资本家之附属物耳。排除宗教，自是无政府之一种手段，而不必与无政府共产之根本要义”<sup>②</sup>。有关婚姻制度问题上，他反复说，“婚姻制度之大谬点，即在误生理问题为道德问题”，但他为了废止婚姻制度而更强烈地主张“经济革命”<sup>③</sup>。特别是在家族问题上，他基本同意家族革命的意义，但他对社会党进行批判时说“家族主义虽为强权之一种，然其细已甚”，如果达到无政府社会的话，自然地就消灭了家族制度。因此，他不认为破除国界和破除家族具有同等的地位及价值。如此，废家族主义等道德革命已经不是师复的最高目标。此外，他对有关“不作海陆军人”项目进一步解释说：“至心社所以有不作海陆军人之说者，以心社内道德的问题。社会运动，则非心社范围内之事。故凡与真道德相违反者，皆得列入社约，倘其别有怀抱欲隐身军队以行其革命之职志者，则可暂居赞成人之列，而吾心社亦不至失此良友也。”<sup>④</sup>

在《民声》上师复着重提出的主要问题是两个方面：一是无政府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的差别是什么？另一是无政府社会革命的手段和方法是什么？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他首先正名“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共产主义”这两个概念。师复认为“无政府”和“共产”概念是近代的“新”用语，他明确指出：“‘无政府’云，‘共产’云，此名在华文中为新产物，其主义之在东洋，则犹襁褓时代之婴儿耳。”<sup>⑤</sup> 民初时期，与清末天义派一样，有些人认为无政府主义学说符合中国古圣先贤的教导。他们或用儒

① 师复：《答恨痴》，《民声》第10号，1914年5月16日。

② 师复：《论社会党》，《民声》第9号，1914年5月9日。

③ 师复：《反对家族主义》（书后），《民声》第10号，1914年5月16日。

④ 师复：《论社会党》，《民声》第9号，1914年5月9日。

⑤ 师复：《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民声》第5号，1914年4月11日。

家的“大同说”，或用老庄杨墨的片言只语牵强附会地去解释无政府主义学说。师复针对这些现象说：“好古者则又执保存国粹崇拜祖国之陋见，取中国经籍牵合而附会之，以为社会主义本吾国所固有”<sup>①</sup>。他明确地批判一部分社会党人将老子和无政府主义结合而提出的“无治主义”式解释方法<sup>②</sup>。

师复又认为，社会民主党（指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集产主义、独产党（指个人主义者）主张独产主义，而无政府党则主张共产主义<sup>③</sup>。本来，“无政府主义本质为对于政治之学说，虽含对于经济之意见而不限定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则纯为对于经济之学说”，而且共产主义概念的核心内容是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上。并且，他定义“共产主义而兼主张无政府者是为‘无政府共产主义’”<sup>④</sup>。可以说，无政府主义是“公名”，而无政府共产主义是“专名”，即无政府主义包括无政府共产主义。他还认为，无政府主义可以包括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不能包括无政府主义。所以社会党人主张的“无家庭”和“无宗教”等概念，都包含在“无政府”这一概念里。可以说，它是一种广义的抽象的概念。师复宣称他是无政府主义中的一个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其实这里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克鲁泡特金主义是同一词，因此，他公开宣称：“克鲁泡特金，吾党之泰斗。”“克氏学说，实不愧为吾党之经典。”他极力赞扬克鲁泡特金的科学主义，并介绍克鲁泡特金的种种学说。大概基于这种解释的基础上，他对各种社会主义概念进行了批判。

① 师复：《论社会党》。

② 师复：《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

③ 师复在《民声》中分类的共产主义、集产主义、独产主义方法在1907年新世纪派发行的爱露斯著、真民（李石曾）节译《世界七个无政府主义家》（新世纪丛书之五）之中可以看到。

④ 师复：《答悟尘》。

本来，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传播时，许多人都把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三个概念混合在一起。例如，孙中山等人宣传说，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就是从英文 Socialism（译为社会主义）一词翻译过来的。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也以三无主义为中心提倡自己的社会主义。师复认为这两种社会主义不过是似是而非的社会主义，他指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具有强烈的国家社会主义性格，并判断其对国家权力之性格的深刻把握方面缺乏认识。因此，师复通过批判平均地权说和产业国有政策后，提出质问：如果孙中山所说的国有化政策被认为是社会主义，那么，清朝政府与袁世凯政府的国有化政策是不是社会主义？<sup>①</sup> 对于江亢虎，他的批判则更为激烈。他指出，中国社会党的纲领不仅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原则，而且土地政策等各种主张也不过是改良性的社会政策<sup>②</sup>。由此，师复对江亢虎之社会主义评价说：“江氏不主张生产机关公有，不主张废私产，违背社会主义之原则，故江氏所主张非社会主义。江氏对于政治主张限制军备，采用单税，对于产业，主张营业自由，财产独立，皆属国家的社会政策，故绝不能社会主义之名。”<sup>③</sup>

当时，师复着重批判的是，中国社会党和社会党人主张的一些主义，例如“纯粹社会主义”、“真正社会主义”、“极端社会主义”、“无治主义”、“无政治主义”等。他还批评所谓“三无主义”、“五无主义”、“反家族主义”、“反宗教主义”、“无祖国主义”、“无军备主义”、“无国会主义”等无奇不有的名称，全都不

① 师复：《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民声》第6号，1914年4月18日。

② 参见师复《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民声》第6号；《答江亢虎》，《民声》第8号，1914年5月2日；《答李进雄》，《民声》第11号，1914年5月23日；《驳江亢虎》，《民声》第15号，1914年6月13日；《江亢虎之无政府主义》，《民声》第17、18号，1914年7月4、11日等。

③ 师复：《答李进雄》。

是科学用语，不能包括在无政府主义学说里<sup>①</sup>。在《民声》中，通过对社会党人的质疑和师复的答辩形式，明确揭露社会党人在概念上的种种谬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论争是在师复与乐无（太虚）之间的有关社会主义概念问题上展开的。乐无首先提出希望用无政府主义代替“无强权主义”一词，师复则在《论社会党》一文中对于社会党名称的问题提出异议。他说，社会主义是对社会的学说而不是对政治的学说，对政治的学说就是无政府主义，所以社会党这一名称是不适合的。他又批判了社会党纲领中种种不合理的因素，并进而批判了社会党人的政党活动。对此，乐无在《答论社会党》中提出“社会”是“家族以上，国家以下”的组织，而社会党人主张的无政府的目标是废除国家、共产的目标是废除家族。但师复即刻反驳这种看法，他认为从人类历史来看，社会成立后才出现家族和产生国家，所以家族、社会、国家三者概念不会成为同等概念。讨论中，他特别不满意社会党人把无政府主义与传统思想相结合的非科学的态度<sup>②</sup>。但是，师复坚持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同类异派”（中国社会党、社会党等）不非难的立场，所以他对社会党大致给予友好的评价。

师复与《民声》迁到上海后，即与原社会党和中国社会党的主要成员建立起联系，并频繁交流其看法，不久，就先后组织了上海共产主义同志社（1914年7月）、南京无政府主义讨论会（1914年5月）、常熟无政府主义传播社（1914年5月）等，原广州心社的骨干分子则组织了“广州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1914年7月）。以师复为主的中国无政府派，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也从事他们的活动。例如，袁振英等人在香港成立了“大

<sup>①</sup> 参见师复《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论社会党》；《答悟尘》等。

<sup>②</sup> 参见师复《论社会党》；《答乐无》，《民声》第13、15、16号，1914年6月6、20、27日。

同社”，他们主张无家庭、无国家、世界大同，与广州的心社相呼应。梁冰弦也在新加坡出版《正声月刊》，宣传无政府主义。这样，中国无政府运动在急速发展。同年8月，师复公布了《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一文，这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

在《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中提出的14项具体地描述了师复所追求的无政府理想社会。大概从第1项到第8项反映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内容，从第9项到第14项的内容则包含了他们对于教育、文化方面的态度。摘条如下：

……（九）废婚姻制度，男女自由结合，产育者由公共产育院调理之，所生子女，受公共产育院之保护。（十）儿童满六岁以至二十或二十五岁，皆入学受教育。无论男女，皆当得最高等之学问。（十一）无论男女，由学校毕业至四十五岁或五十岁，从事于劳动，此后休养于公共养老院。凡人有废疾及患病者，由公共病院调治之。（十二）废去一切宗教及一切信条。道德上人人自由，无所谓义务与制裁，使‘互助’之天演道德，得自由发展而至于圆满。（十三）每人每日劳动时间，大约由二小时最多至四小时，其余时日，自由研究科学，以助社会之进化，及游息于美术技艺，以助个人体力脑力之发达。（十四）学校教育采用适宜之万国公语，以渐废去各国不同之语言文字，而远近东西全无界限。<sup>①</sup>

在上述文章中描写的无政府乌托邦社会与清末刘师培在《人类均力说》中提出的理想社会较相似。但在刘师培的理想社会里，每个人都是共同具有各种技术的一种“平均”人，与此相反，师复的理想社会里没有这种传统的理想社会的因素，而是具

<sup>①</sup> 《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民声》第19号，1914年7月18日。

有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未来社会景象。可以说，师复在理想社会中的反复古主义倾向也是受新世纪派的影响<sup>①</sup>。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他除了在心社规约中已提出的家族和宗教问题以外，对于教育和文字问题也提出了新的革新主张。其实，民声时期在师复的文化思想及运动中较具有代表性的两个问题就是有关‘教育’和‘世界语’。

辛亥革命前，新世纪派在谈到社会不平等与阶级差别的时候，总是把智和愚的不一样也说成是阶级差别，而且还认为人们的智愚不等是造成富贵贫贱差别的原因之一。因此，在他们看来，要实现社会平等，首先要提高“愚者”的智力水平，要从教育入手。新世纪派的吴稚晖特别强调教育对实现无政府主义的作用，认为只要普及教育，人们有了智识，就通晓了无政府主义的道理。辛亥革命后，吴稚晖最重视的理论也是“以教育为革命说”。他说：“如中学、高等之强迫教育行，则国民之知识道德自至于自治文明之国，而所谓法律者，不几虚设之哉？而一般欺凌下民，蹂躏幸福之官吏，自可绝灭，而不认其永留于世界矣！”<sup>②</sup>但是，师复反对要实现无政府主义必须从教育入手的吴稚晖式看法，曾在《无政府浅说》一文中对于所谓“以教育为革命说给予批驳”。他说，“今日教育之不能普及，由于经济之不平等，经济之不平等，由于政府之保护私产，故有政府之世，断无教育普及之理……且有政府之教育，大抵与自由教育之原理相反，一般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等盲学说盘踞于人心，实无异为无政府之敌。

① 有的日本研究者认为，一方面师复坚持对传统问题的彻底反对态度，另一方面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传统的残存。例如，通过考证学方法解释无政府主义概念，而在革命过程上较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等（见〔日〕嵯峨隆：《刘师复とアナキズム—辛亥から五四への架桥》，《法学研究（广大·法）》第66卷第5号，1993年5月）。

② 吴稚晖：《吴稚晖之无政府主义谈》，《社会党月刊》第3期，1912年9月。

故谓教育普及而后可实行无政府者，无异谓地球诸星尽灭而后可无政府也”<sup>①</sup>。师复对李石曾的态度则是相反的，当时，李石曾较注意的是工人教育问题。他在给师复的信中指出，“关于吾党进行之方针，弟（指李石曾）以为应从学问与教育入手”，“组织工会之事至善而其弊则甚危险，似不如先从事于工人教育”。他一再强调，组织政党是没有必要的，“为同志之交通机关者，报社似已足用”<sup>②</sup>。对此，师复赞扬李石曾说，他是介绍中国无政府主义的第一人，他也同意李石曾宣传普及教育的重要性，特别在工人教育问题上。师复对李石曾的尊重态度和他对吴稚晖的批评态度是与李、吴两人在民初时期参与政治活动与否有直接关系的<sup>③</sup>。

师复主张平等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科学教育和平民教育。对于科学教育来说，师复认为，“顾中国今日学术之幼稚，欲使科学教育发达，非得多数留学欧美不可。故鼓吹留学，养成多数他日改造社会之工匠，实为教育上之根本大计”<sup>④</sup>。因此，师复全面支持李石曾等新世纪派进行的“留法俭学会”运动。吴稚晖曾劝告师复到法国留学，但他终于没有出国。有关原因有人曾谈到，“中国只有他（指师复）最熟悉无政府主义理论，又有决心传播，还能够筹款，维持刊物，此外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他”<sup>⑤</sup>。对于平民教育来说，他认为，“平民教育对于国家教育而言，政府所

① 师复：《无政府浅说》。

② 李石曾、师复：《真民先生与师复书》，《民声》第5号，1914年4月11日。

③ 师复说：“吾人以为稚晖先生本无政府党之健将，方望其出而提倡，不料其烂缦之后归于平淡，东归以后，绝不积极的鼓吹，不免令我辈鲁莽少年之失望。因失望而生恼，因恼而生憾”（师复：《答道一书》，《民声》第3号，1913年12月20日）。

④ 师复：《答悟生》，《民声》第20号，1914年7月25日。

⑤ 刘石心口述《关于无政府主义活动的点滴回忆》（见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第933页）。

经营之教育，无论如何，只能得皮相之教育，而决无精神之可言，甚或足为真理之障碍”<sup>①</sup>。它的主要目的是除简易识字外普及科学知识和传播无政府主义，而其主要对象是工人阶级。因此，他提倡通过普通日报、画报、小说报、科学报的刊行，以此来提高工人阶级的识字率。他一再说明，在学习方法上应注意教育对象的水平以及各种环境因素<sup>②</sup>。师复的教育运动是为了工人运动——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的发展，因而注重在工人阶级中普及无政府基础理论。例如，民声社所刊行的《工人宝鉴》一书，就是专门对工人进行无政府主义宣传的刊物。师复认为工人运动的方针“不外六字”，即“结团体，求智识”。民声派除了印刷刊物，还通过在各地举办书报社、俱乐部、大集会、小座谈等方式以展开其无政府教育运动。

世界语是无政府派用来传播其思想的重要手段之一，所以他们主张大家都来学习世界语，以便与国际的无政府主义者有共同的语言，互相交流思想，以促进世界的无政府革命。因此晦鸣学舍创立时已经设立“世界语部”，并在《晦鸣录》及《民声》中开设世界语专栏。在《编辑绪言》中谈到，“以希望语言统一之故，特设‘世界语部’。一方面传达世界语于支那，一方面披布支那社会之真相于全世界。复以世界语及华文两者微集文件，互译而并载之”<sup>③</sup>。其后，在《民声》上继续登载《介绍世界语团体》、《世界语问答》、《世界语万国大会纪事》、《世界语与无政府党》等文。1912年夏天，为了推广世界语，借以宣传无政府主义，他们在广州西关华林寺内“平民公学”附设世界语夜校。师复、郑彼岸和郑佩刚等60余人参加学习，从法国留学归来的许

① 师复：《答悟尘》。

② 师复：《答悟尘》。

③ 《编辑绪言》，《晦鸣录》第1号，1913年8月20日。



论博传授。同年秋天，师复、许论博在广州东堤东园建立“广州世界语学会”，很快会员发展到300多人，为“全国之冠”。这年冬天，世界语学会成立大会在东园召开，会众达千余人，选许论博和师复为正副会长。接着，师复又被“环球世界语会（国际总会设在瑞士）任命为环球世界语会广州分会会长”<sup>①</sup>。1914年7月，师复等在上海法租界白尔路一所房子外挂起了“世界语讲习所”的牌子，以“世界语讲习所”进行无政府主义活动。师复病体未重之前，除了编印《民声》外，亦常编译世界语的著述、纪录等。师复死后，他的墓志铭即采用世界语，这也说明了他对世界语的热情<sup>②</sup>。

那么，为了达到无政府社会革命，其具体性的革命手段是什么？师复在《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中提出：“（一）用报章、书册、演说、学校等等，传播吾人主义于一般平民……（二）当传播时期中，各视其时势与地方情形，可兼用两种手段：1）抵抗，如抗税、抗兵役、罢工罢市等，2）扰动，如暗杀、暴动等……（三）平民大革命，即传播成熟，众人起事，推翻政府及资本家，而改造正当之社会也；（四）平民大革命，即世界革命。故吾党万国联合，而不区区为一国说法”等<sup>③</sup>。并且在《致无政府党万国大会书》中建议：（一）组织万国机关；（二）注意东亚之传播；（三）与工团党联络一致行动；（四）万国总罢工；（五）采用世界语<sup>④</sup>。不过，师复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其他问题都还谈不上，而应以文字宣传为最重要的内容。这样，文字宣传成为师复无政府主义的关键的因素，而且还把文字宣传的对象

① 《郑佩刚的回忆》（见高军等主编《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第514页）。

② 王炎：《无政府主义与世界语》，《广州文史资料》第5辑，1962。

③ 师复：《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

④ 师复：《致无政府党万国大会书》，《民声》第16号，1914年6月27日。

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

师复在去世前不久，对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内容做了一个重要补充，这就是工团主义。工团主义的提出，标志着师复把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与欧洲的工团主义结合起来，构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这就是“以无政府共产主义为目的，以工团主义为手段”<sup>①</sup>。师复等人并着手开始在广州组织“理发工会”和“茶居工会”等，进行工团主义运动。但很不幸的是，1915年3月27日，师复因肺病死于上海<sup>②</sup>。因师复的死亡，《民声》第23号（1915.5.5）专发“师复纪念号”特辑。从纪念号中他写的遗稿《上海之罢工风潮》一文可以再一次看到他对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热情。他在文中提出了工团主义运动的三个基本观点，即“（一）工团之根本目的自然为反抗资本制度，惟今日工人智识幼稚，一时尚难显出此作用，故目前之要图，实在乎多设平民学校……（二）工团之组织，吾无政府党及社会党皆当为之鼓吹，且加以赞助，惟仍当以各业之工人自为主体，吾人但予以指导，以养成其独立战争之能力……（三）工团之宗旨，当以革命的工团主义为骨髓，而不可含丝毫之政治意义……”<sup>③</sup>。为了推动中国工人运动的兴起，促使工人群众的觉悟，师复等人在中国最先论证了对工人进行宣传和组织的重要性以及实际方法，这较充分地反映了西方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的基本路线。

① 蒋俊、李兴芝：《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第184-187页。

② 在住医院时期，医生为了配合治疗，建议师复要多吃肉、鸡蛋、牛奶等以补充营养，但师复不肯违背心社规约，宁死不食。师复去世前曾给彼岸信，内有“师复惟有与无政府主义同葬支那之黄土而已”一语（郑佩刚：《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若干史实》，《广州文史资料》第7辑，1963）。

③ 师复遗稿：《上海之罢工风潮》（后记），《民声》第23号，1915年5月5日。

辛亥革命前的天义派和新世纪派都对推翻清朝表现出了一定的热情，并把它当做实现无政府主义的起点，无政府社会党人也激烈地抨击过袁世凯的独裁政治，但是，师复却对现实的政治斗争不太感兴趣。他在“中华民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这一观点上，全面否定了民国政体的存在意义。例如，他在评价二次革命时提出，讨袁的目的不过是仅有政权争夺的意义，即讨伐袁世凯后，孙中山、黄兴出而登总统的地位<sup>①</sup>。在对三次革命的评价中又提出，这也不过是“军队革命”。因此，他不相信政治革命的进步意义，他相信的只是社会革命，主要是以工人为主的经济革命。因此，师复将活动最后归结于无政府工团主义。不过在《新世纪》上宣传的西方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只是局限在介绍工人运动的理论及活动水平上，而师复则把无政府共产主义和工团主义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前人的思想和活动。

师复死后，《民声》由郑佩刚负责印刷、出版、发行等工作。1916年11月出至第29号，因经费没有着落，被迫停刊<sup>②</sup>。晦鸣学舍时代所出版的书籍是《无政府主义粹言》、《无政府主义名著丛刻》、《军人之宝笈》、《明信片10种》、《新世纪丛书》等<sup>③</sup>。《晦鸣录》、《民声》以及由他们编印的大量出版物，因为都是国内出版，流传方便，并且大多数又是免费赠阅，所以传布较广。据民声社的统计，1916年的11个月当中，“先后发出《民声》各期共10000册、《平民之钟》534册、《无政府浅说》534册、《总同盟罢工》700册、《军人之宝笈》500册、《无政府主义》

① 师复：《答英白》，《民声》第8号，1914年5月2日。

② 1921年3月15日在广州再次复刊《民声》，所谓“后期民声”。从第30号到第33号只发行四次后停刊。其中，第30号增刊号掲載陈独秀区声白之间的无政府主义论战。

③ 《“民声”小史》，《民声》第30号，1921年3月15日。

700册”<sup>①</sup>。新文化运动时期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活跃分子，大多是师复的同志或受其思想影响的人。“五四”时期青年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公开声称：“师复先生是我们的先觉，我们是师复先生的后觉。”<sup>②</sup>可以说，民声派是国内影响最大的无政府主义团体<sup>③</sup>。民国初期无政府主义的急速发展，引起了北洋政府的警戒。例如，北洋政府数次下达了禁止出版无政府小册子《人道》、《无政府浅说》、《平民之钟》等的命令。当时无政府派对与国际无政府党人之间的交流较重视，据北洋政府汉口警察厅的报告，来华的国际“社会党”人大约有100多人，其中很多是无政府主义者<sup>④</sup>。

综上所述，从道德启蒙运动到无政府主义原理的宣传，再到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转变过程，就是师复的无政府主义发展过程。民国初期，他的心社活动是与新世纪派的进德会活动及中国社会党（社会党）的三无主义精神大体一致的。但由于袁世凯的独裁，江亢虎、孙中山等宣传的社会政策性质的社会主义，新世纪派一部分成员的参与政治，引起了师复的不满。因此，在《民声》中，他集中宣传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原理。但在他的最后时期，他又把克鲁泡特金主义与西方流行的工团主义思潮结合起来，展开了对工人的平民教育活动和工团组织活动。到这一时期，他已经对道德和文化问题不太感兴趣。不过，师复本人为了保持一个纯洁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形象，则始终奉行心社的戒约，直至去世。

① 《万国社会风潮》，《民声》第29号，1916年11月20日。

② 凌霜：《师复主义》，《进化》第1卷第3期，1919年3月。

③ 日本研究者对师复的评价相当高，例如，狭间直树给师复以高度评价，说他是民国初最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丸山松幸甚至认为，当时师复对进步青年的影响力与陈独秀的影响力可以相匹敌。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无政府主义与中国社会党》，第28页。

## 小 结

对于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就它的有关无政府文化思想方面来说，表现出传统的“大同”主义和江氏的三无主义的结合倾向，即所谓刘师培式传统主义的解释色彩较浓厚。相反，对于沙淦等人的“新”社会党来说，他们大体上是接受新世纪派的文化思想。中国社会党和社会党其构成人员都很复杂，所以在文化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但他们共同主张对封建文化进行革新。江亢虎的家庭解体论和妇女解放论与太虚将佛教和无政府主义的结合主张，则具有自己的特色。另外，有些社会党人主张的“个人主义”也在近代中国社会里具有一定的价值。而师复的文化思想可以说是清末民初的无政府思想变化的一个缩小版。辛亥革命前，像清末国粹派一样，他对民族主义和古文学的倾向较浓厚；辛亥革命后，像清末无政府派、民初社会党人一样，也集中批判了以家族为主的封建社会秩序，并进而提倡道德文化运动。不久，他为了进行无政府社会革命，积极宣传无政府共产主义理论，并积极实践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他的主义和主张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成为无政府派最热门的话题。简单说，江亢虎注重政治方面的改良主义和文化方面的革新主义，师复则不仅仅局限于道德运动的个人意义，更强调的是社会革命的现实意义。因此，江氏追求政治权力的道路最终使其成为一个“政客”，而师复却一直揭露政治革命的虚构性，并始终追求社会革命的整个变革，成为言行一致的“革命家”。

有的论者认为，新世纪派的无政府思想（包括文化思想）对中国国内的影响不太大。但是，在这里我们通过社会党和师复等人的社会运动，可以较容易看到新世纪派的深刻影响。民初无政

府派通过他们的期刊反复介绍新世纪派的观点，而且出版了新世纪派的不少著作及译著。其实，对家族、女性、道德、教育、世界语等各种文化问题的基本看法都是由《新世纪》而来的。可以说，新世纪式无政府主义在民初社会里占据其主导性的地位。原新世纪派也积极帮助民初无政府派的各种活动。当时在袁世凯独裁下，孙中山的国民党、江亢虎的社会党被迫解散后，师复的民声社仍在组织社会运动，从而使得民声派的教育、世界语、工人运动成为1915年前后国内最大的社会运动力量。师复之死，使中国无政府派进入暂时的沉寂，但他们的影响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再一次表现出来，并广泛影响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对清末《新世纪》无政府主义的再解释，即是民初的师复主义，这使它成为清末无政府主义和新文化运动时期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桥梁。

## 第五章 中国无政府派与新文化运动

清末以来蔡元培和原新世纪派的主要成员之间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在民国初期各种社会运动中——特别是在道德、教育方面——他们共同进行了启蒙活动。例如，进德会、留法俭学会、勤工俭学会、教育制度改革等。本章前半部中除介绍民初原新世纪派和蔡元培的上述活动外，还集中讨论原新世纪派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和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革这两个问题。可以说，这两个事件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标志。所以，弄清它们与无政府派的关系是探讨无政府派与新文化运动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新文化运动时期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人的勤工俭学思想和“互助”、“劳动”主义，为以后“五四”时期提供了社会运动的主要思想根据<sup>①</sup>。

本章后半部谈到的是，陈独秀的《新青年》创刊及其言论活动与中国无政府派的关系问题。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前期（大略指“五四”事件以前时期）的主要宣传内容——孔教问题、家庭问题、女子解放问题、道德宗教问题、教育改革问题、世界语问题等——基本上都与清末新世纪派的反传统主义和民初师复的反复古主义思想倾向紧密相关，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情。我们通过对《新青年》的代表性作者和无政府派人士的有关文章分析

---

<sup>①</sup> 在这里，笔者不同意新文化运动只是文化运动，而无政府运动只是政治运动的单纯研究模式。

后，可以理解《新青年》的文化观和无政府派的文化观之间的密切关系。并且，从同一时期第二代无政府派<sup>①</sup>的杂志“实社”《自由录》、《进化》、《奋斗》、《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来看，我们再一次发现的是第二代无政府派的文化革命论与新文化精神是基本一致的。

## 第一节 蔡元培和原“新世纪”派的新文化运动

### 1. 民初吴、蔡、李的道德启蒙运动

辛亥革命导致了清朝的崩溃。清朝被推翻后，新世纪派（以下称“原新世纪派”）所主张的“排皇革命”，立即集中于最终革命——社会革命上。但是，为了实现无政府主义理想，他们在无政府主义运动进行方法上，却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即：是忠诚于无政府主义原则，继续进行对于共和政体的斗争，向最终目标进行，还是先把共和政体认定为实现无政府主义理想所需要经过的阶段，暂时承认其存在，然后进行下一阶段的准备。当时，原新世纪派在这两种走向中，选择了后者<sup>②</sup>。这就是他们的所谓“以建民国，以进大同”的方针。革命前后，原新世纪派主要成员和他们的好友蔡元培都已回国。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① 第一代无政府派是以张继、刘师培等人的天义派和吴稚晖、李石曾等人的新世纪派为代表的早期无政府主义者。第二代大概是师复和他的学生，主要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活动的梁冰弦、郑佩刚、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师复主义者（参见蒋俊、李兴芝《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第6页）。

② [日] 嵯峨隆：《民国初年におけるアナキズム》，《アジア研究》37，1990，第36页。



时，他们已经成为民国的社会名流。可以说，由于《新世纪》时期李石曾、吴稚晖的革命阶段论和对同盟会及三民主义的肯定态度，以及与孙中山之间的个人亲密关系等原因，使他们接受了民国体制。

其间，李石曾曾参加汪精卫组织的“京津同盟会”活动。他在北京创刊《民意报》，并参与企图暗杀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事件及暗杀“宗社党”领袖良弼事件。有趣的是，当时李石曾拒绝了孙中山邀请他出任驻法公使的任命，从而实践了所谓不任官职的“不官主义”原则。吴稚晖也在中国社会党等的讲演会上宣传无政府主义，并主张反军阀主义和反军国主义。他虽然较积极参与对民国政治制度的讨论，但他也与李石曾一样，遵守了不官主义原则。原新世纪派的褚民谊、张静江也在实务、资金方面积极支持参加了他们的活动。当时，原新世纪派思想中的反对国家的无政府主义因素逐渐消失了，但是，他们仍较彻底地遵守了不参与政治和政党的原则。原新世纪派接受民国的实际动机很可能是，他们回国的时候，没有做好立即代替国家、政府的准备。既然如此，就不能说他们的无政府主义哲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应该说是，李石曾、吴稚晖等人根据自己的信念结成了“新”的社会团体，从而进行各种社会活动。

南北和议不久，李石曾南下与在上海的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张继、汪精卫、褚民谊等人发起组织“进德会”（1912年1月）。进德会会约分甲、乙、丙、丁四种会员。要求普通会员：不狎妓、不赌博、不置妾（已置者入会以后不再置）；要求特别甲部会员：除前例三项外，加不作官吏；特别乙部会员：除前例四项外，加不作议员及不吸烟；特别丙部会员：除前例六项外，加不饮酒及不食肉；戒约最多者为八项，故又曰“八不会”。其中，丁种会员不过是吴稚晖、李石曾、廉泉三人。该会无会长、干事等名目，亦无章程，不纳会费，不设罚则，但凭会员介绍，

即刊刻氏名表字于册中，使海内共知为进德会会员<sup>①</sup>。吴稚晖在《进德会会约》缘起中说：

亡清之腐败，积社会之腐败而成，腐败之原因虽种种，而亦自有其最普通之可约言者在焉，即‘吃花酒’、‘斗麻雀’，加之以‘讨小老婆’是也。若民国新建，承其流而不加注意，将腐败之根株不去，而凋敝之原气难复，因发起为进德会，广征海内有道之士，相与邀约，为社会树之风声，庶新社会可以成立，而国风丕乎其变焉。<sup>②</sup>

因此，他们认为为了建设新社会应需要新道德。这篇文章的执笔者是吴稚晖，但其思想的实际起源可能是李石曾。

不久，蔡元培与唐绍仪、李石曾、宋教仁、汪精卫等讨论进德会问题，其中，有些人提出了进德会会约中的“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两项可以暂不要求。由此，除两项外成为以6个项目为主的新团体，名为“六不会”（1912年2月）。它的会约是：（1）不狎妓；（2）不赌博；（3）不纳妾；（4）不食肉；（5）不饮酒；（6）不吸烟。将进德会之范围缩小，其原因是因为参加讨论者大多数为官吏或议员，所以他们以不作官吏、议员两戒为不便<sup>③</sup>。他们又同时发起“社会改良会”，其宗旨是以人道主义和科学知识为标准，改良社会上种种恶习，并列举改良条件36条。它明确规定入会条件如下：不狎妓，不置婢妾，实行男女平等，提倡废止早婚，提倡自由结婚，承认离婚自由，承认再嫁之自由，废缠足、穿耳、敷脂

① 《发起“进德会”会约》，《李石曾先生文集》（上册）（以下“文集”），中央文物供应社，1980，第175页。

② 《文集》，第175页。

③ 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第247～248页。

粉之习等等。可以说，社会改良会是进德会范围的扩大。进德会、六不会及社会改良会，均为一种道德启蒙运动。进德会及社会改良会所强调的许多问题，吴稚晖和李石曾在革命前就已在《新世纪》上研究过，他们相信根本性的文化变革是政治变革成功的关键。进德会运动可能对师复的“心社”活动给予了影响，以后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又一次以同样的题目实践这一道德运动。

民国创立前后，吴稚晖已经是一个出色的语言学家。临时政府北迁，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吴稚晖应蔡之邀请赴北京，进行国语注音工作，成为“全国读音统一会”的主席，并发行读音统一会具体进行程序的小册子。这与吴稚晖在《新世纪》所发表的主张大体相同。在吴稚晖耐心引导下，会议终于在字母采用上达成共识，决定采用读音会所定的“记音字母”，计为39个，定名为“注音字母”。有趣的是，这是一种由简单汉字表述的字母，原为章太炎创制，会议在章氏基础上做了改造与修订。因会员中不少是章氏弟子，意见相对集中，因而得以通过<sup>①</sup>。清末吴稚晖与章太炎的世界语论争最终导致了上述结果。民初时期吴稚晖的国语运动一直持续进行，直到20世纪20年代。其间，他主持编辑了《国音汇编草案》、《国音字典》等，并且先后发表《致钱玄同君论注音字母书》、《国音问题与国语文学问题》、《注音字母自身之价值》、《草鞋与皮鞋》等一系列文章，来回答人们对于注音字母的疑问。吴稚晖在《新世纪》时期宣传的世界语主张虽没有实现，但却产生了近代中国文字改革的主要成果之一，即注音符号运动。

新世纪派的世界语运动，通过中国社会党人和师复等无政府主义者的积极宣传和传播，使得与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结成不可分的关系。当然，民初吴稚晖等人又是这一世界语运动的积极赞

<sup>①</sup> 吴相湘：《吴稚晖促进国家统一》，《民国百人传》第一册，台北，传记文学社，1971，第408页。

成者。有意思的是，那时蔡元培对于世界语也甚为注意，他甚至成为北京地区世界语运动的领导者。他的年谱中记载：“1912年6月……教育总长蔡每日散署后，亲至世界语传习所听讲。”<sup>①</sup>“同年8月17日……（蔡元培）出席世界语欢迎会，并发表演说。”蔡元培在世界语学会欢迎会上的演说中首先提出，语言之价值，国际通用语之必要，我国人可采用世界语为辅助语。最终提出：“第一、先设一世界语藏书楼，使人知世界语印行之书，关系于学问者，已如其浩博。第二、先设一私立大学，有文、理二科，试验以世界语教授果否足用。”<sup>②</sup>有人评价说，“中华民国世界语会自设立中央事务所于上海后，即广招国内同志联络进行，各省响应者颇多，而尤以北京为最发达，是皆先生（蔡元培）提倡之力”<sup>③</sup>。他对世界语的关注即使是成为北京大学校长以后仍在继续。

蔡元培是在20世纪初开始接触社会主义学说的，而他较系统地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是1907年以后，即在德国留学时期通过《新世纪》等刊物受到过克鲁泡特金的影响，并接受素食主义和世界语。民国初期的蔡元培具有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另外还具有进步主义、平民主义趣向等。他对政党政治、学生运动的态度也含有多种不同看法。因此，我们不容易理解蔡元培的政治趣向。清末时期他主张并参加过暗杀活动，但他的主要活动是通过教育方法而鼓吹革命，这也是其主流<sup>④</sup>。这一点也是与原新世纪派相似的地方。1912年2月他以教育总长资格而发表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蔡元培较具体地谈到教育和

① 王世儒编撰《蔡元培先生年谱》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41页。

②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以下“全集”），中华书局，1984，第273~276页。

③ 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第375页。

④ 参见〔韩〕闵斗基《蔡元培（1868~1940）思想的构造理解》，《历史和人间的对应》，1984，第815、817页。

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文章中，他认为专制时代可以实行以政府方针为主的教育，但共和时代教育可以独立于政治之外。在他的内心里很相信的是，政治绝不应该支配教育<sup>①</sup>。这里，事实上蔡元培第一次宣传了有名的“教育独立论”。表面上蔡元培的这种教育论与吴稚晖、李石曾的教育思想有所差别，但在其教育精神上是大体相同的。

特别是蔡元培在文化思想上是与新世纪派很相似的，而主要表现在对封建文化意识进行批判。例如，对于孔子、孔学及道德、宗教的态度，对于家庭问题的态度等。在蔡元培写的上述文章里，对于尊孔一事，即公开表示，“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孔子之学术，与后世所谓儒教、孔教当分别论之，嗣后教育界何以处孔子，及何以处孔教，当特别讨论之”。他想以法国式自由、平等、博爱等近代道德来代替忠君、尊孔的封建道德。因此，对教育积极地进行重要改革，废除忠君、尊孔及读经。以后，他提出的有名的“以美育代宗教”主张反映了近代思想家力图“舍宗教”的强烈愿望。对于家庭问题，蔡元培也坚持急进主张。例如，他在回答胡汉民关于姓、婚姻和家庭问题时说道：“用父的姓不公道，用母的姓也不妥当，还是不要的好，可以设法用别的符号来代替。”他主张在理想的“新村”里废除婚姻，“在这新村里，有很好的组织，里面有一人独宿的房间，也有两人同睡的房间……当两人要同房居住的时候，须先经医生检查过，并且要有很正确的登记，如某日、某时、某某同房居住，将来生出的子女，便可以有记号了”。在家庭问题上，“不要的好，不得已而想其次，小家庭比大家庭好”<sup>②</sup>。这些主张也是与李石曾、吴稚晖等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主张大致相同。

<sup>①</sup> 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全集》第2卷，第130页。

<sup>②</sup> 蔡元培：《关于姓、婚姻、家庭问题的谈话》，《全集》第5卷，第404页。

本来,《新世纪》时期吴稚晖倾向于怀疑暴力的作用,而代之以推动一种革命教育。他主张过,“其实则日日教育,亦即日日革命”;还说过:“真理、公道,日日倾向于进步,即教育须臾不可息,亦即革命无时可或止。惟教育必有效果,效果即革命。经一革命,即人类之公德心加扩。”<sup>①</sup> 民国初吴稚晖在教育方面最极力主张的是科学和工艺教育。辛亥革命之前,他已经撰写了《上下古今谈》(1911年7月)一文,以启发青年求知之心,此为吴氏提倡科学与工艺之始。吴稚晖跟蔡元培虽然在主张扫除士大夫教育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蔡氏着重于造就大学问家,因此毕生致力于办大学。吴氏却主张“设专科学校、造就工程人才”,表现出平民主义取向。民初无政府主义者的象征性的领导李石曾也一直相信以教育为革命的吴氏说法。从李氏写的种种文章来看,他的教育论与克鲁泡特金的教育论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差别<sup>②</sup>。

在文化、教育问题上联结他们三人之间的团体就是“世界社”。清末,在法国巴黎,他们已经组织了世界社。民国成立后,1912年,他们在上海第二次组织了同名团体,该团体本来是《世界》画报在国内的总发行所,其发起人有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汪精卫、张静江、褚民谊、陈碧君、谭熙鸿八人<sup>③</sup>。据李石曾的纪录,世界社“从事于文化、经济与社会三项,于第一项中以出版为始,同时致力研究与教育工作,而尤以推广中法比瑞间之教育成留学之大潮流为可记,其他如在经济中农工商金融之张本,社会中国内之革命,国际之合作运动亦均始于其时,而继进与文化教育同”<sup>④</sup>。1915年,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汪

① 燃:《无政府主义以教育为革命说》,《新世纪》第65号,1908年9月19日。

② 参见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第105页。

③ 参见《旅欧教育运动》,1916,第99~103页。

④ 李石曾:《世界社四十年史试言》,《文集》(上),第345页。

精卫、张静江、褚民谊等人又在巴黎重新组织“世界社”。由蔡元培起草的《世界社之意趣》中申明：“同人就学异国，感触较多，欲从各方面为促进教育之准备，爰有世界社之组织。”<sup>①</sup>以“传布正当之人道，介绍真理之科学”为宗旨的世界社的教育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和方法在《世界社简章》上做了大概记述。现列举如下：

#### 甲、书报

续出《世界》大画报（前已刊行第一、二两册及特刊《近代世界六十名人》一册）。

续办月报（前拟名《民德》、《学风》，均已试办，未能续出，今拟续办）。

编译社会科学图书（就学风丛书及译书社之萌芽，扩张兴办）。

#### 乙、研究

推广“远东生物学研究会”（研究生物学之理解与致用），附化学研究所；

推广“美术研究会”（预备改良新剧、推行新乐等事）；

续办“人地学社”（前发起“人地学社”尚未实行），附绍氏藏书楼。

#### 丙、留学

推广“留法俭学会”，附设法文预备学校（留法俭学会员现有百余人）。

补助“勤工俭学会”（现有七十余人）。

推广“互助社”（互相集资，维持无费之自费生）。

#### 丁、传布

<sup>①</sup> 蔡元培：《世界社之意趣》、《全集》第2卷，第401页。

传布“进德会”（发起于民国元年）。

传布“社会改良会”（同上）。<sup>①</sup>

由上所述，民初的世界社是以教育文化运动为主而组织的一个团体，可以说，它是清末世界社的进一步的发展过程和结果，特别是为中国学生、工人去法国留学这一目的而组织的。有趣的是，他们这一时期较早强调“文化”这一词的意义。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蔡元培与原新世纪派都已经不是清末时期的过激革命党人，而是成为中华民国的主要社会领导并参加各种社会改良运动，甚至蔡元培、吴稚晖等人已经开始从事民国政府的教育文化政策方面的主要活动。但是，我们不容易断定他们是否已完全离脱无政府主义。从文化方面来说，他们的教育文化运动的思想来源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清末《新世纪》时期一脉相通的。对于政治的怀疑心理在不官主义的实践过程中已经消极地表明了，并且吴稚晖、李石曾本人也一直相信他们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 2. “以工兼学”、“以学兼工”——（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曾经两度出现过留学热潮，一次是清末的留日运动，另一次即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其中，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组织者就是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等原新世纪派和蔡元培。吴稚晖对清末以来的“苦学”方法深表关心，他在英国亡命时期已经经历了苦学生活。1907年，他在巴黎与李石曾、褚民谊等人继续进行苦行僧式的“俭学”生活，是为“留法俭学会之张本”。同年，蔡元培留德，也是半工半读。可是，事实上“勤工俭学”的真正起源，与进德会同样，也是从李石曾开始的。1908年，他在巴黎设立豆腐公

<sup>①</sup> 李石曾：《世界社之简章》，《文集》（上），第218—219页。



司，它与留法勤工俭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sup>①</sup>。李石曾初设此公司时，从他的家乡河北高阳等地招来5名工人，后渐增至30人左右。李氏组织这些工人在工作之余学习法文、中文等文化科学知识、实行半工半读<sup>②</sup>。蔡元培曾清楚地回忆当时情况，“昔者李石曾、齐竺山诸君之创设豆腐公司于巴黎也，设为以工兼学之制，试之有效，乃提倡俭学会、俭学者，专持以俭求学之主义者也。而其中有并匱于俭学之资者，乃兼工以济学。其与豆腐公司诸君，虽有偏重于学、及偏重于工之殊，而其为工学兼营则一也”<sup>③</sup>。在这一时期，他可能就较具体地想出利用少量的资金就可以留学的勤工俭学方法。

民初，为了有利于中国新文化事业的发展，原新世纪派成为青年人到国外留学的最积极的发起者。除了进德会、社会改良会等社会启蒙团体外，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等人又积极组织了留学教育活动。1912年初，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张静江、张继、吴玉章等人发起成立了“留法俭学会”，以鼓励和帮助青年去法国留学。他们认为要将中国改造成新社会，其最为模范的国家是法国。他们平生特别喜欢的就是法国的科学道德精神和革命民主精神。同年5月，由该会创办的留法预备学校即在北京宣布成立，后又由李、吴、张等发起成立上海留法俭学会。同年6月，以吴玉章为中心组织了四川俭学会，并在成都创办了预备学校等。留法俭学会运动深得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的支持，因为他素来提倡社会教育和平民教育，并有亲身经历的体验。因此，由教育部拨房在北京设立预备学校校舍。同年冬天，经由北京留

① 《留法俭学会发起及简章》，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一），北京出版社，1979，第167页。

② 《旅欧教育运动》，第71页。

③ 蔡元培：《“勤工俭学传”序》，《全集》第2卷，第398~398页。

法预备学校学习期满并且合格的学生（第1、2期），大约有60余人赴法国留学。1913年6月，再次派送了第3期留学生。

我们从1912年公布印行的《留法俭学会简章及会约》中可以了解其运动的目标，即“改良社会，首重教育。欲输世界文明于国内，必以留学泰西为要图……欲造成新社会新国民，更非留学莫济，而尤以民气民智先进之国为宜”<sup>①</sup>。并在其会约上大致反映了原新世纪派的“俭学”思想，但当时还没有充分地表示出“勤工”即劳动方面的考虑。另外，“留法女子俭学会”、“留法居家俭学会”及“留东俭学会”、“留英俭学会”等也相继成立。这些活动在较短时期内就形成社会风潮。有趣的是这些留学生里有不少人成为“五四”时期活跃的所谓第二代无政府主义者。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突然变化，袁世凯政权以武力镇压国民党人和各省蜂起的武装反袁势力。于是，参加反袁运动的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都不得不流亡法国、德国、英国等海外。因此，他们组织的进德会、社会改良会、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世界社等团体一时就解散了。但原新世纪派亡命的欧洲又突起变局，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在战争中的法国积极努力帮助解决留法俭学生的生计和学费问题。当留法俭学界度过一战最初艰难困苦岁月后，关于留法勤工俭学的一个新的计划便被提上议事日程，李石曾仍然是这个计划的始作者。他用豆腐工场实行过的“以工兼学”方法而提出俭学生也进入工场从事“以学兼工”。因此，当时在法国的工人和学生这两种身份的中国人分别开始从事于“以工兼学”及“以学兼工”。一战期间，以豆腐干及豆制品充当军队粮食，以绿豆芽充当生菜，而李石曾的豆腐工场销售较多，也需要一定的劳动力，于

① 《留法俭学会简章及会约》，《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一），第168页。

是这就被称为“勤工俭学”<sup>①</sup>。

1915年夏天，在法国的李石曾等人发起“勤工俭学会”。该会的宗旨是“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会员之性质是“以工求学者为实行会员”和“本身非以工求学，而赞成此意，欲有所尽力者为赞助会员”<sup>②</sup>。勤工俭学的宗旨及有关规定表明，该会立足于赴法华工，宣传、组织工作的主要对象即是赴法华工，而不是以工济学的学生。1906年4月设立“华工学校”，李石曾、蔡元培为华工学校编写讲义。勤工俭学会成立后，印行了《勤工俭学传》，该书以鼓吹工人求学为宗旨。以后，华工的人数急剧增加而又刊行《华工杂志》，它创办于1917年1月，每月两期，每次千册，分布于工界。该报创刊号中明确说明其宗旨为，“提倡勤、俭、学三者为宗旨，亦即以此为吾工界改良之方法”<sup>③</sup>。该刊前后经过了三年多而停刊，出版的期数在50期以上。勤工俭学会也帮助那些在欧战期间得不到学费的留法学生，一边做工，一边维持学业。一战后，这一方法经蔡元培、吴稚晖等大力宣传和推广，在国内逐渐形成一种社会思潮。该会的成立很可能是与法国流行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潮有密切关系，当时，李石曾较注意观察工人的革命力量。

除勤工俭学会外，我们应注意的另一个团体是“华法教育会”。李石曾与蔡元培等人于1916年6月同法国人欧乐（巴黎大学历史系教授）、穆岱（法国参议员）共同发起了该会。它的宗旨是“发展中法两国之交谊，尤重以法国科学和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智识、经济之发展”<sup>④</sup>。蔡元培被推选为中方会长，

① 鲜于浩：《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稿》，巴蜀书社，1994，第7-8页。

② 《勤工俭学会一览》，《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一），第187页。

③ 《“华工杂志”说明》，张允侯、殷叙彝、李峻展编《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104页。

④ 《旅欧华法教育会一览》，《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一），第206页。

欧乐任法方会长。蔡氏在发起会上表示了“欲以法国教育的师资”，“灌输法国学术于中国教育界”的希望。李石曾也坚信法国教育制度即为中国将来的理想型教育制度<sup>①</sup>，他在华法教育会的计划中认为，“就第一部言之，业经有中华印字局刊行书报若干种；就第二部言之，已有远东生物学会与留法俭学会之组织；就第三部言之，已有工人团体之结合”<sup>②</sup>。其实，该会与勤工俭学会及上述的世界社的宗旨和做法大体是一致的。华法教育会还编辑出版了《旅欧杂志》，该刊宗旨是“以交换旅欧同人之知识、及传布西方文化于国内为宗旨”<sup>③</sup>，创办于1916年8月15日，由李石曾、蔡元培、汪精卫担任编辑主任。它可以说是《华工杂志》的姊妹刊物，非常注意报道勤俭工学会的活动，以及旅法华工的情况，最后一期是1918年3月1日出版的。新文化运动时期，上述团体成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法国的根据地。有趣的是，当时国内刊行的《新青年》杂志中较详细介绍和广告有关留法俭学会活动以及旅欧杂志社刊行的《旅欧教育运动》一书<sup>④</sup>。对此，《旅欧杂志》也反复广告《新青年》杂志并在法国代理贩卖该刊物，这一事实已经间接表明了国内新文化运动和留法教育运动之间亲密的关系。

在法国流亡时期，李石曾更加重视教育效果的现实意义，并认为在进行社会革命中最重要的也是教育运动。他认为“学”的差别就是造成社会身份的差异与经济不平等的原因，将“学”的权利均等这就是教育。为了发展科学与学问，他首先注意的教育

① 参见李石曾《法国教育与我国教育前途之关系》，《文集》（十册），第231～236页。

② 《华法教育会的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一），第72页。

③ 《本杂志出版之缘起及简章》，《旅欧杂志》第1期，1916年8月15日。

④ 见《北京留法俭学会简章》，《新青年》第3卷第2号；《华法教育会鉴定“留法教育运动”》，《新青年》第3卷第3号等。

对象是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当时，他除了接受克鲁泡特金、邵可倡等人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教育论——劳动和知识两者的结合外，还接受了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中的某些教育思想，这就与同时期国内师复的教育论有颇相似的地方。但是，在社会运动主要力量问题上他们之间有差别，如果说李石曾较重视知识分子的指导力量的话，师复则较重视工人本身的革命力量。当然，他们都相信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进行教育的积极意义，并认为在工人运动上知识分子的地位只是教育者而绝不是领导者。在英国居住的吴稚晖积极支持李氏的活动，他也认为造成袁世凯独裁专制的原因，可能是中国平民的水平太低。其解决方法是把青年学生派到欧美各国留学从而接受西方的新知识，让他们回国后对平民进行教育。但与李石曾不同的是，吴氏认为在中国目前现实上还不能立即实现无政府主义，因此除教育手段外，还主张为了防止独裁应部分肯定政治手段的积极意义。

另外，当时李石曾对一战的评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战争期间这一问题成为国际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最热门话题。欧洲无政府主义者对一战评价问题分裂为两个派别，即赞成支持联合国的克鲁泡特金派和反对参加军国主义战争的多数派。李氏认为，“一曰，欧战为民主与帝国之争，欧战有革命之性质；二曰，德败，则日耳曼民主萌芽，世界各国趋入于民主潮流，日益普及；三曰，中国民主，当与世界民主同一心理，望以民主之法，胜帝国之德”<sup>①</sup>。这样，李氏积极赞成克鲁泡特金对一战的观点，以后，他的支持协约国的态度给了中国无政府派在对一战解释上的基本观点，蔡元培等人也同感于李氏对于一战的解释。

袁世凯政权的复辟企图失败及他死后，中国国内政局有所变

<sup>①</sup> 石曾：《欧战论》（一）、（二），《旅欧杂志》第2期、第22期，1916年9月1日、1917年8月15日。

动，流亡海外的革命派人士纷纷回国。李石曾、蔡元培、汪精卫、吴玉章等人在巴黎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华法教育会在中国国内进行的问题。不久，蔡元培于1916年10月初因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而归国，其他大多数成员也于同年底或第二年回到中国。他们回国之后又重新开始留法俭学运动，1917年6月，北京“留法俭学会”、北京“华法教育会”重新成立。其后，直隶、山东、上海、湖南、四川、福建、广东、陕西、重庆等各省市相继恢复及成立这些团体。特别是李石曾与蔡元培、吴玉章等人一起开展了新形式的勤工俭学运动，随之而新成立的“留法勤工俭学会”，大体上与上述三种团体的色彩相似。但是与在法国的“勤工俭学会”比较起来，它们主要召集的对象是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还有，据说勤工俭学会主要负责向参加者进行理论方面的宣传，而华法教育会主要负责纯粹留学方面的事务。为了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进行赴法国前的语言及技能培训，1917年5月在华法教育会的帮助下设立“留法准备学校”，至1919年3月已设立了20余所留法准备学校及预备班。

1919年3月第一次留法勤工俭学学生89名从上海出发经由英国到达法国，这就是新文化运动时期著名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开始。其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进入高潮。全国19个省份的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分批乘船去法国。到1920年底，有近2000名勤工俭学学生，远涉重洋，踏上了法国的领土。这一运动无论在人数的规模上，还是学习的内容上，这时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成为“举国公认之惟一要图”<sup>①</sup>。关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指导者之间的关系，有人曾认为，该运动的核心领导者是李石曾，其运动的思想、精神方面的支持者是蔡元培和吴稚晖，其运动的实务、组织方面的支持者是汪精卫、张继，而他们的共同特

<sup>①</sup>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27，第89页。

色是在无政府主义上<sup>①</sup>。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还兼任华法教育会会长之职，继续参与领导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使它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就更显示了它所具有的重要的社会文化意义<sup>②</sup>。

另外，1918年3月，无政府派刊行了中国第一个以“劳工”为对象的刊物——《劳动》月刊。《劳动》月刊是中国第一个以“劳动”一词命名的杂志<sup>③</sup>。它出版于五四运动之前，从1918年创刊到7月止，共出了5期。在其发行主旨里，他们写到：“尊重劳动；提倡劳动主义；维持正当之劳动；排除不正当之劳动；培植劳动者之道德；灌输劳动者以世界知识普通学术；纪述世界劳动者之行动，以明社会问题之真相；促进我国劳动者与世界劳动者一致解决社会问题。”<sup>④</sup>这一杂志注重介绍勤工俭学运动并宣传工读主义，吴稚晖有关工读主义的有名文章《论工党不兴由于工学不盛》（第1号）、《工人俱乐部之娱乐品》（第2号、第4号）和有关科学主义代表作《机器促进大同说》（第5号）<sup>⑤</sup>等文都在该杂志上发表。并且，在该杂志曾登载李石曾、黄凌霜、华林、梁冰弦等人的有关《新世

① [韩]朴济均：《中国‘巴黎小组’（1907—1921）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实践》，庆北大学校博士学位论文，1996，第207页。

② 原新世纪派除了参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以外，还分别在中国和法国设立了大学。1920年在北京成立中法大学，1922年在法国成立里昂中法大学。北京中法大学由李石曾担任董事长，蔡元培担任了董事兼校长，吴稚晖也是董事之一。里昂中法大学由褚民谊担任副校长。里昂中法大学虽然经过了许多曲折，但一直维持到20年代末。在大学的运营过程中，吴稚晖起了很大的作用。

③ 《劳动》虽然没有提出“劳工神圣”的口号，但是，早在蔡元培提出这个口号之前，《劳动》就发表过许多文章，阐述劳动的作用和尊重劳动者的重要意义（路哲：《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第175页）。

④ 劳动：《劳动者言》，《劳动》月刊1卷1号，1918年3月20日。

⑤ 又见《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

纪》登载记事、工读主义、乡村教育、世界语文章以外，又发表陈独秀、蔡元培、恽代英等人的文章。其实，《劳动》名义上是以吴稚晖任主编，但负责实际编辑工作的主要是梁冰弦、刘石心等第二代无政府派。

到这里，笔者不想再谈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具体情况和内容。因为关于这一运动的研究成果已经不少<sup>①</sup>，我们着重注意的是新文化运动（前期）时期无政府派的“工”和“学”的结合思想——工读主义——与“五四”时期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工学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些思潮都是与无政府主义的倡导密不可分。

“泛劳动主义”的创始者是俄国的托尔斯泰，其基本观点是“凡人皆不可不劳动”，“人欲得衣食，须要靠自己勤劳，人人自劳而食”。托尔斯泰看到了社会的不平等，将社会阶级的差别归结于劳力和劳心之分，并且视人人参加生产劳动作为消灭社会不平等和社会阶级的根本途径。这就是刘师培所设想的理想社会的基础，也是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在《勤工俭学传》等文中很注意谈到的问题<sup>②</sup>。“新村主义”系日本武者小路

① 例如，资料集有：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1、2（上、下）、3，北京出版社，1979；张允候、殷叙彝、李俊晨编《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陈三井：《勤工俭学运动》，台北，正中书局，1981等。国内外研究著作有：黄利群编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简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张洪祥、王永祥：《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鲜于浩：《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稿》，巴蜀书社，1994；〔美〕John Kong chong Leung, *The Chinese Work - study Movement: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Experience of Chinese Students and Student - workers in France*, Brown University Ph.D., 1982；〔日〕森时彦：《フランス勤工俭学运动小史》（上、下），《东方学报》50、51，1978、1979；〔韩〕朴济均：《中国“巴黎小组”（1907~1921）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实践》第5章，庆北大学校博士学位论文，1996等。

② 鲜于浩：《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稿》，第28~29页。



实笃所倡导的一种共产社会主义学说，与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理论颇为相似。武者小路企图通过建立新村，使村民人人劳动，平等互助，从而达到没有阶级斗争的理想境界，而新村在全球普及之时，则是世界大同实现之日。对于这种理想村的实验也是清末民初无政府派较注意的地方，例如，清末新世纪派的吴稚晖、张继等人参观了法国的“鹰山共产村”并介绍这种理想村<sup>①</sup>，民初中国社会党的江亢虎和民声派的师复也鼓吹过这种主义。后来周作人在《新青年》、《新潮》等刊物上，对武者小路的新村主义做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和宣传。不久，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王光祈于1919年12月正式发出组织工读互助团的倡议。他率先在北京成立了国内第一个“工读主义”团体——“北京工读互助团”。王光祈等人为该团规定的宗旨是：“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团员们每天通过工作与读书，“养成劳动、互助的习惯”，团内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他们希望“小团体大联合”计划的实现，就是理想社会的到达之时。他们组织的工读互助团的思想来源可以说是泛劳动主义的“人人皆不可不劳动”主张、新村主义的组织形式和宗旨、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等<sup>②</sup>。

同一时期，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办“工学会”，其机关刊物《工学》宣传了所谓“工学主义”<sup>③</sup>。工学主义提倡者是无政府主义信仰者匡互生。匡互生和其朋友在《工学会的旨趣书》中说，“我们发起这个工学会，就是要把工和学并立，作工的人一定要

① 参见燃《游鹰山村植民地记》，《新世纪》第53号，1908年6月27日。

② 鲜于浩：《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稿》，第35-36页。

③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的“工学会”成立于1919年2月9日。他们为了宣传和进一步研究工学主义的理论，创办了《工学》月刊（1919年11月创刊）。已见的《工学》有第1卷1至5号和1922年5月复刊的第2卷1号（“五一纪念号”）。

读书，读书的人一定要作工。绝对反对作工的人可以‘目不识丁，蠢如鹿豕’，读书的人可以‘高其身价，坐享福祿’。一心想把我国数千年来‘贵学贱工’的一种谬见，一扫空之。所以叫做工学会。这是本会目的之大概”<sup>①</sup>。并在该刊中继续讨论“工”和“学”两概念的关系问题，这是《工学》的一大特色。大体上，他们的工学主义的目的是打破劳力者和劳心者的区别，并进而主张知识分子应参加劳动而工人也应参加学习。他们认为求学和做工都是人生所必不可缺少的活动，这种工学主义的劳动和学问的结合就是达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理想社会的目的兼手段。从《工学》杂志上登载的内容来看，工学会也是与上述的种种思潮一样，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原新世纪派的勤工俭学思想的影响<sup>②</sup>。

综上所述，新文化运动时期，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人在国内进行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及其他社会运动，为师复死后没有领导核心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提供了新的活力，从而吸引了许多青年无政府主义者积极支持和参加。其实，工读互助团及工学会等学生社团里存在着不少青年无政府派。并且，由于无政府主义学说的开放性，使其容易与其他社会思潮相融合，产生出一些新的混合物。“五四”时期盛极一时的新村主义、工读主义、工学主义都可以看做是这种混合物。

### 3. “互助”和“劳动”——无政府主义在北京大学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蔡元培可以说是一个哲学性的无政府主义者，他积极肯定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并相对于马克思的阶级斗

<sup>①</sup> 周馨：《工学会的旨趣书（一）》，《工学》第1卷第1号，1919年11月。

<sup>②</sup> 参见〔韩〕朴济均《中国‘巴黎小组’（1907~1921）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实践》，第160~190页。

争论给予了它更高的评价。但他接受克氏的互助论时，是通过传统的中庸论和大同论作为媒介物理解其人道主义的特点。对于政治问题，蔡元培的看法和活动与其他无政府派具有相当的差别。但无论如何，他是因为对平等主义的理想社会的热望才渐渐接近了以互助论为主的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

蔡元培更相信互助论的决定性因素可能是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sup>①</sup>。例如，他认为因在德国是尼采的强权主义、在俄国是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在协约国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占主导，在这三者格局中应反对德国而支持协约国。他说，“现在误用托氏主义的俄人失败了，专用尼氏主义的德人不久也要失败了，最后的胜利，就在协约国。协约国所用的，就是克氏的互助主义。互助主义，是进化论的一条公例”<sup>②</sup>。这样，从蔡元培对欧战的态度中可以较明确地看到这些特点。从蔡氏1918年10月、11月在庆祝协约国胜利的演说《大战与哲学》、《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等文中，又可以看到互助主义的历史意义。他宣称：“黑暗的强权论消灭，光明的互助论发展。”“此后人人都信仰互助论，排斥强权论了。”<sup>③</sup>蔡元培认为，互助是国际上公理战胜强权的有力方法，并认为互助主义是进化论的一条公例。他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就提倡互助精神，这成为他改革北大的一个重要思想。

① 有人曾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第一，表现在否定以生存竞争为中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第二，表现在否定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第三，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民主议会制的失望；第四，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要求逐渐强烈（朱育和主编《中国革命史通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第250页）。

② 蔡元培：《欧战与哲学》，《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

③ 参见蔡元培：《大战与哲学》，《全集》第3卷，第200~205页；《黑暗与光明消长》，同上书，第215~218页。

我们已经认识到的是，互助论与清末无政府派之间有不可分的关系。清末在《天义》、《新世纪》中曾介绍和翻译了互助论。民国初期，李石曾又一次将《互助论》重新翻译，连载于《东方杂志》第16卷5至10号上<sup>①</sup>。另外，在其他几个刊物中也登载过《互助论》的部分译文。可以说，新文化运动时期流行的“互助”一词的真正来源就是来自李石曾，蔡元培写的一篇文章里较明确地记述了这一情况。他写道：

《天演论》出版后，‘物竞’、‘争存’等语，宣传一时，很引起一种‘有强权无公理’的主张。同时有一种根据进化论，而纠正强权论的学说，从法国方面输进来，这是高阳李煜瀛（李石曾）发起的。李氏本在法国学农学，由农学而研究生物学，由生物学而研究拉马尔克的动物哲学，又由动物哲学而引到克鲁巴金（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他的信仰互助论，几与宗教家相像。民国纪元前六年顷，他同几个朋友，在巴黎发行一种《新世纪》的革命报，不但提倡政治革命，也提倡社会革命，学理上是以互助论为根据的。卢梭与伏尔泰反对强权反对宗教的哲学，纪约的自由道德论，也介绍一点，李氏译了拉马尔克与克鲁巴金的著作，在《新世纪》发表，虽然没有译完，但是影响很大。李氏的同志如吴敬恒（吴稚晖），张继，汪精卫等等。到处唱自由，唱互助，

<sup>①</sup> 李石曾在《互助论》译者序言中说：“进化学说初创于法之陆谟克，大成于英之达尔文。陆氏言境遇与遗传、达氏言物竞与天择、至达氏进化学说乃定……后人过信竞争。达氏亦未及自料。赫胥黎智尔辈于传达进化学说虽大有功。而于误点则不能谓无过。逮俄之学者开斯来柯伯坚 Kropotkine（亦作克洛泡得金）继起。乃明进化不独有竞争为之一因。而互助尤其大者。今之互助论，即柯氏之名著也”（李石曾：《互助论》译者序言，《东方杂志》第16卷第5号，第87页）。

至今不息，都可用《新世纪》作为起点。<sup>①</sup>

笔者认为，在近代中国具有相当影响的两种译著《天演论》与《互助论》的关系问题中提出的是：从进化论方面来说，在“天演”这个词内在的“进化”和“伦理”两种侧面中，严复注重自强保种问题，比较忽视伦理、道德意识的进化问题。相反，“互助”这个词在于它同意进化和革命的必然性，同时更强调人间社会的伦理问题。这样，“互助”的无政府主义可以在近代中国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思想中存在对于“竞争”的民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的批判因素。

到五四运动时期，互助主义一词已经成为普遍的口号，以至于各地都出现了一些以“互助”命名的社团或刊物。在这种情况下，互助论的进化思想广泛流行起来。当时，不少知识分子认为“社会发展”是“协助生存的结果”。除了孙中山等以外，甚至许多具有初步觉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受到了克鲁泡特金互助论思想的影响，他们不是直接表示不赞成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需要无政府主义互助论的补充和完善。

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另一个特色是重视“劳动”的态度。在他支持原新世纪派进行的勤工俭学计划过程中就已经充分地表现出这种劳动主义。1917年以后，蔡元培在他主持下的北京大学里提倡全民参加劳动和实行平均主义，他在1918年高喊“劳工神圣”的口号，就是这种思想的明确反映<sup>②</sup>。如前所述，他的劳动思想是与李石曾、吴稚晖常说的“劳工”和“劳心”的消灭及“工”和“学”差别的废除主张一脉相通的。其理论起源是建立在克鲁泡特金的“肉体劳动和精神劳动的结合”和托尔斯泰的

① 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1923

② 参见蔡元培《劳工神圣！》，《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

“泛劳动主义”基础上<sup>①</sup>。由此观之，无政府主义在北京大学得到较广泛传播，这与蔡元培的提倡有不可分的关系。

那么，北京大学改革和原新世纪派的关系是怎样的呢？1917年1月，蔡元培写信给吴稚晖说，北大需要像他这样的人，因为他能帮助学生提高研究的鉴赏力，并给学生在人格上树立榜样。但吴拒绝了蔡的邀请，可能他认为这个学校太腐败了，以致改革不可能在这所学校起作用。汪精卫也拒绝了蔡的邀请。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领导者中，只有李石曾曾接受了在北大就职的邀请<sup>②</sup>。其后，在蔡元培和李石曾的支持下，在北京大学内设立了具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新文化运动团体，我们通过这些团体可以理解北大改革中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力。

第一，“北京大学同学俭学会”：大约12个同学于1917年4月主动发起成立了北大第一个学生社团——北京大学同学俭学会。在《简章》任务项目中说，“本会无会长等名目，惟由会员中公推同志数人，分任总务、文牍、会计等事务”，在规约项目中规定，“1. 勿赌博；2. 勿狎妓；3. 勿吃烟；4. 勿吃酒；5. 勿坐车（非绝对的规定）；6. 爱用国货；7. 节衣；8. 俭食；9. 躬行洒扫；10. 寝兴准时”<sup>③</sup>。这就像蔡元培和李石曾于1915年在巴黎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会以及早在1912年他们成立的进德会一样，俭学会反映了无政府主义思想<sup>④</sup>。

第二，“进德会”：1918年1月又发起成立北京大学“进德

① 有趣的是，师复曾说：“无政府主义之道德，不外‘劳动’‘互助’而已。二者皆人类之本能，非由外烁”（上海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民声》第19号，1914年7月18日）。

② [美]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第152～15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③ 《北京大学同学俭学会简章》，《新青年》第3卷第4号。

④ [美]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第161页。

会”，征求甲、乙、丙三种会员。进德会甲种会员以不嫖、不赌、不纳妾三项为条件；乙种会员除以上三戒外，还应遵守不做官，不当议员二戒；丙种会员除以上五戒外，再加上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三戒（后来改为会员不分等，以不嫖、不赌、不纳妾为基本条件，后五戒随意选择）。同年5月28日，召开北京大学进德会成立大会，公布会员人数已达468人。大会中，李石曾演说了《最近之道德与宗教时代玄学》。发起者认为，“官吏议员两戒，在普通社会，或以为疑，而大学则当然”<sup>①</sup>，这一句话间接反映了政治和教育之间的区别。该会就是民初原新世纪派和蔡元培等人创立过的进德会的再建。

第三，“实社”：1917年在北大成立了第二代无政府派的小团体“实社”。这是一个在意识形态上属于广州无政府派（指民声派）的小社团，其代表人物是黄凌霜、区声白等人。他们在蔡元培和李石曾到北大之后也来到北京。实社宣称对男男女女所有人都开放，只有那些参与政治的人例外。并且像上述的俭学会一样，宣称它的主要目的是促进道德进步。但与俭学会不同的是，实社把无政府主义思想当做社会变革的纲领性思想，并积极吸纳新会员<sup>②</sup>。在《实社意趣书》中明确宣言，“本社以进德修学为宗旨，而以研究‘无政府主义’Anarchism为范围”<sup>③</sup>。为了贯彻这一思想，实社成员们出版了《自由录》，宣传无政府革命，对中国的封建伦理道德也进行了猛烈攻击。这本杂志还汇编了有关欧洲无政府主义者的译作，其中绝大部分译作已在中国其他刊物上发表过。实社同时为世界语的传播而努力。

第四，“奋斗社”：它是“五四”事件以后在北大组织的无政

① 《北京大学之进德会》，《自由录》第3集，1918年5月。

② 〔美〕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第162页。

③ 《实社意趣书》，《自由录》第1集，1917年7月。

府主义小团体。其代表人物是朱谦之、易家钺等人。他们提倡的所谓“奋斗主义”中虚无主义及个人主义的色彩很浓厚。例如，《奋斗主义》一文中，作者易家钺写道：“人类的社会，是由奋斗一层一层进化来的，所以人类的生活，无一刻不在奋斗之中。”“奋斗的结果，就是创造，创造的结果，就是进化。反面说来，没有奋斗，就没有创造；没有创造，就没有进化。所以说，没有奋斗，就没有进化。”<sup>①</sup> 奋斗社认为，“建设是从破坏中来的”。与其他无政府派不一样，他们不仅批判近代科学，甚至批判无政府共产主义。奋斗社出版《奋斗》杂志，1920年1月4日在北大创刊（旬刊）。他们除了批判无政府共产主义以外，还反对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曾出版“反对布尔什维克专号”（第8、9号合刊）。另外，还有“奋斗专号”（创刊号）、“自由恋爱专号”（第3号）、“破坏专号”（第5号）等，所载文章大部分用英文字母署名（例如，A.A、A.D等），据说其原因是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废姓。

并且，朱谦之与上述的实社成员区声白、黄凌霜等人共同参加《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的编辑工作。这个杂志原来是由北大学生会出版的全体同学可以发表思想的机关刊物，因此，对北大学生的影响不小。宗旨是创造“新道德、新教育、新经济、新文学、愉快美满的社会”，采取“兼容并包、广纳众流”的方针<sup>②</sup>。这本周刊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是当时的其他进步刊物所不及的，这就是，它经常公开批评和揭露北洋军阀政府，甚至明目张胆鼓吹革命。该杂志的论调甚至超过了《新青年》上主张的教育改革论，并由于该杂志的作者不满意北大改革的程度而要求“教

<sup>①</sup> 易家钺：《奋斗主义》，《奋斗》第1号，1920年1月4日。

<sup>②</sup> 《我们的旨趣》，《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号，1920年1月4日。



育革命”<sup>①</sup>。《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前期注重讨论教育问题，而后期注重宣传无政府主义。另外，在北大出版的《社会运动》杂志也是无政府主义的刊物。

第五，“北大世界语研究会”：北京大学是中国提倡世界语较早的一个学校，1917年秋天，北大第一次开设了世界语课。蔡元培主持北大后，即聘世界语学者孙国璋来校主讲世界语，于文科设立讲习班，参加学习的达到五百多人。并且蔡元培倡立的校役夜班正班也把世界语作为外国语学科之一。他为了有利于世界语学者作高深的研究，于1920年创立北大世界语研究会，自兼会长，孙国璋为副会长。蔡元培本人努力学习世界语，进而主张在国际上采用世界语，到1923年他亲自担任北京世界语学校校长。当然，不能认为世界语和无政府主义思潮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两者间具有密切的关系。

另外，关于学生们合作的思想，至少部分上是受到了在当时甚为流行的克鲁泡特金的影响，并且得到了蔡元培的全力支持。在北大建立“消费公社”和“互助团”<sup>②</sup>等的活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互助论的影子。这些事实充分证明，北大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地区的无政府派的集合地。蔡元培和李石曾在北大改革中反复强调的“互助”和“劳动”的思想，以后于20年代末在上海的劳动大学里又一次实现了。这所劳动大学可以说是李、吴、蔡等人创办的较具典型性的无政府主义大学。

当时北京大学内无政府主义势力很大，这一事实通过当时人的种种回忆很容易看出来。例如，梁漱溟回忆说，“同盟会里面的思想是多种多样的。孙先生虽自有一套学说和具体主张，却全

<sup>①</sup> [美] 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第252页。

<sup>②</sup> 参见《介绍新文化中的有力大组织》，《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3号，1920年3月28日。

然不能以此统一其党人的思想意志。大约不同于他的，至少可分为两派：一派是无政府主义者，例如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张继等许多人物都是，乃至汪精卫亦接近于此……又一派则是资产阶级和民主政治思想，换言之，就是倾向欧美近代政治，特别是美国式的议会政治，宋教仁即是代表。由之，蔡元培甫掌北大，即要援引王、李、吴诸人到北大，其中意趣倾向，可思过半了”<sup>①</sup>。据许德珩的回忆，蔡元培主持时的北大有大略三种派别。“第一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者，教员中属于这一方面的有李石曾、吴稚晖等人，蔡校长本人的思想在当时也有点倾于这一方面。李石曾当时在北大教生物学，吴稚晖学校里发表了他做学监他不就职……第二是《新青年》和《新潮》方面的人物，即新文化运动的人物”。指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第三是《国故》派的人物，教员方面有辜鸿铭、刘师培、黄侃，这些先生，他们抱残守缺，少谈政治，所以在思想上没有可叙述的地方”<sup>②</sup>。又说，“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太坏，学生们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水平太低，又有社会上这些‘知名之士’（指蔡、李、吴等人）来鼓吹提倡，所以北大在最初一个时期，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学生不少，其最活跃的我记得有凌霜（黄）、声白（区）这些人，他们当时主张不要国家，不要政府，不要家庭，把‘爱国’、‘救国’看成是落后的思想行为，他们不赞成，也不参加；因为不要家庭，所以他们的名字上多半不冠姓，如‘凌霜’、‘声白’之类”<sup>③</sup>。朱谦之也回忆说：“五四前后北大图书馆公开陈列无政府主义书报，任人阅读，给许多知识青年以绝

① 梁漱溟：《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第41页。

② 许德珩：《五四运动在北京》，《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第212~213页。

③ 许德珩：《五四前的北大》，《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229~230页。

大的影响，加以当时的气候，不能严格区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因而一时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做社会主义加以接受”<sup>①</sup>。因此，当时上海《时事新报》公开批判北京大学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流行<sup>②</sup>。

大体上，无政府主义思潮之所以在 1917 年前后在北京大学流行，并非因为它那种导致社会革命蓬勃兴起的纲领性思想，而是因为它强调个人修行和团体协作。通过教育培养品德、忍耐力和互助精神，以及促进个人素质的发展，这是蔡元培和学校其他领导者所强调的主要观点<sup>③</sup>。这也是与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常主张的道德革命、教育革命等和平性的改良改革方法没有冲突的地方。他们已经放弃了暴力革命手段，并且他们相信的是无政府革命的真正基础在于个人道德的完善上。除了原新世纪派以外，新文化运动时期师复的继承者即第二代无政府派也不愿意谈政治，只是为了准备社会革命而进行对于工人和知识分子的道德、教育及理论方面的宣传。这一时期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不谈政治面只谈学术文化方面的种种革新主张。

## 第二节 《新青年》言论中的无政府主义

### 1. 陈独秀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

1915 年 9 月 5 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成为新

① 朱谦之：《世界观的转变（七十自述）》，《中国哲学》第 3 号，1980 年。

② 《北京大学之无政府主义》，《时事新报》（见《少见多怪之时事新报》，《自由录》第 2 集，1917 年 7 月）。

③ [美] 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第 162 页。

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公开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从第二卷起，《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1917年1月因陈独秀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迁到北京。在这以后，李大钊、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等人也先后来到北大，鲁迅虽未到北大任教，但因长期在教育部任职，又和《新青年》杂志有联系，因而和北大也保持着密切联系。于是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学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新文化阵营。陈独秀主编时期的《新青年》，标榜“以改革青年思想，辅导青年修养，为本志之天职”<sup>①</sup>。又说：“介绍西方学说，改造社会，此固本志惟一之宗旨，出版以来，一字一句，皆此物此志也。”<sup>②</sup>除了上述教育青年、改造社会的目的外，还进行如改革伦理观念，提倡文学革命，讨论女子问题等。这样，原来《新青年》的目的是借青年及中国人的基本思想变化，特别是道德的变化，来促进文化改革，另外，也宣布杂志的目的非属政治性。除此之外，陈氏又认为当时中国之民力衰弱与政治、社会的落后，最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人民持有传统的旧思想。

那么，《新青年》的反传统主义的起源是从哪里开始的？不少学者从各种角度提出了种种意见。从陈独秀本人方面来说，他在1904年创办的《安徽俗话报》，具体而全面地反映了他的反传统文化思想。其中，陈独秀在《恶习篇》（共五篇）中批判了在婚姻、敬菩萨、妇女问题上的种种封建迷信的习俗。特别诉说了妇女在封建压迫下的苦难，提出了这些坏习俗与人民愚昧、国家贫弱的关系。陈氏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掀起的“打孔家店”、批判

<sup>①</sup> 记者：《通信》，《青年杂志》第1卷第1期，1915年9月15日。

<sup>②</sup> 独秀：《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4期，1916年12月1日。

封建礼教的新文化运动，从这时就开始萌芽了<sup>①</sup>。因此有人说，《安徽俗话报》可以说是“十一年后出版的《新青年》的模型，在许多方面它还是《新青年》的先声”<sup>②</sup>。

从有关杂志的影响方面来说，有人认为，“《甲寅》（1914年5月）在酝酿和推动新文化运动方面的功绩被大大地忽略了。但是在新文化团体的形成及其向政治和学术方向发展方面，《甲寅》发挥了极端重要的作用”。同样，有人先讨论了《甲寅》的政治救国论和《新青年》的道德救国论之间的差别后，又认为，“《新青年》在《甲寅》所作的理论准备基础上，汇集了其他救国主张的有益成分，离开政治救国论的轨道，走上‘伦理的觉悟’。举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掀起了新文化运动”<sup>③</sup>。这样，章士钊在日本主编的《甲寅》和《新青年》之间存在着继承关系问题也是一种说法。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甲寅》注重谈到的是政治问题，而《新青年》注重谈到的是文化问题。

从有关组织方面来说，有一些学者曾注意到1914年组织的“欧事研究会”与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的关系。斋藤道彦、末次玲子等人较强调“欧事研究会”和“共和维持会”等旧国民党系谱与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的密切关系。他们的主要根据是“欧事研究会”内有蔡元培、吴稚晖、章士钊、陈独秀等人。其实，二次革命流亡到欧洲后，蔡元培、吴稚晖、汪精卫、李石曾和张继等都力图维系很大的流亡者群体，并扩及东京和上海。所以，除了李石曾，他们全是“欧事研究会”成员，这些论者强调的是国民党人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关系

① 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32页。

② 沈寂：《陈独秀和安徽俗话报》，《历史论丛》第1辑，齐鲁书社，1980。

③ [美]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第108页；刘桂生主编《移植西方民主政制的失败与启蒙思想的复苏——“新青年”的先声“甲寅”月刊》，《时代的错位与理论的选择》，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第132页。

问题<sup>①</sup>。

如上所述，在陈独秀的《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起源方面的研究中已经提出了较多的观点。在这里，笔者要探讨的是，《新青年》的文化思想和清末《新世纪》等无政府派的文化思想之间在思想逻辑上是否存在继承的问题，为了讨论这一问题，笔者首先论述陈独秀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清末进行反清革命运动时，陈独秀与张继、刘师培之间开始交往。据年谱记载，1901年陈独秀第一次渡日后在东京与张继等共同参加过留学生组织的“励民会”，1902年第二次渡日时又一次与张继等人一致参加“青年会”。此外，陈氏当时与蔡元培领导的上海“爱国学社”成员也有了联系。并于1903年8月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报》时，由章士钊、张继、陈独秀等人任主编。同一时期，陈独秀首次结识了“‘由扬州以政嫌遁沪’而处于困苦中的刘师培”。1904年他一方面在芜湖发行《安徽俗话报》的时期，另一方面参加在上海蔡元培等人组织的暗杀团。1905年秋陈独秀在芜湖组织反清革命团体“岳王会”，刘师培也参加了陈氏的革命活动。1906年秋蔡元培准备赴德留学时，陈氏邀金少甫即刘师培到芜湖皖江中学、安徽公学任教。由此两人

<sup>①</sup> 参见〔日〕斋藤道彦《五四北京学生活动断面》，《五四运动史像の再检讨》，日本中央大学出版部，1986，第159页；〔日〕末次玲子：《五四运动と国民党势力》，同上书，第287-288页。对此，陈万雄不同意上述看法。他说，“蔡元培出掌北京大学校长后之与孙中山的来往书信，所道及的都是无关乎实际政治的其他事情。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蔡元培等人毋宁说是有意摆脱现实的政治，而专志于文化思想和教育工作上去。甚至可以说，其间，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等倾向无政府主义的国民党人与孙中山的关系最是疏离的一段时期”。这样，他否定了孙中山的国民党系列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的直接继承关系（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第60页）。

之间友谊更深<sup>①</sup>。

1907年春，陈独秀赴日，与苏曼殊、邓仲纯同住一间小屋。陈独秀为苏曼殊翻译了《梵文典》题诗，还与在东京的同盟会员章太炎、刘师培、张继过从甚密，切磋中西学问，建议梵文书藏，但不参加“中国同盟会”，而参加由章太炎、刘师培、苏曼殊及日本人幸德秋水、印度人钵罗罕、保什等发起的“亚洲和亲会”。更有趣的是，陈独秀又积极参加了天义派的“社会主义讲习会”活动<sup>②</sup>。1907年9月1日，在《天义》报上，陈氏以“熙州仲子”笔名发表诗：《题曼上人“梵文典”》<sup>③</sup>。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陈独秀不参加同盟会而参加亚洲和亲会这一事实<sup>④</sup>。其原因之一，即当时同盟会内部发生了明显的矛盾对立。在章太炎、刘师培、张继等人和孙中山的对立之中，以陈独秀论，他本与张继、刘师培等人交往甚久，感情密切，于是自然地倾向于章太炎等人，所以，不仅不入同盟会，反而加入实际上带有同盟会分裂性质的亚洲和亲会及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活动<sup>⑤</sup>。

照此看来，清末陈独秀在日本东京时期和天义派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这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想很可能对陈独秀的影响不

① 参见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第15~42页。

② 陈万雄：《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见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53页。

③ 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第43~44页。

④ 陈独秀之不肯入同盟会，与章上钊亦不肯入会一样，是因为他们“与孙中山一系在人事关系思想气质方面都有相当距离”，而且陈独秀本人在同盟会成立前就已经组织过革命团体岳王会，依据“志大心雄，不欲依人成事”的独立的政治个性，自然更是“不欲加盟”（陈万雄：《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转引朱文华《终身的反对派——陈独秀评传》，青岛出版社，1997，第36~37页）。

⑤ 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第44页。

小。但是，因资料的限制，我们不容易断定其他事实。我们只能通过民国时期陈独秀和刘师培的关系而再一次理解两人之间的友情。革命之后，不少革命党人即主张惩罚投降端方的刘师培。但是，陈独秀与蔡元培、章太炎一样，也参加了拯救刘师培的活动。陈氏鉴于他学有专长，曾以皖省都督部秘书长的名义与邓艺荪等人联名致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为之乞命<sup>①</sup>。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和刘师培对待传统文化的观点基本上是对立的。前者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后者是主张“保存国粹”的国故派领袖。但是，刘师培之人北大，是由陈独秀招聘的。其实，从个人关系方面来说“两人感情极笃，背后也互相尊重，绝无间言”<sup>②</sup>。后来刘师培死后也是由陈独秀主持而料理其丧事<sup>③</sup>。这些事实都充分地证明两人之间的友谊。

那么，陈独秀与原新世纪派的关系是怎样的呢？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是很密切的。因资料的限制，我们不容易清楚了解两者之间的具体关系。但我们可以通过片断记事而大概进行了解。吴稚晖回忆说，“见独秀两个名词，尚以为是备绝世美男子。后我在‘新青年’发起时晤到，正如韩退之所状苍苍者动摇者的形貌”<sup>④</sup>。这样他们两人间直接结识是在《新青年》创刊时才开始的。但陈独秀早在清末革命运动时期已知道吴稚晖的名望。到新文化时期，他对吴稚晖仍很尊重，而对他的评价也特别高。例如，陈独秀在《新青年》登载的吴稚晖《青年与工具》一文后记中介绍说：“吴先生稚晖，笃行好学，老而愈挚。诚国民之模范，

① 参见陈独秀等《保释刘光汉》（上书大总统），《临时政府公报》第2号，1912年1月30日。

② 陈觉玄：《陈独秀先生印象记》，《大学》第1卷第9期，1942年9月。

③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起源》，第52~53页。

④ 吴稚晖：《章士钊——陈独秀——梁启超》，《吴稚晖先生文粹》（·），华文书局，1929，第816页。



吾辈之师资”<sup>①</sup>。吴稚晖是《新青年》的主要赞助者，而陈独秀也曾投稿于吴稚晖在上海主编的无政府派刊物《劳动》杂志<sup>②</sup>。当时在北京的《新青年》与在上海的《劳动》相互呼应，共同进行新文化事业。

《新青年》创刊时期，李石曾还在法国进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李和陈之间还没有结识的机会。但陈独秀已经知道李石曾这一名字，曾在通信中介绍：“李君石曾，闻尚居巴黎，所译二书，犹未出版。《互助》不独为克氏生平杰作，与达尔文之书同为人类不刊之典。”<sup>③</sup> 1917年李石曾回国后，与陈独秀一起共同进行了讲演会等各种新文化运动。在北大，李石曾对陈独秀介绍了文化运动的重大意义。其后，陈独秀与原新世纪派共同参加了蔡元培主持的进德会和《新青年》刊行等工作。

综上所述，从清末天义派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原新世纪派都与陈独秀之间维持着密切关系。这不只是个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五四”时期至无政府主义论战之前，从陈独秀的几篇文章里，我们可以较容易发现陈氏以友好的态度介绍无政府主义的种种内容。

第一，陈独秀部分介绍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新青年》创刊不久，陈独秀在《答李敬平》的信中说，“达氏书言万物由竞争而进，不适者自处于天演淘汰（Natural Selection）之境。克氏书言人类进步由于互助，不由于竞争，号为与达氏异趣。鄙意以为，人类之进化，竞争与互助，二者不可缺一，犹

① “此文竟于发热剧烈时力疾为之，以践本志之约。其海不倦重然诺如此，全文无一语非药石。我中国人头脑中得未曾有，望读者诸君珍重读之，勿轻轻放过一行一句一字也”（独秀：《青年与工具》（后记），《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6年10月1日）。

② 见陈独秀《人生真义》，《劳动》第1号，1918年3月20日。

③ 记者：《通信》，《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1915年10月15日。

车之两轮，鸟之双翼”<sup>①</sup>。陈氏认为竞争和互助各见真理之两面。第二，陈独秀过去参加过上海暗杀团，所以，在《新青年》上部分宣传了虚无党、无政府党人。例如，1915年11月，陈氏在《新青年》第一卷第三号上发表了《欧洲七女杰》一文，他把俄国虚无党人苏菲亚（Sophie Perovkasa）、法国无政府党人未雪儿（Louise Michel）等大加颂扬<sup>②</sup>。第三，陈独秀是带着无政府主义眼光来观察社会主义的。他也提出了破除国家观念、实现世界“大同”的思想。他说，“国家是个什么……我老实说一句，国家也是一种偶像……现在的人所以要保存这种偶像的缘故，不过是藉此对内拥护贵族财主的权利，对外侵害弱國小国的权利罢了。世界上有了什么国家，才有什麼国际竞争。现在欧洲的战斗，杀人如麻，就是这种偶像在那里作怪”<sup>③</sup>。这种偶像破坏精神是与法国的革命思想有关系的。其实，不但陈独秀和无政府派都是法国文化的热烈赞美者，而且《新青年》前期思想也是积极宣传法国的思想文化。第四，最重要的是，陈独秀提倡的文化革新论与无政府派的文化革命论其基本精神大体一样。特别是对有关反国粹主义态度上基本一致。甚至当时陈独秀的文化论可以说比吴稚暉的文化论激进得多，例如，关于“孝”问题和“世界语”问题。

从《新青年》发表的整体文章来看，陈独秀可以说是一个精英主义者，这与无政府派的平民主义比较起来，这是两者之间存在的最大的差别点。但是，新文化运动前期的陈独秀与无政府派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可以说是同志关系。因此，这一段时期（1917~1920年前后）在《新青年》上登载了不少无政府派的文

① 记者：《通信》，《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1915年10月15日。

② 陈独秀：《欧洲七女杰》，《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1915年11月15日。

③ 陈独秀：《偶像破坏论》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

章。在陈独秀从《谈政治》开始与无政府派进行论战后，他们之间从政治文化上彻底分手了。这里我们应注意的是，最初陈独秀批评无政府主义的时候，他重点批判的对象是所谓“中国式”无政府派和无政府个人主义派（指朱谦之、太朴等人），而不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

## 2. 《新青年》作者中的无政府派

在《新青年》上宣传的新文化与清末《新世纪》上宣传的文化观基本一致。其原因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在该报上登载了不少无政府派的文章，而且不少作者的观点里又存在着无政府文化思想的色彩。因此，可以说这是当然的结果。过去的研究者不太注意《新青年》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宣传或支持无政府派的文化观这一事实。其可能是因为《新青年》所刊文章的内容中有关政治方面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很少。再说，以科学和民主为中心展开的新青年派的反传统主义的文化论和无政府主义的反传统主义的文化论之间不容易分辨其相互间的关系。而且一般人认为，如果文章上没有反对国家、反对政府的内容的话，这不算是无政府主义文章。甚至认为无政府主义就是混乱或无秩序的代名词，因而如果没有过激思想、空想思想的内容的话，也不是无政府主义文章。这种见解最终导致了有关对《新青年》研究的部分空白。

那么，为什么在《新青年》里没找到有关无政府主义政治理论方面的内容呢？从内部原因来说，与陈独秀等《新青年》编辑队伍的编辑方针有直接关系。自1917年新知识分子领导人物开始联合之后，他们有些已经不愿涉及政治，或避谈政治，就是陈独秀亦如此，他因对军阀和旧官僚制度异常失望，所以认为当时救中国的希望不在于政治运动，而是在于全国的

文化革新<sup>①</sup>。从外部原因来说,《新青年》本来是以一般知识分子为对象的公开性刊物,而不是“违法”的革命刊物。因此,在该杂志上不易公开宣传无政府革命理论。并且,在北京政府及军阀政权的弹压状况下更不容易。当时北京政府继续进行调查及禁止新文化时期的种种无政府派刊物。并且,不谈政治的方针是民国成立后中国无政府派的主要方针。原新世纪派(除吴稚晖)和师复都是不相信军阀政权因而不愿意讨论现实政治,只是为了准备社会革命而进行以道德、教育为主的社会文化运动<sup>②</sup>。他们的“文化”概念是针对“政治”的反而含义。当然,他们自己创办的无政府杂志里还是继续宣传了无政府主义的文化、政治、经济方面的主义主张。

在这里,笔者只谈到《新青年》上发表的有关无政府派或有关无政府主义色彩浓厚的一些文章,而不是全面地谈到该报全部的文化论。因为关于《新青年》的研究已经不少,所以只希望论证的是较简单的一些事实,即关于该报的新文化思想方面,无政府主义也是构成其思想的一个主要流派之一。还有,笔者分析的文章主要限于《新青年》前期,即新文化运动启蒙时期从1915年创刊到1919年末五四运动前后的《新青年》时期(参见表10)。在《新青年》上,除了第一代无政府派的吴稚晖

①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翻译版,第313页。

② 《新青年》前期对封建思想的批判很激烈,但五四以前在《新青年》中没有找到打倒封建势力而建立新政府的革命思想,即原来该杂志不愿意谈到权力问题。五四运动爆发时,在《新青年》文章中不容易看到有关五四运动的记事,这一事实充分反映了该杂志的不谈政治的方针([日]丸山松幸:《中国近代の革命思想》,研文出版,1982,第211~212页)。

和其好友蔡元培的文章以外，第二代无政府派黄凌霜（凌霜）<sup>①</sup>、袁振英（震瀛）<sup>②</sup>、华林<sup>③</sup>、区声白（声白）<sup>④</sup>、梁冰弦（冰弦）<sup>⑤</sup>、

- ① 黄凌霜（生卒不详），又名文山，曾用兼生、兼胜、超海等笔名，广东新宁人。早年在香港学习英语、后入北京大学外文系学习。新文化运动前后，继承师复的思想，积极宣传无政府主义。1917年曾与太侔、袁振英等在北大发起组织“实社”，编辑出版实社《自由录》。后又参与编辑《进化》、《北京大学学生周刊》、《新生命》等刊物，在《新青年》上发表《马克思学说的批评》等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与陈独秀之间展开了无政府主义论战。撰写了《师复主义》，阐明师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并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种种著作。1922年赴美留学，1928年回国，任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 ② 袁振英（生卒不详），曾用笔名：震瀛、无梦青年、觉情和尚、黄龙道友、仲斌且郎等。广东人。师复在广州组织“心社”时期，他在香港组织类似性质的“大同社”。1915年7月，与黄凌霜、太侔等在北京大学组织“实社”，出版实社《自由录》，“五四”时期，参加组织“全菲列宾华侨工党”，出版《平民日报》，鼓吹无政府工团主义。曾翻译出版克鲁泡特金的种种书籍。1920年下半年，曾参加陈独秀发起组织的上海共产党组织小组的活动。后退出。1921年秋去法国留学，1924年归国，任广东大学教授。
- ③ 华林（生卒不详），辛亥革命时期参加社会党，并在《良心》杂志上撰写《无世界主义》等文。民初参加原新世纪派的“留法俭学会”而留学法国。回国后，他积极帮助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但当吴稚晖等人参加国民党时，他提出了其正当性与否的问题。有关文艺方面，他也提出了种种意见。
- ④ 区声白（生卒不详），广东佛山人。早年加入广州无政府主义同志社，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曾与黄凌霜组织“实社”。在实社《自由录》上发表《平民革命》等文章。又主编后期的《民声》杂志。他曾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展开了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论战。1922年赴法国巴黎留学，参加无政府派“工学社”的活动，并与周恩来等马克思派进行过论战。回国后，在广州进行世界语的推广工作。
- ⑤ 梁冰弦（？～1960），笔名两极。广东南海人。辛亥革命前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受师复影响笃信无政府主义，曾参加“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广州）”。在新加坡编辑过《正声》杂志，翻译了《世界工会》等无政府主义小册子。“五四”时期，编辑《劳动》、《民风》、《闽尾》等刊物。1925年，与郑佩刚创办出版合作社，编辑出版《吴稚晖学术论著》等。他注重宣传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

尉克水（克水）<sup>①</sup>等人的文章也可以见到。另外，朱谦之<sup>②</sup>、郑贤宗（太朴）等无政府个人主义者的文章也在《新青年》上发表。

无政府主义者的元老吴稚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三篇主要文章，即《青年与工具》、《再论工具》和《机器促进大同说》，这些文章都清楚地表达了他的科学主义信念。过去《新世纪》停刊后，他在英国时一直研究西方的科学技术文明，并且写了《天演学图解》、《荒古原人史》、《上下古今谈》等自然科学译著，他认为科学是人类进步和工业社会实现的主要源泉。其后，在这种近代科学的信念上，他反复赞扬了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社会。在《青年与工具》和《再论工具》两文中均反映了这种物质文明的观点。吴稚晖自己说，“吾决非崇拜物质文明之一人。惟认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所由奇之而发挥则坚信无疑”<sup>③</sup>。其实，他的思想里面具有相当的唯心主义因素，但新文化运动时期他注重提倡的是学习科技文明。因此，他对青年宣传了所谓“工具”一词代表的物质文明的社会意义。吴氏在《机器促进大同说》一文中，设想的无政府大同社会具有更具体的内容，即该社会乃是一个物质文明十分发达的社会。值得注意的是，新文化运动时期

① 尉克水（生卒不详），1918年在山西出版了无政府杂志《太平》，并在《新青年》、《进化》杂志中也可看到他的文章。

② 朱谦之（1899~1973），化名A、A，福建省福州人。1917年入北京大学学习。1919年与黄凌霜组织“互助团”，并编辑过《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宣传无政府主义。“五四”时期，编辑《奋斗》旬刊，写过《现代思潮批评》及《革命哲学》等书，鼓吹虚无主义比无政府主义革命更彻底，主张否定一切，破坏一切，以致毁灭人类，才是最彻底的革命。一般认为，当时他是无政府个人主义者。后来在北大哲学系任教授。以上‘人物介绍’参见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③ 吴稚晖：《青年与工具》，《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9年10月1日。

吴稚晖虽强调科学与工艺教育，却并不忽视“德育”。他在法国《新世纪》时期，曾大力鼓吹“新教育”，其所谓的新教育，便是以“科学”与“公德”为内容。其后，他的头脑里一直担心过渡时期民主社会中的科学误用问题，由此“道德”在他心中一直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且认为它在从民主社会到无政府社会发展进化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此外，蔡元培对《新青年》也始终是关心和支持的。1917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就曾以记者的名义刊登了《蔡子民先生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蔡子民先生之欧战观》等报道。他的《以美育代宗教说》、《欧战与哲学》、《洪水与猛兽》等重要文章，也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蔡氏本人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并不多，但他却促成了北大与该杂志的结合，这是《新青年》文化品格形成的关键所在。另外，在《新青年》上我们虽找不到李石曾的文章，但在别人的文章里却常常看到介绍他的新文化思想及活动<sup>①</sup>。

新文化运动时期具有较大影响的青年无政府主义者主要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这两人都是广东人，而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即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黄凌霜曾在师复创办的《民声》杂志上撰写过文章，而区声白参加过“广州无政府主义同志社”。可以说，他们都是师复的好学生，新文化运动时期两人均为北京大学学生，在《新青年》上以世界语问题为主发表了几篇文章，例如，《世界语问题》、《Esperanto 与现代思潮》、《论 Esperanto》、《中国文字与 Esperanto》等。以后黄凌霜主要活动于北京，区声白则在广州活动。无政府主义论战时，他们与陈独秀之间展

<sup>①</sup> 例如，李平敬、记者：《通信》，《新青年》第1卷第2号，1915年10月15日；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开了理论论争。他们两人是这时期的著名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并且是传播世界语的主要领导者。袁振英也是广东人，早年就读于香港香仁书院，后入北京大学。他信奉无政府主义，在校与黄凌霜、区声白等人组织“实社”，研究无政府主义，出版《自由录》，曾翻译美国无政府主义者高曼女士的《婚姻与恋爱》和撰写《易卜生传》，发表在《新青年》上。另外，梁冰弦、华林又撰写有关妇女问题等文章发表在《新青年》上。他们与黄、区两人一样，在“五四”时期成为第二代无政府派的主要活动家。除此而外，朱谦之也是引人注目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是当时北大学生中一个思想偏激的学生，在哲学思想上受叔本华的意志主义、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影响较深，他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几篇文章。

第二代无政府派人物大多数是以北京大学为主而从事活动的青年无政府派，通过这一事实，我们可以了解李石曾、蔡元培支持的北大无政府派团体也积极参加《新青年》的新文化运动。而黄凌霜、袁振英、区声白、梁冰弦等人过去都是师复的学生，由此，我们又可以了解在广州活动的民声派无政府主义者和在北京活动的原新世纪派人士的结合事实。可以说，这一时期北京地区是无政府派活动最活跃的地方。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上，同时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黄凌霜的《马克思学说批评》，并同时刊载了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和克水的《巴古宁传略》，这一事实间接证明了该杂志中的无政府派的势力。

当时在《新青年》上发表《物质实在论》、《论信仰》的恽代英可以说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他在1919年9月9日给王光祈的信中说，“从实告诉你，我信安那其主义已经七年了。我自信懂得安那其的真理，而且曾经细心之研究”，又说“我信只要一个人有了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精神，他自然有日会



懂得安那其的”<sup>①</sup>。1917年10月8日，恽代英在武昌中华大学发起组织的“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的互助社，显然是受到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的影响，他自己也说是“定名互助社，取克鲁泡特金新进化论的意义”。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创办人王光祈有很浓厚的无政府主义互助论色彩，他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工作与人生》一文。

综上所述，在《新青年》上看到的是，该杂志中无政府派文章已经占有相当分量，甚至在《新青年》主要编辑阵营中有些人也具有无政府主义的色彩。例如，李大钊、钱玄同、周作人、鲁迅等人。

李大钊在1912年时，曾经在天津参加过陈翼龙主持的“中国社会党”<sup>②</sup>。其后，在日本留学时期受到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影响。有人曾认为，那时他可能是受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的影响比较深刻<sup>③</sup>。从李大钊回国后发表的主要文章里容易看到这些影响，例如，1919年他在《新纪元》一文中明确指出：“从前讲天演进化的，都说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你们应牺牲弱者的生存幸福，造就你们优胜的地位，你们应该当强者去食人，不要当弱者，当人家的肉。从今以后都晓得这话大错，知道生物的进化，不是靠着竞争，乃是靠着互助，人类若是想求生存，想享幸福，应该互相友爱，不该仗着强力互相残杀。”<sup>④</sup>这样，他对一

① 中央档案馆等编《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第624页。

② 见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第60~61页。

③ 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的《近代思想》出版时期与李大钊的赴日留学时期是大略一致的。李大钊的《厌世心与自觉心》、《青春》等文与在《近代思想》上登载的种种文章之间从思想方法到作文结构都很类似（〔日〕丸山松幸：《中国近代の革命思想》，第262页）。

④ 李大钊：《新纪元》，《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第120页。

直奉为思想基础的社会进化论表示了怀疑，认为社会进化不是由于“竞争”，而是由于“互助”。同年，他又在发表的《阶级斗争与互助》和《“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中大力提倡“互助主义”精神。他进一步表示“人类应该相爱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不可依战争而生存，不能依战争而进化”<sup>①</sup>。他还认为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与马克思“阶级斗争”“仿佛相反”，而实际上是一致的。“这最后的阶级斗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我们主张心物两用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sup>②</sup>。

钱玄同在政治趋向上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是，从清末留学日本后一直保持对无政府主义的兴趣。自1907年秋起，钱玄同多次参加张继、刘师培二人召集的“社会主义讲习会”，在那里，无政府主义引起了钱玄同的共鸣。当时他给人写过一封信，认为因为“世界大势所趋”，已至“无政府”阶段<sup>③</sup>。其间，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举办世界语讲习班，章太炎举办国学讲习会，钱玄同两者都想参加，由于时间冲突，最终选择了后者，可能是这一时期他了解了天义派的种种主张。并且，据在《新青年》登载的他的文章来看，他引用吴稚晖、师复等人的论说而主张世界语及公历纪年等。由此观之，新文化运动前后他已经熟读了《新世纪》和师复的《民声》杂志等<sup>④</sup>。特别是，新文化运动时期钱玄同宣传世界语的主张与无政府派的世界语主张之间有着密切的

① 李大钊：《阶级斗争与互助》，《李大钊选集》，第222页。

② 李大钊：《李大钊选集》，第224页。

③ 转引杨天石《振兴中国文化的曲折寻求——论辛亥前后至“五四”时期的钱玄同》，《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第989页。

④ 参见钱玄同《通信》，《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论中国当用世界公历起源》，《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11月1日。

关系。其实，后来他自己说过，他主张文字改革，最早是受了吴稚晖、李石曾主编的《新世纪》报的影响。

周作人也在清末留学日本时受到了克鲁泡特金的影响，那时，他把克鲁泡特金写的《西伯利亚纪行》一文翻译登载在《民报》上。还与吴弱男翻译马拉得斯达的著名文章《无政府共产主义之工人问答》登载在《天义》报上。以独应的笔名在《天义》报上发表的那一组诗文，都是周作人的作品，例如，《女子选举权问题》、《绝诗三首》、《读书杂拾》、《读店斗监狱书书感》等，这时期他对无政府主义是相当心醉的。新文化运动时期他提倡的新村主义，也是与无政府主义的理想村运动具有很相似的地方。他的兄长鲁迅清末在日留学时期也曾与一些无政府派和无政府主义刊物有过直接或间接的交往。例如，据周作人回忆，在《天义》报（第11~12卷合册）上发表的《俄虚无党与革命主义之区别》一文就是“鲁迅当时曾嘱我节译出来，送给刘申叔，登载他的《天义》报上”。鲁迅在《文化偏至论》（1907年作）中还曾赞叹“彼持无政府主义者，其颠覆满盈，铲除阶级，亦已至矣”<sup>①</sup>。有人曾提出，鲁迅强烈地受到无政府个人主义者施蒂纳的思想的影响<sup>②</sup>。除上述人物外，在《新青年》作者群中还有不少人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影响。

### 3. 无政府派论“新文化”：以《新青年》为中心

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讨论的有关文化革新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1）孔教问题，礼教问题，道德问题；（2）家庭问题，

① 鲁迅：《文化偏至论》，《文化解剖与社会批判——鲁迅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第29页。

② 参见王晖《反叛的个人与民族复兴——鲁迅与个人无政府主义研究之一》、《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第285~286页。

父子问题；(3) 婚姻问题，自由恋爱问题，女子解放问题；(4) 宗教问题；(5) 教育改革问题；(6) 世界语问题，国语统一问题；(7) 文学改革问题，戏剧改良问题等<sup>①</sup>。如上所述，几乎都是《新世纪》中曾经讨论过的重要问题。新文化运动产生在国内，影响自然比《新世纪》来得大，但新世纪派反宗教反国粹的科学态度，竟成为新文化运动时期反传统的先声之一，这一事实有可能表现出在有关文化问题上从《新世纪》到《民声》再到《新青年》这一系列间具有某种内在的逻辑关系。为了理解这种事实，下面笔者大略描述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文化革新思想和无政府主义文化革命论之间的密切关系问题。但是，由于在这里谈到的只是限制在文化激进主义方面的种种文章，这些看法当然与新青年派中的自由主义者存在着一定的差别。

(1) 孔教问题，礼教问题，道德问题。在1916年2月袁世凯称帝期间，易白沙的《孔子评议》(上、下)是《新青年》上发表的直接针对孔子的第一篇反孔文章。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其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写的《宪法与尊孔》、《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教问题》、《复辟与尊孔》及不少通信之中继续宣传反孔言论。同时，蔡元培又否认中国有“孔教”一说。他认为孔子既无形而上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又无神秘主义思想，“故孔子非宗教家，而孔教为不辞”<sup>②</sup>。这是他对康有为的“定孔教为国教”的否定。李大钊也在《甲寅日刊》上发表了《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

① 胡适曾提出，新文化运动时期讨论的问题是①孔教问题，②文学改革问题，③国语统一问题，④女子解放问题，⑤贞操问题，⑥礼教问题，⑦教育改良问题，⑧婚姻问题，⑨父子问题，⑩戏剧改良问题等(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② 蔡元培：《再致“新青年”记者函》，《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子》等。鲁迅也尖锐地提出“仁义”中所包含的只是“吃人”二字。这些文章着重批评的是当时兴起的孔教运动。可是，其批判程度已经超过孔教和孔学，而陈独秀等人已经达到部分否定历史上孔子的地位。我们知道的是，清末在《新世纪》上已经具体地提出“孔丘之革命”的口号。

值得注意的是，“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对于孔子及封建礼教的批判使其达到空前的舆论高潮，但他与新青年派之间对传统文化的意识趋向上却存在较大的差别。从吴虞写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吃人与礼教》等文来看，他认为“儒家以孝悌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连结之根干”，因此，他集中全力攻击“父子之纲”。但吴虞对封建礼教进行批判时，把老庄思想及墨子思想借鉴过来，着重攻击的是孔子及儒教而绝不是批判一切传统。可以说，他不是新型知识分子而是传统知识分子中的极左派。他在一定程度上学习了一些西方的东西，但与刘师培一样<sup>①</sup>，在思维结构上仍然存在着传统主义的因素。

如果说马克思的最后代表作是《资本论》的话，克鲁泡特金的最后代表作即是《伦理学》一书，这一事实间接地反映了无政府共产主义的重要特点，即重视道德伦理的思想。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也可以说是一种伦理教科书。清末以来绝大多数无政府派经常主张的就是反传统主义的道德革命。可以说，近代中国无政府派主张文化革命的核心内容就是这种道德革命。在文化运动上，他们的反权威主义精神与新青年派中的自由主义者没有直接的对立关系反而具有密切关系。所以，在对《新潮》进行评价

<sup>①</sup> 据《吴虞日记》，辛亥革命之后在四川吴虞与刘师培之间有较密切的学术交流（参见邓星盈等著《吴虞思想研究》（《吴虞日记》学术资料摘要），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及批判时黄凌霜公开声称：“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万能，因而为极端自由主义，所以，无政府主义乃个人主义的好朋友。”<sup>①</sup> 无政府派不同于别的派别的地方，是在阐述他们的主张时总是要把它与“科学”相联系。黄凌霜又说：“吾人所鼓吹无政府主义，绝非感情的调调，无政府正当之真理，实来自真理之科学。近来社会革命风潮之膨胀，亦实与科学同进。科学所求者发明公理，革命之所图者实行公理”<sup>②</sup>。他们的以科学为基础的反传统主义道德观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应。例如，据胡适的评价，新文化精神是除科学和民主外，还应包含吴稚晖的“道德”一项。甚至，他把吴稚晖列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反理学的四位思想家之一而给予高度评价。近代中国颇具代表性的自由主义者胡适虽然在思想上绝不能接受无政府主义政治原理，但他也不能不肯定无政府派的科学的人生观。

另外，新文化运动时期无政府派道德论的两个关键词就是“互助”和“劳动”。当时，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和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时代思潮。因此，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有关互助和劳动的许多文章，无论作者的政治倾向如何，大多数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无政府主义的伦理观的影响。当时的平民主义思潮也是与无政府主义有关系的，因为“平民”一词也是无政府派常用的一个主要概念。

(2) 家庭问题，父子问题。在《新青年》上登载的有些文章根据历史事实来暴露家族和专制的内在关系后，继续讨论了新模式的家庭制度。在该杂志上讨论的家庭问题主要是，批判大家族制度而主张小家族制度的改良问题。这可以说是具有自由主义倾

① 凌霜：《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进化》第2号，1919年2月20日。

② 《少见多怪之时事新报》，《自由录》第2集，1918年5月。

向的知识分子所主张的。对此，无政府派不但批判大家族制度，而且批判小家族制度。他们认为，构成社会的最小单位就是家庭，如果家庭没有根本性变化的话，社会就不能实现根本性的变化。因此，他们继续宣传解体家庭的激进主张。自《新青年》上讨论了家庭问题后，在其他各种宣传新文化的杂志上也开始登载关于家庭问题的文章。

其中，在实社《自由录》第2辑和《新潮》第1卷第1号上登载的以《万恶之原》为同名题目的两篇文章，他们都激烈地批判传统家庭制度，但两者之间也有根本性的差别。孟真在《新潮》上述文章的后记中对两者分别说：

一、彼泛指家庭：吾则专就腐败之中国家庭立论，希望其改造成新式，而不认世界上之家庭制度，在现日可以根本废除；二、吾所谓独身主义，希望特殊人格者用之，以为特殊事业之张本，不敢望尽人如是：彼则谓世上不应有婚姻；三、吾所谓独身主义，乃极纯洁之生活，非如英后伊利沙白之独身：彼既以不婚责之尽人，自不能与我同旨。<sup>①</sup>

这样，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作者为了解决家庭问题，提出了独身主义的方法，认为“独身主义是最高尚、最自由的生活。是最大事业的根本”<sup>②</sup>。这就是以个人为主来解释家庭问题。对此，无政府主义者在《自由录》的文中认为家庭问题不但是个人的问题而且是社会阶级的问题。甚至认为在反对宗教、反对政府以前更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家族解体问题。其实，在文化问题上，无政府派最鲜明、最突出的主张就是有关家族问题。可以说，他们两

① 孟真：《万恶之原（一）》，《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1日。

② 孟真：《万恶之原（一）》。

人的差别较明确地反映了新文化运动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基本差异。另外，吴虞写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一文使人想起了清末天义派经常谈到的家族制度和国家制度之间不可分的关系。

辛亥革命以后三纲原理中的“君为臣纲”一项已经被破坏了，所以，与家庭问题联系起来，新青年派又批判“父为子纲”和“夫为妇纲”两项。其中，对于父为子纲来说，他们认为，在家族制度中的父子关系就是国家制度中君臣关系的缩小版。因此，为了打破这种支配服从关系，他们宣传父子之间的平等原理。关于这一问题在《新青年》上有异见，主要是怎么评价“慈”和“孝”的意义。有趣的是，恽代英是部分肯定了父子之间的慈孝之类的三纲范畴，反而，吴虞在《论孝》等文上全面攻击父子之间的孝的弊病。还有，吴稚晖把“孝”和“忠”两概念区分后，部分肯定了孝概念中的爱情因素，对此，陈独秀认为忠孝两概念是绝对分不开的，所以他全而否定了“父为子纲”这一原则。如此，有人肯定慈孝的现实意义，有人批评慈孝的封建因素。

(3) 婚姻问题，恋爱自由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女子解放问题是近代时期大多数进步知识分子经常注意的问题。《新青年》前期在有关女性解放问题上有两种见解，一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女性解放论，而另一种是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女性解放论。前者提倡，“恋爱中心之结婚论”，“伦理的结婚”，“男女教育平等及贤母良妻主义教育”，“打破早婚之习及改良育儿问题”，“女权伸张及女性自立”，“男女社交公开”，“争取女性参政权”，“改造旧贞操观念”等。并提出，在教育上男女同学的要求，在政治上女子参政权的要求，在社交上自由交际之要求，在婚姻上自由择配和新贞操说的主张。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高素素提出，“解决女子问题，有两前峰：曰破名教，曰破习俗。有两中坚：曰确立女子



之人格，曰解脱家族主义的桎梏；有两后殿，曰扩充女子职业范围，曰高举社会上公认的女子之地位”<sup>①</sup>。但是，他们之间在独身主义、极端的恋爱自由、婚姻的方法、贤母良妻主义等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地方。上述主张的最大目标就是实现男女差别的废除。

对此，后者即无政府派认为，“婚姻与爱情，二者无丝毫关系”，“婚姻之原义，与一保险合同，乃经济上之支配耳”，“婚姻乃人生之不幸事，已不能为讳”，“婚姻制度，使女子为寄生虫，极端依赖”，“自由恋爱乎，恋爱无他，自由而已”<sup>②</sup>。当时，无政府派之间较流行的女性解放论是美国著名女无政府主义者高曼(Emma Goldman)的理论。他们把女性解放与道德问题、经济问题联系起来，提倡“妇女若不解放，社会无由发达。女子即不得享受自由之幸福，男子亦不能增进高尚之人格”<sup>③</sup>。与前者比较起来，他们的特点是把女性解放与社会革命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

女子解放问题与家庭革命存在着不可分关系。无政府派认为家庭是“万恶之源”，新文化运动时期无政府派更进一步认为“万恶根源之根源”就是婚姻制度。他们说：

夫人类有所谓男女，无所谓夫妇更无所谓婚姻。乃自婚姻之制度定，而夫妇之道苦夫妇之名分定，而男女之爱情绝矣。所谓女属于男也，幼属于老也，而家庭以立强权乃生。而从古所谓圣贤之辈，更复推波助澜，以惑后生小子，邪说

① 高素素：《女子问题之大解决》，《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② 高曼女士著、震瀛译《结婚与恋爱》，《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1日。

③ 华林：《社会与妇女解放问题》，《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

横流，深入乎青年之脑根。其有思想自由之辈，欲脱离家族，打破婚姻，则皆斥为大逆不道，宗族乡党所不齿，善恶不辨，是非不明，此青年子女，所以甘于自杀也。<sup>①</sup>

在这种逻辑下，有人认为屈从不自由的婚姻是当了历史的奴隶，有的认为在恋爱问题上要使男女双方都得到爱情的满足必须提倡男女共同恋爱。他们号召人们废绝婚嫁制度，实行自由恋爱。

后来，在关于女子解放问题上无政府派与马克思派之间有一小规模的论争。例如，郑贤宗给陈独秀的信中提出，为了解决男女问题，他不赞成用法律方法而主张由教育角度上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人类本能基础上通过自由恋爱而解决男女问题。对此，陈独秀的答信中认为，使教育方法实现理性的发达，而本能的解决男女问题是将来的希望，该方法不足以对近来问题的紧急解决<sup>②</sup>。“五四”时期，在《新青年》上陈独秀、陈望道、李达等人部分介绍过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论。其中，陈独秀提出，“妇女问题虽多，总而言之，不过是经济不独立。因经济不独立，遂生出人格的不独立，因而生出无数痛苦的事情”。并且陈望道分别把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看做是中流阶级的妇女运动，而把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看做是劳动阶级的妇女运动。然后，他批评了自由主义的妇女解放论。这样，马克思派立足于经济关系基础上讨论妇女问题<sup>③</sup>。对此，“五四”时期的恽代英、高钰、施存统等人从无政府主义角度上继续批判家庭制度和婚姻制度及主张恋爱自

① 震瀛：《万恶之原》，《自由录》第1期，1917年7月。

② 郑贤宗、陈独秀：《通信》，《新青年》第8卷第3号，1920年11月1日。

③ 陈独秀：《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广东群报》，1921年1月31日（见《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三联书店，1981，第80～81页）；陈望道：《我想（二）》，《新妇女》第4卷第4号，1920年11月15日；《女人压迫男人的运动》，《新青年》第8卷第6号，1921年4月1日。

由。他们不但主张一切大、小家族制度的解体，并且提出了以公共机关为主的子女生育方法。这时，无政府派强调的是，以家庭这一社会最小单位为主来讨论社会变革。由此，对于子马克思派来说，阶级斗争为主的社会变革运动里包括妇女解放问题，与此相反，无政府派在对于反对政府、反对宗教、反对家庭等核心问题上没有先后轻重的顺序。

(4) 宗教问题。在《新青年》上讨论宗教问题与孔教运动有密切的关系。陈独秀在《再论孔教问题》上明确提出，反对“以孔教为国教”主张而宣传“以科学代宗教”主张。甚至说，“非独不能以孔教为国教，定入未来之宪法，且应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sup>①</sup>这是新青年派对于孔教及宗教的基本观点。对此，蔡元培在某演说会上曾表示，他不反对孔子也不反对宗教。但他又提出“孔子只孔子，宗教只宗教，孔子、宗教两不相关”，“人智日开，文化渐进，科学发达，而一切宗教迷信之说，稍稍不足维系人心”，“国、教二字，字不能相和，合之则不成名词”等<sup>②</sup>。这样，实际上他的所谓个人“信仰当绝对自由”的主张里并不含有反对宗教的倾向，只不过他反对将孔子作为一种宗教信仰。由此，不久他提出了有名的“以美育代宗教说”。陈独秀和蔡元培等人的“以科学代宗教”、“以道德代宗教”主张与无政府派的宗教观大体相同。

在该杂志上无政府派也积极参与发表了较多反对宗教、迷信的文章。例如，恽代英在《论信仰》一文中，从道德进化的角度上说，“信仰虽有若干之利益，然利不胜弊，绝对无保存之价值

<sup>①</sup> 陈独秀：《再论孔教问题》，《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1日。

<sup>②</sup> 蔡子民：《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1日。

也”，又断言“宗教已应成过去之一物”<sup>①</sup>。黄凌霜也在《新青年》中通过一篇译文批评尼采的宗教观，并且反对尼采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宣传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sup>②</sup>。黄凌霜在另一个刊物登载的译文中，又一次全而否定了一切宗教，认为“宗教者，思想自由之障也”，“自宗教立，其专制之流毒，甚于君主”，“无政府主义是以反对万恶之上帝，破真理蠹贼。无政府党人谓人类曰：上帝者，进化之障碍物也”<sup>③</sup>。他认为，与科学相对立的宗教，则是应该坚决放弃的。另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也对宗教进行抨击：“盖宗教者，利用民智之未开，凡事之未明者，均以宗教代之，使不应用其思想之机能……阻碍社会之进化，莫此为甚。”<sup>④</sup>当时，具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钱玄同、易白沙等人参加了在《新青年》上开展的关于鬼神的论争，他们引用广泛的古籍和吴稚晖的无神论观点等，全面否定了鬼神的存在及其意义。

(5) 教育改革问题。近代中国无政府派的重大影响方面是在教育。前节中已经谈到新文化运动时期蔡元培和原新世纪派为中心的教育运动，即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北京大学改革等。有关这些运动思想和活动在《新青年》上登载的不少文章里都充分地介绍及反映了。在这里不再讨论。不过，在向中国移植无政府教育思想的过程中，无政府派失去了不少无政府主义的色彩<sup>⑤</sup>。但我们不能不承认的是，这一时期的教育改革问题与无政府主义的种种教育思想有不可分的关系。

① 恽代英：《论信仰》，《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1日。

② 萨特勒著、凌霜译《德意志哲学家尼采的宗教》，《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

③ 高露曼女士著、霜译《无政府主义》，《自由录》第1集，1917年7月。

④ 声白：《平民革命》，《学汇》第200期。

⑤ 〔美〕沙培德：《辛亥革命中的激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下），中华书局，1994，第1068页。

(6) 世界语问题，国语统一问题。新文化运动开始时，提倡世界语的主要社会名士是蔡元培和钱玄同<sup>①</sup>。其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旧学功底深厚的中国文字音韵学家钱玄同提出了最激进的“废灭汉文”的主张。原来钱玄同致力于旧学，但他在急进知识分子的影响下，一转成为极端的反传统论者，在《新青年》上向传统发起了彻底的挑战。在他看来，为了彻底告别传统，废除孔学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废除汉文。他大胆地说：“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文明，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sup>②</sup> 废止汉文的主张在当时社会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对，所以陈独秀在一个答辩中承认，“社会上最反对的，是钱玄同先生废汉文的主张”<sup>③</sup>。钱玄同同时主张，废除汉文之后“采用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 ESPERANTO（世界语）”。在世界语“尚在提倡之时，汉语一时亦未能遽尔消灭”的“过渡之短时期”中，他赞成用英文或法文“为国文之补助”<sup>④</sup>。钱玄同“废汉文后代之以世界语”，并“以新体白话国文与西文并用为过渡”的主张直接承接了清末《新世纪》上吴稚晖提出的所谓“中国文字，迟早必废”之说的余绪。钱氏主张最终导致了在《新青年》上对世界语展开较大的论战，参加这次讨论的有陈

① “最近蔡子民先生返国，提倡斯语，既不遗余力；而钱玄同先生，辩护世界语之功用，预测世界语之将来，尤属言之成理”（陶履恭：《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1日）。

② 钱玄同：《通信》，《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③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

④ 钱玄同：《通信》，《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独秀、钱玄同、陶履恭、胡适、吴稚晖、孙国璋、区声白、黄凌霜、姚寄人、胡天月、周祐等人。

有趣的是，钱玄同主张世界语时，吴稚晖对于国语的统一问题正进行改革，即“注音字母”问题。当时，钱玄同给吴稚晖的信中提出有关注音字母问题的种种意见，并提出“用北京语为国语”的意见。对此，吴稚晖在答信中详细说明了自己的意见，并且原则上支持钱氏的世界语主张<sup>①</sup>。以后两人在相互尊重的态度上继续讨论了关于文字改革的问题。吴氏与钱玄同之间讨论有关文字改革及世界语问题的文章也构成了《新青年》内容的一部分。这可以说对近代中国文字改革运动在学术理论上做出了很大贡献。

第二代无政府派之中，主张世界语的较有代表性的是区声白。师复死后不久，1916年区声白继续推广世界语，从世界语的内容中传播无政府主义，并编印了一本《世界语读本》，在广州出版。各地讲习世界语的，也多采用它为教材。该课本还分送上海、北京、天津、常熟、佛山、江门等地。其他，如世界语阅览室、俱乐部、传播站等，也有这一课本陈列。实际上这是一本宣传无政府主义的读物<sup>②</sup>。在北京上学期间，他也参加了《新青年》上的世界语论战<sup>③</sup>，还在无政府派期刊中继续发表有关世界语的文章。例如，《世界语与无政府派》、《吾人何为而提倡世界语乎？》等。到20年代，他成为传播世界语的主要领导之一。

(7) 文学改革问题，戏剧改良问题。相对来说，有关文学改

① 参见钱玄同《论注音字母》，《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15日；吴敬恒：《致钱玄同先生论注音字母书》，《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等文。

② 王炎：《无政府主义与世界语》，《广州文史资料》第5辑，1962。

③ 区声白：《通信》，《新青年》第5卷第2号、第6卷1号，1918年8月15日，1919年1月15日。

革问题，在《新青年》上登载的无政府派的文章较薄弱。但是，从周作人、钱玄同、陈独秀等人的文章里往往可以看到与无政府派相似的一种极端反传统主义精神。例如，在废止旧剧问题上，周作人认为，旧剧是野蛮的，并且它是有害于“世道人心”的，因此，主张废止中国旧剧。对此，钱玄同积极赞成周氏的主张，他们的逻辑根据之一就是吴稚晖的“今日欧美的物质文明，并非西学，乃是人类进化阶级上应有的新学”的观点<sup>①</sup>。

综上所述，在《新青年》杂志上宣传的大多数新文化主张都与无政府派的文化革命论具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其原因之一就是，不少无政府派参与了《新青年》的工作。虽然，当时以《新青年》同人为主的进步知识分子不容易接受反对国家、反对政府、反对军国、反对祖国等的无政府政治理论，但是，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基本赞成有关无政府派的社会革命论中对于文化的观点。特别是《新青年》所主张的反传统主义与无政府派的反国粹主义之间在其内在逻辑上具有同一新思路。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和无政府派的吴稚晖比较起来，我们可以更明确地了解其基本精神的类似性。例如，对于国粹的评价两人提出：

吾人尚论学术，必守三戒：一曰勿尊圣。尊圣者以为群言必折中于圣人。而圣人岂耶教所以全知全能之上帝乎？二曰勿尊古。尊古者以为不师古，则卑无足取。岂知古人亦无所师乎？犯此二戒，则学术将无进步之可言。三曰勿尊国。尊国者以为‘鄙弃国闻，外励进民德之道’。（用《重组中国学报缘起》之语）夫尊习国闻，曾足以励进民德乎？国闻以外，皆不足以励进民德乎？吾以为此种国粹论，以之励进民

<sup>①</sup> 周作人、钱玄同：《通信》，《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

德而不足，杜塞民智而有余。<sup>①</sup>

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小老婆、吸鸦片，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再把他丢在茅厕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sup>②</sup>

前一引文，陈氏的认识较富有偶像破坏的精神，他的反对国粹也是破坏偶像的一种，实际上他自己就根本怀疑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后一引文，吴氏注重批评的是“什么都是我们古代有的”国故学者。吴氏认为，国粹主义不过是盲目的爱国主义。他们共同具有“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式的观点。他们两人都特别相信科学，可以说他们是一种科学主义的信仰者。所以在这种科学主义的信念基础上，他们展开了反对旧传统的新文化运动。

## 小 结

新文化运动时期较具代表性的社会风潮可以说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和北京大学改革。其实，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推动者就是原新世纪派的李石曾、吴稚晖和其好友蔡元培。他们进行的这一

① 陈独秀：《学术与国粹》，《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② 吴稚晖：《箴洋八股化的理学》，《吴稚晖先生学术论著》，上海出版合作社，1925，第124页。



大规模留学运动是从民初时期就展开的留学运动的继续。在运动进行过程中，欧洲流行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潮对中国无政府派的影响也不少，它与托尔斯泰式泛劳动主义结合后在中国社会引发了重视“劳动”的思想。欧洲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使得从清末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相信的社会进化论产生了根本怀疑。由此，不少知识分子为了代替“适者生存”式进化论，转而接受“互助”的新进化论。以“互助”和“劳动”两概念为主形成的无政府主义色彩浓厚的社会理论在中国成为主要社会思潮。他们的运动到“五四”时期流行在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工学主义、工读互助主义诸思潮中并作为其思想的重要源泉。并且从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中，我们又一次较容易地发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力。蔡氏本人是具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一个人物，根据在北大校内设立的种种无政府社团和杂志以及有些人的回忆来看，我们在教育文化方面较容易认识新文化运动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

那么，新文化运动时期代表性的杂志《新青年》和无政府派的关系是什么？《新青年》的理性精神可以说是对专制文化的一大挑战。因此，不少研究者认为这个运动是自由主义运动，例如，《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的著者周策纵是其代表人物。这不是从18世纪到19世纪前半叶形成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大约是19世纪后半叶形成的共和主义和新自由主义<sup>①</sup>。但是，除了胡适等少数较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以外，《新青年》的大多数作者并不太明确理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只表现出自由主义的倾向或偶像破坏的精神。其实，除了这种自由主义倾向以外，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新青年》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该杂志文章里，吴稚晖及第二代无政府派的文章占有一定的地位。他

<sup>①</sup> 参见刘桂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属性及其主张口号的释义分析》，《教学与研究》，1988年第1期。

们的文化革命论可以说是与新青年同人所主张的新文化精神基本一致的，因此，得到了相当数量作者的支持和同情。特别是《新青年》的领袖陈独秀等人在对待文化问题上也与无政府派的文化论——主要是《新世纪》——具有相当类似的特点。由此观之，我们不能不承认从清末民初以来展开的无政府主义文化思想宣传对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影响<sup>①</sup>。

---

<sup>①</sup> 本篇研究不足之处：从清末章太炎、民初太虚、新文化时期朱谦之连续下来的中国无政府主义非主流派的内在逻辑关系，世界语和无政府主义运动之间的实际关系，对中国社会党及社会党的更为具体的研究，“五四”时期从“文化”到“政治”的无政府派运动的变化问题，1920年以后国民党统治下的无政府派的思想文化问题等，都有待深入研究。等以后时间充裕，笔者将进一步修改本研究，以弥补这些不足，希望使这个问题的论述能够更上一层楼。

## 结 语

笔者在绪论中强调了对中国无政府主义的研究应该从政治思想与政治运动的角度进一步升华到全方位研究的必要性，因此，本研究的议题即是以中国无政府派的文化思想为中心而展开论述。这是因为，无政府社会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革命中，最具有中国特色而反复强调的部分就是文化革命，它本身就适合于重视文化问题的中国人的性格。所以引起了最多的关心，而且这也可能是无政府主义进入东亚社会而直接产生变化的部分。当然，这时候文化问题仍然与政治、经济问题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文化思想的角度，不少学者指出，中国无政府派是西化派的始祖，或者说西方的“近代性”色彩较浓厚。尽管他们带有一些那种倾向，如果把时期限制在清末民初来看，从天义派和新世纪派、江亢虎和师复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不能把他们简单地认定为西化论者、近代化论者。在对西方无政府主义的吸收过程中，就像其他诸多社会思潮一样，都出现了传统主义解释和反传统主义解释的倾向。他们的激进性在于对现存体制的最激烈的、最根本性的批判方面，与国外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相一致。但是，在对传统文化问题的解释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文化主义意识，值得引起重视。对所谓的传统文化的强烈执著，表现为对传统与无政府主义的结合努力和要求拒绝传统的主张两种意识。可以说，

中国无政府派用西方的近代价值批判了中国的前近代性，同时他们将反近代性的社会思想攻击了西方的近代价值。

近代中国无政府派的文化思想，基础于进化论的世界观。进化论的世界观作为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期占有绝对优势的世界观，可以说是一种科学主义世界观。科学与科学主义是不同的，科学根据时代的变化可以经历许多变化，而科学主义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信念体系。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根据情况的变化反对科学主义，既可以接近于宗教上的无政府主义，也可以执著于科学的纯粹性。但是，近代中国的大多数无政府派就具有信仰科学主义的特点。这符合于当时的世界潮流和中国内部的需要。这从克鲁泡特金为代表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理论在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事实中，就可以得到说明。克鲁泡特金也与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一样，试图消灭现存的一切强权的社会组织。但是，由于他是个强调无政府主义科学性的合理主义者，所以没有对当时的科学本身提出过问题。在中国，虽然章太炎、太虚、朱谦之等人对无政府共产主义曾提出过问题，但中国无政府派的主流仍然是基于具有科学主义基础上的文化观。从今日的观点来看，这种科学主义带有一种信仰宗教的性格，并面临着众多即将对它进行的批判。

尽管如此，中国无政府派文化思想的另一特点，表现为乌托邦色彩较浓厚。虽然他们相信合理主义基础上的科学观，但是对进化论（互助论）的绝对信赖、对人民的非理性的尊崇、对无政府主义革命的过分乐观等却不能不说具有感情的色彩。反映在文化思想中，也表现为对家族（家庭）的解体、对婚姻制度的否定、汉字的废除等过激的主张。这些主张，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独裁统治下的中国，尤其在封建文化顽固存在的中国社会的现实面前，反而弱化了其主张的说服力。对传统文化的前所未有的全面攻击，引起了不少人强烈的抵抗感。此外在政治领域中，从

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无政府主义对国家主义的反对和对现实政治的冷淡，也造成了多数知识分子远离无政府主义的结果。实际上，他们所提出的理想社会的蓝图，希望唤起被压迫、受痛苦的人民大众，也实在是太遥远的空想。这种现象也出现在西方社会。因此，不少人提出无政府派战术方面的灵活性不足以及对社会结构分析的缺如等缺点比较明显。虽然不少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也考虑到适合于中国社会现实的各种问题，但在自身却带来了内部分化和弱化其主张的后果。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无政府派的重大缺点——对于理论的原则性或僵化性，反而对近代中国做出了明显的贡献。尤其是在文化思想方面更为突出。无政府派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把握好权力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他们立足于科学和乌托邦的理想论，向一切非科学因素和保守因素发动了攻击。他们从自己所提倡的对国家和政府的革命，对于宗教、迷信的革命，到科学革命、教育革命、三纲革命、孔子革命、妇女革命、文字革命等诸多文化革命论，没有前后顺序和轻重的区别。他们共同认为，文化问题像蜘蛛网一样是交织在一起的权力网，为了断绝这种关系，主张进行全方位的革命。同样，他们认为，无论是政治革命论，还是经济革命论，甚至在社会革命上，都不能与文化革命的重要地位相提并论。

因此，在权力问题上，中国无政府派从不认为只有国家权力才是最高的惟一强权。例如，从他们对家族的解释中也可以看出。对他们来说，家族制度作为构成国家政治权力的最小基层单位，首先应当成为批判的对象。家族使个人养成依赖他人的习惯，反过来也产生对他人的支配欲望。在家族内部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只不过是压抑与服从的权力关系，这对国家与人民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给予了合理化的解释和支持。由于这种家族的外延扩大就是国家，所以为了消灭国家的存在，首先要消灭家族

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家族制度的核心“父权”和国家制度的核心“君权”，就具有了相同的性格。从另外意义上说，为了维持家族这一组织，每个人在放弃本人自由的同时，也侵犯了他人的自由，其目的是为了谋得生存。因此，他们把这种“弱肉强食”的恶性循环也归咎到家族制度上。

在家族制度内存在着作为父权和君权前提的“夫权”，夫权是基础于夫妇关系的，是构成家庭的第一前提。在夫妇权力关系中，由于男子占据独裁地位而妇女是最大受害者，这一问题就直接联系到妇女解放论。而男女之间的权力问题，与政治上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经济上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就具有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妇女在经济上的独立和教育方面的平等权，则成为调整这种权力关系时十分必要的关键所在。中国无政府派所主张的家庭革命以及男女革命的基本前提，就是婚姻自由和恋爱自由。而且为了根本的解决，他们提出了废除婚姻制度本身的存在意义，从而在消灭家族与其他许多权力关系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除此之外，家族制度与受其支配的意识形态三纲、其意识形态的创始人孔子、维持家族制度的另一种权力形式的宗教、迷信，就都有密切的关系。甚至，通过对教育、文字的垄断导致对知识的垄断，并且进一步延伸对权力的垄断，表面上看是截然不同的关系，而在实际上仍然与家族制度具有一定的关系。在近代中国，封建家族的处理问题的确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在同样的逻辑关系上，其他的文化问题也具有相同的意义。这是因为，这些诸多个别问题就综合形成了他们所要解决的一大问题——“强权”。即使在素食主义、废除姓氏等较小的问题上，也反映了文化和权力之间的某种关系。于此我们可以再次确认，他们的反权威主义精神一直贯通到新文化运动的打破偶像的精神。

中国无政府派所宣传的进化论和科学主义，并不是他们所创

造的产物，而是时代的普遍思潮。这种以进化论和科学主义为武器消灭现存体制的努力，最终陷入自我矛盾之中。这颇类似于克鲁泡特金的个人情况。原来克鲁泡特金是利用进化论的归纳方法来批判社会进化论的同时又主张自己的互助论的，即他根据动物界的相互扶助的因素来批评斯宾塞的“适者生存”模式。有趣的是，他的反对者也采用相同的方法来批判互助论，最终表现出自我的局限性。拿近代中国来说，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利用阶级斗争论来批判中国无政府派所提倡的互助论，而且在文化保守主义者借用西方的人文主义来批判他们的科学主义的时候，他们只能徘徊不前，惊慌不已。结果，他们之中，或者只能被新兴的共产主义运动所吸收，或者通过向新传统主义接近来探索新的出路。当时仍然坚持无政府主义的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也没有能力创造出能够消灭他们所处的社会的办法并用新的思想体系来代替，那么无政府主义者作为一种社会势力就再也不能坚持下去以实现他们所憧憬的理想社会的目标。

尽管如此，像许多伟大思想那样，只要无政府主义思想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它就会继续维持其生命力，到今天仍然给我们提供许多思索和借鉴。

## 附 录

表 1 1905 年以前有关虚无党、无政府派论著（译著）及论文一览表

论著(译著)/论文	作者/译者	出版社/期刊	发表时间
《俄罗斯大风潮》	[英]克喀伯著/独立之个人(马君武)译	(上海)广智书局	1902
《(社会主义)广长舌》	[日]幸德秋水/中国国民丛书社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02
《近世社会主义》	[日]福井准造/赵必振译	(上海)广智书局	1903.2
《社会党》	[日]西川光次郎/周子高译	(上海)广智书局	1903.2
《政体进化论》	竞庵	《江苏》第 1、3 期	1903.4.27 /6.25
《俄国虚无党三杰传》(《近世无政府主义》节译)		《大陆杂志》第 7 号	1903.6.5
《俄罗斯的革命党》(《近世无政府主义》节译)/《俄国压制之反动力》	[日]烟山专太郎/杀清译	《童子世界》第 33 号	1903.6.16
《虚无党》		《苏报》	1903.6.19
《露西亚虚无党》	轶孙	《江苏》第 4、5 期	1903.7.24 /8.23
《二十世纪之新主义》	马叙伦	《政艺通报》癸卯第 14~16 期	1903.8.23 --9.21
《湖南之湖南人》	杨笃生	《新湖南》	1903
《俄国虚无党女杰沙勃罗克传》(《近世无政府主义》节译)	[日]烟山专太郎	《浙江潮》第 7 期	1903.9.11



续表 1

论著(译著)/论文	作者/译者	出版社/期刊	发表时间
《新社会之理论》	大我	《浙江潮》第 8、9 期	1903.10.10 /11.8
《论俄罗斯虚无党》	中国之新民 (梁启超)	《新民丛报》 第 40、41 合刊	1903.11.2
《理想的虚无党绪言》	杨笃生	(上海)《国民日报 汇编》四	1903
《俄皇亚历山大第二之死状》 (《近世无政府主义》节译)	[日] 烟山专太郎 /张继等译	(上海)《国民日报》	1903
《无政府主义》	自然生译编(张继)	(上海)	1903 末
《俄国之社会党》		《新民丛报》 第 44、45 合刊	1904.1.1
《无政府主义及无政府党之 精神》	自然生(张继)	《中国白话报》 第 2 期	1904.1.2
《新年梦》	蔡元培	《俄事警闻》	1904.2.17 ~25
《俄国虚无党源流考》(《近世 无政府主义》(意译)/《神圣 虚无党》/《俄虚无党之斩妖 状》等	[日] 烟山专太郎等	《警钟日报》第 28、 35、38、39、40、46、47、 49、50、52、53、54、64、 65 各期等	1904.3~4
《自由血》(《近世无政府主义》 意译)	[日] 烟山专太郎/金 一意译	(上海)东大陆图书译 印局印/镜今书局出 版	1904.3
《虚无党》	陈冷(陈景韩)译	(上海)开明书店	1904.3
《论俄国立宪之风潮及无政 府党主义》		(广东)《时敏报》	1904.3
《社会革命与总同盟罢工》		《大陆》第 2 年第 9 号	1904.10.28
《论大同平等之说不适用于 今日之中国》		《警钟日报》第 225 期	1904.11.6
《虚无党女英雄》	江西一青民编	(上海)	1905

\* 参见蒋俊《辛亥革命前有关无政府主义的书刊资料述评》(《中国哲学》第 13 辑, 人民出版社, 1985, 第 354~375 页)和《外国无政府主义论著汉译目录》(《中国哲学论丛》,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6, 第 216~244 页)。

表2 《民报》刊载有关虚无党、无政府派的图片、文章一览表

论著(译著)/论文	作者/译者	出版社/期刊	发表时间
虚无党女杰苏菲亚肖像		第2号 1906.1.22	图 编辑人:张继 第1-5号
无政府党首创者巴枯宁 烈士吴樾(炸清五大臣者) 烈士吴樾君意见书	吴樾	第3号 1906.4.5	图 图文
露国拔苦总督拉加希芝太 公被炸之真景 欧美社会革命运动之种类 及评论	日本巡耕(宫崎 民藏)稿,社员译	第4号 1906.5.1	图 译丛
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	覃斋(宋教仁)	第5号 1906.6.26	文
社会主义史大纲 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	渊实(廖仲恺) 梦蝶生(叶夏声)	第7号 1906.9.5	来稿(翻译) 文 编辑人:章炳麟 第6-18号
西班牙王之遭难 无政府主义之二派	渊实(廖仲恺)	第8号 1906.10.8	图 来稿(翻译)
俄国虚无党轰炸首相(司 多吕平)之真象 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	渊实(廖仲恺)	第9号 1906.11.15	图 来稿(翻译)
俄国之新圣杜尔斯克 虚无党小史	渊实(廖仲恺)	第11号 1907.1.25	图 来稿(翻译)
吴烈士遗像及其未婚之夫 人烈士遗书之真迹 吴樾遗书	吴樾	无讨号(民报临 时增刊)	图 图文
利害平等论	韦裔(刘师培)	第13号 1907.5.5	文
俄国暗杀团首领该鲁学尼 狱中之肖像 悲佃篇 苏菲亚传	韦裔(刘师培) 无首(廖仲恺)	第15号 1907.7.5	图 文 来稿
徐锡麟烈士 秋瑾女士 五无论 安抚恩铭被刺事件 无政府主义实行者巴枯宁传 陈伯平肖像 马宗汉肖像 国家论 祭徐锡麟,陈伯平,马宗 汉,秋瑾文 虚无党小史(续第11号)	太炎(章炳麟) 寄生(汪东) 无首(廖仲恺?)  太炎(章炳麟) 太炎(章炳麟) 渊实(廖仲恺)	第16号 1907.9.25  第17号 1907.10.25	图 图 文 时评 来稿 图 图 文 附录  来稿(翻译)

续表 2

论著(译著)/论文	作者/译者	出版社/期刊	发表时间
辨满洲非中国之臣民(续第15号) 徐锡麟传	弇裔(刘师培) 西史民(陈去病)	第18号 1907.12.25	文 附录
千九百年俄罗斯虚无党女子击莫斯科总督之图 记葡萄牙王被刺 覆吴敬恒书	寄生(汪东) 太炎(章炳麟)	第19号 1908.2.25	图 编辑人:张继 第19号 时评 附录
被刺五分钟之前之葡萄牙王及太子 首先枪击葡王者毕夏 杀葡王子者克斯德 无政府主义序	太炎(章炳麟)	第20号 1908.4.25	图 编辑人:陶成章 图 第20-22号 图译丛
爆烈后之吴樾烈士 排满平义 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 帝王暗杀之时代	太炎(章炳麟) 太炎(章炳麟) 无首译(廖仲恺?)	第21号 1908.6.10	图 文 文译丛
再覆吴敬恒书	太炎(章炳麟)	第22号 1908.7.10	附录
马利亚 崇侠篇 电光	揆郑(汤增璧) 英人与豆克著, 台山译	第23号 1908.8.10	图 编辑人:章炳麟 文 第23-24号 小说
规新世纪 西伯利亚纪行  电光(续23号)	太炎(章炳麟) 俄国克罗颇特庚著, 仲密(周作人)译 英人马豆克著, 台山译	第24号 1908.10.10	文 译丛  小说
秋瑾女侠之墓		第25号 1910.1.1	图 编辑人:汪精卫 第25-26号
韩人刺杀伊藤博文于哈尔滨之景 俄国革命党与历山三世皇帝书	愚公	第26号 1910.2.1	图 译件

\* 根据吴雁南等主编《清末社会思潮》(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0, 第436~437页)所录图表编制而成(参见〔日〕小野川秀美编《民报索引》(上、下), 京都,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1969)。

表3 《天义》报刊载有关无政府主义文化思想的文章一览表

(1) 理论

主题	题名	作者(译者)	卷/发表时间
一、 中国 式 一 无 政 府 主 义	破坏社会论	去非子译述	第1卷/1907.6.10
	大盗与政府	何殷震述	
	道德与权力	何殷震述	
	废兵废财论	申叔	第2卷/1907.6.25
	人类均力说	申叔	第3卷/1907.7.10
	政府者万恶之源也	志达	
	保满与排满	志达	
	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一)	申叔	第4卷/1907.7.25
	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二)	申叔	第5卷/1907.8.10
	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一)	震/申叔	第6卷/1907.9.1
	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三)	申叔	第7卷/1907.9.15
	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二)	震/申叔	
	论新政为病民之根	申叔	第8、9、10卷/1907.10.30
	中国民生问题(一)	申叔	
	天义之证定	少年	
亚洲现势论	申叔	第11、12卷/1907.11.29	
中国民生问题(二)	申叔	第13、14卷/1907.12.30	
世界平等政府谈	划平王		
一、 国 学 一 和 无 政 府 主 义	李卓吾先生学说	不公仇	第1卷/1907.6.10
	唐铸万先生学说	亚公	第2卷/1907.6.25
	中国古代均贫富之制/富人之病民/	叔时	
	颜元斥土地不均之害		
	戴东原先生学术	去非	第3卷/1907.7.10
	西汉社会主义学发达考(一)	申叔	第4卷/1907.7.25
	西汉社会主义学发达考(二)	申叔	第5卷/1907.8.10
	非六子论	申叔	第8、9、10卷/1907.10.30
	鲍生学术发微	申叔	
	区田考序	申叔	第16-19卷合册/1908.?
区田考	梅毓		

续表 3

主题	题 名	作者(译者)	卷/发表时间
一 西 学 和 无 政 府 主 义	巴枯宁学术要旨		第 1 卷/1907.6.10
	苦鲁巴特金之特色(摘译日本久津藏 村无政府主义)	公权	第 3 卷/1907.7.10
	欧洲无政府党宗旨汇录:布鲁东无政 府主义大纲	公权	第 4 卷/1907.7.25
	节译俄杜尔斯德答日本报知新闻社书	去非	第 5 卷/1907.8.10
	欧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异同考	申叔	第 6 卷/1907.9.1
	社会契约说评论	民鸣	第 7 卷/1907.9.15
	斯撒纳尔无政府主义述略	自由	第 8、9、10 卷/1907.10.30
	俄虚无党与革命主义之差别	独应	第 11、12 卷/1907.11.29
	苦鲁巴特金无政府主义述略(一)	申叔	第 13、14 卷/1907.12.30
	杜尔斯特致支那人书	乌忧	
	社会主义与国会政策(一)	申叔	第 15 卷/1908.1.15
	苦鲁巴特金学说述略(二)	申叔	
	快愉之劳动	[俄]苦鲁巴金 著/申叔译	
	社会主义与国会政策(二)	申叔	
	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 festo)序言	[德]因格尔斯 著/民鸣译	
	未来社会生产之方法及手段	[俄]苦鲁巴金 著/申叔译	
	共产党宣言	[德]马尔克斯 ·因 格尔斯著/民 鸣译	第 16--19 卷合册/1908.?
	社会主义经济论	[英]哈因秃曼 著/齐民社同 人译	
	社会主义史大纲 面包略取	比利斯 [俄]苦鲁巴金 著/申叔译	
	无政府主义之哲理同理想	[俄]苦鲁巴金 著/齐民社同 人译	
俄国革命之旨趣 致中国人书	[俄]杜尔斯德 [俄]杜尔斯德 著/忧急译		
无政府共产主义之工人问答	马拉特斯丹 著/龔洋		
选举罪恶史			
ESPERANTO 词例通释总序	申叔		
ESPERANTO 词例通释			

(2) 妇女问题(限其代表性文章)

续表 3

主题	题名	作者(译者)	卷/发表时间
男女革命 / 家庭革命 / 社会革命	女子宣布书	何殷震述	第 1 卷/1907.6.10
	帝王与娼妓	何殷震述	
	论女子受制之原因	守民	
	震致留日女学生书	何殷震	
	女子复仇论(一)	何殷震述	第 2 卷/1907.6.25
	平权论	恢权	
	女子复仇论(二)	震述	第 3 卷/1907.7.10
	妇人与政治(译日本幸德秋水平民主义)	公权	
	幸德秋水来函	幸德秋水	
	女子复仇论(三)	震述	第 4 卷/1907.7.25
	呜呼三纲之国		
	毁家论	汉一	
	妇女选举权问题	独应	
	女子复仇论(四)	震述	第 5 卷/1907.8.10
	论女性劳动问题(一)	畏公	
	男盗女娼之上海/政府奖励实业	志达	
	女子劳动问题(二)	畏公	第 6 卷/1907.9.1
	女子解放问题(一)	震述	第 7 卷/1907.9.15
	妇女选举权问题	独应	
	女子解放问题(二)	震述	第 8,9,10 卷/1907.10.30
	女子复仇论(五)	震述	
	论女子当知共产主义	震述	
	节妇辨	凤词	
	女子非军备主义	震述	第 11,12 卷/1907.11.29
	废纲论	高亚宾	
	家庭革命(《新世纪》中节录《家庭革命》——家庭和教育)	(民)	
	女子教育问题	志达	第 13,14 卷/1907.12.30
	女子革命与经济革命	震述	
	异哉万国社会党对于女子选举权之提案		
	神州女报发刊词		
论中国女子所受之惨毒(未完)	震述	第 15 卷/1908.1.15	
女子问题研究	志达	第 16~19 卷合册/1908.?	

表4 《衡报》中有关无政府主义文化思想的文章一览表

主题	题 名	作者(译者)	卷/发表时间
一 中 国 式 一 无 政 府 革 命 / 世 界 新 语	发刊词	申叔	第1号/1908.4.28
	论国家之利与人民之利成一相反之比例	申叔	
	劝同志肆习世界新语		
	论共产制易行于中国		第2号/1908.5.8
	大杉荣君世界语 Esperanto 开班演说词(节录)		
	社会革命与排满		第3号/1908.5.18
	社会革命与排满(续)		第4号/1908.5.28
	张继君由巴黎来函(其一)	张继	
	论中国宜组织劳民协会		第5号/1908.6.8
	论中国宜组织劳民协会(续)		第6号/1908.6.18
	世界新语 Esperantisto 发达记		
	无政府革命与农民革命		第7号/1908.6.(?)
	论中国田主之罪恶		
	论农业与工业联合制可行于中国		
世界新语 Esperanto 发达记(续)		第8号/1908.7.8	
衡书三篇	申撰	第10号/1908.8.8	
	Esperanto 第四次大会杂报		

(除第9、11号之外的各期)

表5 《世界》画报(第1、2期)目次表(包含第3期目次预告)

《世界》第一期目次	《世界》第二期目次
世界各殊之景物(一)	世界各殊之景物(A)
公建筑	公建筑
都市	名山水
古迹	古迹
世界真理之科学(二)	世界真理之科学(B)
进化学说	微生物学
达尔文进化学说	穿照物体光
耗智尔进化学说	电传照相
世界最近之现象(三)	新式德律风
俄国议会	世界最近之现象(C)
俄乱一斑	西王遇险

续表 5

《世界》第一期目次	《世界》第二期目次
<p>           斯波国会            欧陆社会风潮            全法国教分离            上海权利之竞争 *            女权之膨胀 *            世界视线所聚 *            世界纪念之历史(四)            查尔斯第一之奇祸            华盛顿之故宅            鲁伊十六之惨剧            拿破仑之末路            世界进化之略迹(五)            交通机关              * :中国关系记事         </p>	<p>           樊须巫火山爆裂            旧金山地震            智利地震            鲸墨峡地震            香港风灾 *            英日亲睦            万国肺病研究会            德国陆军丑事            美拒日童入学            俄国饥荒            海牙平和会            商会团练 *            鸦片问题 *            淮北饥荒 *            世界进化之略迹(D)            教育 *            运动 *            演剧 *         </p>
《世界》第三期目次预告	
<p>           世界各殊之景物            英法德意之大博物院            欧美诸国之大公园            世界真理之科学            地质学合三色诸图            独轨火车            世界最近之现象            爱尔兰万国博览会            法国南部葡萄酒业人暴动            高丽灭亡         </p>	<p>           法国战斗舰炸裂            北京巴黎《摩托》车赛走            英国火车失事            葡萄牙王及太子被刺等大事            世界进化之略迹            中国近年之进步            美国黑人之进步            欧美女权之发展              (未刊行)         </p>



表6 《新世纪》刊载有关无政府主义文化思想的文章一览表

主题	题名	作者(译者)	号/发表时间
科学 / 教育	谈学	真	第7号/1907.8.3
	与人书	默子来稿	第15号/1907.9.28
	普及革命	民	第15号/1907.9.28
	续普及革命	民	第17号/1907.10.12
	进化与革命(进化与革命表证之二)	真	第20号/1907.11.2
	问革命	民	第20号/1907.11.2
	下夜杂说	民	第21号/1907.11.9
	谈学	真	第21号/1907.11.9
	四续普及革命	民	第23号/1907.11.23
	答问疑君	无政府党分子来稿	第29号/1908.1.11
	续无政府说	民	第32号/1908.2.1
	续无政府说	民	第33号/1908.2.8
	续无政府说	民	第34号/1908.2.15
	续无政府说	民	第40号/1908.3.28
	续无政府说	民	第41号/1908.4.4
	续无政府说	民	第43号/1908.4.18
	续无政府说	民	第46号/1908.5.9
	续无政府说	民	第47号/1908.5.16
	个性自由	石卷著/反节译	第49号/1908.5.30
	谈无政府之闲天	X与X	第49号/1908.5.30
	中国人之腐败病	燃料	第59号/1908.8.8
	续无政府说	民	第60号/1908.8.15
	中国人之程度	仰来稿	第64号/1908.9.12
	无政府主义以教育为革命说	燃	第65号/1908.9.19
	偷安愈久革命之代价愈重	革命党一分子来稿	第83号/1909.2.6
	达尔文一百年之纪念日	华伦西述/真译	第86号/1909.2.27
续达尔文一百年之纪念日	华伦西述/真译	第87号/1909.3.6	
异哉革命党竟有瓜分中国之能力	岁寒来稿	第89号/1909.3.20	
与友人书(论物理世界及不可思议)	燃	第116号/1909.12.18	
宗教迷信 / 道德革命	程度	燃/真	第2号/1907.6.29
	再续普及革命	民	第18号/1907.10.19
	三续普及革命	民	第20号/1907.11.2
	续革命原理	革新之一人著/真译	第23号/1907.11.23
	推广仁术以医世界观	来稿/燃	第37号/1908.3.7
	书某君邮筒后	燃	第42号/1908.4.11
	宗教问题	某君由北海道/燃	第54号/1908.7.4
	续宗教问题	某君由北海道/燃	第55号/1908.7.11
	死刑	燃/民	第82号/1909.1.30
	宗教谈	谁来稿	第97号/1909.5.15
	答谁君宗教谈	四元	第98号/1909.5.22
	日本人之道德	格雷夫原著/一译来稿	第110号/1909.8.28
	续日本人之道德	格雷夫原著/一译来稿	第111号/1909.9.4
	知与行	--民来稿	第114号/1909.10.16

续表 6

主题	题 名	作者(译者)	号/发表时间
礼教 / 祖宗 / 三纲 / 孔子 问题	此之谓中国圣人		第 1 号/1907.6.22
	祖宗革命一家庭革命之一	真	第 2 号/1907.6.29
	续祖宗革命	真	第 3 号/1907.7.6
	革命之原	墨者	第 10 号/1907.8.24
	三纲革命	真	第 11 号/1907.8.31
	论习惯之碍进化	鞠普来稿	第 50 号/1908.6.6
	无父无君无法无天	四无	第 52 号/1908.6.25
	排孔徽言	绝圣来稿	第 52 号/1908.6.25
	辩子	民	第 89、91、94、95、100 号 /1909.3.20~6.5
	答童子 舆论	民 夷	第 102 号/1909.6.19 第 120 号/1910.4.23
女性 解 放 论	歌帖		第 1 号/1907.6.22
	西人之结婚及成婚	一人来稿	第 2 号/1907.6.29
	歌帖余波	一人来稿	第 2 号/1907.6.29
	续歌帖余波	一人来稿	第 4 号/1907.7.13
	女界革命(节录)	真	第 5 号/1907.7.20
	男女之革命	真	第 7 号/1907.8.3
	续男女革命	真	第 8 号/1907.8.10
	申报之俾女同胞		第 11 号/1907.8.31
	书骚客对于游学荡子之慨言后	真	第 27 号/1907.12.21
	英妇力争选举之运动	醒/燃	第 27 号/1907.12.21
	续革命原理	革新之一人/真译	第 28 号/1908.1.4
	续革命原理	革新之一人/真译	第 29 号/1908.1.11
	续革命原理	革新之一人/真译	第 30 号/1908.1.18
	续无政府说	民	第 35 号/1908.2.22
	续无政府说	民	第 36 号/1908.2.29
	续无政府说	民	第 38 号/1908.3.14
	男女杂交说	鞠普来稿/燃	第 42 号/1908.4.11
	女德篇	鞠普来稿	第 48 号/1908.5.23
	毁家谭	鞠普来稿	第 49 号/1908.5.30
	观娼感念	初来欧洲者	第 54 号/1908.7.4
	答某君	燃	第 56 号/1908.7.18
	奥中女子之不嫁者	老汉来稿	第 60 号/1908.8.15
	工人	民	第 79 号/1908.12.26
论智识以外无道德	民/燃	第 79 号/1908.12.26	
无家庭主义	某君来稿	第 93 号/1909.4.17	
好淫之支那人	惩律者来稿	第 94 号/1909.4.24	

续表 6

主题	题 名	作者(译者)	号/发表时间
反对 国粹	好古	民	第 24 号/1907.11.30
	好古之成见	民	第 26 号/1907.12.14
	外来广告(吴敬恒与章炳麟书)	吴敬恒	第 28 号/1908.1.4
	续好古之成见	民	第 28 号/1908.1.4
	续好古之成见	民	第 30 号/1908.1.18
	续好古之成见	民	第 31 号/1908.1.25
	礼运大同释义	荷兰来稿	第 38 号/1908.3.14
	人类原始说	荷兰来稿/燃	第 39 号/1908.3.21
	大同释义	鞠普来稿	第 41 号/1908.4.4
	本馆广告	本馆	第 42 号/1908.4.11
	国粹之处分	反	第 44 号/1908.4.25
	外来广告(吴敬恒与章炳麟书)	吴敬恒	第 44 号/1908.4.25
	大同心理	鞠普来稿	第 46 号/1908.5.9
	书排满平议后	燃料	第 57 号/1908.7.25
	吴敬恒再答章炳麟书	吴敬恒	第 63 号/1908.9.5
	琴语(其一)	牛一来稿	第 64 号/1908.9.12
	异哉革命党竟有瓜分支那之能力	岁寒来稿	第 80 号/1909.1.16
	国粹笑话	夷	第 85 号/1909.2.20
	致爱新觉罗载沣君书	夷	第 99 号/1909.5.29
	书民吁报告白后	燃	第 115 号/1909.11.13
文字 革命/ 世界语	万国新语	醒	第 6 号/1907.7.27
	记万国新语会	醒	第 10 号/1907.8.24
	进化与革命(进化与革命表证之一)	真	第 20 号/1907.11.2
	万国新语之进步	醒来稿	第 34 号/1908.2.15
	续万国新语之进步	醒来稿	第 35 号/1908.2.22
	续万国新语之进步	醒来稿	第 36 号/1908.2.29
	编造中国新语凡例	醒来稿/燃注	第 40 号/1908.3.28
	新语问题之杂答	燃	第 44 号/1908.4.25
	续新语问题之杂答	燃	第 45 号/1908.5.2
	书验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	燃料	第 57 号/1908.7.25
	万国新语第四次大会		第 62 号/1908.8.29
	废除汉字议	苏格兰君来稿/燃	第 69 号/1908.10.17
	续废除汉字议	苏格兰君来稿	第 71 号/1908.10.31
	书神洲日报东学西渐篇后	燃	第 101 号/1909.6.12
	续书神洲日报东学西渐篇后	燃	第 102 号/1909.6.19
	续书神洲日报东学西渐篇后	燃	第 103 号/1909.6.26
	辟谬	上海沐君来稿/燃	第 118 号/1909.2.19
	鳞鳞爪爪	箴俗来稿	第 118 号/1909.2.19
	续辟谬	燃	第 119 号/1910.3.12
	陶斯道君致景教士书	木君来稿(译)	第 121 号/1910.5.21

续表 6

主题	题 名	作者(译者)	号/发表时间
其他 代表 性 理 论 , 除 翻 译 文 外	新世纪发刊之趣意		第 1 号/1907.6.22
	新世纪之革命		第 1 号/1907.6.22
	与友人书论新世纪	来稿/(答)	第 3 号/1907.7.6
	答 CHEE 氏	真	第 3 号/1907.7.6
	来书论新世纪发刊之趣意		第 4 号/1907.7.13
	答自由血氏	来稿/(答)	第 4 号/1907.7.13
	验新世纪丛书革命附答	(非社会党来稿)真	第 5 号/1907.7.20
	续来书论新世纪发刊之趣意	燃	第 5 号/1907.7.20
	来书(军魂)附答	真	第 6 号/1907.7.27
	(伸论)民族民权社会(三主义之……)	民	第 6 号/1907.7.27
	答旁观者	真	第 7 号/1907.8.3
	论种族革命党及社会革命党	真	第 8 号/1907.8.10
	答军魂氏第二次书	真	第 8 号/1907.8.10
	某氏与新世纪书附答	真	第 8 号/1907.8.10
	谈新世纪(附录兽与人)	真	第 13 号/1907.9.14
	问革命	真	第 20 号/1907.11.2
	答骚客书	真	第 29 号/1908.1.11
	无政府说(书民报第 17 号‘政府说’后)	民	第 31 号/1908.1.25
	呜呼立宪党	燃	第 33 号/1908.2.8
	无政府主义可以坚决革命党之责任心	四无	第 58 号/1908.8.1
呜呼立宪党	燃料	第 61 号/1908.8.22	
皇帝	燃	第 68 号/1908.10.10	
验时报‘论中国今日不能提倡……’	民	第 72 号/1908.11.7	
续劝劝劝	燃	第 116 号/1909.12.18	

表 7 中国社会党(包含社会党)期刊中有关文化问题文章目录

(限《新世界》、《社会世界》、《人道周报》、《良心》四种)

题 名	作 者	号/发表时间	类 别
新世界			
中华女子争参政权之开始	大白	第 1 期 1912.5.19	主张
言语与文字合一之研究			纪事
新世界之四面观(答或问)	煮空	第 4 期 1912.6.30	杂俎
咄咄!吾不解所谓公妻会者	煮尘	第 5 期 1912.7.14	杂俎
误认教育平等者曷听诸	煮尘		杂俎
心社趣意书	煮尘	第 6 期 1912.7.28	广告
煮尘客废姓说	师复、彼岸、纪彭	第 8 期 1912.8.30	杂录
			以上《新世界》

续表 7

题名	作者	号/发表时间	类别
今日之僧侣、出家不出家,平等不平等,奢金钱之罪恶也	不平	第1期 1912.4.15	时事月旦
自由婚	鼎成	第2期 1912.5.15	社会棒喝
法律与道德	铸九		
均贫富浅言、以平等教育为手续,以共产主义为目的	太虚	(第2,3,4期)	时事月旦
女子剪发议	张饒瑛		
论父子一纲亟宜废去	心根		
说伪	文典	第3期 1912.6.15	社会棒喝
恋爱自由	愤侠		
家庭压制	絮因	第3,4,5期)	时事月旦
十不解	愤侠		
大私篇	天放	第4期 1912.7.15	时事月旦
男女革命	怪侠		
广魂魄说	太虚	第5期 1912.11月	言论
世间物与社会主义	挟驾		
恋爱自由会征同志文	慧观	第5期 1912.11月	言论
废止婚姻制度	安镇		
自由乎、不自由乎	社会党人来稿	第5期 1912.11月	言论
三无主义之研究	社会党人来稿		
敬告今之所谓上流社会	社会党人来稿	杂俎 附录 以上《社会世界》	
论破除族姓为实行社会主义之起点	师复、彼岸、纪彭		
心社趣意书			
世界语(文法)			
本报宣言	真安	第1期 1913.1.26	宣言
人道进化之动机	端任	第3期 1913.2.16	社论
素食卫生学	伍廷芳	第4,5期 1913.2~3	学说
个人与社会	安真	第6期 1913.3.9	社论
社会主义与宗教	安真译	第9期 1913.4	译丛
公共心社约章			世界潮音
男女革命谈(一)	君怀		世界潮音
政府乎? 盗数乎?	安真	第12期 1913.4.20	记事
中国革命原论	叔鸾	第14,15期 1913.5	(每期末尾世界语栏) 以上《人道周报》
发刊辞	重忧	第1期 1913.7.20	发刊辞
世界之三大罪恶(一)	乐无	第2期 1913.8.20	论说
无政府之研究	迦身		
男女平等说	玄玄女士		
世界之三大罪恶(二)	乐无		
无神论	乐无		
女子参政商兑	无无		
爱恋自由会试办草章	率真		
无世界主义	华林		专件 杂俎 以上《良心》

表 8 师复早期有关文化问题文章目录

题 名	根 据	发表时间	内 容
造字时代之男女平等观	《香山旬报》 (据“师复集外文”)	1908.10	文字和女性
佛教之男女平等观		1908.10	佛教和女性
稀孔氏		1908.10	孔子批判
绸庵谏语		1909.10	学术、道德、反孔
不饮酒不吸烟与卫生	《师复文存》	1912.5	卫生问题
不用仆役不乘轿及人力车与平等主义		1912.5	平等问题
废婚姻主义		1912.5	女性问题
废家族主义		1912.5	家族问题

表 9 《民声》刊载有关文化问题文章目录

题 名	作 者	号/发表时间	内 容	
编辑绪言	师复	第 1 期 1913.8.20	宗旨	
无政府浅说	师复	第 2 期 1913.8.27	理论(教育等)	
介绍世界语团体	师复		世界语	
政府与社会党	师复		社会党	
再致吴稚晖书	师复/吴稚晖		理论(政治参与等)	
世界语问答	师复译	第 3 期 1913.12.20	世界语	
师复启事	师复		心社	
世界语第九次万国大会纪事	师复		世界语	
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	师复		理论(无政府概念)	
师复答凡夫书	师复	第 5 期 1914.4.11	心社	
环球世界语戒酒会消息	如晦译		世界语	
世界语与无政府党	安真译		世界语	
再续世界语万国大会纪事	李石曾/师复		理论(无政府概念)	
真民先生与师复书	师复	第 7 期 1914.4.25	素食主义	
素食主义浅说	师复译		反对军国与妇女	
告妇人	师复译		世界语	
环球世界语禁酒消息	师复		无政府理论	
论社会党	师复	第 9 期 1914.5.9	无政府理论	
续答端任	师复		广州世界语学校	
世界语消息	量能译意		家族问题	
反对家族主义	师复		素食和姓氏	
答恨疾	师复	第 10 期 1914.5.16	公历和宗教	
答无吾	师复		三无主义批判	
答乐无	师复		心社广告	
心社意趣书	师复		三无主义批判	
驳江亢虎(续)	师复	第 14 期 1914.6.13	中国无政府主义	
致无政府党万国大会书	师复		无政府理论	
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	上海无政府共产		第 15 期 1914.6.20	
.....	.....		第 16 期 1914.6.27	
答蔡雄飞	师复	第 19 期 1914.7.18	无政府理论	

续表 9

题 名	作 者	号/发表时间	内 容
答恨苍	师复	第 20 期 1914.7.25	无政府道德
答乐无	师复	第 21 期 1914.8.2	教育问题
答微觉	师复		男女问题
世界语素食会报出版/介绍	师复	第 22 期 1914.8.9	世界语/素食广告
世界语新刊			教育问题
答恨苍			教育问题
(师复死后)	颀父述	第 23 期 1915.5.5	师复传记
师复君行略		第 24 期 1915.5.15	进化问题
答宗宁		第 25 期 1915.6.1	进化问题
续答宗宁		第 27 期 1916.2.30	进化问题
答宗宁			(除外后期《民声》)

表 10 《新青年》前期中有关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一览表

(1915年9月~1919年5月/1卷1号~6卷5号)——新文化运动启蒙时期(“五四”事件以前)

## (一) 无政府派论说(包含蔡元培)

作 者	题 名	卷、号	发表时间
吴敬恒 (稚晖)	青年与工具	第 2 卷第 2 号	1916.10.1
	再论工具	第 2 卷第 3 号	1916.11.1
	论旅欧俭学之情形及移家就学之生活	第 4 卷第 2 号	1918.2.15
	致钱玄同先生论注音字母书	第 4 卷第 5 号	1918.5.15
	机器促进大同说	第 5 卷第 2 号	1918.8.15
	补救中国文字之方法若何?	第 5 卷第 5 号	1918.11.15
	(通信)注音字母	第 4 卷第 3 号	1918.3.15
	(通信)文学上之疑问三则	第 5 卷第 5 号	1918.11.15
蔡元培 (子民)	蔡子民先生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	第 2 卷第 5 号	1917.1.1
	以美育代宗教说	第 3 卷第 6 号	1917.8.1
	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	第 4 卷第 5 号	1918.5.15
	新教育与旧教育之岐点	第 5 卷第 1 号	1918.7.15
	劳工神圣!	第 5 卷第 5 号	1918.11.15
	欧战与哲学	第 5 卷第 5 号	
	德国分科中学之说明 (通信)	第 5 卷第 5 号	
恽代英	物质实在论 论信仰	第 3 卷第 1 号	1917.3.1
		第 3 卷第 5 号	1917.7.1

续表 10

作者	题名	卷、号	发表时间
黄凌霜 (凌霜)	托尔斯泰之平生及其著作	第 3 卷第 4 号	1917.6.1
	德意志哲学家尼采的宗教	第 4 卷第 5 号	1918.5.15
	世界语问题	第 6 卷第 2 号	1919.2.15
	马克思学说的批评	第 6 卷第 5 号	1919.5
	(通信) Esperanto 与现代思潮	第 6 卷第 2 号	1919.2.15
袁振英 (震瀛)	结婚与恋爱(高曼女士著)	第 3 卷第 5 号	1917.7.1
	易卜生传	第 4 卷第 6 号	1918.6.15
	近代戏剧论(高曼女士著)	第 6 卷第 2 号	1919.2.15
华林	与全国各县筹派公费留法商榷书	第 3 卷第 6 号	1917.8.1
	社会与妇女解放问题	第 5 卷第 2 号	1918.8.15
区声白 (声白)	(通信)论 Esperanto	第 5 卷第 2 号	1918.8.15
	(通信)中国文字与 Esperanto	第 6 卷第 1 号	1919.1.15
梁撝弦 (撝弦)	席渣谭	第 5 卷第 3 号	1918.9.15
	什么话? (三)女子道德与缠足	第 6 卷第 2 号	1919.2.15
尉克水 (克水)	巴枯宁传略	第 6 卷第 5 号	1919.5

## (二) 有关无政府主义论说

作者	题名	卷、号	发表时间
汝非 陈独秀	托尔斯泰之逃亡	第 1 卷第 2 号	1915.10.15
	欧洲之七女杰	第 1 卷第 3 号	1915.11.15
高一涵 钱玄同	近世三代政治思想之变迁	第 4 卷第 1 号	1918.1.15
	论注音字母	第 4 卷第 1 号	
钱玄同	(通信) Esperanto	第 4 卷第 2 号	1918.2.15
钱玄同	论注音字母	第 4 卷第 3 号	1918.3.15
陶履恭	(通信) 论 Esperanto	第 4 卷第 4 号	1918.4.15
周作人	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	第 4 卷第 5 号	1918.5.15
李大钊	新的! 旧的!	第 4 卷第 5 号	
陶履恭 李大钊	(通信) 论 Esperanto	第 5 卷第 2 号	1918.8.15
	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 的胜利	第 5 卷第 5 号	1918.11.15
	(通信) 论 Esperanto	第 5 卷第 5 号	
钱玄同	(通信) 中国文字与 Esperanto	第 6 卷第 1 号	1919.1.15
钱玄同	(通信) Esperanto/Esperanto 与现代思潮	第 6 卷第 2 号	1919.2.15
高一涵	斯宾塞尔的政治哲学	第 6 卷第 3 号	1919.3.15
周作人	日本的新村	第 6 卷第 3 号	
王光祈	工作与人生	第 6 卷第 4 号	1919.4.15



续表 10

作者	题名	卷、号	发表时间
其他	北京留法俭学会简章	第3卷第2号	1917.4.1
	北京大学同学俭学会启及简章	第3卷第2号	
	华法教育会鉴定《旅欧教育运动》	第3卷第3号	1917.5.1
	吴敬恒著《读音统一会进行程序》	第3卷第3号	
	师复著《伏虎集》	第3卷第5号	1917.7.1

(参见(韩)朴济均《中国‘巴黎小组’(1907~1921)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实践》,庆北大学校博士学位论文,1996年第137~138页)。

表 11 新文化运动时期第二代无政府派有关文化思想的文章一览表

(限《劳动》、《自由录》、《进化》、《奋斗》、《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五种)

题名	作者	号/发表时间	类别
论工党不兴由于工学不盛	稚辉	第1号/1918.3.20	论著
留美工读会记略	陈宗猷		劳动之友
在美之工读见闻	梁荫曾		
人生真义	陈独秀		
论旅欧俭学之情形及移家就学之生活	吴稚晖		
劳动教育	劳人	第2号/1918.4.20	论著
工人俱乐部之娱乐品(上篇)	稚晖		工学与科学
工人(转引《新世纪》)	民		劳动之友
工读主义与教育普及	雷沛鸿		
论旅欧俭学之情形及移家就学之生活(续)	稚晖		
英国工人大学校	纯纯	第3号/1918.5.20	工学与科学
论 Esperanto(质孙国璋先生及《新青年》诸子)	冰弦		附录
工读主义进行之希望	凌霜	第4号/1918.6.20	论著
为盛倡职业教育者进一解	劳人		
乡村教育	华林		
工人俱乐部之娱乐品(下篇)	稚晖		工学与科学
克鲁泡特金著《告少年》	真民译		劳动之友
机器促进大同说	稚晖	第5号/1918.7.20	论著
论乡村图书馆	家菊		工学与科学
留法之勤工俭学会			劳动之友
勤工俭学传序	子民		
勤工俭学传引言	石曾		
勤工俭学传书后	稚晖		
论旅欧俭学之情形及移家就学之生活(续)	稚晖		
			以上《劳动》

续表 11

题 名	作 者	号/发表时间	类 别
素食与道德 欧战后之女权 乡村教育 谈学(转引《新世纪》) 礼运大同释义(转引《新世纪》) 婚姻与恋爱	凌霜 华林 华林 真(李石曾) 荷兰来稿 高曼女士原著/震寰译 霜述	第 1 集/1917.7	论著   学说
世界语发明家柴门合甫博士事略 李石曾先生与实社社员之谈话 教育工会试办简章 万恶之原 世界语与无政府党 近代科学 自由恋爱 法兰西素食会 北京大学之进德会 少见多怪之《时事新报》	震寰 声白 托尔斯泰著 /凌霜译 震英	第 2 集/1918.5	传记 纪事 介绍 论著  译述 小说 记事  以上实社 《自由录》
本志宣言 学术上奴隶之心理 吾人何为而提倡世界语乎? 自由恋爱……共产……独身 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 女子自由问题之研究 师复主义 万恶社会与纯洁心社 北京大学新旧思潮之对抗进行与反对 党之造谣	凌霜 华林 声白译 几真致华林 凌霜 凌霜 凌霜 抱拒致记者 记者	第 1 号/1919.1.20  第 2 号/1919.2.20  第 3 号/1919.3 (师复纪念号)	论著   通信 论著  论著 通信 世界消息述评 以上《进化》
为自由而死 自由恋爱主义 理想方面的废除夫妻制度 实行自由恋爱之机会 我对于自由恋爱与自由结婚之意见 反对“自由恋爱”! 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 我对于女子解放的意见 破坏论(一) 破坏论(二) 革命与哲学 革命与哲学(续)	A. C 朱谦之 陈顾远 梦良 卢慧根 郑振铎 A. F A. J A. D A. I A. A A. A	第 2 号/1920.2.24 第 3 号/1920.3.10  第 4 号/1920.3.20  第 5 号/1920.3.30 第 6 号/1920.4.20 第 7 号/1920.4.30	“自由恋爱专号”      “破坏专号”   以上《奋斗》

续表 11

题 名	作 者	号/发表时间	类 别
新思潮之新人生观	吴康	第 1 号/1920.1.4	
就来的三自由	R		
我的工学主义观	黄天俊	第 2 号/1920.1.11	
学校公开问题	陈友琴		
学生解放问题	列悲		
介绍“工读互助团”	吴康		
教员待遇问题	谭鸣谦		
我的奋斗的人生观	吴康	第 3 号/1920.1.18	
文化运动的重要和着手的方法	缪金源		
度舍监制			
废止学校的考试制度	穗庭/敏干		
我的奋斗的人生观(续前)	记者	第 4 号/1920.1.25	
女子独立奖气样	吴康		
教育独立		第 5 号/1920.2.1	
我们的新宗教	潘传霖		
读陶行知先生的“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	仙榜		
教育独立(续前)	缪金源	第 6 号/1920.2.8	前期: 注重讨论 教育问题
批评朱谦之君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批评	潘传霖		
今日吾国教育现状的一般观	兼胜	第 7 号/1920.2.15	
读颜保良先生的“我们对于‘废止现在学校考试制度’的意见”	蔽轩	第 8 号/1920.2.20	
再评无政府共产主义(答兼胜君的批评)	魏建功	第 9 号/1920.2.27	后期: 注重宣传 无政府主义
再评无政府共产主义	朱谦之	第 10 号/1920.3.7	
介绍寰球世界语会	朱谦之		
“妇女解放”与“人类解放”	列悲		
废止学校一切不良的制度	影	第 11 号/1920.3.14	
批评朱谦之君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批评(答朱君的再批评无政府共产主义)	流冰		
反抗考试的宣言	兼胜	第 12 号/1920.3.21	
我的废止考试后之救济办法	朱谦之		
“学生解放问题的商榷”之商榷	一峰	第 13 号/1920.3.28	
介绍新文化中的有力大组织——有彻底觉悟、具体办法的互助团	列悲		
世界语与工党	益		
(略)	列悲	第 14 号/1920.5.1	劳动纪念号
“学生解放问题的商榷”之商榷(续)	(略)	第 15 号/1920.5.9	革命教育号
Bolshevism 和 Esperanto	列悲	第 16 号/1920.5.16	
	E. Adam	第 17 号/1920.5.23	
			以上《北京大学学生周刊》

## 参考文献

### 一 报刊

《清议报》

《新民丛报》

《苏报》

《俄事警闻》

《警钟日报》

《安徽俗话报》

《国粹学报》

《民报》

《世界》画报

《天义》

《新世纪》(包含《新世纪丛刊》)

《衡报》

《社会星》

《社会杂志》

《社会党月刊》

《新世界》

《社会世界》

《天声》  
 《人道周报》  
 《良心》  
 《民声》(包含《晦鸣录》)  
 《甲寅》  
 《新青年》(包含《青年杂志》)  
 《新民德》  
 《旅欧杂志》  
 《华工杂志》  
 《自由录》  
 《劳动》  
 《新潮》  
 《进化》  
 《工学》  
 《北京大学学生周刊》  
 《奋斗》

## 二 资料集、文集

[日]幸德秋水著、中国国民丛书社译《(社会主义)广长舌》，上海广智书局，1902。

[日]烟山专太郎著、金一编译《自由血》，上海东大陆图书译印局，1904。

[德]罗列著、张继译：《总同盟罢工》，东京，1907。

江亢虎：《洪水集》，上海社会星出版社，1913。

[俄]克鲁泡特金著、‘真社’译《克鲁泡特金的思想》，天津，1920。

朱谦之：《现代思潮批评》，新中国杂志社，1920。

江亢虎：《江亢虎博士演讲录》，东南大学出版部，1922。

吴稚晖：《吴稚晖学术论著》，上海，出版合作社，1926。

李石曾：《李石曾革命论著》，上海，革命周报社，1927。

师复：《师复文存》，革新书局，1927。

师复：《伏虎集》，上海民声社，1928。

王有立主编《吴稚晖先生文粹》（全四册），上海全民书局，1929。

江亢虎：《江亢虎文存初编》，上海中华书局，1932。

〔法〕邵可倡著、毕修勺译《进化与革命》，上海平明书店，1947。

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二编》，上海出版社，1953、1954。

张楠、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全五册），三联书店，1963、1977。

〔俄〕克鲁泡特金著、李平沅译《互助论》，商务印书馆，1963。

罗家伦主编《吴稚晖先生选集》（上、下），台北，1964。

〔日〕小野川秀美编《民报索引》（上、下），东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69。

沈云龙主编《吴稚晖先生纪念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

李又宁、张玉法主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 1842~1911》（上、下），台北，传记文学社，1975。

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专题资料选辑第1辑》，中华书局，1976。

汤志均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下），中华书局，1977。

〔日〕藤田正典：《新青年别卷》，东京，汲古书院，1977。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

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

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所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全六册），三联书店，1979。

张允侯、殷叙彝、洪清祥、王云开编《五四时期的社团》（全四册），三联书店，197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室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杨天石编《“社会主义讲习会”资料》，《中国哲学》第1辑，1979。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下），中华书局，1979。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全四册），北京出版社，1979。

张允侯、殷叙彝、李峻晨编《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李石曾先生文集》（上、下），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0。

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全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王云五主编《民国李石曾先生煜瀛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

王云五主编《民国吴稚晖先生敬恒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

王云五主编《民国张静江先生人杰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

沈云龙主编《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台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中央档案馆等编《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全八册),中华书局,1981。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全十一册),中华书局,1981。

冯自由:《革命逸史》(全五册),中华书局,198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三联书店,1981。

钟离梦、杨凤麟主编《无政府主义批判》(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1~4),辽宁大学出版社,1981。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研室编《中国无政府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

杨天石编《“社会主义讲习会”资料》(续),《中国哲学》第9辑,1983。

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全五册),人民出版社,1983、1986。

林代昭、潘国华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上、下),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辽宁大学哲学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续集—8》,辽宁大学出版社,1984。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恽代英文集》(上、下),人民出版社,1984。

张磊整理《师复集外文》(一、二),《中国哲学》第12、13辑,1984、1985。

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高军、王桢林、杨树标主编《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全七册），中华书局，1984。

姜义华编《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

北京师范大学校史资料室编《五四运动与北京高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北京师范大学校史资料室编《匡互生与立达学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全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李妙根编《刘师培论学论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日〕玉川信明、坂井洋史、嵯峨隆编译《中国アナキズム运动の回想》，东京，总和社，1992。

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全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全十二册），中华书局，1994。

〔日〕坂井洋史、嵯峨隆编《原典中国アナキズム史料集成》（全十二册，别册一），东京，绿荫书房，1994。

胡适：《胡适文存》（全四册），黄山书社，1996。

李妙根编《国粹与西化——刘师培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刘师培：《刘申叔遗书》（全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7。

〔俄〕克鲁泡特金著、巴金译《面包与自由》，商务印书馆，1997。

蔡元培：《蔡子民先生言行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王世儒编撰《蔡元培先生年谱》，（上、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朱维铮主编《康有为大同论二种》，三联书店，1998。

朱维铮主编《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三联书店，1998。

张宝明、王中江主编《回眸“新青年”》（全三册），河南文艺出版社，1998。

沈永宝编《钱玄同五四时期言论集》，东方出版中心，1998。

### 三 著作

#### 1 中文

吴相湘：《民国人物传》（第1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

郭湛波：《近代中国思想史》，台北，龙门书店，1973。

李文能：《吴敬恒对中国现代政治的影响》，台北，正中书局，1977。

李日章编撰：《现代中国思想家》（第5辑），台北，巨人出版社，1978。

蔡韦编著《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反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中），人民出版社，1981。

〔日〕小野川秀美著、林明德、黄福庆译《晚清政治思想研究》，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2。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

林茂生等：《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1919～1949）》，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张文伯：《吴稚晖先生传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

郑宪著、陈孟坚译《同盟会……其领导、组织与财务》，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

刘其发主编《近代中国空想社会主义史论》，华夏出版社，1986。

陈孟坚：《民报与辛亥革命》（上、下），台北，正中书局，1986。

罗福惠、唐文权：《章太炎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陈之骅：《克鲁泡特金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袁伟时：《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上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

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等编《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上、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

刘桂生、张步洲编《台港及海外五四研究论著摘要》，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

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编委会：《中国近代文化问题》，中华书局，1989。

刘桂生主编《时代的错位与理论的选择》，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

蔡元培研究会编《论蔡元培》，旅游教育出版社，1989。

徐善广、柳剑平：《中国无政府主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

李良玉：《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景克宁、赵胆国：《景梅九评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路哲：《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

吴熙钊：《中国近代道德启蒙》，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美〕周策纵等著、周阳山编《五四与中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1990。

吕美颐、郑永福：《中国妇女运动（1840~1921）》，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胡伟希编《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汤庭芬：《中国无政府主义研究》，法律出版社，1991。

肖万源：《中国近代思想家的宗教和鬼神观》，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

蒋俊、李兴芝：《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林代昭、潘国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杨奎松、董士伟：《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戴伟：《中国婚姻性爱史稿》，东方出版社，1992。

吴雁南等主编《清末社会思潮》，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近代日本思想史》（第2

卷), 商务印书馆, 1992。

马勇:《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龚书铎:《近代中国与文化抉择》,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张晓唯:《蔡元培评传》,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3。

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杨天石主编《民国掌故》,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3。

[美]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唐明邦主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潮》,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3。

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张岂之、陈国庆:《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 中华书局, 1993。

邓伟志:《近代中国家庭的变革》,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胡庆云:《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史》, 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4。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上、下), 中华书局, 1994。

鲜于浩:《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稿》, 巴蜀书社, 1994。

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 三联书店, 1995。

丁伟志:《中西体用之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美] 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汤志均:《近代经学与政治》, 中华书局, 1995。

马庚存:《中国近代妇女史》, 青岛出版社, 1995。

[美] 史华兹:《寻求富强: 严复与西方》,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美〕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陈少明、单世联、张永义：《被解释的传统》，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

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

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朱志敏：《五四民主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刘泱泱主编《辛亥革命新论》，湖南出版社，1996。

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美〕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邓星盈等：《吴虞思想研究》，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方光华：《刘师培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

蔡建国：《蔡元培与近代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

路小可：《民国大老——吴稚晖》，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

张宝明：《启蒙与革命——“五四”激进派的两难》，学林出版社，1998。

〔美〕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89～1920）》，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2 日文

盐田庄兵卫编《幸德秋水日记书简》（增补版），东京，未来社，1965。

丸山松幸：《五四运动》，东京，纪伊国屋新书，1969。

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东京，みすず书房，1969。

狭间直树：《中国社会主义の黎明》，东京，岩波书店，1976。

铃木靖之等：《日本无政府主义运动史》(1、2)，东京，黑色战线社，1979。

玉川信明：《中国の黒い旗》，东京，晶文社，1981。

丸山松幸：《中国近代の革命思想》，东京，研文出版，1982。

坂出祥伸：《中国近代の思想と科学》，京都，同朋社，1983。

有田和夫：《清末意识构造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84。

野村浩一：《近代中国思想世界——“新青年”の群像》，东京，岩波书店，1990。

斋藤道彦：《五四运动の虚想と实像》，东京，中央大学出版部，1992。

嵯峨隆：《近代中国アナキズムの研究》，东京，研文出版，1994。

### 3 英文

Scalapino, R.A./Yu, G.T. *The Chinese Anarchist Move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Press, 1961.

Woodcock, George. *Anarchism: A History of Libertarian Ideas and Movement*. New York: World Publishing, 1962.

Schwartz, Benjamin.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Joll, J. *The Anarchists*. New York: Grosset/Dunlap, 1964.

Kwok, D.W.Y.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 ~ 19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Avrich, Paul. *The Russian Anarchis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Chow, Tse - 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Wright Mary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 ~ 191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Capouya, E./Tompkins, K. *The Essential Kropotkin*. New York: Liveright, 1975.

Wang, Richard Tze - yang. "Wu Chih - hui: An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Biography" (Ph.D.de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Virginia, 1976) .

Bernal, Martin. *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 Ithaca/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Pennock, J.R./Chapman, J.W.ed. *Anarchis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8.

Lin Yu - 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Fleming, Marie. *The Anarchist Way to Socialism: Elisee Reclus and Nineteen Century European Anarchism*. London; Croom and Helm, 1979.

Chan, Pik - chong Agnes Won. "Liu Shi fu (1884 ~ 1915): A Chinese Anarchist and the Radicalization of Chinese thought" (Ph.D.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79) .

Cohen, Paul A.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Chang, Hao.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Dirlik, Arif.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Zarrow, Peter. *Anarchism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Dirlik, Arif. *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 4 韩文

〔俄〕克鲁泡特金著、李乙奎译《现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创文阁，1973。

无政府主义运动史编纂委员会：《韩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史》，萤雪出版社，1978。

〔美〕周策纵著、曹秉汉译《5.4运动——近代中国的知识革命》，光民社，1980。

〔美〕Feierabend著、郑丙熏译《对于方法论的对抗——新科学观和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1980。

〔美〕Woodcock著、河岐洛译《无政府主义（思想篇）》，萤雪出版社，1981。

〔美〕Woodcock著、崔甲龙译《无政府主义（运动篇）》，萤雪出版社，1982。

〔俄〕克鲁泡特金著、河岐洛译《田园·工场·作业场》，萤雪出版社，1983。

〔俄〕克鲁泡特金著、河岐洛译《相互扶助论》，萤雪出版社，1983。

〔俄〕克鲁泡特金著、朴教仁译《一个革命家的回忆》，1985。

〔日〕丸山松幸著、千圣林译《中国近代的革命思想》，艺田社，1989。

赵京兰：《进化论对中国的受容与历史认识的转换》，成均馆大学校博士学位论文，1994。

自由社会运动研究会：《无政府主义研究》，国民文化研究所出版部，1995。

千圣林：《辛亥革命时期对于国粹学派的研究》，梨花女子大学校博士学位论文，1995。

朴济均：《中国‘巴黎小组’（1907~1921）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实践》，庆北大学校博士学位论文，1996。

吴章煊：《韩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史研究》，国学资料院，1998。

#### 四 论文

##### 1 中文（主题分类）

###### （1）清末民初无政府派一般论

杨天石、王学庄：《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

匡珊吉：《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破产》，《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李振亚：《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今昔》，《南开学报》，1980年第1期。

彭英明：《评辛亥革命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文汇报》，1980年2月25日。

陈汉楚：《无政府主义浅议》，《读书》，1980年第6期。

沈骏：《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潮初探》，《华中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

李光一：《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破产》，《史学月刊》，1981年第2期。

孙茂生：《中国无政府派的政治思想》，《求是学刊》，1981

年第5期。

周子东：《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徐善广：《试论中国无政府主义的特点》，《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6期。

陈汉楚：《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中国哲学》第7辑，1982年。

蒋俊：《无政府主义传入与二十世纪初年的革命风潮》，《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3年第1辑。

胡绳武、金冲及：《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收入《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汤庭芬：《辛亥革命前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述评》，《政治学研究资料》，1985年第2期（《近代中国空想社会主义史论》，华夏出版社，1986）。

蒋俊、李兴芝：《建国以来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思潮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收入（《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述评》，人民出版社，1986）。

汤庭芬：《本世纪初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立足的主要原区浅析》，《政治学研究资料》，1986年第2期。

王思义：《评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的特点及其思想影响》，《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

蒋俊：《外国无政府主义论著汉译目录》，《中国哲学论丛》，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

汤庭芬：《关于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的作用问题》，《政治学研究资料》，1987年第2期。

胡继申：《论辛亥革命前无政府主义对革命党人的影响》，《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

汤庭芬：《梁启超与早期中国无政府主义》，《近代史研究》，

1989年第3期。

熊启珍：《20世纪初年中国的无政府主义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武汉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翟文奇：《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论要》，《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6期。

刘勇：《无政府主义在近代中国广泛传播的原因》，《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

〔美〕沙培德：《辛亥革命中的激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收入《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下），中华书局，1994。

马小泉：《辛亥前后无政府主义与民族主义变异》，《河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 （2）天义派

王有为：《试析章太炎〈亚洲和亲会约章〉》，《学术月刊》，1979年第6期。

彭英明：《〈悲伯篇〉性质质疑》，《学术月刊》，1980年第5期。

汤志钧：《关于亚洲和亲会》，《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辑，1980年9月。

蒋俊：《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剖析》，《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1年第2期。

吴雁南：《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贵州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

李润苍：《章太炎与日本的无政府主义》，《学术月刊》，1982年第6期。

何若钧：《论刘师培政治思想的演变》，《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李妙根：《论辛亥革命前后刘师培的政治思想》，《求是学刊》，1983年第4期。

杨天石、王学庄：《论〈天义报〉刘师培等人的无政府主义》，《近代史研究专号：近代中国人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李妙根：《〈悲佃篇〉的巨大贡献和可悲结论》，《安徽史学》，1985年第1期。

吴雁南：《刘师培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思想》，《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

经盛鸿：《论刘师培的前期思想发展》，《徐州师院学报》，1988年第2期。

周新国：《试析1903~1908年刘师培的政治思想》，《江海学刊》，1989年第1期。

朱维铮：《刘师培：一个“不变”与“善变”的人物》，《书林》，1989年第2期。

翟文奇：《刘师培无政府主义思想活动述评》，《江西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

经盛鸿：《张继》，《民国档案》，1993年第1期。

赵炎才：《刘师培的理想王国》，《毕节师专学报》，1993年第1、2期。

〔美〕沙培德：《何震与中国无政府女权主义》，《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22》，1993年第5期。

〔日〕富田升：《社会主义讲习会与亚洲和亲会》，《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22》，1993年第5期。

郑师渠：《章太炎刘师培交谊论》，《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6期。

杨天石：《刘师培举报章太炎》、《刘师培举报章太炎引起的风波》、《刘师培举报章太炎引起的风波的馀波》，收入《民国掌故》，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

蒋俊：《论刘师培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思路》，《齐鲁学刊》，

1994年第1期。

陈奇：《讲习会派社会主义思想探析》，《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

杨天石：《何震揭发章太炎》，《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

### (3) 新世纪派

安嘉芳：《“新世纪”之始末及其言论之分析》，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1977。

汤庭芬：《关于新世纪派的“社会革命手段”问题》，《江汉论坛》，1985年第12期。

李柏玲：《吴稚晖与早期无政府主义宣传》，《大庆师专学报》，1989年第1期。

周为号、钟声：《吴稚晖无政府主义思想剖析》，《江苏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

蒋俊：《“新世纪派”思想研究》，《文史哲》，1991年第2期。

刘义生：《张静江评析》，《史学月刊》，1992年第6期。

汪晖：《吴稚晖与中国反传统主义的科学观》，《学人》第3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

张明：《新世纪派文化思想探究》，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7年5月。

〔韩〕曹世铉：《论严复的“天演论”与李石曾的“互助论”》，收入《严复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98。

### (4) 中国社会党（包含社会党）和师复的民声派

夏良才：《试论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党》，《历史教学》，1980年第4期。

曾业英：《民元前后的江亢虎和中国社会党》，《历史研究》，

1980年第6期。

郑学稼：《刘师复和他的思想》，《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社会主义》，1980。

徐善广：《评辛亥革命时期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武汉师院学报》，1981年第3期（武汉师范学院编《辛亥革命论文集》，1981）。

周新月：《刘思复》，《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82年第1期。

杨材玉：《评民国初年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学术月刊》，1983年第2期。

汤庭芬：《评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江汉论坛》，1983年第8期（《近代中国空想社会主义史论》，华夏出版社，1986）。

张磊、余炎光：《论刘师复》，《近代史研究专号：近代中国人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皮明麻：《民初刘师复无政府主义之兴亡》，《辛亥革命与近代思想》，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周海乐：《江亢虎和中国社会党》，《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蒋俊：《略论〈极乐地〉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意义》，《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

汪佩伟、李熠曾：《江亢虎的“新民主主义”研究》，《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2期。

夏四清：《1911～1913年中国社会党述论》，《深圳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刘贵福：《刘师复社会主义思想述论》，《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

徐弋生：《社会党魁江亢虎的堕落》，《民国春秋》，1995年第3期。

〔美〕德利克、克列布斯：《民国初年的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国外近代史研究》第5号。

(5)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无政府派

黄岳海：《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辽宁师院学报》，1979年第4期。

于清河：《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理论与实践》，1980年第2期。

李华兴：《民主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复合体——蔡元培政治思想初探》，《复旦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方庆秋：《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无政府主义派》，《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

马成功：《党的创立时期在建党问题上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四川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

汤庭芬：《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派别及其分化》，《华中师院学报》，1981年第3期（《近代中国空想社会主义史论》，华夏出版社，1986）。

陈文彬：《五四时期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历史教学》，1981年第8期。

杨才玉：《建党时期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党史研究》，1982年第1期。

颌建中：《略论党的创立时期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兰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王永青：《建党时期陈独秀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求索》，1982年第2期。

杨世创：《建党时期旅欧中国共产主义者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南开学报》，1982年第6期。

邓野：《五四时期的工读互助主义及其实践》，《文史哲》，1982年第6期。



赵村方：《论二十年代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论战》，《东北师大学报》，1983年第1期。

汤庭芬：《试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破产》，《华中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近代中国空想社会主义史论》，华夏出版社，1986年）。

李兴芝、蒋俊：《关于建党前后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斗争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84年第4期。

戴茂林：《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原因》，《党史研究》，1986年第3期。

段绍珍：《五四时期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中州学刊》，1986年第3期。

顾训中：《试述无政府主义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党史研究》，1987年第3期。

郑雅茹：《论广东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与斗争》，《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胡玉海：《建党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刘放：《无政府主义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佛山大学佛山师专学报》，1988年第1期。

史也夫、刘云久：《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点及其历史评介》，《北方论丛》，1989年第2期。

〔日〕狭间直树：《五四运动的精神背景——对恽代英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历史评价》，《广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

云庆秋：《江亢虎的‘新主义’与中国社会党的浮沉》，《民国档案》，1989年第4期。

孟彭兴：《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兴衰与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史林》，1994年第1期。

范季莲：《李石曾与勤工俭学运动》，《史学月刊》，1991年

第2期。

公孙旬：《李石曾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

关敏：《试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接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其转变》，《沈阳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盛明：《无政府主义在四川的流传》，《四川党史》，1995年第3期。

马小泉：《五四以前无政府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关系》，《史学月刊》，1995年第5期。

〔美〕德利克：《新文化运动回顾——新文化思潮中的无政府主义及其社会革命观》，《国外近代史研究》第14号。

#### (6) 有关人物及思潮

杨天石：《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新建设》，1965年第2期。

杨天石：《章太炎与端方关系考析》，《南开学报》，1978年第6期。

丁守和：《陈独秀与新青年》，《历史研究》，1979年第5期。

朱维铮：《〈民报〉时期章太炎的政治思想》，《复旦学报》，1979年第5期。

季甄馥：《蔡元培社会政治思想初探》，《江西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

吴光：《论〈新青年〉反对鬼神迷信的斗争》，《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

吴根梁：《辛亥革命前后的陈独秀》，《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

吴雁南：《刘师培与〈中国民约精义〉》，《历史知识》，1981年第4期。

罗福惠：《试析国粹派经学的二重性》，《纪念辛亥革命七十

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下册),中华书局,1983。

李喜所:《论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潮》,《辛亥革命史丛刊》第5辑,1983年。

李侃:《清末士大夫思想演变的缩影——读〈忘山庐日记〉》,《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万易:《刘师培年表》,《文教资料简报》,1985年第2期。

经盛鸿:《〈刘师培年表〉史事订正》,《文教资料简报》,1985年第4期。

姚伟:《刘师培与资产阶级方志学》,《中国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4期

胡逢祥:《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史学》,《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

杨汉鹰:《西方社会主义输入与中国传统的‘平均’思想》,《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

刘桂生:《晚清“墨学复兴”与社会主义传入中国》,《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4期。

王有为:《章太炎与〈民报〉》,《近代中国人物》第三辑,重庆出版社,1986。

陈奇:《刘师培的经学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宣传》,《贵州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

陈奇:《刘师培的汉、宋学观》,《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

范明礼:《清末资产阶级国粹派的几个问题》,《辛亥革命史丛刊》第7辑,1987年。

王凌:《有关刘师培一则早期反清史料》,《历史档案》,1988年第3期。

郑师渠:《略论20世纪初年的文化反思》,《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

陈奇：《刘师培对传统经学的批判》，《贵州师大学报》，1989年第2期。

朱志敏：《论五四时期的平民主义思潮》，《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

左双文：《论“苏报案”中的章吴之争》，《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

龚书铎：《辛亥革命与文化》，《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

李翔海：《论章太炎的民粹思想》，《浙江学刊》，1989年第6期。

〔美〕戴维翰：《蔡元培与东西文化融合》，《论蔡元培》，旅游教育出版社，1989。

胡家玉：《蔡元培与社会主义思潮》，《论蔡元培》，旅游教育出版社，1989。

陈奇：《刘师培的今古文观》，《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2期。

龚书铎：《晚清西学约议》，《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2期。

房德邻：《论国粹主义》，《中州学刊》，1991年第3期。

曹靖国：《刘师培史学思想述评》，《东北师大学报》，1991年第6期。

郑师渠：《略论晚清国粹派的崛起》，《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李喜所：《略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思潮》，《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杨立人：《蔡元培主观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贵州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

赵宝泉：《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暗杀风潮述评》，《山东师大学报》，1992年第4期。

浦伟忠：《论刘师培〈左庵集〉的学术思想》，《清史研究》，

1992年第4期。

郑师渠：《晚清国粹派与社会学》，《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5期。

郑师渠：《晚清国粹派的文化观》，《历史研究》，1992年第6期。

吴雁南：《刘师培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与心学》，《贵州社会科学》，1992年第11期。

王立兴：《刘师培戏剧起源观论略》，《中国近代文学考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朱宗震：《中国的文艺复兴——本世纪初期的一个合理期望》，《走向近代世界的中国》，成都出版社，1992。

毛丹：《论‘五四’前〈新青年〉的价值评估》，《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2期。

田秉鐸：《〈新青年〉杂志与中国人权启蒙》，《淮海文汇》，1994年第1期。

陈奇：《刘师培的‘六经皆史’观》，《贵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李洪岩、仲伟民：《刘师培史学思想综论》，《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

蔡世华：《康有为‘尊孔’和五四‘打倒孔家店’》，《历史教学》，1994年第10期。

丁伟志：《晚清国粹主义述论》，《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

王宪明、舒文：《近代中国人对卢梭的解释》，《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

李叶领：《辛亥革命时期的邓实及其中西文化观》，《历史档案》，1995年第3期。

刘民山：《李大钊与幸德秋水》，《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

4期。

方志华：《试论刘师培对〈左传〉的整理和研究》，《孔子研究》，1995年第4期。

吴光兴：《刘师培对中国学术史的研究》，《学人》第7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李永昌：《觉醒前的狂热——论‘公理战胜’和‘劳工神圣’两个口号》，《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

李占领：《简论邓实的中西文化观》，《辛亥革命新论》，湖南出版社，1996。

〔日〕竹内善朔：《本世纪初日中两国革命运动的交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号。

〔日〕石田母正：《中国革命与幸德秋水》，《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号。

## 2 日文

小野川秀美：《刘师培と无政府主义》，《东方学报》36，1964（《清末政治思想研究》，1969）。

有田和夫：《清末におけるアナキズム》，《东方学》30，1965。

平野义太郎：《〈天义〉及び〈新世纪〉について》，《アジア经济旬报》637，1966。

野原四郎：《アナキズムと五四运动》，《アジアの历史と思想》，1966年。

狭间直树：《刘思复と〈民声〉——民国初年における中国の无政府主义》，《思想》578，1972。

森时彦：《民族主义と无政府主义——国学の徒、刘师培の革命论》，《辛亥革命の研究》，筑摩书房，1978。

嵯峨隆：《无政府主义者としての刘师培》，《アジア研究》26～1，1979。

川上哲正：《民国初年のアナキズム——刘师培の社会主义论》，《学习院史学》，1982。

嵯峨隆：《辛亥革命前の李石曾——〈新世纪〉时期を中心に》，《石川忠雄教授还历纪念论文集——现代中国と世界》，庆应通信，1982。

佐藤丰：《〈国粹学报〉志上に於ける‘国粹主义’と‘国学’の成立》，《日本中国学会报》34，1982。

嵯峨隆：《最近の中国におけるアナキズム研究の动向》，《アジア经济》25，1984。

嵯峨隆：《〈苏报〉时期の刘师培について》，《八戸大学纪要》5，1986。

嵯峨隆：《吴稚晖の出发——‘陋儒’から‘革命家’へ》，《东亚》227，1986年5月。

嵯峨隆：《清末における革命と传统——アナキズムを中心に》，《アジア研究》第34卷第3期，1988年1月。

海老谷尚典：《章炳麟における种族革命と无政府主义》，《广岛哲学会》3、4，1988年（《哲学》34，1982）。

坂井洋史：《近年の中国アナキズムの研究おめぐって》，《中国社会と文化》，东大中国学会，1988。

坂井洋史：《近代中国のアナキズム批判——章炳麟と朱谦之をめぐって》，《一桥论丛》第101卷第3号，1989。

砂山幸雄：《〈五四〉の青年像——恽代英とアナキズム》，《アジア研究》第32卷第2期，1989年2月。

狭间直树：《五四运动の精神的前提——恽代英アナキズムの时代性》，《东方学报》第61卷，1989年3月。

嵯峨隆：《民国初年におけるアナキズム》，《アジア研究》37，1990。

石川洋：《师复と无政府主义——その理论与价值观を中心

に》，《史学杂志》第102卷第8号，1993。

上村希美杂：《初期社会主义の辛亥革命观——片山潜と堺利彦を中心に》，《海外事情研究‘态本商科夫’》第20卷第2期，1993年2月。

嵯峨隆：《刘师复とアナキズム——辛亥革命から5.4への架桥》，《法学研究（广大・法）》第66卷第5期，1993年5月。

石川洋：《师复と无政府主义——その理论与价值感を中心に》，《史学杂志》第102期第8号，1993年8月。

### 3 英文

Bernal, Martin. The Triumph of Anarchism over Marxism 1906 ~ 1907,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 ~ 1913*, pp.97 ~ 142.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Bernal, Martin. Chinese Socialism before 1913, *Modern China's Search for a Political Form*, pp.65 ~ 9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Bernal, Martin. Liu Shih-p'ei and National Essence,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pp.90 ~ 112.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Furth, Charlotte.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ese Conservatism", In Charlotte Furth, ed.,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on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pp.22 ~ 56.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Jansen, Marius. "Japa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2 part2, pp.339 ~ 37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Dirlik, Anf/Krebs, E.S. Socialism and Anarchism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Modern China*, pp.117 ~ 151. 1981.4.

Furth, Charlotte. "Intellectual Change: From the Reform Move-



ment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1895 ~ 1920",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2, part1, pp.322 ~ 40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Dirlik, Ari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Revisited——Anarchism and the Idea of Social Revolution in New Culture Thinking, *Modern China*, pp.251 ~ 300. 1985. 7.

Dirlik, Arif. Vision and Revolution——Anarchism in Chinese Revolutionary Thought on the Eve of the 1911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pp.123 ~ 165. 1986. 4.

Chang, Hao. *Liu Shih - p'ei (1884 ~ 1919),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 (1890 ~ 1911)*,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146 ~ 179. 1987.

Zarrow, Peter. He Zhen and Anarcho - Feminism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pp.796 ~ 813. 1988. 11.

Dirlik, Arif. The Revolution That Never Was——Anarchism in the Guomindang, *Modern China*, pp.419 ~ 462. 1989.

#### 4 韩文

闵斗基：《蔡元培（1868～1940）思想的构造理解》，《历史和人间的对应》，1984。

金泰丞：《民国初期，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高丽大学校大学院硕士学位论文，1986。

金世殷：《中共创立时期对于思想斗争的一考察——以无政府主义论争为中心》，《成大史林》第5辑，1989。

朴济均：《‘五四期’李石曾的思想和活动》，汉城大学校大学院硕士学位论文，1988。

千圣林：《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革命论》，《梨大史苑》第24、25合辑，1989。

千圣林：《章炳麟（1869～1936）的资本主义批判——以

〈民报〉时期为中心》，《东洋史学研究》第38辑，1991。

吴章焕：《1920年代在中国韩人无政府主义运动》，《国史馆论丛》第25辑，1991。

千圣林：《清末女性解放论的一考察——以〈天义〉报为中心》，《女性学论集》第8辑，1992。

金贞和：《辛亥革命时期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认识》，《忠北史学》第4辑，1992。

吴章焕：《在佛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1903~1907）》，《韩国史学论丛》（下），1992。

千圣林：《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清末国粹学派的社会主义认识》，《梨花史学研究》第20、21合辑，1993。

朴济均：《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庆北史学》第16辑，1993。

朴济均：《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者的理想追求运动》，《1993年秋季东洋史学研究发表会要约文》，1993。

朴济均：《“工学”杂志中的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潮》，《中国现代史研究》第1辑，1995。

曹世铉：《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国家’和‘政党’的论议》，《东亚研究》第32辑，1996。

## 后 记

本书是我 1999 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博士学位论文《清末民初无政府派的文化思想》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无政府主义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所以研究这一思潮是极富意义的。过去的研究者大多注重中国无政府派的政治思想和运动方面，他们认为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且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政治理念。因为无政府派思想包含着虚无主义、恐怖主义、空想主义因素，所以该派在政治目标上最终失败。这些消极评价具有相当的道理。众所周知，由于无政府主义者对于日本的侵华战争、国共两党之间的国内战争等国内外主要问题上没有及时提出有效的现实方向与行动纲领，从而逐渐走向了衰退之路。

在对中国无政府派的政治思想与运动的研究已达到一定水平的前提下，我对无政府主义的另一个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以前无政府派的文化思想。例如，无政府派是否西化派，无政府主义与进化论、科学主义之间关系，无政府派文化革命论的具体内容及其内在逻辑，无政府主义文化思想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问题等。我在本书之中较注重的是在反专制、反封建问题上该思想所做出的积极贡献，该派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历史界限及其历史意义，我谨以此书求教于国内外其他专家学者。

在此书将出版之际，谨向多年来关心、帮助我的史学界老师和朋友们表示感谢。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导师龚书铎先生，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龚先生所给予我的教诲和启示。先生引发了我对清末民初思想史的兴趣，使我涉足研究这一领域。同时，在此书的写作过程中，先生又对我多所鼓励和鞭策。我还要感谢认真评审我的论文并参加答辩会的清华大学刘桂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彭明教授、北京大学房德邻教授、中华书局陈铮先生、北京师范大学郑师渠教授，他们中肯的宝贵意见，使我深受教益。其中我特别感谢刘桂生教授，他或为我查找资料提供帮助，或为我介绍研究信息，或为我关注本书出版。我还要感谢在韩国西江大学攻读期间的老师吉玄益教授、金翰奎教授、曹秉汉教授及许多同学，在此我要表示深深的谢意。另外本书能得以印行，我应当感谢阮芳纪先生的热心关怀，以及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学术文库”学术评审委员会诸位先生的宽容接纳。

在中国留学之时，我不能忘怀的还有几位学友：金容权、任春洙、都重万、李春馥、朴章培、任灵兰等。几年来，他们以真正的友谊给我提供了多种形式的帮助，感激之情，难以言表。借此机会，我要特别感谢任灵兰同学，她为修改本书的整个内容而提供了很多意见。我希望学位论文出版的好消息能与釜庆大学历史系李升荣教授、李源钧教授、朴花珍教授、李根雨教授和我的学生们一起分享。最后，我之所以能较为顺利地完成学位论文，是我的父母、妻子姜顺宝和其他亲人长期的同情理解与鼓励支持分不开的。

2001年12月

于韩国釜山釜庆大学研究室

##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稿约

一、凡向本文库提出申请，经评审通过入选的史学专著（25万字以内为宜），均获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全额资助，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并略致薄酬。

二、收入本文库的史学专著，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外国近现代史、中外关系史，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外交等领域，以近现代为主。

三、入选文库的专著，为有较高水平的，或解决重大课题，或确立新观点，或使用新资料，或开拓新领域的专题研究成果，尤欢迎优秀博士论文，但一般希望经过至少一年的修改。总之，不断提高学术水平，出精品，是文库的学术追求。

四、入选专著，必须遵守学术著作规范，要有学术史的内容和基本参考书目，引文、数据要准确，注释要规范，一律采取当页脚注。

五、申请专著，要由两位业内教授级专家的推荐（本文库的评、编委不做推荐人），出版时在封四署推荐人姓名和意见摘要。书稿应为已达到出版要求的齐、清、定作品。一般要求提供电脑打印稿。除手写稿外，申请书稿、申请表、推荐书均不退。切勿一稿两投。每年4月底为该年度申请截止时间。

六、欲申请者，可函索申请表。来函应有：书稿基本情况，作者简介、联系地址、邮编、电话、传真、电子信箱等内容。

文库编委会地址：北京海淀增光路 45 号中国工运学院院内  
7 号楼 211 室

邮 编：100037

电 话：(010) 68459176

传 真：(010) 68451844

E - Mail: ahorse @ 163bj. com

联 系 人：阮芳纪 (010) 68436791

沈 渊 (010) 64224505

2001 年修订

## 图书链接

### 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 区域发展比较（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徐 浩 著

大 32 开 定价：30.00 元

2002 年 4 月出版

ISBN 7 - 80149 - 712 - 0/K

本书叙述、分析了国内外学者关于农业和农民经济问题的观点和理论，对清代华北及同时期英格兰农民经济的发展变迁进行了系统、缜密的分析，探究了农业英格兰何以迅速走上工业化道路、而清代华北何以落后的深层原因。

读者对象：历史学专业研究者，大学本科学子

### 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王宏斌 著

大 32 开 定价：20.00 元

2002 年 4 月出版

ISBN 7 - 80149 - 713 - 9/K

作者认为,就清代前期海防思想来说,应当探讨当时人们的海洋观念、海防地理认识水平、禁海思想的渊源及其流变;就海防政策而言,应当研究清政府的海防对象与任务,移民政策、闭关政策与海防的关系;就海防制度来说,应当深入研究海防的兵力部署状况和特点,研究水师的会哨制度,战船、兵器修造制度;就重大事件来说,自然应当研究郑成功收复和统一台湾,乾嘉之际东南沿海的海盗问题,等等。该书研究的重点是海防地理认识状况、海防制度、禁海思想的渊源及其流变。

读者对象:中国史学研究、教学工作者及史学爱好者,大中型图书馆收藏

### 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 (1941~1947年)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李春放 著

大32开 定价:28.00元

2001年10月出版

ISBN 7-80149-585-3/K

本书系统探讨了1941~1947年间的伊朗危机及冷战的起源问题。冷战问题是国际问题及世界历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关于冷战的起源问题更是学者们关注的中心。本书通过对1941~1947年间,美国、英国、苏联在伊朗的矛盾冲突的研究,指出三国的矛盾冲突是伊朗危机的根本原因,而危机的升级又进一步加剧了三方的冲突,从而揭开战后冷战的序幕。本书作者李春放先生长期从事冷战问题研究,本书是其多年研究的结晶,言人所未言,有独到之处,尤其在材料方面,引述了大量新近解密的俄罗斯、美国的档案,从而使其立论更扎实,内容更为丰富。

读者对象:大学相关学科学生、教师,专业研究人员,外交及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等



## 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东周墓葬制度（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印 群 著

大 32 开 定价：22.00 元

2001 年 10 月出版

ISBN 7 - 80149 - 586 - 1/K

该书是采用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方法，选择一段特定的时间、一个特定区域，对中国古代墓葬制度做深入研究的一次尝试。正文包括六章，第一章是对黄河中下游地区东周时期典型墓地的内涵、分期、性质的介绍；第二至六章按时代顺序从葬式、墓室结构、葬具、礼器制度等方面，具体考察东周时期的墓葬制度，绪论和结语，从宏观角度探寻东周时期墓葬制度的演化过程及社会历史根源，考察凝聚于墓葬制度之中的社会历史。

读者对象：中国史学研究、教学工作者及史学爱好者，大中型图书馆收藏

## 清代私盐问题研究（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张小也 著

大 32 开 定价：19.80 元

2001 年 10 月出版

ISBN 7 - 80149 - 587 - X/K

本书在阐述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盐务及私盐情况的基础上，系统梳理、分析了清王朝有关盐务的政策措施以及私盐运销活动和发展情况，并对各地区的私盐活动及其特点、参与私盐活动的人员及其参与原因做了缕析。本书以经济学、法经济学和史学的观点，分析私盐活动产生、存在的原因及其影响，视界开阔，观点、方法均有独到之论，作者多年专研私盐问题，收集、列证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并具有较扎实的经济学理论素养，从而使

本书内容丰富，论证合理。

读者对象：大学历史系、社会学系学生、教师，专业研究人员

### 中国地名学史考论（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华林甫 著

大 32 开 定价：19.80 元

2001 年 10 月出版

ISBN 7-80149-342-7/K

中国地名学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末民初为界划分为传统地名学和现代地名学两大阶段。传统地名学依历史发展进程划分为六个时期，现代地名学可分为三个时期。作者认为，中国传统地名学对地名的研究只偏重于具体的、个别的地名记载与解释，而把地名作为整体看待，从而探讨其发展和分布普遍规律的论著是非常零星的，不成系统的。这是中国传统地名学最显著的特征，而现代地名学的发展，则受国际学术发展的影响比较明显。

读者对象：历史学研究领域学者和大学师生，民政部门工作人员等

### 元代史学思想研究（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周少川 著

大 32 开 定价：18.00 元

2001 年 10 月出版

ISBN 7-80149-589-6/K

元代史学思想在理学的影响下，呈现出不同于前代的思想特征。作者指出，理学的观点和方法，对史家的理性思辨提供了哲学依据，但史学没有成为理学的附庸。

元代史家冲破了夷夏之防，提出了进步的民族观，为民族文化融合及

统一国家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元代史家具有开阔的世界性意识，记载的范围比前代扩大，这对后世思想观念和学术发展有重要影响。

元代史家提倡务实、用世风气，尤其注重对经世文献的收集。

读者对象：历史学研究领域学者和大学师生

### 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近史探幽系列）

杨天石 著

大 32 开 定价：40.00 元

2002 年 8 月出版

ISBN 7-80149-016-9/K

杨天石，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长期研究中国文化史和中国近代史。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兼任职务有南京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史学会理事、《百年潮》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及《中国哲学》编委等。

我写这本书，目的是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以便进一步准确地阐述中国近、现代的历史。

现在的人们可能不很喜欢“斗争”这个词儿，但迄今为止的历史确实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斗争，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军事的，五颜六色，错综纷纭。斗争既将历史向前推行，又为历史涂抹油彩，使许多事件云遮雾绕，许多人面目走形。例如，蒋介石其人，或尊之为“千古完人”，或斥之为“十恶不赦”，都未免离真相过远。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还历史本相，正确地阐述、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

——杨天石

### 近代中国史事钩沉（近史探幽系列）

杨天石 著

大 32 开 定价：39.80 元

2001 年 1 月出版

ISBN 7 · 80149 - 016 - 9/K

消融一条条沉寂的冰河，再现云诡波谲的政治风浪，掀开一页页尘封往事的记载，吟哦感泣鬼神的文化悲歌，追寻一段段扭曲的印痕，演绎壮怀激烈的人生角斗场……在历史的拐角处蓦然回首，连缀起一鳞鳞文明的碎片，于是就有了著名学者杨天石的《近代中国史事钩沉》。它是对百年沧桑中国的一次重新读解，蕴涵于其中的，不仅是学术价值，更在于作者对祖国的热爱，对生活的热忱，对人生的追求，在于一种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

读者对象：史学工作者，研究机构，历史爱好者

### 史学新书评（1996～1997）（学术新书评）

七刊史学图书评论联合工作小组编

大 32 开 定价：20.00 元

2001 年 2 月出版

ISBN 7 - 80149 - 463 - 6/K

该书是《历史研究》等 7 家史学类杂志，1996～1997 年所刊图书评论的选萃。文章作者均为各相关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本着严谨、公正的学术态度，对有关图书进行客观的评述，或肯定其成就，或批评其不足，或在其基础上进一步阐发有关问题，尤为难得的是，这些文章中有相当部分是批评性书评，既有对内容不足的批评，也有对作者治学不严谨等的批评，更对少数涉及抄袭、粗制滥造的伪劣之作加以猛烈的批评，以正风气。

读者对象：史学研究者、教学者，社会科学工作者，大学生等

### 史学新书评（1998～1999）（学术新书评）

七刊史学图书评论联合工作小组编

大32开 定价：32.00元

2001年2月出版

ISBN 7-80149-464-4/K

该书选编了1998～1999年初发表在《历史研究》等7家史学刊物上的历史图书评论，这些被评的图书均是各编辑部经过认真核实，并由各相关领域的专家撰写。这些书评写作严谨，态度客观，或肯定或否定，均言之有据，不作空言，实事求是，对于个别伪劣之作，则予以严厉的批评，既批评其内容的不实，更批评其恶劣的学风与低下的道德，对于规范学术，严肃学术风气，很有必要。

读者对象：历史学研究、教学工作者，研究生大学生，社会科学研究者

### 近代东亚佛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何劲松 著

大32开 定价：22.00元

2002年4月出版

ISBN 7-80149-684-1/B

近代东亚佛教的发展变化，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近代日本佛教逐步沦为法西斯主义的工具和帮凶。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日本对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殖民统治，随着它对中国的军事进攻，日本佛教也大大扩展了其势力范围，主动配合、

推行日本政府的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东北地区都遭受了日本佛教的渗透和影响。

读者对象：近代史研究者、大学历史系学生、宗教研究者

### 中葡早期关系史（明清史研究丛书）

万明 著

大 32 开 定价：29.80 元

2001 年 6 月出版

ISBN 7-80149-539-X/K

万明，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专业研究生，1988 年获硕士学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室工作。1995~1996 年得到葡萄牙卡蒙斯学会资助，在里斯本大学进修葡文一学年。现任历史所明清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明史学会理事，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秘书长。

本书在前辈和同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中外关系史的视野出发，利用中外文献，梳理明清两朝的政治体制、对外政策、商留往来等，力图比较系统、全面地围绕澳门的历史探讨中葡早期关系的状况，昭示中葡关系早期曲折隐晦的演变脉络，以及鸦片战争后葡萄牙逐步占据澳门，中国逐步丧失对澳门行使主权的历史过程，并进行客观的理性分析和诠释。本书结构完整，资料翔实，是研究澳门及中西关系的填补空白之作。

读者对象：明清史、中外关系史、中葡关系史专业人员，政府部门外交外事活动单位、个人，媒体从业人员

### 近代的初曙：18 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明清史研究丛书）

高翔 著

大 32 开 定价：42.00 元

2000 年 12 月出版

ISBN 7-80149-379-6/K

本书从18世纪中国知识界选取近百个人物，按照伦理观念、生活方式、学术思想、政治观念分别进行考察，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示了18世纪中国的观念变迁和社会发展的历史画卷，揭示了18世纪中国的时代精神。作者探寻中国近代化的内在动因，通过大量材料否定了中国传统社会停滞说、静止说，特别是否定了国内外学术界流行的18世纪有考据而无思想的说法，开创了清史研究的新领域，填补了长达数十年无人问津的学术空白。

读者对象：研究明清历史、中国文化史、社会史的专业工作者，大专院校历史系师生，图书馆，资料室

### 唐宋茶业经济（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孙洪升 著

大32开 定价：26.00元

2001年1月出版

ISBN 7-80149-442-3/K

本书对唐宋时期的茶叶消费及茶法演变、生产条件、生产形态、生产技术、商品经济等从理论上做了全面的探讨和研究，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做了考辨与稽校，再以茶业经济中唐宋社会的结语殿后，把茶业经济放在历史长河的大背景下考察，提出了一些因茶业经济而引发的深层次问题。

读者对象：历史、经济系师生、研究者，爱好者

### 唐代翰林学士（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毛蕾 著

大32开 定价：15.00元

2000年10月出版

ISBN 7 - 80149 - 418 - 0 / K

本书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较全面而系统地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对某些问题如翰林学士人数、学士职责、学士权力大小变化等，进行了动态的研究，尤其将翰林院和学士院的出现与发展区别开来，将翰林学士与翰林待诏区分开来，多所创见。本书搜集资料丰富，分析问题清晰透彻，很有自己的独立见解。

读者对象：大学历史系、中文系师生，历史文学爱好者

### 古典书学浅探（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郑晓华 著

大 32 开 定价：23.80 元

2001 年 10 月出版

ISBN 7 - 80149 - 165 - 3 / K

作者从中国古典书学理论的整体发展状况入手，描述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书学理论的发展变化过程，其重点是围绕唐宋两代书学的主要命题进行对比研究，探寻书学理论发展脉络，说明古典书学理论的结构，揭示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规律。

读者对象：书法爱好者，中国古典文化爱好者，大中专院校文科专业师生

### 元代书院研究（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徐 梓 著

大 32 开 定价：13.80 元

2001 年 10 月出版

ISBN 7 - 80149 - 201 - 3 / K



本书主要论述了元代书院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分析了元代书院的结构与功能，援引了许多史实说明为何元代书院从表面上看是朱熹创办书院传统的继续，而实际上却极大阉割了书院自由讲学、独立研究的优良传统，从而说明和解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线路。

**读者对象：**历史学研究领域学者和大专院校师生